

新世纪学刊

New Century Journal

第九期

要目：

- ※ 南大生诗歌中的南大情意结和文化思考
- ※ 砂华文学的本土特质
- ※ 论南洋色彩文学对马华文学发展的意义
- ※ 新华当代戏剧作者评介
- ※ 论鲁迅小说中月的话语形构
- ※ 日军政权下的新马华侨华人教育
- ※ 菲华新诗史料汇集
- ※ 《遥远的期待》之文化认同



新加坡斯雅舍
亚细安（东盟）地区大型世华学术理论年刊
《新世纪学刊》的姐妹刊物——

新世纪文艺（半年刊）



新世纪学刊

New Century Journal

第九期



亚细安（东盟）地区大型世华学术理论年刊

斯華舍 出版

本学刊编辑及编务顾问

新世纪学刊第九期（2009年12月出版）

编辑：新世纪学刊编委会

Editor: New Century Journal

Editorial Committee

出版者：斯雅舍

Si Ya She

通讯处：150 Orchard Rd

#02-31 Orchard Plaza

Tel: 9012-2319

封面设计与刊名题字：廖宝强

排版装帧：城市精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http://www.cntopcs.com>

承印：东艺印务公司

Eastern Art Printing Company

Tel: (60)6292-8967

发行：新加坡商务印书馆

Block 211, Henderson Road,

#05-04,

Singapore 159552

电话: 6278-3535

准证号码：MICA (P) 031/10/2008

ISSN 0219-6085

售价：S\$12.00

海外：US\$8.00

本刊法律顾问：

黄锦西律师

刘华源律师

本刊顾问：

新加坡：

方修 新马华文文学史家兼作家

马来西亚

甄供 董教总教育中心研究员

文莱：

一凡 文莱华文作家

日本：

小木裕文 京都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部教授

菊池一隆 爱知学院大学部教授

美国：

陈葆珍 世华文协副监事长

加拿大：

詹文义教授 约克大学政治学系资深学者

陈国相教授 **University of Guelph**

中国：

李 庆 上海复旦大学兼日本金泽大学教授

周 宁 厦门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教授暨博导师

金元浦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

李一平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研究员

童 强 南京大学

中国思想家研究所研究员

李 勇 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刘登翰 中国华文文学家协会常务理事长

台湾：

陈映真 台湾名作家

香港：

忠 扬 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常务理事长

泰国：

岭南人 泰华文艺作家协会副会长

□ 新马文学研究

南大生诗歌中的南大情意结和文化思考	何逸敏	1
砂华文学的本土特质	田思	28
论南洋色彩文学对马华文学发展的意义	郑小燕	37
新华当代戏剧作者评介	欧清池	44
去来无处不天涯	李庆年	49

——清末留寓南洋诗人萧雅堂

□ 中国文史问题研究

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中的五四新文学	李勇	58
——夏志清对五四新文学的评价及其启示		
论鲁迅小说中月的话语形构	朱崇科	63
抒情美典的濠濮之思	杨旭辉	70
——浅论高友工教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石		
以卫风《氓》为例浅评《诗经》	郑享中	73

**□ 中日课题探索**

日军政权下的新马华侨华人教育	菊池一隆	76
论日本古典园林色彩的民族文化基因	曹林娣	82
宫崎骏动画电影的后现代主义现实关怀	吴雨平 张一楠	90

□ 争鸣

运用灵活手法表现内心世界	史英	95
凌江月的诗显露独树一帜特征	仲原	96
菲华新诗史料汇集	云鹤	99
汶莱华文文学的主要推手	林岸松	102
从网络术语看中西思维的碰撞与融合	卓梅华	104
文学作品中常见拟声词简表初稿（上）	忠扬	120

□ 书 评

南洋当代知识分子群像录

党 阳 132

——评析风沙雁先生的小说《遥远的期待》

逐梦、筑梦的民族文化“弘扬”者之歌

朱厚刚 翟 红 137

——评风沙雁长篇小说《遥远的期待》

文化困境中的破茧重生

张淑云 141

——风沙雁小说《遥远的期待》的文化认同

永远的遗憾

唐仁贵 145

——读《遥远的期望》的感伤

思想和往事

李 庆 147

——忆王元化先生

贾植芳先生散记

李 庆 154

一轴人间大爱与时代风云的历史画卷

朱厚刚 翟 红 157

——读马来西亚作家甄供的报告文学《华教春雷林晃昇》

汉语的同字异序词

覃盛发 160



□ 编后语

162



南大生诗歌中的 南大情意结和文化思考

新加坡 何逸敏

一、绪论

南洋大学（简称南大，以下同）曾是中国以外唯一的民办华文大学。

本文旨在从南大学生（简称南大生，以下同）的文学作品中检视他们流露出来的强烈直接或寓意含蓄的南大情意结，为何旧南大已并入国大近28年了，南大生的母校情结依然浓厚，难以释怀？

结合具体作品，研究的对象界定为诗歌，字里行间，捕捉南大生文学作品中的对南大情深意切的感情倾向的表现及其文化意涵的体现。在论析文本的同时，让我们感受旧南大生这种对母校的款款情怀，深深伤感，拳拳期冀，乃至引申至全社会的民族文化的黍离之伤的情感和华族留根的坚韧支撑。

重点分析一些和南大有关的诗歌作品，通过旧南洋大学学生的诗歌文学作品，探究时代大潮冲击对南大学生乃至当时整个华文教育和文化传承氛围的普遍影响力，试图了解南大生的南大情意结及民族的华文情意结的形成过程。阐述这种已根深蒂固的文化与民族的情意结导致对整个社会变革的不安、关注、挣扎和执著，南大生运用各种文体在文学作品中有明显及含蓄的充分体现。论文也将探讨在新形势下，南大生文学作品中的意识形态倾向与文化意涵应赋有的现实意义，让代表自强不息的南大精神继续在新形势下继续发扬光大。

1、研究目的和选题的意义及价值

当笔者读到由新加坡文人张泛（张振源）谱曲，杜南发作词的歌曲《传灯》¹时，久久震荡我心的是这不仅仅是一首家喻户晓的诗乐而已，它还是一种文化精神的象征，甚至在歌唱的过程中，还发展出一种仪式活动——传灯。相互点亮一盏盏的灯火，象征着文化传统的一代代传承。

杜南发是南大生，又因为本人在工作过程中接触和采访诸多南大生，促使我对南大生创作的文学作品产生了兴趣，继而广泛阅读，并涉猎南大的史论和校史，发现南大生的文学作品中流露出来强烈的南大情意结，我们探究时代大潮冲击下南大生文学作品中情意结与文化意涵，以及发扬他们对几千年中华文化的执著传承的精神，将是十分有意义的。这也是本文研究的目的与价值。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我们要把南大生的文学作品中感染到的爱校、爱国、爱中华文化的浓浓情意，赋予新时代的积极意义。诗歌是文学作品中的一种重要的形式，具有体现社会现实，紧跟时代脉搏的特点，更能寄托作者的情意结，体现南大生的心路历程。故选择南大生的文学作品中的诗歌作为研究方向。

南大生校友遍天下，薪烬火传，泽披四海，扬名五洲，选南大生文学作品来研究，是

1、作于1982年8月25日，发表于同一天举行的第一届金狮奖文艺创作比赛颁奖典礼。全文见附录1。

愿南大精神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光辉如传灯一般，千秋百代。

2、南大情意结的释义

一所代表东南亚人力财力，共襄盛举的华文大学，一群自觉肩负起传统文化传承使命的大学生，对母校依恋情深，南大生始终铭记校徽的涵义：“南大校徽是一座星和黄、蓝、红，三道光圈所组成的图案，这图案的总结构象征了交流、相辉与团结。”²

南洋大学，是马新两地华裔志坚不渝、排除万难，集资兴办的华文教育最高堡垒，南洋大学光荣诞生以后，虽然备受歧视，但在作为一间民办大学的基础上，力争上游，取得学术上的成就，扬名国际。

南大生对南大的拳拳之心岂止只是母校之情，这牵涉到南大生们对自己华族文化的语言、教育、民族意识等层面上的元素，这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南大被合并后，南大生充满着哀越校殇的情感？为什么引发更为深层的文化思考？“语言是民族的灵魂”，而事实上南大从创立到合并，无不是语言、文化、教育与民族权益的争取，一种民族精神的强烈体现。因此，南大情意结除了母校之情，更是鞠躬尽瘁，捍卫民族教育，深入新时代下文化思考的一颗赤子之心。

3、文化思考的释义

当南洋大学存在之日，为新马的华文教育建立起了完整的体系。南洋大学是先贤们筚路蓝缕，万众一心，出钱出力，流尽血汗，排除万难，艰辛擘划的巍峨学府，从成立到被迫接受合并的命运，前后只有二十五年短短的历史。

南大生们执着地追求，执着地思考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命运浮沉，要发扬光大还是在夹缝

中求生存？南大生们把历史与现实的负荷始终揽在胸怀，不能妄然辜负先贤的遗愿，更无限痛心下一代的文化断层。南大是一种象征，放眼看现实的华文文化式微的现象，从华文教育的断根危机到华文文化的断根警号，诸多有识之士的内心经历了一场与西方强势文化的抗衡与拔河较量。

南大走入历史，引发出华文教育在岛国的“消亡”课题，南大的实事已不容挽回，人们情不自禁地提起笔，基于对中华文化的坚持与执着，对民族教育的良知，大量的作品如新加坡河水般滔滔地倾诉着人们的愤慨，作家们借助意象，借题发挥，表达对于自己文化的无比热爱与智者的深刻思考。

4、前人研究综述与写作中存在的困难以及解决的办法

有关南大学生文学作品中的情意结与文化意涵的探究至今还没有前人专门著书论撰过，相关的文献似乎只有黄孟文博士的《新华微型小说与南洋大学的情缘》³和张森林⁴《当代新加坡伤痕文学及中国学者的解读（1981—2007）》⁵作过相应的论述。

由于时代的车轮已滚滚向前，南洋大学的今天和昨天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自从南洋大学在1980年并入国大后，岁月的久远，人事的变动，体制的改革，要完全还原旧南洋大学的“原貌”，正如南大的标志之一相思树一样，砍掉的树要回来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当事人所编的史料和部分南大生的回忆篇章，更从部分南大生的文学作品中，以及一些作者的叙述和回忆来拼接旧南洋大学的历史轨道，从而了解和剖析论文所要探讨的课题。这无疑是有一定的困难。

南大生的文学作品类型众多，题材广泛，

2. 《南洋大学校徽释义》，见《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特刊》，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筹委会，1993年4月15日，页1。全文见附录2。

3. 黄孟文《新华微型小说与南洋大学的情愫》，见黄孟文《微型小说微型论》，新加坡：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出版，2007年2月，页195—211，作于1997年1月8日。有关的部分节选见附录3。

4. 张森林，新加坡人，北京师范大学及新跃大学汉语言文学学士，新加坡年青的文学评论家，常用笔名“伍木”。

5. 张森林《当代新加坡伤痕文学及中国学者的解读（1981—2007）》，北京师范大学及新跃大学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论文。

有回忆体小说、诗歌集、单篇诗、散文集及回忆散文篇章，还有以南大生为主体的长篇小说，甚至笔力含蓄却寓意深刻的微型小说。但由于没有前人的研究资料可参考，惟有熟读这些文学作品文本，从中体验南大生那颗对母校的挚爱之情。沿着文字的轨迹，剖析南大生创作过程中的心路历程，情感起伏，然后从中发掘方块字深处折射出来的情意结与文化思考。

由于客观原因导致资料并不多，解决困难的方法是继续在南大生的文学作品中挖掘对论文有所帮助的元素。除了从文学作品中挖掘外，笔者当然也尽量收集南大生作者本身的心声，亲自访问作者本人或相关人士，倾听并记录当年他们怎样举起号角，吹响时代大潮下奋斗之歌的情境和过程，得到第一手资料。幸运的是我得到了一些南大生的热情协助，有机会访问一些历届南大毕业生，他们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资料、作品和建议。

众所周知，由于南大这个课题有一定的敏感性，有些当事人有意回避一些话题，泛泛而谈甚至不愿接受采访，有些则不愿提供他们当年的文学作品给笔者，这又无疑阻碍了论文的进度和深度。

在马来西亚的南方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法律图书馆和中文图书馆、南洋理工大学中文图书馆和华裔馆、国家图书馆总馆等

处也找到一些相关的资料。

二、南大情意结的背景

1、南洋大学的创立

20世纪的50年代，二战刚结束不久，新马仍是英国殖民地，此地华文教育发展深受变动的局势影响，华社领袖陈六使等人不惜倾注巨资创办南大⁶。随着1953年“南洋大学”校名的选定、“南洋大学创校宣言”⁷的发布，以及“南洋大学有限公司”法人地位的确立，海外华人第一所中文大学在新加坡云南园诞生了。

南大的创办体现了华裔先驱们艰苦卓绝的毅力以及华人社会重视教育的传统精神。“南洋大学”已经成为南大人甚至是新马乃至东南亚华人文化图腾，牵引着族人的文化记忆和情结。⁸

南大当时是中国以外唯一的民办华文大学，它的存在使新马华文教育体系趋于完整，是本区域华文教育的最高堡垒。1950、60年代是一个动荡和充满变数的时代，南洋大学也深受变动的波及。南洋大学经历了1950、60年代和1970年代的颠簸岁月，随着1980年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后，匆匆告别历史，结束新马华人教育史上富有传奇色彩与悲剧特性的使命。

6. 陈六使，1897年6月7日生于福建同安县集美乡，即今日之厦门市集美。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念完小学。1916年南来东南亚，1923年陈六使昆仲创业，成立联合橡胶公司，两年后成立益合橡胶公司。1930年代末，益和已晋身为新加坡、马来亚的大企业。与此同时，陈六使开始积极参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福建会馆、同安会馆等社团组织，热心筹办不少文教慈善事业。1937年担任新加坡橡胶公会主席。1939年向陈嘉庚提议中华总商会兴建中华大会堂及图书馆认捐了20多万元，约占所需经费的四分之一。1941年获选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副会长。1950年成为世界级的大股商。从那一刻起他将业务进行多元化经营。成了新马乃至东南亚著名的企业家。1950年他发动为马来亚大学筹款，率先认捐30万元。响应者亦共捐20万元，创全马为马大捐款的纪录。同年提出创办一所华文大学的意愿，1953年正式倡议，呼吁华人社会以自身的人力物力，摒弃帮派观念，创立一间华文高等学府，以满足当时华校高中毕业生渴望深造的迫切需求，并为新马社会培养各种专才。最终在陈六使的倡议带头捐款义举和华社领袖不惜倾注巨资与华族各阶层人士的努力下，成功创办了南洋大学。关于陈六使等创办南大参见附录4《南洋大学的创办人陈六使先生（潘受）》。
7. 南大筹备委员会《南大创立宣言》，李业霖主编《（1953—1980）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南大从创办到被关闭重要文献选编》，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5年5月，页23—24，发表于1953年4月7日。全文见附录5。
8. 李元谨《“南洋人文丛书”总序》，见李元谨主编《南洋人文丛书——南洋大学历史研究1》，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创作室，2006年3月，页Ⅲ。

“南大结束了25年的生命，走入了历史。虽然只有短短的25年，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南大学生，在大学建设与改革的整个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孕育和培养了南生对南大、对华文教育与华族文化传统的浓厚的情结。南大在新马乃至东南亚的政、经、文、教史上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尤其是它的‘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力争上游’的精神象征和内涵，即‘南大精神’，至今仍为后人所称颂，”⁹影响了南生的一生。

2、新马政治与南生情结对其诗歌的影响

“讨论南大学生与政治的关系是个敏感的课题。这是源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利益所产生的利害关系所致，更遑论意识形态之争和当前利益攸关。自1953年，南大成立以来到六十年代末这一历史时期，全世界民族解放独立运动非常蓬勃。六十年代是狂飙的年代，全世界学生运动像海啸一般席卷世界各国大专学府。

如果以单纯的政治理想为动力，则南大的学生运动肯定掀不起大的浪潮。相对而言，政治白色恐怖，紧急法令和内安法令还起着相当的镇慑作用。然而，一旦教育问题政治化，基于民族语文的情感作用，那就演变成激烈的维护民族教育的抗争。南大的学生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其渊源是来自全马（包括新加坡）的华校在历次维护华文教育、维护华校存在的斗争中孕育成长而壮大的学生运动”¹⁰。

在维护民族教育和坚持文化的立场上，大部份的同学认同并参与行动，其实不是所有南大学生都是左倾的，有些倾向于政府，更多的则是政治上或左或右的随从者。

“由于南大面对被改制受控制的处境，南大创办人陈六使对于南大学生参政寄予厚望。因而他在福建会馆为芽笼光华学校新校舍动土典礼上致词呼吁人民在选举中支持南大学生，投他们一票。他说：“一个民族没有文化，这个民族一定没有灵魂的。我们不是支持他们毕业生，而是支持我们的文化。如果我们不支持他们的话，就是等于放弃我们的文化。如果大家一致支持的话，华校才有希望”。由于陈六使对南大毕业生参选的支持，他便在这次事件中被夺了公民权。”¹¹

南大共培育了21届毕业生，人数达万人以上。他们在新马政坛均有不俗的表现，为新马人民争取应得的政治权益，为人民谋福利，为新马民主政治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

正因为新马政治的严酷与特殊性，华族在新马地位的特殊情况，华教、华校的存在与发展的艰苦与华族特有的坚韧，通过接下来的本文的阐述中，就能够咀嚼到南生为什么对南大的情意结这么的深，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在他们的诗歌中，对1980年母校南大一旦合并后，情绪上掀起的滔天波浪的理解。可以说，南大学生在政治上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的诗歌创作有一定的影响，或有关联。这种关联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间接的，或隐晦或关心，或就论题直接讨论或借题发挥，一言以蔽之，离不开南大的情结和含有新马政治对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影响成份。

3、南大精神是南大情意结的根本内涵

陈嘉庚国际学会和陈嘉庚基金于2003年7月26日，主办徐冠林教授华语公开演讲《从南洋大学到南洋理工大学——华文教育的回顾与前瞻》。这场精彩演讲，在狮城引发广大回响。

徐院长也强调必须正视南大的历史，“让

9. 丘淑玲《理想与现实——南洋大学学生会研究（1956—1964）》，见李元谨主编《南洋人文丛书——南洋大学历史研究1》，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创作室，2006年3月，页1。
10. 陈剑《南大学生与新马政治》，见李业霖主编《南洋大学史论集——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二）》，马来西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4年3月，页368。
11. 陈剑《南大学生与新马政治》，见李业霖主编《南洋大学史论集——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二）》，马来西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4年3月，页368
12. 徐冠林《从南洋大学到南洋理工大学：华文教育的回顾与前瞻》，见陈嘉庚国际学会学术小组编《南大精神》，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3年12月，页15。

创办人陈六使找到合理定位，在学校里作出衔接新旧南大的恰当安排”¹²，为缝合历史伤口跃出重要的一步。

梁丁尧曾谈到：“‘南大精神’为何物？相信只有当年参与筹办南大的各阶层人士能够全面体会，还有早期南大生才能亲身感受。当然，南大创办时期的环境和现在的环境大不相同。不过，‘南大精神’的含意——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力争上游，是千古不变，永垂不朽的。”¹³

陈瑞献赋予它哲学性，说它是一种盛大刚直的正气与节操，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一种正义凛然的精神状态。他说南大精神是“先南大而存在，并且在南大消失后仍盈于天地之间的一股正气。”¹⁴

南大第十六届经济系毕业生戴文雪，则认为南大精神指的是前南大生待人处事的态度和行为。“前南大生的一般特质是比较随和，做事有责任感，家庭、朋友观念重，对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能和中下层人民打成一片，生活纯朴，讲义气，能舍己为人，有社会责任感，以及自强不息、默默耕耘的态度在自己的领域中奋发图强。”¹⁵

南大精神是新马的共同遗产，重燃对南大的激情。“南大的篇章，具有跨越教育史、政治史和海外华人史的宽广度。”¹⁶

“中华文化”、“社会责任”、“向前

看”和“国家”等字眼，这都显示了南大精神在在是新加坡未来世纪面临困境所要召唤回来的民族资本。而对身居新加坡之外的华人来说，南大精神更接近某一种历史的追讨与除魅。南大精神就在这瞻前回顾之余散射出一种历久弥新的能动力，为花果飘零的海外华人添上历史的真章。

1998年，潘受¹⁷老先生七十八岁，是新加坡著名诗人兼书法家，曾任南洋大学秘书长。称他老为南大建校功臣之一，该当之无愧。

据报导，南洋理工大学为表彰潘老对文化的贡献，于那年的8月26日授他以“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在隆重的毕业典礼上，不良于行的潘老只得坐在轮椅致谢辞。“他在台上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慢慢的可以让人感受到他的感情在翻腾”。“讲到自己对南大复名的愿望时，手上握着稿，眼睛开始与观众接触，像是在表白心迹，也像是在搜寻对他的愿望表示认同的眼神”。

以上一文间接地表明虽然南大合并于新大已10年了，但南大生在感情上对母校依然挚热，南大生依然难以释怀，而引申出来对中华文化的思考，也依然不断地在他们的诗歌里释放出情感的起伏和流泻着深沉的伏案诗句。

其实“对南大最具杀伤力的因素不是政治，而是语文”¹⁸。20世纪的50、60年代是国际跨国企业的全盛时代。新加坡以吸取外资为

13. 梁丁尧《把开创精神注入新南达》，见陈嘉庚国际学会学术小组编《南大精神》，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与陈嘉庚国际学会，2003年12月出版，页107。（原载2003年8月1日《联合早报》言论版）
14. 《母亲在云端微笑——陈瑞献专访》，见陈嘉庚国际学会学术小组编《南大精神》附录（一），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3年12月出版），页194。（原载2003年8月12日《联合早报》）
15. 戴文雪《火凤凰即将重生》，见陈嘉庚国际学会学术小组编《南大精神》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3年12月，页131。（原载2003年8月2日《联合早报》言论版）
16. 潘永强《忧郁与抗议——新马华人的大学情结》，见陈嘉庚国际学会学术小组编《南大精神》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3年12月，页139。
17. 潘受（1911.1.26—1999.2.23），原名潘国渠，福建南安人，生于1911年1月26日。1930年19岁南渡新加坡，初任《叻报》编辑，1934年起执教于华侨中学、道南学校及马来亚麻坡中华中学，及任道南学校校长6年（1935~1940）。1953年参加筹办南洋大学，任南大执行委员会委员。1955年南大校长林语堂离校，受委出任大学秘书长，度过一段没有校长主持校务的最艰苦的4年，直至1959年第一批437名学生毕业，才辞去职务。潘受精研书法，造诣很深，最后自成一家。
18. 徐冠林《从南洋大学到南洋理工大学：华文教育的回顾与前瞻》，见陈嘉庚国际学会学术小组编《南大精神》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3年12月，页5。

重点的政策，是今天成功的基础，但也付出了民族教育和语言边缘化的代价。

南洋大学的二十五年，风风雨雨，则集中地反映了新马华文教育在要求生存，要求发展的过程中，道路迂回曲折、崎岖不平、荆棘满途，更留下众多校友和华族的南大情结。

1995年南洋理工大学把简称改为南大，加上校友的迁就，让“南大精神”在今天有机会在云南园重新振飞。

全球1万2000名校友对南大精神的执着，并在校外延续了南大精神，还加以发扬光大。南洋理工大学有很强的潜力，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南洋大学的传统和精神。

南大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南大校友对新社会的贡献、建树，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南大虽已成为历史，但南大的种子已遍布新社会以及世界各个角落；南大精神，将永垂不朽，与日月同光，与天地同存！

三、校殇创伤孕育深沉的南大情意结

1. 哀伤激越、愤笔直书

1.1 1980—1989年代 典型诗作析解

伴随着1980年南大与新大的合并，南大生面临的社会、政治、生活、就业等窘境，紧随着华教事业和华族文化萎靡不振，迎面而来的是可以预见的荒凉感与无助感。我们不妨从诗歌创作来审视这个充满哀伤的时代情绪与情结。

在此期间，一群以南大生为主的关怀民族文化和华教事业的人士，提笔以各种文学形式抒发心中的文化郁闷，均带有强烈文化隐喻与情结的诗歌多达274首¹⁹，诗人们借助诗歌倾注强烈的文化反省与思考。

南大1980年被合并，激起南大毕业生的心头隐隐楚痛，字里行间，难以驱赶他们刻骨的哀伤。这不是拿得起放得下的潇洒，这肩负社会和历史传承的重任，似乎已早以烙印在这些南大生的心灵深处。

梁锐²⁰的《故园》²¹。在这首含义深远，意象明确的诗里，诗人心痛的伤痕，早已被来自全方位“西风”吹袭的利刀割得支离破碎。诗人“兼济天下”或“独善其身”，这种文化心理在东西文化到了分水岭的关口，怎能让人含蓄地表达，难挡心头的决堤。

“故园”是群体的文化心理，作为个体的诗人主体性弥合在文化的群体主体性中，新加坡“故园”的文化视野已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华文的“红灯”标志越来越刺眼，西文的“绿灯”大放异彩。顿悟中西文化的交汇是那么的短兵相接，那么的现实残忍，这恐怕是诗人和众多南大生始料未及的。

诗歌不是个人的逃避，文字也逃避不了，对已注入血液的方块字更是舍不。正因为如此，在“故园”这首诗歌里，平静的“湖边”岂能让诗人关上“不忍目睹”的双眼，富有深刻寓意的“西风”，不就是新加坡教育体系重大改革的现实状况，英文来势汹汹，席卷小岛，从小学到中学，华校生措手不及，痛定思痛。

“西风里，你扭曲的容颜/你本古之苍龙兮”“结局一点也不凄美/扭曲的容颜据说是为生存/因何我竟听到/你幽幽的哭泣？”

南大的合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龙的传承的委屈并入，是对西方文化的无奈妥协，是新形势大环境的逼迫的策略下的默认。国家的政策有其伟大的高瞻远瞩，这无可厚非。就文化的层面来讲，一个伟大种族的尊严，体现

19. 张森林《当代新加坡伤痕文学及中国学者的解读（1981—2007）》，北京师范大学及新亚大学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论文，页22。笔者所收集到的南大生诗歌篇名见附录6。

20. 梁锐，原名梁春芳，1950年生。南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士。1984年出版诗集《茶如是说》，荣获书籍发展理事会所颁发的书籍奖。1992年，与南大同窗寒川及刘文注联合出版诗集《山山皆秀色》。

21. 梁锐诗集《茶如是说》，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84年8月，页73—74，（作于1981年6月15日）。诗歌全文见附录7。

于其种族的语言被尊重也是不容置疑的。

在新加坡，南大作为唯一华文最高学府的象征，无不独领起这份语言的光荣，引以自豪的民族图腾。这是南大的义务，这是南大的责任，这是南大的创立宗旨，她逃不了历史赋予她的义不容辞责任。

南大校园的野草丛生，所以才揪动万名南大生的心弦，他们睡不着，他们要发泄，文学作品中因而得以有了南大生的南大情结。

“失去了你犹如失去/整部历史，日暮以后我将迷失/迷失成一片失去方向的落叶/任西风如刀，横劈/我踉踉跄跄的身子”。

南大何尝不是每个华校生的梦萦缭绕的“故园”啊！

《喜见相思树》²²又是梁钺的一篇对南大的相思之作。南大校园当初种满了相思树，相思树和牌坊已是公认的南大标志。踏上山岗，又见相思树，是喜是悲？喜见相思已久的树，可是见到的树已是：

“瘦怯怯的一株/就孤立在，这陌生的小路旁。”“我激情地奔向你，抚摸你/拥抱你也如拥抱/久别的爱侣，相思树呵/同是沦落，同在天涯/相逢只有灰白/灰白的叹息。”

对南大的相思——

“别问我愁有多长/别问我路有多险多难走/”“让我们及时做一根蜡烛/点起晚霞/熊熊自焚”。

不禁令人联想起郭沫若诗歌里重生的火凤凰形象，悲喜交加的相思，多么的沉重，多么的雄壮，多么的喜极生悲！南大啊南大，相思树啊相思树，南大生见到你，有风雨故人的惊喜。

“你举起柔弱的手臂/轻轻地向我招手”。

梁钺在诗集《茶如是说》的后记里写道：

“在华文日趋式微的此时此地写诗，更是苦涩凄惨，举步维艰。……如今经过那儿，目睹人非物不是的情景，每于泫然泣下。”²³

“因为语文教育环境的骤然改变，作家们对文化的乍然断根皆感到痛苦莫名，这股浓烈的断根情绪折射在文学创作上，基本上是以直接抒情的诗歌和散文为主。南洋大学的校友们以悲伤的语调咏叹母校的停办、象征南大精神的南大牌坊的被拆除命运，以及怀念在南洋大学念书时的美好日子。”²⁴

如果说梁钺的黑色或灰色调子里带有对南大的情意结略微含蓄的意味，那么陈剑²⁵多首情真意切的诗篇则给人以直接心潮澎湃的激情震荡。

如《请记住！你是南大的儿女》²⁶、《哀牌坊——惊闻传言有人蓄意要拆除南大牌坊》²⁷、《山岗湖畔回顾》²⁸、和《偶拾红豆》²⁹等。

在《请记住！你是南大的儿女》中，陈剑

22. 梁钺诗集《茶如是说》，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84年8月，页93—94，（作于1984年2月25日）。诗歌全文见附录8。

23. 梁钺《后记》，见梁钺诗集《浮生三变》，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97年6月，页97，（作于1984年5月5日），相关段落祥摘见附录9。

24. 张森林《当代新加坡伤痕文学及中国学者的解读（1981—2007）》，北京师范大学及新跃大学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论文，页22。

25. 陈剑，原名陈松洁，1940年生于新加坡。1965/66年第七届南洋大学地理系毕业。自六十年代始便以不固定笔名如陈思、陈放、陈捷、维明、扬戈、鲁生、岭上青等以诗、杂文及评论见诸新、马文坛，并积极从事文艺活动。七十年代因故停笔。八十年代始又偶有创作并创立“文学书屋”专事出版新马文学创作凡数十种，并大力推介新、马创作至台、港、中国大陆等地区，且与香港三联书店等合作出版《新马华文文学研究丛书》等。

26. 陈剑诗集《火凤凰》，新加坡：诗出版社，1995年6月，页23—26，（作于1981年3月）。全诗见附录10。

27. 陈剑诗集《火凤凰》，新加坡：诗出版社，1995年6月，页27—31，（作于1985年）。全文详见附录11。

28. 见陈剑诗集《火凤凰》，新加坡：诗出版社，1995年6月，页33—37，（作于1988年3月11日）。

29. 陈剑诗集《火凤凰》，新加坡：诗出版社，1995年6月，页39—40，（作于1989年3月17日）。

感慨道：

“谁说东南亚的华族散沙一盘/云南园的建立是我华族的典范/南大！南大！/南洋大学啊这闪着金光的名字/在东南亚的文明史中/从此写上！”

陈剑的诗歌超越了个体的情感，贴近整个社会的对南大被合并所连锁出来的哀伤基调，因为南大的历史已不单单只是南大的校史，它已是东南亚华人的骄傲史，华人的文化传承的见证史。诗人慷慨激昂，激愤南大的牌匾上的“南洋大学”的涂白。

“石狮子威猛端庄/守护着巍然耸立的石牌坊/廿五年中目送万名的学子英才离去/就是守不住牌匾上‘南洋大学’的字样”。

南大校园有着南大生的甜蜜回忆，南大生的豪迈雄心，南大生的坎坷人生。

“不管你感到光荣还是耻辱/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切切思量、牢牢紧记/你啊！你是南大的儿女！”

“请记住/你是南大的儿女/三个圈圈紧紧扣住一颗星/就是这颗星啊/照亮着华文教育的坎坷和平”，“记住！/记住啊！/你是华文教育的子弟兵！”

在陈剑另外一首明显刻骨哀伤调子的诗歌《哀牌坊》中，反应出大多数南大生的心声。作为南大重要标志的牌坊，如同南大的图腾一般，见证了历史的曲折，很多南大生无不以悼念的心情来凭吊，来哀伤。

“牌坊啊！牌坊”“见证华教历史曲折向

前/牌坊啊！牌坊/你是三代华人用血为砖、用汗为瓦/一块一块砌起的文明的华表/是我弹丸小国璀璨的历史文化。”

田思³⁰的诗《牌坊》³¹语句十分哀悼和愤怒。“牌坊死了”，“被凿掉名字的遗骸/僵立在高速公路旁”。身在马来西亚的田思疾笔愤书有其诗句不求暧昧，平白直叙的特殊地域语境。

东南亚有黎元热肠的诗人很多，其中成君³²的诗歌，淡雅声中，久久沉淀的是两者和谐的结合，时代诗情与精神价值的共存。诗人通过诗性的目光，凝视者现实的世界，也感慨热土的改变所带来遗憾的后遗症。

在《楼牌·心台》³³中，诗人直抒情怀。

“风风雨雨/千秋万载/必有我师/永筑心台。”

南大荒芜的牌坊，草木凄凄，精神家园的失落，怎能让优秀的诗人遗世独立而不朽，他总是置身于探求出路的人群之中，与时代共呼吸同忧患，才使自己的歌吟发出真实而有价值的声响。诗人们从时代汲取诗情的欲望，使在他那颗赤子之心表现得尤为强烈。

谷衣³⁴在他的诗歌中，常用“我又回到”的句子说明他如何进入现实，例如他的诗歌《我又回到那山岗上》³⁵。

“阔别了多年/我又回到那山岗上”“那个山岗/已不是我熟悉的模样”“那个山岗/寂静地像个坟场/一排排的相思树/也不知隐藏在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南大的云南园。那是谷衣

30. 田思，原名陈立桐（应桐），马来西亚吉晋出生，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硕士。

31. 见田思《田思诗歌自选集》，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02年1月25日，页110，（作于1987年11月28日）。诗歌全文见附录12。

32. 成君，原名成泰忠。祖籍广东省番禺县。1978年毕业于南洋大学历史系，新加坡文艺研究会理事。从六十年代末开始发表诗作，作品散见于各报文艺副刊和各文艺杂志上。

33. 成君诗集《淡淡的情愫》，新加坡：商务印书馆分馆，1990年1月，页28，（作于1985年12月13日）。诗歌全文见附录13。

34. 谷衣，原名廖建裕，出生印尼，现为新加坡公民。早年南洋大学毕业，后赴澳美留学获博士学位。曾在英国讲学，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执教，为新加坡作家协会多年来的受邀理事。华文作品已收集成册出版的有十余种。

35. 谷衣《谷衣诗选》，新加坡作家协会，1999年2月，页20—21，编为《新加坡作家协会丛书之四》。诗歌全文见附录14。

36. 严思，本名杜丕勉，1943年5月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泉州，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大学。自1961年开始诗歌创作，作品见于新马及香港等地各类报刊，并被收于多种选本。诗风劲健沉郁，语言富于张力。已有《风雷集》、《春华集》等诗歌出版。

37. 吴晓逸编，《新加坡》严思诗集《木麻黄恋歌》，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3月，页1—2，（作于1985年11月）。

文学之梦的地方，可是在1980年初，它一度被弃为一个荒芜的废园。

严思³⁶的《我此刻寂然——怀念新加坡南洋大学》³⁷。问道：什么使之寂然？这是一种直截了当而又是颇具力度的写法。

“我此刻寂然/——寂然/似我脚下/山岗庄重的肃穆”“而，四季风过/依然拂起满目依依的相思/——树梢飒响的叶/地上零落的花。”

曾经欢闹的校园，同学们围在石凳石椅旁，白天激昂的谈论。这一切，如今特别的“寂然”！山岗变得异常的庄重和肃穆，记忆的花朵飘落在寂然的地上，留下无限的惆怅。诗人未作过多的修饰和铺排，寂然、肃穆的情感突兀而出。

“我此刻寂然/——寂然”“似我身旁/丰碑镌刻的宣言”“而，跫音悠悠于云海的远处/当锈蚀的门环叩响/流放的人儿/将与百鸟一齐归来”。

全诗节奏急促，语言简炼，重复的语句造成一种寂然凝神、气势铿锵的美感效应。

25年的南大历史，通过旧南大生的直泻而来的诗歌表达，通过诗中的意象“山岗”、“旗杆”、“青峰”等，较大的能指性和极强的感染力无不将读者瞬间置入怀旧的情感氛围，受到猛烈的冲撞。

寂然的空间，来自不同的时空的调转。寂然的感觉，来自不同时光的对南大的感触。在这首诗歌中，我们明显地感受到恋林的鸟儿们忆念往日的母校，虽然母校的门环已锈蚀斑

斑，但文化失落的疲倦旅人，梦中都向往叩响南大的校门，向她的怀抱奔去。

严思的诗歌具有凝重与沉郁的情感特质，素以劲健的诗风而被华文诗坛所瞩目。“他以严谨的诗笔，记录了自我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追怀中华文化辉煌源头，在热带豪雨和太阳风的交汇中，发出自己动人的吟唱。”³⁸

诗歌与文化同源，南大生诗歌中表现出来的精神寂然，无不是文化流放式的现状，传统文化的边缘化，让诗人内心世界的情感惟有通过文字的抒情来使之浮上层面。如果说此诗只是南大生对南大的情意结，那是十分肤浅的看法，激荡于文字深层的诗意，是对新加坡精神文化，怎样上升至一种具有价值观念、社会文化理想思考。

寂然，是不是因为我们失去了什么？诚然，肯定不仅仅是失去南大校园里的相思树而已。

严思在《岁月》³⁹一诗中写道：

“枕着失眠的夜，清晰地/我听到生命因销熔而折裂的声响”“啊！二十五年匆匆的行脚/我不停地思索，什么才是你的真实？”

对于“生命真实”的追问，也就是对于生命价值和人格理想的追问。字里行间流露出对25年南大历史脚步匆匆的感慨，对南大的一片虔诚和缅怀。

艾青说过，一首诗不仅使人从那里感触了它所包含的，同时还可以由它而想起一些更深更远的东西。⁴⁰

1986年3月，李贩鱼⁴¹按某日见报的《祖

38. 吴晓《严思诗歌的情感特质及其它（代序）》，见吴晓选编，《（新加坡）严思诗集《木麻黄恋歌》》，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3月，页序1，（作于1985年11月）。

39. 又名《啊！岁月》，见严思诗集《春华集》，新加坡：长屋出版社，1985年8月，页100—103。吴晓选编，《（新加坡）严思诗集《木麻黄恋歌》》，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3月，页87—90。（作于1984年12月2日）。诗歌全文见附录15。

40. 艾青著《诗论》，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页2

41. 李贩鱼，原名李大倍，祖籍福建永春，1940年生于马来西亚柔佛。1963年毕业于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98年逝世。曾任南大中文学会出版组主任及该会出版的刊物《大学青年》主编。擅长写诗，尤其长于叙事诗。早在1965激情满怀的《南大颂歌》就得到南洋大学学生会主办第二届全校文艺创作比赛特等奖。李贩鱼是个出身贫寒的谦谦君子，是真正的人民诗人。他的诗大都描写劳苦大众，反映底层人民生活的喜怒哀乐，笔触带着对他们深切的同情，诗行中隐隐然凸现诗人的正义感，为劳苦大众吐冤情、争权益。他不幸劳累成疾，英年早逝，令人扼腕伤悲。

42. 诗歌全文见附录16，（作于1986年3月）。

先的脚印》一文，重登前母校南洋大学开幕典礼盛况的历史照片，有感而作一首很著名的诗歌《忘》⁴²。

“你对我说，/忘了她吧。/我对你说，/忘了她吧。”“孩子虽到过，/但已印象模糊，/后代的子孙，/将更茫然不知。”

那种对南大的情缘跃然纸上，可惜悠长的南大梦，留不到子孙后代的继承，唯有南大生高举的南大精神无法中断那份对南大的情结。无奈之中，惋惜之中，伤感之中，“偏又见那一幕，/殷红的山岗，/人潮汹涌，/热血沸腾/”无庸置疑，那是南大的旧日振奋人心的景象，那是南大生心中永远的回忆，那更是南大生那份对南大无法中断的血浓于水的情结。

岂能忘记？！

“忘？忘？忘？忘？/你的眼眶，我的眼眶/都已变成泛滥的泪湖，/……”

南大已是东南亚华文的精神家园，是华校生惟一向往的高等学府，是每个华人父母对孩子的未来的希冀，是来自中国故乡的传统文化的延续。

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体不是它在自然中所找到的，而是它自己心智的果实，是一种丰产的神圣精神灌注的结果。诗歌是诗性智慧的结晶，由心智点燃的诗之光。

在连奇⁴³的咏物诗中引起读者情感的共鸣。《怀念——相思树》⁴⁴流露的就是一个南大生对母校的深厚情结。

“那相思树的黄色花粉”“就像那流逝的青春/早已流进了我的梦里”。

感叹南大时光的飞逝，每一段都用“梦”

字，是否那一场梦已永远消失，只留下心中永远的伤感和遗憾。相思树啊想思树，“在我的梦里”“依依不舍地告别相思树”……

在《怀念——红墙绿瓦》⁴⁵一诗中，连奇直指那曾经是南大行政楼的建筑，如今的华裔馆：

“那红墙绿瓦/可还是鲜明如昔/屹立如昔”“在历史的长河里看你/你是万里长风激起的/灿烂的/凝固的/一朵浪花”

在连奇的咏物诗中，他的思想、感情、感受和情绪，都是和用相思树比喻的南大的思想、感情、感受和情绪是一致的，和诗人体现的情意结是息息相关的。

田思⁴⁶的诗《牌坊》⁴⁷语句十分哀悼和愤怒。

“牌坊死了/她最后的回记/是血汗砌的红墙/相思的绿浪”“被凿掉名字的遗骸/僵立在高速公路旁/所有通往回忆的蹊径/都被铁丝网所切断”“只有泥土夜半的叹息/会悄悄牵动埋着的无数碎瓦/但总也揭露不出/一个毁尸灭迹的离奇故事”“牌坊的魂魄/化作一道白虹/跨过世纪的长空/在后代的心灵闪烁”。

身在马来西亚的田思疾笔愤书有其诗句不求暧昧，平白直叙的特殊地域语境。

就像谷衣的《过去的光辉》⁴⁸里的那位老朋友：

“远处传来了/断肠的挽歌/不，这不是当年的山岗/这是叫我心寒的坟场”。

最后一句的“坟场”是诗伸出的最敏锐的触角，捕捉到南大生情绪最高涨的、难以遏制的悲痛，甚至是悼念的心寒。

1.2 1990—1999年代典型诗作析解

43. 连奇，原名郭富坤，1947年生，祖籍福建同安，南大毕业，曾任职于新闻界。七十年代踏上文坛，以写评论为主，八十年代继续创作，以写诗与散文为主。
44. 连奇诗集《那一丛夹竹桃》，新加坡：春艺图书贸易公司，2002年5月，页16—17。（作于1985年7月）。诗歌全文见附录17。
45. 连奇诗集《那一丛夹竹桃》，新加坡：春艺图书贸易公司，2002年5月，页18。（作于1985年7月）。
46. 田思，原名陈立桐（应桐），马来西亚古晋出生，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硕士。
47. 田思《田思诗歌自选集》，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02年1月25日，页110。（作于1987年11月28日）。
48. 谷衣《谷衣诗选》，新加坡作家协会，1999年2月，页39—40，编为《新加坡作家协会丛书之四》。（原载于1986年12月《文学半年刊》18期）
49. 黄孟文《黄孟文微型小说评述》，新加坡：云南园雅舍，1996年5月，页52。收入云惟利主编《南洋文学丛书》。

1980年是个历史的转捩点，回视的痛苦最终磨砺出哲理的晶体，主要的形象亦从历史和文化的斑斑驳驳的背景上浮凸出来。黄孟文写于1995年6月15日的《云南园低吟》⁴⁹中：

“幼苗裂石抽芽。一九五五。微睁眼，仰天欢笑，在云南园。”

自南大创立始，用时间的顺序道出艰辛曲折的回视。

“龙卷风特爱狮城。拔根上高空。掷落。支离。尸横肯特岗。一九八零。”

“老中青围聚新牌楼。一九九五。亢奋。悲怆。南大湖水映寂寞，伊人独彷徨。”

黄博士的句子顺势翻检出民族生存、民族文化、南大历程的荣辱兴衰。

“一万二千人齐聚阁王殿侧。二零五五。遥望阳间。祥云。玄孙口塞汉堡包，愕问：何为南大精神？”。

2055年，也就是南大创办百年，南大培养的一万二千名学生，已“齐集阁王殿报到”。这种对时空的跳跃无不揉入了诗人对悠久历史的忖度，在一种苍凉激奋又悲壮的氛围中，灌注了对南大的挚爱的情愫，吐纳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交锋的残酷。

朱光潜评陶渊明的诗说，“不枝语”这三个字意思是简练高妙。⁵⁰有道是，《云南园低吟》是极短篇小说，又是如诗般极为精炼的语言，南子在评论其作时，说这是一篇大胆尝试之作。时间横跨一百载的人事变迁，“两大”境界的湖光山色尽在诗句中，黄博士用血和泪写成了这首如诗的控诉，讲述着整整一百年的故事，一个跨世纪老人在云南园低吟。

何曾想，西化如凶残的龙卷风，铺天盖地而来，不由分说将幼苗般的南大连根拔起，吹至九霄云外，任其坠落、支离，在肯特岗上

的阴魂至今不散。四十年过去了，“老中青围聚”在“新牌楼”下，身影寂寥，彷徨不已，“亢奋”、“悲怆”的心在滴血，感慨万千。

成君《致云南园〈语讯〉》⁵¹，荒芜的牌坊，草木凄凄，精神家园的失落，怎能让优秀的诗人遗世独立而不朽，他总是置身于探求出路的人群之中，与时代共呼吸同忧患，才使自己的歌吟发出真实而有价值的声响。成君从时代汲取诗情的欲望，在他那颗赤子之心表现得尤为强烈。

成君《致云南园〈语讯〉》此诗一上来就点题：

云南园已“一片荒野” “四十二个年头 /这个大牌坊/依然竖立在人们心中”。

诗人呼出1万多名南大生的心声：

“信念中/相思豆总有一天/重新撒遍/满园大地”。

信念激发了旺盛的希望，凝注着对产生民族文化的土壤的热爱，使得我们读起来，获得一种历史绵远感和崇高感。

成君《爱你，南大——为南洋大学创校40周年而作》⁵²爱得如此沉迷，当它是曾经风暴式恋爱过的情人，倩影深深，每每激起温馨的依恋。

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有一类诗人视诗歌作为自己瞭望历史风云和远峰的遥灯，去研讨如何以映现社会时代民族情绪的强度，展示留存人民记忆的事物和精神家园存亡的人心深度。简洁的笔触刻拨心灵魄的力度，去体察是否引起这一片热土不熄的人们全身心、全人格、全忧患的黍离之伤的情感。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在《爱你，南大》这首诗里，回转的是青春的歌声高吭，满怀放眼世界的抱负，不屈的以真为骨。社会的历史长

50. 朱光潜著《诗论》，北京出版社，2005年6月，页332。

51. 成君诗集《地平线上的世界》，新加坡：赤道风出版社，2001年10月，页90—91，（作于1996年12月19日）。诗歌全文见附录18。

52. 成君诗集《地平线上的世界》，新加坡：赤道风出版社，2001年10月，页74—78，（作于1995年6月26日）。诗歌全文见附录19。

河分叉的残酷，一时代一历史，生活在生我养我的母亲怀抱，一棵相思树，一份记忆。平凡的描绘，年轻的热血，时间的倒转，无尽的片段，南大情结使南大生在夜里，在日间，在风里，在雨中回望母校。

精神家园的神圣殿堂，依然成为历史的回声和时代的折光而显示其不灭的传统，有助于反思一下对现实中精神价值的深入理解。

成君的诗含蓄中起伏着心理的深度，不浮夸，不浓艳。在《爱你，南大》的最后一段，深邃的情感再也按捺不住对款款深情的母校之依恋，连用五个排比成段，一口气道尽沧海桑田。

田思在1992年3月2日写的《长相思——纪念南大创校三十五周年》⁵³一诗中：

“我们源自/一个最相思的地方/最昆明的云南/最美丽的南洋”。云南园就是南大生最魂梦萦绕的相思地。“牌坊坍塌了/我们把相思塑成牌坊”

这一主题在南大生的诗歌里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旋律，无论是含蓄表达还是直抒胸臆。

“在最痛心的云南/在最母亲的南洋/我们是无数离散的种籽/在悲哀中结出苍郁的相思”。

谷衣的诗《云南园，我为梦而来》⁵⁴已被另一位诗人槐华谱曲，落寞地唱一回南大的颂歌。

“我踏浪而来/寻找我当年留下的脚印/重温我逐渐褪色的绮梦”

作为华裔馆馆长，每天在曾经是南大行政楼的华裔馆办公，感触想必不言而喻。“我踏浪而来，多么优美的诗句，情感又是那么的

真，苦泪夺眶而出，一下子把人拉回到那当年的岁月。

最后一句诗句，“我为梦而来/云南园在这夕阳无限好的时刻/请你再进入我的梦乡”诗人把情感的流向直接倾诉在诗的形象里，夕阳的渲染，凸现相思，整首诗歌节奏感非常强，南大的情结已喧昭天下。喜悦之处，一顿挫而和诗的韵律出，伤感之处，一顿挫而和诗的悲恨出。如果说，谷衣的诗歌《云南园，我为梦而来》动人心脾，其实是南大生的真情借用了诗句，借用了心中的音符，携着史诗性和悲剧性的沧桑而来。

为谷衣的这首诗作曲的槐华⁵⁵是一位苦吟不辍的诗人，在他的诗歌中每每听到新马文新诗主潮所特有的壮阔涛声，当然，这“涛声”的余响却超越了讴歌时代的现实层面，中华人文精神是围绕于“涛声”的一脉神韵。曾经当了四年“诗囚”的槐华，早在《水塔放歌》⁵⁶里唱出南大生活的真情写真。

另外写下南大情结的诗歌还有陈剑的《南大啊，南大！》⁵⁷和《相惜——为九五年南大之夜而作》⁵⁸以及《火凤凰》⁵⁹。

1.3 2000—2007年代典型诗作析解

严思《我是历史的标志》⁶⁰中：

“孤星残月/野草凄迷/我没湮没” “我是/众志成城的精神/我是/淫威不屈的魂魄/我是/历史的标志/”

那历史的标志何曾消失过，南大啊南大，你何曾在南大生的心中湮没，永远不会！成为标志，意味着永存。

54. 谷衣《谷衣诗选》，新加坡作家协会，1999年2月，页139—140。编为《新加坡作家协会丛书之四》。（原载于1996年6月《文学半年刊》37期）

55. 槐华，原名鄭国琦，祖籍广东潮安，1936年生于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1958年起写诗，1971年《赤道诗刊》主编，1974年《乡城文艺》主编。

56. 槐华《槐华的诗长征》，新加坡：朝晖艺术及文化公司，2002年6月，页80—81。（作于1962年5月17日）

57. 陈剑诗集《火凤凰》，新加坡：诗出版社，1995年6月，页42—43。（作于1995年3月24日）。

58. 陈剑诗集《火凤凰》，新加坡：诗出版社，1995年6月，页45。（作于1995年3月24日）。

59. 陈剑诗集《火凤凰》，新加坡：诗出版社，1995年6月，页5。（作于1995年5月1日）。

60. 徐婉君主编《新华九家诗选》，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06年5月4日，页179。诗歌全文见附录21。

“情愿/再屹立荒郊千百年/永远叙说/一段云南园的/忠奸与功过”

历史的标志，文化的反思。鉴于南大牌坊因无人愿意投标而万幸得以保存至今，一切慢说，留给后人公断。

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有一类诗人视诗歌作为自己瞭望历史风云和远峰的遥灯，去研讨如何以映现社会时代民族情绪的强度，展示留存人民记忆的事物和精神家园存亡的人心深度。简洁的笔触刻拨心灵魄的力度，去体察是否引起这一片热土不熄的人们全身心、全人格、全忧患的黍离之伤的情感。

2. 忧戚内敛、隐婉达意

2.1 1980—1989年代 典型诗作析解

南大生的诗歌中有部分作品出于某种因素，写得隐晦而又婉转，不直接正面触及南大的当时现状，从字面上探究似乎只能寻得诗人对中华文化的思考和探索的痕迹，但其实不然，乘着微醺时分，吐露真言。透过字面，我们明显地感觉到那股强烈的南大情结，那股借意象语句所要宣泄的一种情绪，那股难以遏制的对云南园无限缅怀的追忆。

梁钱⁶¹的诗歌《夜饮》⁶²：

“蒙头犹不成眠的午夜/做什么最好？”
“夜正荒芜/也不见有什么流星/从天外飞来，
飞来抚慰/我这忧患渐深的眼神”

宗白华说，“醉”的境界是无比的豪情。这豪情使我们体验到生命里最深的矛盾、广大的复杂的纠纷。⁶³诗人在思考的问题是否是来自对南大的缅怀，还是“荒芜的教育体系”让诗人倍添忧患的意识。眼神的忧患渐深意味着

除了诗人个人以外的普遍忧患眼神，这里只是以个体的表现方式而呈现。整个南大生对南大的命运的遗憾，待到“酒过七分后，我还可以/策起心灵的快马/奔向盛唐，漏液去赶赴/骑驴人的约会”。只可惜，“今夕此刻，雾大风冷/纵酒若能成欢/醉了有何妨？/不醉又何妨？”。“雾”让人蒙住了双眼，不是看不清，而是无奈的买醉，任由弥漫的“大雾”笼罩蕞尔小岛的天空，四两拨不动千斤，空留夜饮。如果太清醒，眼里怎能容得下沙子。“奔向盛唐”的神往，是南大生不可轻易关闭的心门。在这首诗歌里已见端倪。

朱德春⁶⁴“属于沉思型的诗人”，“他有能力在平凡事物中发掘具有联系的潜藏的秘密，而且找出具有深广社会内涵的思想。”

“而且使它变成有象征的形象。”⁶⁵1982年他写下《砂话》⁶⁶一诗。他把自己比作历史长河中的一粒沙石。

“我们是砂/经不起历史长河的冲击/淘得只剩贫瘠的砂砾/且不自主地在疾水中流逝/完全无法建起历史的殿堂”，“却总是意识着要发挥造陆的神奇/在水势缓静下来时/又开始沉淀和淤积”。

这首诗表现出作者所具有的历史感，含蓄地道出南大的历史启示，人民无根便会失去精神的家园。

梁三白⁶⁷的诗集《微醺时候》里收入了那为当代人感动、为后代人传诵的诗篇，主要还是其中潜存的深邃内容或浑厚内涵，由诗人出于内心地、发乎真情地传了出来。

读者若真要感知的话，就只有靠敏锐的心灵了。《微醺时候》⁶⁸到底是怎样的一首诗？

61. 梁钱，原名梁春芳，1950年生。南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士。1984年出版诗集《茶如是说》，荣获书籍发展理事会所颁发的书籍奖。1992年，与南大同窗寒川及刘文注联合出版诗集《山山皆秀色》。
62. 梁钱诗集《茶如是说》，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84年8月，页71—72，（作于1981年6月15日）。诗歌全文见附录22。在诗集《茶如是说》里，同时还收入有《橙与番石榴》（作于1982年8月1日）、《雁行》（作于1982年9月21日）、《总是》（作于1982年10月9日）、《一支歌》（作于1982年11月6日）、《茶如是说》（作于1982年11月8日）、《面临断崖》（作于1982年12月11日）、《秋之外》（作于1982年12月14日）、《野草赋》（作于1983年4月16日）、《十九行》（作于1983年7月21日）、《醉翁操》（作于1983年10月1日）、《士呵士》（作于1984年2月22日）、《鱼尾狮》（作于1984年3月5日）。
63. 宗白华著《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出版集团出版，1981年6月。页28。
64. 朱德春，祖籍中国福建省莆田县，1951年生于新加坡，1975年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是南大诗社发起人之一，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
65. 王润华序《一棵沉默的树以花说出最美的语言——试论朱德春诗集〈砂话〉》，见朱德春诗集《砂话》，新加坡：中外翻译书业社，1989年3月，页（八）。
66. 朱德春诗集《砂话》，新加坡：中外翻译书业社，1989年3月，页40，（作于1982年）。
67. 梁三白，原名梁荣源。1937年出生于新加坡，祖籍中国福建南安。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负笈台湾国立台湾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又获新加坡区域语言中心阅读发展高级文凭。主编过《教育》（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及《教育学报》（新加坡教育学院）。
68. 梁三白诗集《微醺时刻》，新加坡：仙人掌出版社，1987年4月，页134—135，（作于1985年4月）。诗歌全文见附录23。

“微醺时候就不读剑”。诗歌的第一句仿佛破空而来，并且耐人寻味。它引起读者一连串的疑问：“读”什么“剑”？“剑”又怎么“读”？为什么“微醺时候”就“不读剑”？原来它指的是“剑谱”——“五千年的剑谱”。关于所谓“剑谱”指的到底又是什么，已经不须解释了：一部二十五史，岂不是一部庞大无比的“剑谱”？于是“剑怎么读”也就不成问题了。诗句虽曰“不读剑”，却又间接引发读者去联想。南大历史25年，25年磨一剑，不忍卒读。

从“读遍五千年的剑谱/只澎湃一腔慷慨悲凉”，看来，“读剑”这回事应该是在清醒时做的，不适宜“微醺时候”。然而，“读苍茫后隐隐约约一盏盏/一盏盏明灭，醉成了朵朵红莲/绽开在心中”“舒卷在水面/荡热辣辣的诗意在梦边”。必须细加体味的倒是此时所营造的三个境界：即“梦边”、“梦里”和“梦外”。编制理想是最美的时刻；跋涉于现实则苦不堪言；等到一切都时过境迁，则留下的只有难耐的涩果，读者须仔细咀嚼梁三白诗中的这三个层次，才不会枉费诗人的一番苦心。

《微醺时候》是梁三白作品中最“难读”的一辑，何况诗人的走“涩”路，往往自有其苦衷。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三白的《伤痕——情诗一帖》⁶⁹一诗，就可以发觉它绝非普普通通的“情诗”——虽然诗歌的副题是“情诗一帖”，其实不是。但它的的确确又是一首情诗——首如假包换的情诗，只不过它所抒发的并非一般的情情爱爱、风花雪月之情，是一种深情。对自己的理想，对自己的诗歌高度热爱的深情。这样的一种“爱情”，虽然一点儿也不“销魂”，但却是血水交融，却是休戚与共，却是刻骨铭心的，那里面有对中华文化的深情。

诗的最后一节：

“我的刻骨铭心的，/盛开在水面的诗啊，/你呢？”

就由于铭心刻骨，就由于“爱”入膏肓，一旦所爱枯萎，那种痛苦，又岂是一般的失恋者所能感受到的？

几经折腾之后，“我”也“有点儿累了，/真的。”但“我”所深爱的——爱“的刻骨铭心的”——诗，“你呢？”——你到底累不累？爱者与被爱者，都落得这么一个欲告无门、欲说还休的下场，焉得不令人掩卷长叹？所以说欲说还休，是因为“酒醒，”后“触目尽是”“花魔”非但“杀不得赶不得”，甚至是“骂不得的”。既然连骂也骂不得，只好眼巴巴地、无助地“欣赏”它“以彩蝶的斑斓，/把春色/蚕成/如此脉络分明的残局。”

“力求领悟已是读者的责任。”⁷⁰

如此“一帖”“伤痕”，若非细心阅读，又怎能感受诗人切身的痛楚？华文在新加坡已被西风席卷，南大被合并，酒过三巡，乘着微醺时候，品茗一盅中国茶。

带着同样“伤痕”的有《苍茫——兼答林臻》⁷¹悲壮如杜鹃啼血；《割爱》⁷²则写得沉痛无比。

“我的白天/从此成了/剪不碎的一片空茫”“黑暗/被我切齿地搓成/黎明以前颤动的平安”

这样的诗句，呕心沥血的意象和语言铸造，自不待言。诗情（或曰心情）的愤慨更是溢于言表，令人读后不禁为之动容，即便他的句子略为隐涩，却掩卷后心灵神会。

2.2 1990—1999年代典型诗作析解

园内的脚步声沉寂下来了，文学也远离而去。只有牌坊默然守在路口，石牌和湖水黯然相望。云惟利⁷³《南园风物：红楼、短亭、碑文、小湖、牌坊》⁷⁴。这首诗诗短却意义深长，语句十分流畅。

69. 梁三白诗集《微醺时刻》，新加坡：仙人掌出版社，1987年4月，页124—125，（作于1984年3月）。诗歌全文见附录24。

70. 蓝棣之著《现代诗歌理论：渊源与走势》，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页89。

71. 梁三白诗集《微醺时刻》，新加坡：仙人掌出版社，1987年4月，页128，（作于1984年6月）。

72. 梁三白诗集《微醺时刻》，新加坡：仙人掌出版社，1987年4月，页128，（作于1983年11月）。诗歌全文见附录25。

73. 云惟利，1970毕业于南洋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旋即专攻古文字学，获硕士学位，后负笈英国，获语言博士学位。现任南大教育学院教授。

74. 云惟利《红楼集》，新加坡：云南国雅舍，1996年5月，页147—158。诗歌全文见附录26。

“南园景物，入眼铭心。走在园中，恍如隔世。世事多变，沧海桑田。念旧时情景，百感萦牵。”

身为南大生，虽客居他乡，心系祖国，梦萦南大。

《红楼》中：

“如燕子衔泥归来，”“还记得檐下的旧巢，/细听楼头人语，/才知道已换了主人家。”

红楼绿瓦，显然有所指，是大家知道的南大的重要标志之一。“吹熄了房中红烛”蜡烛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今吹熄了红烛，是否有所暗示？

《短亭》一诗，如丝丝细语，小亭中有人窃窃私语。“指点园中相思花。”“卷走如梦的岁月。

南大生们“指点园中相思花”，“劫数如飞的灰尘。/海已不再绿，/天也不再蓝。”

《碑文》一诗中，沧桑的血泪，都由碑文扛起。

“四十年来如一日，/风雨如晦，/总有多情人来，/衔爱茹哀。”“立下碑文，/记住前人的血，/后人的泪。”

一句“衔爱茹哀”中的“衔”字，那么的真诚又舔犊，湿润的情感那么的如梦当前，紧跟着的“哀”字又撩人无限的伤感和哀叹。

云惟利的诗句非常有特色，旧体诗歌的痕迹仿佛在他的诗里流淌着思绪、技巧，深受古文的影响，流畅之中见深厚的功底，并且不着一字已数风流。云惟利的诗句给人留下不做作、自然清新、朴实意远的印象，如另外一首诗《小湖》：

“小斜坡上的垂柳/终于牵不住斜阳西去。”“投一块石头入湖心，/始知先人的血/乃是黄色的记忆。”“不知小湖面上/还能泛舟吗？”

请问，南大生还能泛舟吗？星转物移，人

事皆非，历史遗存惟有透过思索，穿过历史的隧道，使得现实获得一个深厚的参照物。

南大的情结和对文化的思考在不经意的、十分自然的文字中，铺满历史与现实视点的碰撞，使诗人的作品升华，使诗歌的内容带来深层意蕴和忧患的反思。

南大生诗歌中潜在着悲怆的调子，又有豪壮诗情。前者是一落锤音后南大生难以释怀的基调，是对历史艰难行的忧虑。后者是南大校园荡漾的笑声之永远不落的心音，年轻的南大生在政治、学潮、斗争的激情中，在变制过程中的激奋中，在毕业后即失业彷徨的激愤中，对民族生存、对文化空间、对民族命运的横向观照，被南大生联缀在所述中华文化旅程的诗歌线性结构中。

《牌坊》中：

“看地形的人说，/朝南最多风雨。/背后无忧，/进了山口便是相思林。”“四十年来，守住山口，/如横刀立马的大将军。”

“挡住了南拳北腿，/东邪西毒，/而逝者如斯！”

诗人对历史进程纵向的整体把握和借古喻今，既归纳又扩展了诗歌的空间，并使主旨更具概括性。这种高层度的、理性化的、情感收敛的省思，成为云惟利诗歌的共有特征。

“挡不住的风雨如劫数，/吹落贞节牌坊的芳名。/瓦片如前朝的宫女，/扬起的尘埃有泪，/夕照如薰烟迷眼。”

瓦片“如前朝的宫女”，“扬起的尘埃有泪”，声声泪水又向谁倾诉呢？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留下满腹的惆怅和辛酸。一个牌坊，令众多诗人进行纵向的追索，往往凝结为对民族魂的呼唤。在诗人的诗歌中，缅怀这象“始知先人的血/乃是黄色的记忆”，对“吹落贞节牌坊的芳名”泻出了内心的震颤。

2.3 2000—2007年代典型诗作析解

石君⁷⁵的《长发》⁷⁶中，“你在浅浅的紫

75. 石君，毕业于南洋大学中文系。新加坡著名女诗人、作家、教育家。深爱东方文化，也神往西方文学艺术。自1972年以来，出版了18部专集。更以英文弘扬儒家思伦理。

76. 石君著《心灵的守候》，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0年10月，页27。（作于2001年）。诗歌全文见附录27。

色信笺里/夹着一丝柔柔长发”“它曾在树树相思的云岗/随着长风飞扬”，诗中，一丝青发，万缕情丝，“这一根柔柔青丝/缠绵着我的往日情怀”“更在我流浪的心里/打下一生的千千结”。

另一首《寒衣》⁷⁷同样记忆起南大的日子。“记否/当我们芳华正茂”“在树树尽相思的小径”忆不尽南大的生活，“我们徜徉/徜徉/在山山皆秀色的翠峰”。

《泪别》⁷⁸于“只怕踏碎一地的红豆”“我要哭倒在你的臂弯/却未哭已泪尽 泪尽/在树树相思的云岗”。

女诗人回忆当年山岗的甜蜜漫步，泪别爱人为理想而出走的伤心，含蓄地道出当时南大生参与一系列校园内和校园外的活动，这一切的南大情思，摸遍红豆，寄托相思绵绵。南大，结束了使命，唯留下南大生的相思。

四、忧患意识触发民族文化教育的深刻反思

1. 中西冲击、文化错位

1.1 1980—1989年代 典型诗作析解

文化养育了诗歌，诗歌铭刻着文化。南大和南大诗人一起成长，南大生的诗歌发源于南大，涌进在南大文学作品的珍贵记忆中。南大生如同用最真的情感，最柔软的笔，写在最薄的纸上，但是朴实的语言作为南大生生活的点滴和社会文化的记录，作为对25年的南大情结，这些诗篇却比雕刻在石头或青铜的碑上更

要来得珍贵，更要来得真实。虽然雾气将散，依旧有时会白茫茫一片，但解开这些诗歌中深藏的文化密码，必须借助于文化的眼光，五千年文化精粹的沉淀，追溯南大生的南大情意结的源头。

杜南发⁷⁹的《传灯》之所以感人，是因为每一条河流都有流下去的方向，每一盏灯都有燃烧自己的决心。可以如此说，在诗乐的悠扬之中，怀抱文化传统的希望，激励自己的捍卫决心，只为了——“留根。”这首诗曲一直流传至今，不正是一直凝结着南大生的拳拳情意结？

《传灯》诗中的“河”寓意“母族文化的河流”，不论它流向何方，流过如何漫长不利传承的“黑夜”，但总得要有“一盏”象征华族人的“灯”，承担点燃“一脉香火”的使命，为的是让“生命和血缘”继续传承，甚至在所不惜的“燃烧自己”，也最能够映照文化工作者、华社对文化、教育、语言、传统的执著。

这何尝只是诗乐的传灯，更是精神的符码。

“但即使是前途堪虞，即使是廿年内新华文学会广陵散绝，又能力写作的人，还是应该写下去的。不是为了永恒，是为了记忆。”⁸⁰

在朱德春的诗集中，也收入了一些咏怀中华文化日渐式微的感慨之诗，如《咏寄劲草》⁸¹、《石头记》⁸²等这些诗歌无不有着对新加坡中西文化抗衡的忧思。

77. 石君著《心灵的守候》，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0年10月，页32。（作于2001年）。诗歌全文见附录27。

78. 石君著《心灵的守候》，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0年10月，页36。（作于2001年）。诗歌全文见附录27。

79. 杜南发，南大生，现任《新明日报》总编。

80. 风沙雁著《文艺絮语集》，新加坡：中外翻译书业社，页27。

81. 朱德春诗集《砂话》，新加坡：中外翻译书业社，1989年3月，页53，（作于1983年）。诗集中，同类的感慨诗歌有：《火炭》，页64，（作于1986年）。《粽子》，页66—67，（作于1986年）。《本地姜——悼赵戎师》，页92—93，（作于1988年）。《雨夜记》，页98—99，（作于1988年）。《偈语》，页79，（作于1988年）。《芦苇》，页70，（作于1988年）。《塑》，页89，（作于1988年）。

82. 朱德春诗集《把话藏在年轮里》，新加坡：创意圈工作室，2001年6月，页17，（作于1989年）。诗集中，同类的感慨诗歌有：《天空》，页23，（作于1989年）。《龙运》，页27，（作于1989年）。

严思的诗集中《弄潮放歌（寄居蟹）》⁸³、《迎春》⁸⁴等诗歌都是诗人执着地追求，思考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命运浮沉，发扬光大还是在夹缝中求生存，诗歌的基调是把历史与现实的负荷始终揽在胸怀。

“更多新华诗人放眼于当时的华文文化的没落现象，从华文教育的断根危机到华文文化的断根警号，新华诗人的内心经历了一场与西方强势文化的抗衡与拔河，并用他们蘸满文化之泪的诗笔写下了一首首见证时代之变的伤痕诗歌。”例如梁锐悲壮的《茶如是说》⁸⁵，写出了一代文化人对本族文化的眷恋与执著：

“是茶，当然该肤着我们好看的茶色／当然该涵着我们清纯的茶味／这色就算是褐／褐色也褐得十分古典十分／出色，味道就算是苦涩／那也苦得芬芳／涩得过瘾”。

南子⁸⁶的诗《声音与愤怒》⁸⁷虽然以现代派手法表现，但是一股冲天的愤怒，是难以消除的恨怨，一阵阵陌生的声音，一种迥然不同的声波。

“是那么陌生，那么冷漠／那么不和谐，那么急促”“我紧紧地握住拳头”“愤怒地回首”“/何处有我熟悉地/和谐的，响了千年的

/声音。”

南子在他的诗观中说，“写作有一种使命感。华文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语文之一，假如你能掌握这种语文，而又不以它作为写作的工具，你是否有勇气面对历史的批判？”⁸⁸。这是新加坡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的思考，“我的心中燃烧着熊熊的烈火，我借助文字的载体，传播我的信息”。⁸⁹

1.2 1990—1999年代典型诗作析解

朱德春《吃饱记》⁹⁰一诗中，把我们的优良传统和精华比喻成芳香的包点，完美又令人骄傲。鄙视舶来品的汉堡包都是缺乏内涵的两片面包而已，虽然夹着肉饼。南生对中华文化的情结一览无遗。

“我实在忍俊不禁/笑出眼泪/继而把吾族包点/放进蒸笼/留待明天/再蒸熟/再蒸出芳香。”

朱德春《草》⁹¹一诗中，“还被大石/压得/看不见天日”，但笔锋马上一旋转，口气也高昂，“可我啊/不相信/东风不来”，递进一层，“当大地回春/江南又绿/咱们走着瞧吧！”

83. 吴晓选编，《（新加坡）严思诗集《木麻黄恋歌》》，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3月，页97—101。原载1983年9月27日《联合早报·星云》，（作于1983年8月）。诗集中，同类的感慨诗歌有：《啊，如果——悼江秋倒》，页29—31，（作于1987年2月15日）。

84. 严思诗集《春华集》，新加坡：长屋出版社，1985年8月，页45—48。原载1983年12月《联合早报·星云》，（作于癸亥年岁末）。诗集中，同类的感慨诗歌有：《契约的疑问》，页59—60，（作于1984年2月）。《历史的断想》，页62—63。（作于1884年2月）。《诘问》，页64—65，（作于1884年2月）。《我不折剑，我不沉江——岁次甲子端午悼屈原》，页66—70，（作于1884年2月）。《图腾》，页64—65，（作于1884年3月）。《木麻黄恋歌》，页71—72。《今夜，拉纤，归去——85年元旦与诗人周天饮茅台酒》，页116—117，（作于1985年1月）。《过古坟场》，页104—106，（作于1984年）。《足迹》，页127—128，（作于1985年1月31日）。《进化》，页124—126。（作于1985年乙丑年元宵夜）。

85. 梁锐诗集《茶如是说》，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84年8月，页8—9，（作于1982年11月8日）。诗歌全文见附录28。

86. 南子，原名李元本，1945年6月7日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公民，祖籍福建永春。毕业于南洋大学化学系。是新加坡现代文学的开拓者之一，在六十年代，他就以现代派的手法创作新诗，以意识流的手法写短篇小说。近年来，潜研佛学，常以禅理入诗。除诗和小说外，南子也写杂文、评论。

87. 南子主编五月诗社丛书13《五月现代诗选》，五月诗社，1989.8。七洋出版社。页111。诗歌全文见附录29。

88. 南子主编五月诗社丛书13《五月现代诗选》，五月诗社，1989.8。七洋出版社，页110。

89. 南子主编五月诗社丛书13《五月现代诗选》，五月诗社，1989.8。七洋出版社，页110。

90. 朱德春诗集《把话藏在年轮里》，新加坡：创意园工作室，2001年6月，页45，（作于1991年）。诗歌全文见附录30。

91. 朱德春诗集《把话藏在年轮里》，新加坡：创意园工作室，2001年6月，页87，（作于1999年）。诗歌全文见附录30。

最后一句令人读来畅快舒服，明快的坚决，永恒的信心，因为对伟大的中华民族的灵魂、丰碑、历史充满崇敬才能够脚踏大地，气吞山河。

田思的《观潮剧演出》⁹²一诗中：

“在设备新颖的大厅堂”“那‘英语政策’下的狮城少女/以地道纯熟的潮州腔/哭唱着花旦的凄切心曲”。

在这首诗里，明显地呈现新加坡中西文化交融后的文化参杂式的现状，透露下一代依旧衣钵传统的一丝希望，聊慰老一辈的无比叹息。

田思的《狮城四题》⁹³中的“鱼尾狮”一诗：

“在海风的来处/闪一身炫耀的鬣毛/把传统的鳞片脱尽/喷一道新潮的水柱/只剩下不肯退化的尾巴/尴尬地搁在/没有根的垫台上”。

新加坡人双脚踏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十字路口，不同时代特质和民族特质的文化矛盾、对抗和冲突，内化了我们个体人格和价值体系的矛盾冲突。

在我们的文化中心，在我们的文化心灵中，交织着中西文化带来的文化错位，势必让新加坡的诗人充分感到修筑文化无疑是一件筚路蓝缕的艰辛的工作。把话藏在年轮里，但不灭的是对南大的缅怀，对中华文化的殷殷嘱望和热烈呼求，使我们南大的历史，使我们延承的信念将诗歌置诸中西文化特殊交织的宏深视野中。

正因为如此，南生的作品中，最多流露的除了对南大的情结外，就是对文化的思考。

华文在新加坡已经以南大被合并为标志，经过了阵痛、裂变、更新的心理挣扎，也更加深了南大生日日夜缅怀旧校址，绕道而行的无奈。

1.3 2000—2007年代典型诗作析解

田思的《红砖》⁹⁴“埋在记忆里”“一座新型的大厦/兀地从三角坡立起”，人们在“凭吊中/你捡起一块/幸存的红砖”，可是“张牙舞爪的神手/在废墟中咆哮/红砖在泥土中/肢解破碎”。

诗歌的社会含量和诗人的艺术思维运行，关注到对民族、社会、价值的变动历程，不断地往华族文化岩层深入而最终获得一种历史延续性的开拓历程，这种往诗歌审美表层向其纵深源系（隐性结构）所进行的文化追踪，带来南生诗歌中升华和永恒价值的确立。诗歌超越了个体心理的国限，而与整个社会、民族的情感发展与导向同步和同构。南生的南大情结文学作品同时具有鲜明的区域和时代特色。

诚然，社会文化的延续、民族文化的传递，是通过该社会、该民族所有成员的层累与积淀的整体运作来实现的。我们通过诗歌中的表现，能感悟其中借助南大的意象，探究其文化价值，企望社会的“共鸣”，实为回荡于与诗歌作者个体连联通的、文化“共享空间”的宏大腔体，从而使接受诗歌个体的历史意涵，即文化阅读的期待视野与诗歌本文的文化特征获得高度冥契。

群体文化的心理和阅读视野的倾斜，使得华文前景一片黯淡，书店也惨淡经营，年轻一代视华文为考试项目而已，热爱华文，认同华文将成为将来终身职业的人，从父母到孩子，令人遗憾地说，恐怕是凤毛麟角。

那么，当像南大1980年被合并事件后，社会旋即把文化提到一个象征性的高度，文化似乎也处于一种动荡、演变的中，虽然这是一部份人群的想法，却有其代表性和大众性。一部份人士担心几千年的文化将面临西化的正面冲

92. 田思《田思诗歌自选集》，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02年1月25日，页123，（作于1991年9月9日）。诗歌全文见附录31。

93. 田思《田思诗歌自选集》，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02年1月25日，页197，（作于1991年11月30日）。诗歌全文见附录32。

94. 田思《田思诗歌自选集》，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02年1月25日，页144，（作于2001年2月1日）。此诗为纪念马来西亚古晋福建义校被拆而作，福建义校是由古晋福建公会于1912年所创办的福建义务学校，乃砂拉越最早学校。诗歌全文见附录33。

突，交合的过程最终是以精粹让路付出代价。

2. 断根深忧、执意溯源

2.1 1980—1989年代 典型诗作析解

诗歌是艺术化的文化心理，情感的符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文化的超个体性所决定，诗歌所表现的文化心理及情感是特定时空内的群体所共有的。因此，在南大生的诗篇里，作为情感符号的艺术表现是社会的情感，即具有普遍性的、体现出社会共性的情感。

我们通过解析南大生文学作品中的南大情结，借用这个文化的编码系统，来进行新加坡自南大被合并后的社会文化现象，力图还原当时的一些事实存在的情绪淤积，从一个侧面来吸纳和汇集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人的群体或个性的文化心理，深透地把握1980年代初期由于南大事件而引起的人们不同的反应。

从这个层面来说，探讨南大生文学作品中的南大情结就显得更有意义，本来只是一所大学的转向，为何至今在一部份人民心底依然波涛汹涌，难以释怀。

这种情结并且已拔高到了高层次的文化底蕴的境界，彻悟生命的价值的高度，甚至是民族意识、历史意识、群体意识等一系列的整体思维的方式，使我们研究南大生诗歌里的南大情结覆盖了诗歌时空观的深化和博大。

严思写了众多的感悟诗，抒情诗，沉思诗。如《香火》⁹⁵，在诗中：

“昂首挺胸，我们骄傲地/用祖先所赐予的肤色/说祖先遗留给我们的语言”

诗歌中说祖先留给我们的语言本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

“把最璀璨的金刚钻/当成缺乏棱角的煤渣/撒一张几公里的网/竞想罩住浩瀚的海洋”

中华文化渊源流长，如同无尽的大海，她

哺育了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不分国界，不分区域，不分年代，从盘古开天地到e时代，无论语言的禁锢是多么的残酷，无论语言的生存局限于环境，无论语言的传播推广受制于种族的强弱，海外中华语言的传承的确不是那么的理所当然的平坦，历经波折，甚至挣扎求存，无不令海外华人更加珍惜语言的象征，为捍卫民族语言的伟大性而成为“斗士”。

香火延续，正如诗歌《香火》中所抒写得那样：

“易水河畔的壮士” “一头秋霜的丝/一双神驰的眸/两代人的血脉/奔一条五千年的长河……”

严思如同一位紧缩眉头、沉思冥想的诗人，肩扛“历史”和“沧桑”，用那深沉的历史情怀、浓郁的文化意识、充满力度的生命感悟，继续写道：

“世界上有道路千百条/驮一代人的苦难与呼喊/啊！哪一程才能抵达/我们所要寻找的金光大道”。

读者读着读着，无不进入严思的诗歌中，进入其艺术世界，一同激动，一同震撼！

“我们的感觉常常不会那么轻松，相反总有一种沉重的东西在浸润我们”⁹⁶。呐喊出：

“孩子啊！孩子/这一代人倒下的地方/是你们下一辈/征程的起点”

严思用“深厚的心胸和灌注生命力的情感（黑格尔），“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这是继南大被合并后一代华校生对华文强烈的忧患意识的体现。

社会上众多的有识之士甚至担心一旦文化的天平失去有效的控制，西风压倒东风，社会的道德准则和传统文化将失去下一代人的传承。由此可见，南大的意义就更为明显，也就

95. 严思诗集《春华集》，新加坡：长屋出版社，1985年8月，页21—24。原载1983年5月23日《联合早报 星云》，（作于1983年5月）。诗歌全文见附录34。

96. 吴晓《严思诗歌的情感特质及其它（代序）》，见吴晓选编，《（新加坡）严思诗集《木麻黄恋歌》》，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3月，页序1，（作于1985年11月）。

是说南大所推崇的南大精神有其深刻的含义和存在的必要性。这也是众多南大生为什么要在诗歌中疾呼挽救中华文化、寻根、相思树以及把方块字比喻成母亲的脸的重要因素。

长河⁹⁷诗集《掠过夜空的彗星》⁹⁸里的诗歌“内容上十分贴近现实”⁹⁹。1984年写的《寻根梦》¹⁰⁰，眼见欧风美雨大肆侵袭，惊觉民族优秀传统逐渐消失，痛心中华文化趋向式微，有识之士纷纷疾呼“寻根”。

成君《溯源》¹⁰¹在这首诗歌里，追溯源泉，诗人的情感已跃至民族和人类文化的层次，或蛰守文化的局部区域和断面，使得诗歌最终驱使心灵接近新加坡自南大1980年代初的命运追溯，南大的命运即是中华文化底蕴的断层，在文化的视野里，诗人以关怀民族命运的热情，表现了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在中西文化抗衡的当口，人民怎样从迷惘和认识的错觉中，经过苦难与考验，唯有追溯，才能永亮“长明灯”，才能“且让知音者/将祖辈们的心愿/说一说/”。

《文化，我们灵魂的大厦》¹⁰²是一首对于

华人来讲，“不管你爱不爱自己的文化/千秋万代/它永远是我们/灵魂的大厦”的直白，令人感动于诗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用情至深。在《神殿》¹⁰³一诗中诗人“愿将虔诚的心/插进炉中/追随这几千年的神殿”。

《春，一个无根的天堂》¹⁰⁴表达诗人在春节的时候，用代表传统文化的牛车水和代表西方文化的乌节路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名，用没有爆竹声的震耳连响和没了牛车水的热闹夜市，来象征传统的落没。用外国百货公司里挤满了人群来象征西化的挺进，使人不禁“掉进一个无根的天堂”。强烈的对比，化成反省和沉思。成君的《书城的怀念》¹⁰⁵和《时代的叹息》¹⁰⁶表达了诗人对仅存的旧建筑及沉寂的新加坡河的缅怀，“数不尽的参天高楼，怎保得住传统的根基”的感言，《河的独白》¹⁰⁷是时代的独白，是反思的独白。

另外在《五千年的文化》¹⁰⁸加上《墨墨的土壤》¹⁰⁹等这些诗歌里，成君要歌颂中国五千年文明的风雅，赞美五千年的飞跨，感叹新加坡的“体温与脉搏不协和”的遗憾，发出“笔，总是要留着，我们还要写诗和谱曲”

97. 长河，原名陈川波，1963年毕业于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任南大中文学会秘书及该会出版的文艺刊物《大学青年》编委，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任《星洲日报》编辑，主持《青年园地》、《青年知识》等文艺性副刊编务。业余主编综合月刊《建设》。九十年代起，负责文艺性杂志《艺术天地》编务策划工作。1999年以来，担任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会长。
98. 长河诗集《掠过夜空的彗星》新加坡：新华文化事业（新）有限公司，1991年3月。（作于1986年）
99. 方修《序》，见长河诗集《掠过夜空的彗星》新加坡：新华文化事业（新）有限公司，1991年3月，页序3。
100. 长河诗集《掠过夜空的彗星》新加坡：新华文化事业（新）有限公司，1991年3月，页60—62，（作于1984年）。诗歌全文见附录35。
101. 成君诗集《河的独白》，新加坡：中外书业社，1985年1月，页80—81，（作于1983年12月1日）。诗歌全文见附录36。
102. 成君诗集《河的独白》，新加坡：中外书业社，1985年1月，页88—89，（作于1984年4月9日）。诗歌全文见附录37。
103. 成君诗集《河的独白》，新加坡：中外书业社，1985年1月，页82—83，（作于1984年1月12日）。诗歌全文见附录37。
104. 成君诗集《河的独白》，新加坡：中外书业社，1985年1月，页84—85，（作于1984年1月22日）。
105. 成君诗集《河的独白》，新加坡：中外书业社，1985年1月，页86—87，（作于1984年2月27日）。
106. 成君诗集《河的独白》，新加坡：中外书业社，1985年1月，页90—91，（作于1984年4月23日）。
107. 成君诗集《河的独白》，新加坡：中外书业社，1985年1月，页78—79，（作于1983年11月1日）。
108. 成君诗集《淡淡的情愫》，新加坡：商务印书馆分馆，1990年1月，页41—43，（作于1986年8月3日）。诗集中，同类感叹地诗歌有：《向历史交卷》，页58—60，（作于1987年4月20日）。《数千年的宠儿——读周天诗日》，《淡淡的倩影》，页75—76，（作于1988年9月19日）。
109. 成君诗集《地平线上的世界》，新加坡：赤道风出版社，2001年10月，页1—2，（作于1989年9月27日）。诗集中，同类感叹地诗歌有：《移情的嘱咐》，页3—5，（作于1989年11月7日）。

“谁不想把唐诗宋词谱成名曲”的心愿。

成君的诗歌让我们在民族文化的历史回溯和立足当代新加坡的文化价值评价的坐标上，体现出了较大的对南大的情意结和文化群体性在时空的最大容量度。

至于梁三白《母亲的脸》¹¹⁰这首诗却不象前几首那么或悲或痛或苦。全诗惟一流露伤痛的句子是“纵横交错着沉重五千年”，其余的诗句皆带赞颂，毋宁说是一首赞美诗。“母亲的脸方方”此一意象别致有亲切，的确是妙喻。诗歌语言明快与同辑中的《微醺时候》等迥然相异，那就是诗歌皆有感而发，绝不无病呻吟。

然而，仅仅奋力寻根，忽视环境条件的改变，能够挽倾舟于狂澜吗？中华文化的辉煌，需要社会大环境的推波助澜，需要有大环境强势语言的有力助威，但在新加坡这种愿望已渐被西化的语言和作风所边缘化。

2.2 1990—1999年代典型诗作析解

南大的解散，引发出华文教育在岛国的“消亡”课题，南大的事实已不容挽回，诗人们情不自禁地提起笔，基于对中华文化的坚持与执着，对民族教育的良知，大量的作品如新加坡河水般滔滔地控诉着诗人的不平和愤慨。诗人们借助意象，借题发挥，表达对于自己文化的热爱与智者的文化思考。

朱德春的《青菜吟》¹¹¹把脱离“根”的青菜象征无根的语言也是苍白的、不结实的、不稳定的，惟有根基扎实方能代代青绿，千秋万代。

《闻鸡啼小记》¹¹²一诗中：

“我翘首东方/仿佛要成为第一位目睹太阳从地平线/放射出光芒。”

古老的东方有条龙，雄鸡报晓，龙首挥

动。

“引颈企盼的姿势/像极了伸长脖子的鸡啼/声声要唤醒沉睡凄冷的大地。”

朱德春《花的意志》¹¹³诗中写道：

“因为空气太冷/我拒绝在室里盛开/而且室里泛滥着虚情的冷光/不是温煦的阳光”

“只有那些没有原则的假花/才不知失去土壤的悲哀/被断根插进花瓶/仍然开颜展笑”

语言是情绪的工具，情感的深沉用咏物来替代，深刻的寓意深深地在回味、回味、又回味。“真正的花/是植根在土地上/才昂扬着开花的意志”让我们再一次回味咀嚼无穷。

朱德春的《青鸟》¹¹⁴，语句非常的奇妙独特：

“我在古籍里寻觅青鸟的踪迹/逐字逐句地在竹简上找到了它/发现尧舜时代记载青鸟的文献最多/后来人心不古青鸟就音讯杳然”

“我不禁颓然掩卷叹息/莫非青鸟已经飞去另一个天空”。

西方的青鸟和东方的青鸟，都有典型的象征意涵。“含蓄是一种饱满的蕴藏”（艾青语）

如果在这里的青鸟我们当它是华人推崇龙一般地护卫自己的文化的神鸟，那，在新加坡的某一段，令我们的诗人，令我们的文化卫士流下热泪的是血管里流的血和嘴巴上用的语言的碰撞，难以调和，难以平衡，以致精神的神圣殿堂力挫，需寄生于青鸟的完美，青鸟的自由，青鸟的一去不复返来呼唤往日的环境，那可是南生“只有我一个还在苦苦寻觅呼唤”的低吟。《预言》¹¹⁵、《苦瓜吟》¹¹⁶都是咏物抒怀，意味深长。

《苦瓜吟》里我们仿佛把苦瓜慢慢地放进嘴里，慢慢地回味那苦涩的味道。南生对

110. 梁三白诗集《微醺时刻》，新加坡：仙人掌出版社，1987年4月，页126—127，（作于1984年5月）。诗歌全文见附录38。

111. 朱德春诗集《把话藏在年轮里》，新加坡：创意圈工作室，2001年6月，页49，（作于1991年）。诗歌全文见附录39。

112. 朱德春诗集《把话藏在年轮里》，新加坡：创意圈工作室，2001年6月，页51，（作于1991年）。诗歌全文见附录39。

113. 朱德春诗集《把话藏在年轮里》，新加坡：创意圈工作室，2001年6月，页65，（作于1996年）。

114. 朱德春诗集《把话藏在年轮里》，新加坡：创意圈工作室，2001年6月，页75，（作于1997年6月）。诗歌全文见附录39。

115. 朱德春诗集《把话藏在年轮里》，新加坡：创意圈工作室，2001年6月，页89，（作于1999年）。

116. 朱德春诗集《把话藏在年轮里》，新加坡：创意圈工作室，2001年6月，页93，（作于1999年）。诗歌全文见附录39。

南大的情感，随着岁月的流逝，语言环境的改变，华校生的处境等，苦瓜挤出的苦味很多南大生都尝过，有些南大生毕业后的遭遇苦过人们所畏惧的苦瓜。曾几何，要生存，再苦也要咽下去！对华文在新加坡越来越式微的忧虑。

“苦于我们满腹的种子/竟耿耿于怀/苦苦地感怀/苦苦地沉吟”。

古人论诗，讲究“片言可以明百意”。在成君的《甲骨的联想》¹¹⁷中：

“为何来得如此东方/你可以说是陈旧/爱与不爱/由你分说/你只是个逐浪者/或是烟波中的旅客”

一句“爱与不爱，由你分说”，细读之后，联系东南亚的文化大背景，相信许多人都有会心的低头沉思。浅显的文字，简洁的表达，意蕴来得更深远。成君其他诗歌多多少少都有警句式的精练，不求刻意的铺陈，手法熟练，熟悉的文字化作空白的思考余地。读成君的诗，需要对本地的历史和新马的进程有所了解，对新加坡迅速发展的成就冷静地反思。

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迫不及待地取代百年的旧事物，欧风美雨飓风般登陆横扫千年的甲骨文。《悼周天》中，满腔激情地塑造了一位为民族文化忧心的刚毅身影，薪火相传的责任，为新华文学，为民族的后裔，为时代的悲情，敲落铿锵的诗句，令诗人追忆。

祖辈们的心愿，梦想和憧憬，后人将擎着火炬，燃起心灯点点。

成君《两个圆》¹¹⁸一诗非常用心地形容中西文化的习惯互相的冲突，汉堡包“这就

是新的传统”，圆饼“带来一段千年感人的神话”。《脉》¹¹⁹这首诗歌从《叶脉》到《山脉》，《血脉》到《龙脉》，脉脉相传，相传的是叶脉“淡淡的情愫”，山脉延绵的豪迈，血脉“殷红沸腾，发扬传统的热爱”，龙脉“妙用五行八卦化蓬莱”。

《悠悠的五千年》¹²⁰一诗“是思索换来了伤感”，是“为了维护族群间的一种形象”，是“的确还有人/还誓言不倦/要为这种意念/耕耘终身”回归到“高耸的红墙褪了色”。

南大的情结又一次浮现眼前。

田思的《有陶氏之梦》¹²¹中写道：“也许”我们的“祖先都姓陶”，“把这坯醇烈干了/即使摔破在地/片片都是真诚”。在这首诗歌的注释中田思写道：“有人从事文化创业，颇多艰辛，依然锲而不舍。联想到华人向被称为Chinese乃源自China一词，China者，陶器也。岂心系文化传承之辈，其孜孜矻矻精神，皆本自有陶氏之梦乎？”

苦难出英雄，也出作家。从建园的时候起，到闭园的时候止，数不清的作家步出南园，到南洋各地，肩挑文化，背负诗书，安身立命。除于文学有偏爱，更于祖传的语言文化有偏执，而祖传的语言文化也端赖此种精神，得以延续不断。以延续祖传的语言文化为天赋的使命，以教育下一代为己任。

其他诗人的有关文化思考意识浓厚的诗歌还有梁钺的《如果有两个月亮》¹²²、贺兰宁¹²³《东方的发》¹²⁴、严思《我带着一颗中国心——诗赠伏陵先生》¹²⁵、梁钺《虚火》¹²⁶、成

117. 《（新世纪石化文学数列之二）新华七人诗选集》，新加坡：斯雅舍，2007年6月，页173。诗歌全文见附录40。

118. 成君诗集《地平线上的世界》，新加坡：赤道风出版社，2001年10月，页28，（作于1992年8月18日）。诗歌全文见附录40。

119. 成君诗集《地平线上的世界》，新加坡：赤道风出版社，2001年10月，页31—32，（作于1992年9月26日）。

120. 成君诗集《地平线上的世界》，新加坡：赤道风出版社，2001年10月，页104—106，原载1999年6月《新加坡文艺 第68期》（作于1998年10月22日）。诗歌全文见附录40。

121. 田思《田思诗歌自选集》，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02年1月25日，页142—143。作于1999年12月12日。诗歌全文见附录41。

122. 梁钺诗集《浮生三变》，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97年6月，页129—130，（作于1992年9月2日），发表于1992年12月《文学半年刊 第30期》

君《中秋》¹²⁷、梁钺《笔画极短篇》¹²⁸、陈剑《过去随风》¹²⁹。朱德春的《喝茶感言》¹³⁰、成君《谁能补白——读非心〈他们退席〉有感》¹³¹。

1980年代初至中期，是新马诗坛诗歌的丰收季节，一大批诗人在南大事件后，在深沉的反思与艰苦的精神挣扎中，企图借助诗歌这种形式，在文化主题上使得诗歌步入金色的秋天。

1990年代至二十一世纪间，对中华文化的追怀，对文化寻根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对母土文化的崇拜以及对现实生活中的西化现象的失落交织，造成诗人们的复杂情感。南大的事件过了整十年，人们依然心绪纷扰，如同古寺的后花园，却至今还活着一棵联系母体文化的参天大树，广大海外华人浇灌爱护，希望永远茂盛丰沛。诚几何，马华文艺的创作量应当是很丰盛的，是中国本土以外最庞大的华文文化交流。新加坡的诗人更是勤奋笔耕，态度严肃，关心时事，敢于“突破冻土”用诗歌的技巧打

破沉默。

2.3 2000—2007年代典型诗作析解

这一时期只收集到12首诗歌，其中朱德春的《心字》¹³²通过咏物抒怀，还有成君的《瓦》¹³³、《一个华校生的忧思》¹³⁴、适民¹³⁵《新春抒怀——献给南洋大学》¹³⁶、严思《我是历史的标志》¹³⁷、梁三白《母语》¹³⁸等都是这一时期较为典型的诗歌作品。其中《母语》一诗中“母语不是海水/哪有潮涨潮退/母语/无涉民意、谜语或木鱼”诗中的意味令人玩味¹³⁹。

当我们用文化的视野来透视新加坡南大生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寻根意识，我们会发现，诗歌的大背景或大观念，深刻地烙印在南大生的文学作品中。诗人从眼前的历史和南大的命运出发，联想社会的、民族的、教育等一系列的文化思考，从民族文化的语言地位形态潜入民族文化的精神结构。

诗人们充满压抑、哀痛和忧思。探讨引以

123. 贺兰宁，原名陈鸿能，字雅礼，新加坡人。1945年生于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州。先后获得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士、中国南京大学文学硕士、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学硕士、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学博士。从事文学创作四十多年，曾任《文学》执行编辑，《五月诗刊》主编及《大地》编辑顾问等。
124. 发表于1992年12月《文学半年刊 第30期》
125. 吴晓逸编，《新加坡》严思诗集《木麻黄恋歌》，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3月，页70—71，（作于1996年1月1日）
126. 梁钺诗集《浮生三变》，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97年6月，页77—78，（作于1993年3月12日），发表于1993年6月《文学半年刊 第31期》
127. 成君诗集《地平线上的世界》，新加坡：赤道风出版社，2001年10月，页55—56，（作于1993年9月14日）。
128. 发表于1995年12月《五月诗刊 第24期》
129. 陈剑诗集《火凤凰》，新加坡：诗出版社，1995年8月，页47，（作于1995年5月17日云南圆新牌坊揭幕后）。
130. 朱德春诗集《把话藏在年轮里》，新加坡：创意圈工作室，2001年6月，页57，（作于1995年）。
131. 成君诗集《地平线上的世界》，新加坡：赤道风出版社，2001年10月，页107—108，（作于1999年3月18日）。
132. 朱德春诗集《把话藏在年轮里》，新加坡：创意圈工作室，2001年6月，页101，（作于2000年）。
133. 成君诗集《地平线上的世界》，新加坡：赤道风出版社，2001年10月，页118—119，（作于2000年3月17日）。
134. 成君诗集《地平线上的世界》，新加坡：赤道风出版社，2001年10月，页122—124，原载于2000年9月《新加坡文艺 第72期》，（作于2000年7月5日）。
135. 适民，原名黄盛发，1941年8月20日生于马来西亚吉打州，原籍广东省潮安县，现为新加坡公民。1966年毕业于南洋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1970年及1977年先后考获巴黎大学文学硕士与博士学位。专研中国文学。
136. 适民诗集《天地篇》，新加坡：热带出版社，2005年2月，页43—44。（作于2003年2月2日），曾发表于2004年3月马来西亚《塘火文学季刊 第12期》
137. 新华九家诗选》，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06年5月4日，页179—180。（作于2004年至2005年之间），原载于《热带学报》。
138. 《新加坡文艺 91期》，2005年10月，页105。
139. 张森林《当代新加坡伤痕文学及中国学者的解读（1981—2007）》，北京师范大学及新亚大学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论文，页30。

自豪的博大文化在新加坡这个欧风美雨的特殊环境里的生存课题，是诗人们发自良知而自我负起的使命。文化寻根、反省反思是诗人们把历史与现实的交融、沟通，转向思想触角探入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并以思考的冷静姿态表现了对民族文化心理负面的清醒，理性的透视力。因此，2000至2007年的诗歌作品中，南大生呼出寻根与反思的声音。

成君的《瓦》诗回忆云南园的八角亭，愤慨：

“曾几何时/有人拆亭摔瓦/怎能挽回那半截的园地/可惜捡不回那珍贵的半片瓦/四十周年的日子/终于获得那片复制的瓦档/再给我想起瓦的传统/东方人的美德/总不能忘怀/瓦的情结”

瓦，在云南园。绿瓦在八角亭。表达是云南园的沉落，但不沉落的是一颗“铮铮的”南大情结。

成君在《一个华校生的忧思》中，华校生的几许白发是：

“背负着一辈子的社会职责”！“沉压着的是历史的包袱/解不开那绵绵的愁绪”。

是的，一批华校生的出路在某个时段被一刀切。一刀切断了一部份华校生的前途，一刀切断了华校生的摇篮，一刀切断了“那盏照明的心灯”。但诗人深知，华校生的脉管里仍滔滔流着祖先的血液，华校生的文化种属是不会改变的炎黄子孙。

成君的《炎黄子孙》，魂系千秋，海外华人，同样是连接几千年的一个族群，思想的延续，辉煌中夹着血泪，紧握文化传承的舵，踏遍万里的航程。

适民《新春抒怀——献给南洋大学》一诗中，“虽说一颗夜明珠/足以使整箱珍宝失色/你在我心目中/何止千万颗明珠”。缅怀南大，因为南大是东南亚华文的一颗闪亮的夜明珠，是民间自办的大学，凝聚着华人要把传统

文化继承下去的希望。

田思的《你们的名字》¹⁴⁰一诗，在缅怀先贤的诗句中，以先贤伟大的奉献精神引出中华文化优良传统的传承，以及根的延续即是优良传统的血脉相传。寻根是要赓续，记住先贤的名字意味着牢牢扎根。

“你们的名字是灯火”“你们的名字是钟声/敲响民族的醒觉/你们的名字是血脉/赓续文化传统”。

老一代人深忧年青一代失去文化的“根”，断弃文化的承传。但新一代青年人则不以为然，他们自认从来没有拥有“根”的感觉，无从热爱“根”，以至对“根”建立不起应有的联系和情感。

新一代是在新加坡走向国际、走向全球化的英文之上政策培育下成长，在以英文为主的环境和氛围里长大。西方的文明，西方的文化以强势的教育与生活方式深深灌注于他们的思想之中，因而要对古老的中华文化敬礼膜拜深感不明。这就是在中国的崛起中，在民族文化的认同中，新加坡有关当局在这些年，特别在近期，不遗余力提倡说华语、学华文，在学校与民众教育方面，逐渐提升与深化华族文化传统教育的缘故。

正如陈剑的《过去随风》中的感言，“无限感怀/无意抨击陈年老帐/系此纯属缅怀/前南大已入史册/过去随风/后南大再掀新章。”

五、结语

悠久方能充实。中华文化生命的悠久，带来了它自身内容繁富和辐射的辽远，培养了全世界华人民族深沉的历史意识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自1980年南洋大学被合并后，一批受华文教育的诗人满怀一腔激愤，特别是南洋大学毕业生更是对此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们挥笔疾书，留下情绪亢奋的诗歌，留下浓浓的伤感，留下淡淡的无奈。烙印着伤痕的文学就此达到了高潮，本文只对在当时时代感召中的诗歌部分进行铺述和展现，带出诗歌中的文化思考内涵，当然南大生

¹⁴⁰. 田思《心灵捕手——田思朗诵诗选》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08年2月20日，页96—98。（作于2003年7月15日）。

对南大的情结毋需赘述更是主要阐述内容。

旧南大以中文为主要传授语文、以传承中华文化为旨趣的影子随岁月流逝而已越趋模糊，除了仅有的标志性建筑物，在原校址建立的新南大以英文为主要传授语文、以务实的国家需要培育人才，已全然是旨趣迥异的当代大学。唯一力求继承的是南洋大学创办以来形成的具有“国家文化遗产”等级的“南大精神”。

南大精神是新加坡未来世纪面临困境所要召唤回来的民族资本。对华社而言，南大精神除了更接近某一种历史的追讨与除魅外，它的肯定与保存，更能体现族群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力争上游的传统能动力。南大生诗歌在激愤与缅怀中既充分地突显这南大精神。

南大作为东南亚唯一华文最高学府的象征，是族群引以为豪的民族图腾。

1980年南大并入国大的大震荡，对中华文化的追怀成了一时最热门的主题，与此同时，也激活了对南大的追怀，成了南大生或非南大生的情意结宣泄口。翻开南大生创作的诗歌，俯拾皆是的是那对南大的缅怀与对中华文化的忧患意识及随之而来的反思。无论用象征含蓄的手法、隐晦的意象来展现深层的意涵，或是以雷霆万钧、愤笔直书方式哀悼南大，谴责有关当局的措施，力透纸背的既是南大生对南大与中华语文教育的执著，更重要的是他们表达的中华文化的皈依感、民族感、认同感。

身为南大生，置身于这洪流中，明显的身份特点造就了作品中的身份认同，摆脱不了对自己身份的重申，对南大的缅怀也就是对自己身份的肯定，带来的那份使命感也就来得沉重与较为复杂。

虽然有些诗歌情绪上难免有些偏激，以致诗歌内容流于近乎口号式的激呼，语言表达也来得直抒胸臆般火热，诗歌审美性不够。

特别是1980—1990期间，这类的诗歌作品甚多，措词较直接。从肯特岗山岗走下来的年轻的南大生，血气方刚，热情高涨，最后却被毕业后生活的艰辛磨难所考验，南大的文凭受到政治光环的笼罩，求职十分困难，甚至谋职后也被剥夺职位，只得另谋其它生路。

南大的文凭在当时似乎含有另一种意含在

内，我采访了众多的南大生，有些“血泪史”叙者楚楚，闻者嘘唏。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作者，在这片热土生活了十几年的非南大生来说，广泛阅读历史资料，直接接触南大生，沉浸在已出版的书刊中，听取不同方面的看法是必要的，预防书写过程中语言的偏废，情绪上的一面倒，抓住事实，充分了解真相，力求通过自己的判断，遵循法律的依据，事实求是地呈现南大生对南大的情意结和诗歌作品中流露的对中华文化的思考。这是我想阐述的，也是我想呈现于文字的意向。

与其让尘封回忆，不如就某些方面旧话重提，从南大生诗歌作品中的思想内容和审美形态作个分析，留下对五千年中华文化的思考和继承，特别是新加坡历经磨难后，大力建设经济，提倡中西合璧，“把话留在年轮里”应该是很多华校生的感慨之言，更何况是南大生。

因此，在南大生的诗歌作品中随时可见南大生对南大的情结，如果南大生是爱好写诗歌的话，不管他是公开发表或自己收藏，总之那份情结我相信将永远伴随着南大生一生的旅程，带给后人理性的反思。

本来只是一所大学的转向，所因此造成相关族群的文化创伤和引发的强烈反应与情意结，拔高到了高层次文化底蕴的境界，彻悟生命的价值的高度，甚至是民族意识、历史意识、群体意识等一系列的整体思维的方式，这是特定地域、特定时代、绝无仅有的特殊文化现象，南大生诗歌里的南大情意结覆盖了诗歌时空观的深化和博大，探讨南大生文学作品中的南大情意结因而显得意义重大。

中西文化在新加坡这个特定地域的交汇与冲撞所导致文化错位现象，在华社引发一系列的姑且称之为“文化救亡现象”。对南大的缅怀，对中华文化的殷殷嘱望和热烈呼求，使南大的历史，使中华文化延承的信念，将诗歌置诸中西文化特殊交织的宏深视野中，突显了新加坡华族文化错位现象。这是探研南大生诗歌内涵的第二重意义。

由于探研课题的敏感性以及相关资料的某种欠缺，笔者尝试围绕着情意结与文化思考两个命题、以三个相对明显的时段、以可收集到的南大生的诗歌作品，选取其具典型性者进行

解读与分析。

笔者探研南大生文学作品中的南大情意结与其文化思考，是想穿过南大生诗歌里流露出来的缅怀“隧道”，透过切切情意，越过“时空”的触发，赋予南大25年校史艰难行中的乍暗乍明、民族命运、华文教育等旅程中的乍忧乍悲的深刻蕴义。

通过解析南大生文学作品中的南大情意结，笔者借用这个文化的编码系统，来进行新加坡自南大被合并后的社会文化现象，力图还原当时的一些事实存在的情绪淤积，从一个侧面来吸纳和汇集着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人的群体或个性的文化心理，深透地把握1980年代初期由于南大事件而引起的人们不同的反应。

诗歌是艺术化的文化心理，情感的符号，由文化的超个体性所决定，诗歌所表现的文化心理及情感是特定时空内的群体所共有的。因此，在南大生的诗篇里，作为情感符号的艺术表现的是社会的情感，即具有普遍性的、体现出社会共性的情感。

诗歌的社会含量和诗人的艺术思维运行，关注到对民族、社会、价值的变动历程，不断地往华族文化岩层深入而最终获得一种历史延续性的开拓历程，这种往诗歌审美表层向其纵深源系（隐性结构）所进行的文化追踪，带来南大生诗歌中升华和永恒价值的确立。诗歌超越了个体心理的界限，而与整个社会、民族的情感发展与导向同步和同构。南大生的南大情意结文学作品同时具有鲜明的区域和时代特色。

总体而言，南大生的南大的情意结和对文化的思考显现历史与现实视点的碰撞，使诗人的作品升华，使诗歌的内容带来深层意蕴和忧患的反思。南大生诗歌中潜在着的无论是悲怆的豪壮诗情还是哀痛的婉约伤情，都饱含对历史艰难逆行的忧虑。年轻的南大生在政治、学潮、斗争中的激情中，在改制过程的激愤中，在毕业即失业的彷徨的激愤中，对民族生存、对民族命运、对文化空间的横向观照，南大生的激情显现在诗歌中是强烈的历史与文化感悟、是自我期许的历史使命感的体现，研析南大生诗歌不仅在于其诗歌美学本题，更深沉的是其时代内涵所能带来的冲击。

南大生从诗歌中积淀的文化思考和南大情意结，使以南大为题材的诗歌作品由此驶入了对新加坡文化思考的漫长轨道。南大的课题构成诗人们的文化心态模式，使其在创作过程中，起着或隐或显的制导和潜控作用。1980年南大被合并的事件，产生诗人们一种“伟大的悲悯”，在创作冲动下，在南大情意结的驱策下，转化为特定的文化情感意绪，确定着诗歌美的文化思考和文化基质。

参考文献

一、原著

（一）诗集

1. 长河著《掠过夜空的彗星》，新加坡：新华文化事业（新）有限公司出版，1991。
2. 陈剑著《火凤凰》，新加坡：诗出版社，1995。
3. 成君著《淡淡的情素》，新加坡：商务印书馆新加坡分馆，1990。
4. 成君著《地平线上的世界》，新加坡：赤道风出版社，2001。
5. 成君著《河的独白》，新加坡：中外书业社，1985。
6. 谷衣著《谷衣诗选》，新加坡作家协会，1999。
7. 贺兰宁著《花调》，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2。
8. 槐华著《槐华的诗长征》，新加坡：朝晖艺术及文化公司，2002。
9. 李贩鱼著《在生活的道路上》，新加坡：天桥文化社，1965。
10. 连奇著《那一丛夹竹桃》，新加坡：春艺图书贸易公司，2002。
11. 梁三白著《微醺时候》，新加坡：仙人掌出版社，1987。
12. 梁钺著《茶如是说》，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84。
13. 梁钺著《浮生三变》，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97。
14. 南子著《生物钟》，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94。
15. 南子主编《五月现代诗选》，新加坡：五月诗社出版，1989。

16. 石君著《心灵的守候》，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0。
17. 适民著《天地篇》，新加坡：热带出版社，2005。
18. 田思著《田思诗歌自选集》，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02。
19. 田思《心灵捕手——田思朗诵诗选》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08。
20. 吴晓选编，（新加坡）严思著《木麻黄恋歌》，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
21. 新世纪世华文学书列之二，《新华七人诗选集》，新加坡：斯雅舍出版，2007。
22. 徐婉君主编《新华九家诗选》，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06。
23. 严思著《春华集》，新加坡：长星出版社，1985。
24. 云惟利著《红楼集》，新加坡：云南园雅舍，1996。
25. 朱德春著《把话藏在年轮里》，新加坡：创意圈工作室出版，2001。
26. 朱德春著《砂话》，新加坡：中外翻译书业社，1989。

（二）刊物

1. 《文学半年刊 第30期》，1992年。
2. 《五月诗刊 第24期》，新加坡：五月诗社出版，1995。
3. 《新加坡文艺 91期》，2005。

二、专著：

黄孟文著《新华微型小说与南洋大学的情缘》，见黄孟文著《微型小说微型论》
注：黄孟文，祖籍广东省梅县，生于1937年，南洋大学文学士、新加坡大学荣誉文学士、硕士，美国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已出版的小说集有《再见惠兰的时候》、《我要活下去》、《昨日的闪电》（英文版与菲律宾文版）、《安乐窝》、《学府夏冬》、《黄孟文微型小说选评》、《黄孟文微型小说》等。此外，他还出版了散文杂感、文学批评与理论、学术论著如《宋代白话小说研究》、《新华文学评论集》、《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联合主编）（这是新加坡首部文学史）等。他于1981年新加坡文化部颁发的文化奖（文学），以及泰国颁发的“东南亚文学奖”。近年来，他致力于微型小说的创作与研究工作。目前是《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会长。

三、单篇论文

张森林《当代新加坡伤痕文学及中国学者的解读（1981—2007）》，北京师范大学及新亚大学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论文，2007。

四、参考书目

（一）论著

1. 艾青著《诗论》，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 陈嘉庚国际学会学术小组编《南大精神》，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3。
3. 欧清池著《风沙雁文集》，中国：海峡文艺出版社，1997。
4. 风沙雁著《文艺絮语集》，新加坡：中外翻译书业社。
5. 黄吉生著《情系南大》，马来西亚：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2006。

6. 蓝棣之著《现代诗歌理论：渊源与走势》，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7. 李春青著《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8. 李业霖主编《南洋大学史论集——南洋大学走过的道路（二）》，马来西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4。
9. 李业霖主编《（1953—1980）南洋大学走过的道路——南大从创办到被关闭重要文献选编》，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5。
10. 李元瑾主编《南大图像》，新加坡：八方文化，2007。
11. 李元瑾主编《南洋人文丛书——南洋大学历史研究1》，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创作室，2006。
12. 刘星著《不忍卒读集》，新加坡：新加坡丰顺会馆，2005。
13. 刘星著《文化界人士》，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02。
14. 马来西亚南洋大学校友会编《纪念南洋大学创校25周年特刊》，马来西亚：吉隆坡益新印务有限公司和马来西亚南洋大学校友会，1982。
15. 马来西亚南洋大学校友会编《南洋大学史料汇编》，马来西亚：吉隆坡益新印务有限公司和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1990。
16. 马来西亚南洋大学校友会编《南洋大学史论集》，马来西亚：吉隆坡益新印务有限公司和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出版，2004。
17. 马来西亚南洋大学校友会编《南洋大学走过的道路》，马来西亚：吉隆坡益新印务有限公司和马来西亚南洋大学校友会出版，2002。
18. 《面向21世纪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上卷）——新华文学历程及走向》，中国：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
19. 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筹委会编《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特刊》，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筹委会，1993。
20. 欧清池著《哀思集》，新加坡：中外翻译书业社，1993。
21. 岳衡编《南大历史只有一部》，马来西亚：霹雳文艺研究会，2005。
22. 王惠平著《青春颂》，马来西亚：自费出版。
23. 王如明编撰《呵，这五十年》，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2005。
24. 王永炳著《南大在雾中》，新加坡：创意圈工作室出版，2004。
25. 郑奋兴，傅文义，傅文成著《大南大之旅》，新加坡：创意圈工作室出版，2001。
26. 朱光潜著《诗论》，北京出版社，2005。
27. 宗白华著《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出版集团出版，1981。
28. （二）刊物
29. 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出版部主编：《大学青年》，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创刊号（1959年9月廿九日）至第十期（1962年10月24日）合订本，1962年11月订。
30. 欧清池主编《新世纪学刊》第一期到第7期，新加坡：斯雅舍出版，2001—2007。

五、网上资料

符懋濂《潘老受聘相盈眶》，见“随笔南洋网”“符懋濂空间”，（作于1998年8月28日）。
[http:// http://www.sgwriting.com/24917](http://www.sgwriting.com/24917)

砂华文学的本土特质

砂拉越 田思

一、砂华文学的滥觞

“砂华文学”是砂拉越华文文学的简称，这个名称最早见于五十年代。当时正值二战结束后，民族主义的思潮席卷亚非拉各地。砂拉越的许多热血青年，特别是受华文教育者，都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参与了“反殖反帝”的社会运动。他们通过组织政党与公会，开展民族团结工作，唤醒各族人民起来，摆脱英殖民地政府的统治，争取建立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当时许多华文报章都辟有文艺副刊，青年人创作与阅读文学作品成为当时普遍的风气。第一批土生土长的华裔文学作者，也在这个时候涌现，创作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抒发年轻一代理想的文学作品。这是砂华文学的成长期(1956—1962)¹。

砂华文学的起步比马来亚和新加坡稍慢了二三十年²。早期的砂华文学先行者如砂耶、巍萌、吴岸等，都曾向新马的文艺刊物投稿。他们与新马作者们的共同点，是受中国“五四”文学的影响，服膺“为人生而艺术”，注重文学的社会性。但是，这批早期的砂华文学先行者，在那时已确立了明确的乡土观念，把自己的立足扎根于这块椰风蕉雨的土地，并且有意识地和父辈那种眷恋唐山的情意结区分开来。

吴岸写于1957年的《祖国》³一诗，就描述一位在砂拉越长大的华裔青年，送别自己“回国”的母亲，在码头依依不舍，而又毅然决定要留下来，为脚下的土地而奋斗的心情：“你的祖国曾是我梦里的天堂，你一次又一次地要我记住，那里的泥土里埋着祖宗的枯骨，我永远记得——可是母亲，再见了！我的祖国也在向我呼唤，她在我脚下，不在彼岸，这椰风蕉

雨的炎热的土地呵！这狂涛冲击着的阴暗的海岛呵！”

吴岸把这种对砂拉越乡土的深挚感情，称为“处于萌芽状态的乡土观念和爱国思想”⁴。这种思想与当时另一种“北归”(回到大陆参与新中国的建设)的思想比较，无疑具有时代性的进步意义，也为将后砂华文学中的本土特质，奠定了基础。这种萌芽状态的乡土观念和爱国思想，在砂华文学成长期的诗人作品中普遍可以看到，如田农的《土地底梦》、肖南的《农夫？森林和土地》、阿沙曼的《跳玲珑》、卡斯特的《锄头》、舒明的《归来》、白金的《咱给兄弟民族来唱歌》、雨田的《我只有欢欣》等。

由于反殖运动的蓬勃开展，当时具有进步思想的文艺青年，除了向新马一带的文艺刊物投稿练笔之外，也组织起文艺小组，学习写作和文艺理论，并在报章主编文艺副刊，如古晋《新闻报》的《拉让文艺》、诗巫《民众报》的《赤道文艺》、美里《砂民日报》的《赤道风》等。由于文艺创作的蔚然成风，稍后期间也出现了两份文学期刊，即《心声》和《文艺生活》(皆由田农主编)⁵。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艺副刊可说是《拉让文艺》，俨然成为“砂华文学”的主要发表园地，其创刊号的“编前小语”⁶有这么几句话：

“文艺，不论在任何地方，都应作为认识现实和改造现实的工具。我们学习写作，就是在学习如何掌握这种工具……我们希望这副刊能为大家所爱惜，并且至少它应些微地反映砂罗越人民的气息，砂罗越的景色。”

所谓“反映砂罗越人民的气息，砂罗越的

景色”，是当时比较朴实的乡土文学观念。而“拉让江”与另一个意象“犀鸟”（砂拉越特产鸟类）也似乎成为以后砂华文学中常用的符码，代表着某种本土特质。

在反殖时期出现的文学作品中，诗歌方面前文已略提及。吴岸的诗歌后来结集成《盾上的诗篇》，颇获好评。肖南的《农夫·森林和土地》，是一首五百多行的长诗，气魄宏大，描写三代农人开荒种植的故事，注入了对土地的深厚感情，也描述他们被剥削的不幸命运与最终的觉醒。砂耶的《给一位马来兄弟》，抒发了对一位卖“布律邦刚”（糯米糕）的友族穷孩子的怜悯。雨田的《我只有欢欣》和《阔别》，反映出参加反殖运动的各族人民之间的和谐感情。这些诗都跳动着时代脉搏，让读者感受到时代巨轮滚动的声音。散文方面，像韩拍岸的《祖国美丽的山河》与《蒙格罗树之歌》等散文，充满对乡土的讴歌和年轻人对美好理想的憧憬。小说方面，当时较多产的是巍萌与黄沙（黄顺柳）。巍萌所写的《鲁素英》《女记者》《狂风暴雨》等小说，反映了女知识青年的探索、犹豫和成长历程，以及农村的贫困（他后来的小说如《晨光照耀着山村》等，都以郊区的农村生活为主要的描述对象）。黄顺柳的《静静的砂拉越河》则刻画城市各阶层人物的面貌与揭露若干社会矛盾。

砂华文学成长期就以关心社会、热爱乡土、崇尚正义为基调，这也成为它在各时期据以发扬的传统和基本价值取向。

二、十年动乱，文坛衰蔽

砂拉越于1963年变成马来西亚的一个州，由于之前反合并的呼声甚高，政府和英国殖民统治者一样采取高压政策，左翼政党的干部和支持者纷纷被捕。后来又发生汶莱起义、印民政变、马印对抗、砂州设立三个新村等重大事件。政府和地下份子的斗争持续了差不多十年，造成农村破产，经济萧条、民不聊生。而当局在文网上的监控也愈严厉，报纸被查封的现象屡有发生。这种气氛不利于文学的发展，所以从六十年代中到七十年代中，基本上是砂州华文文学的低潮时期。虽然有一两个较有水准的文艺副刊（如《中华日报》的《文艺阵地》

与《国际时报》的《热风》），但后劲乏力，难以继。过去经常写作的旧作者，纷纷搁笔，有实力的新秀未见冒起，文坛有凋蔽之势。

三、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

由于政治势力的紧绷对立，一些涉及社会现实的题材，已不见容于公开的文学园地，而适逢台湾六、七十年代“现代诗”的风气开始在新马造成影响，本州一些揭橥现代主义、主张“完全忠实于自己”，借鉴西方文学手法的青年人，如刘贵德（方秉达）、吕朝景、谢永成、谢永就、陈焕暘、李木香等，组成了砂拉越星座诗社。该社成立于1971年，在当时的《中华日报》与《前锋日报》都辟有文艺副刊。在未创社之前，这批标榜“勇于立异，勇于标新”的文学青年，曾受到一些服膺现实主义文学者的攻击，说他们的诗晦涩难懂，双方爆发了一场为期三个月的论战，最后不了了之。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当时砂州的政局动荡，社会弥漫不安的气氛，注重抒发个人心灵与讲求文字雕饰的文学爱好者，似乎从现代主义文学找到一个精神上的出口，也对太过强调集体主义，而不免流于模式化的文风，作出某种程度的抵制。两者之间的争论，让彼此看到自己的短处，对往后文学的提升是有积极意义的。而对于西方文学流派的借鉴，随着九十年代“后现代主义”风气的兴起，也宣告“现代派”的式微。砂拉越星座诗社曾一度陷入停滞的状态，直到九十年代中，一批在文学品味上兼容并蓄的年轻人模糊如黄曦、蔡羽、叶勤、刘贵梦、沈焕等加入，使该社又重现朝气。

从作品素质来衡量，早期星座同人的作品，由于着重表现内心的意识和技巧的尝试，所以要在他们的作品中寻找本土特质是不容易的。有些作品选择了本土题材，但还是让文字上的刻意求工给模糊了。这种现象，一直到八十年代后期黄泽荣、林离、林武聪与沈庆旺等星座中生代出现，才开始有了显着的突破，黄泽荣的小说《奴英的抉择》⁸写水坝建设对伊班人造成的冲击。林离的散文集《水印》⁹富有环保精神。林武聪的诗《换枕记》¹⁰与《山都望》¹¹等，很有哲理性，而沈庆旺的诗

集《哭乡的图腾》¹²更纯粹以原住民视角来揭示他们的困境。

星座诗社最大的贡献，是文学活动的推广，使文学变得“立体化”。例如1979年主办“本地艺术作品展览会”，其中便有“诗的展览”。1991年主办“活出诗来——现代诗双语朗诵赛会”（双语是指华语与国语）。1993年联合古晋各源流中学华文学会举办“族魂文娱晚会”等。

四、婆罗洲文化局的贡献

一直以来，砂华文学主要的发表园地是报章的副刊，但在英国人统治时期，却有一个官方设立的婆罗洲文化局(Borneo Literature Bureau)。该局于1958年成立，其宗旨乃鼓励砂拉越与北婆罗洲(即后来的沙巴)的本地作家写作并出版他们的作品，且每年举行征文比赛，规定以各族语文撰写。从1960年至1976年，婆罗文化局所出版的华文书籍多达82种，其中创作与翻译(主要为民俗介绍)约各占半数。在其他机构甚少主办征文比赛的情况下，该局可说为两地的华文文学培养了一批写作人才(即使不很成熟)，其华文编辑黄俊贤功不可没。像李永平、煜煜、温玉华、钟济祥、钟济源(梦羔子)、杨华等，都曾在这项征文赛中得奖。李永平以《婆罗洲之子》获得1968年征文奖，那时他刚念完高中，准备赴台湾深造。这篇小说写华人与达雅人共处、做买卖、通婚、离异、结怨、和解，并在水灾中互援助的故事。小说的结尾，通过男主角的口，说出一个美好的愿望：“我相信有一天，没有人再说你是达雅，他是支那了。大家都是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

婆罗洲文化局的另一个贡献是推广阅读风气，该局出版的《海豚》华文学生月刊，销数超过一万三千份。其对各族文学创作的鼓励，可说体现了英国人较开放的文化政策。该局的营作一直维持到1977年，被并入国家语文局砂州分局为止。砂州华总曾多次致函语文局要求恢复早期出版各民族语文着作的做法，这项要求没有受理。不过，砂州的语文局却主办了好几届的“各民族文学奖”，砂华作家吴岸、梁放、巍萌(已故)、田思、晨露皆曾得奖。

五、文化觉醒，团体自强

虽然砂拉越于1974年“斯里阿曼行动”后就已获得和平，基本上进入“发展政治”的稳定阶段，但砂华文学的青黄不接现象，却一直拖到八十年代。1985年以后，就开始迈入蓬勃的阶段。事缘在八十年代，全国华社面临政、经、文教等问题的困扰和打击，曾掀起一场“文化自强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要成果是各地华人社团总会的成立，并吁请政府对已实施十年的国家文化政策加以检讨，从单元化的文化政策改变成多元化的文化政策，采纳各族文化中的精华。于是，在这种大气候的激荡下。砂拉越几个华文文学团体纷纷成立。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成立于1986年(其基本成员原为第一省华总文学组组员)，诗巫中华文艺社成立于1988年，美里笔会成立于1993年。再加上七十年代已成立的砂拉越星座诗社也重振旗鼓，加入一些具有创作与活动能力的新血。而每五年举行一次的砂拉越各民族文化研讨会，也催生了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该会于1990年正式成立)。这几个团体创立以后，纷纷展开推动文化与文学的活动，如举办研讨会、座谈会、创作比赛、出版刊物与丛书，以及在报章上主持文艺版位等。一时文风鼎盛，不但提携提了各地一批年青有为的写作新秀，老作家们也纷纷归队。迄今为止，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的“犀鸟丛书”已出版了55种着作。该会也先后出过《拉让江》与《马华文学》两种期刊，各印行了5、6期。诗巫中华文艺社的主要活动是在当地的报纸主编文艺副刊，开办旧诗词班与文艺讲习班，举办文学奖，并将优胜作品结集出版。该社所策划的“拉让江盆地丛书”已出到26种。至于美里笔会则注重师训学院华文写作者的培训，与提倡童诗和微型小说的创作。该会除了出版5期的《笔汇》期刊外，其“笔会丛书”所印行的会员个人着作也达到29本。砂拉越星座诗社所出版的“星座丛书”较少，前后共出了12本。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是以整理和撰述砂州史料和出版学术性着作为主，已出版的各类书籍总数约53种。该会的不定期刊物《文海》已出了5期。

砂华文学团体目前在报章上都辟有各自的文艺副刊，供会员与爱好写作的人投稿。砂拉

越华文作家协会所负责的副刊是《世纪风》(国际时报), 砂拉越星座诗社的副刊是《星座》(星洲日报), 诗巫中华文艺社兼有《文苑》(联合日报)和。《新月》(星洲日报)两个副刊。美里笔会的“地盘”更多, 分别是《峇南河》《钻油台》(联合日报)与《笔汇》(国际时报)。文艺团体因为有了这些固定的园地, 其凝聚力与创作力都有所加强。

从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中, 由于上述几个文学团体的推动, 砂华文学可说呈现相当活跃与蓬勃的状态。不但文艺副刊与期刊的出现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来得更多, 而且结集的单行本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阶段。配合新书出版而举行的推展礼或讲评会也时有所闻, 这对于普及文风也大有裨益。

另一项更大的成就是: 砂华文学虽然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实绩, 但已出现了四部文学史, 即田农的《砂华文学史初稿》, 黄妃的《反殖时期的砂华文学》¹³, 周翠娟的《砂华文学团体简介》¹⁴, 以及沈庆旺的《雨林文学的回响》¹⁵。这是马来西亚其他区域的文学所无法比拟的。

六、“书写婆罗洲”渐成气候

在上述四个文学团体中, 以诗巫中华文艺社的活动面最广。该社虽然以诗巫为基地, 但与古晋、美里甚至西马的作家都经常保持联系, 而且还在网络上设立“犀鸟文学”与“犀鸟天地”两个网站, 广泛收集与登载砂华文学的各种资料, 浏览的网友来自世界各地。

2002年12月, 诗巫中华文艺社主办一项讲座会, 邀请古晋的田思, 石问亭与该社主席宋志明发表演讲。会上田思提出“书写婆罗洲”的理念。田思认为, “书写婆罗洲”旨在扩大砂华文学的范围和内涵, 主要是考虑到尽量扩大本土文学的价值, 以为它将后可能在世界读者心目中所带来的观感与阅读位置¹⁶。田思后来在一项电台访谈中进一步提出: “自50年代开始出现‘砂华文学’这样一个名称, 过后这个名称就一直沿用下来。由于历史上的因素, 我们也认为‘砂华文学’这个名称, 颇能结合我们砂拉越当地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在历史、地理、人文方面, 是它有别于西马的地方。”

至于书写婆罗洲, “则是一种文学策略。婆罗洲本身有个特色, 就是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多元生态、多元景观。它拥有一大片的绿色雨林, 它是世界的第二大雨林, 仅次于亚马逊河流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空背景底下, 我们如果能够以婆罗洲为重点, 进行我们的文学创作的话, 它可以形成中文阅读世界一个很受瞩目的卖点。”¹⁷

“书写婆罗洲”可说是砂华文学的延伸, 在这个概念下, 写作时的文学语言是华文, 而其文学内涵是超越族群的。田思说: “书写婆罗洲”的另一层含义也在于深入去了解各民族的生活范围, 去把他们失去的传统, 在他们的民族与文化中所存在的那些优质的东西找出来。……我们需要去挖掘原住民的生活本质, 所以我们也在学习, 我们也接触很多原始资料, 也对我们的友族同胞, 带着更大的关怀心情去了解他们, 这有助于促进我们与友族之间的沟通与了解。”¹⁸

自从田思、石问亭、沈庆旺、蓝波等人提出“书写婆罗洲”的理念并加以实践之后, 反应相当热烈。许多砂华作者, 都更有意识地在作品中强调婆罗洲的本土特质。西马和中国台湾等地的许多评论家也相当关注这个课题。迄今为止, 已有十多篇的学术文章专门讨论和分析有关的作品和现象, 这可说是砂华文学的殊荣。随着“书写婆罗洲”文学运动的深化, 相信会有更多的评论出现。有关“书写婆罗洲”的著作, 也得到吉隆坡大将出版社的配合, 列为“婆罗洲系列”丛书, 陆续推出。包括杨艺雄的《猎钓婆罗洲》, 沈庆旺的《蜕变的山林》, 蓝波的《寻找不达大》与《砂拉越雨林食谱》。另外列入出版计划的还有石问亭的《梦萦巴里奥》、梦羔子的《新村纪事》、李振源的《砂拉越左手港探源》、田思编的《婆罗洲乡土小说选》、石问亭编的《砂拉越原住民的一天》、杨贻钫的《砂拉越草木花卉图鉴》等。

七、本土文学, 花果纷呈

从八十年代砂华文学的复兴到近年“书写婆罗洲”理念的推广与落实, 砂拉越华文文学展现了崭新的面貌, 而所表现的本土文学特

质，也就更加深广，兹从以下几方面作具体的介绍：

7.1 神秘雨林 文思泉源

砂拉越位于世界第三大岛婆罗洲的西北部，雨水充沛，河川山岳密布，到处葱茏一片，大部分还是充满神秘感的原始森林。“雨林文学”是文学中较稀罕而富魅力的品种，其实“书写婆罗洲”也是广义的雨林文学。在论及砂华文学现阶段的各项文学成果中，也大都和雨林有密切的关系。

砂华文学中，近年来出现了以山林为背景的猎钓文学，即山猎海钓的题材，其中以杨艺雄的《猎钓婆罗洲》¹⁹最为特出。由于作者出身于拉让江下游的渔村，自小喜欢捉鱼打猎，所以他对于野猪、野牛、猴子、蟒蛇、鳌、四脚蛇以及各种鱼类的习性都非常熟悉，写起来栩栩如生。他也从村民的智慧中学会了捕捉这些猎物的方法，其有趣的过程令人发噱。

另一本《林中猎奇》²⁰的作者是俞诗东和梁娇芳等几位前游击队员。他们以亲身的经历写出山林中的奇观和鲜为人知的生态故事。黄庭在副刊连载的散文《山中纪实》²¹也写出昔年在长屋生活的一些点滴。

热带雨林的题材，也成为一些想象力丰富的小说家，用以虚构传奇故事的灵感来源。例如出身砂拉越而在台湾文坛扬名且已入籍台湾的李永平和张贵兴，他们近年所写的一些长篇小说²²便是以婆罗洲雨林为背景，受到不少评论家的垂青。

7.2 山水文学 小镇风光

素有“犀鸟之乡”称号的砂拉越州，是个地大物博，风景壮丽的地方。千姿百态的景观和名胜，再加上人文荟萃，城镇和乡野风光各有特色。这在砂华文学作品中，常有诗意的描绘和翔实的记录。诗歌方面像吴岸和柔木的山水诗²³，都是以婆罗洲特有的景观为背景；尤其是吴岸甫于去年出版的诗集《美哉古晋》²⁴，其中所收录的一系列诗作，更把焦点集中在砂州首府古晋的景物和人文场景，富有历史的沧桑感。房汉佳所撰写的《世界著名摄影家黄杰夫》²⁵，配合黄杰夫的摄影杰作，也写出了不少引人入胜的砂州风景描绘。而黄孟

礼的《情系拉让江》²⁶一书，更把拉让江两岸的青山翠林、星罗棋布的长屋和险滩急流，刻画得淋漓尽致。这本书的后半部“拉让江市镇巡礼”，所介绍的市镇包括加帛、加拿逸、芦兜(如楼)、诗巫、民丹莪、泗里街、甲望、鱼鳞甲等。有关小镇风光的采访和描述，同类作品还有杨善在报章写的特稿《犀鸟乡跑透透系列》²⁷，杨贻钫的特稿《小镇故事系列》²⁸等。

7.3 穿街走巷 地方掌故

凡有城镇的地方就有街巷，有街巷之处就有各行各业的活动和市井佚闻，加上历史积淀，时空变迁，各种掌故也就成了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在这方面写得不错的著作有郭良的《猫城？古城古意？情》²⁹，蔡宗贤的《在老街五脚基上看夕阳》³⁰，蓝波《寻找不达大》³¹书中第二辑“木胶情愫”的若干篇章。至于在各报连载发表的特稿，有李振源追踪古晋街道掌故的《串街走巷系列》³²与《古晋古今系列》³³，以及记述福建籍与潮州籍殷商发迹故事的《闽潮波澜系列》³⁴等。还有温晓和的《走进浮罗岸系列》³⁵。至于王政贤、徐元福、蔡羽等一些怀旧忆昔的散文，也属于此类内容。

7.4 多元种族 采风探俗

砂拉越是个多元种族的州属，各族和谐共处，在文化上也有不少互相融合之处。砂华文学作者出于“共饮一江水”的感情，在他们笔下也探讨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反映他们的处境，并将观察研究所得写成专著或报道文章。已出版的民俗著作有蔡宗祥的《伊班族历史与民俗》³⁶、《砂拉越华族民间信仰》³⁷、《民俗探寻》³⁸，沈庆旺的《蜕变的山林》³⁹，林青青的《砂拉越伊班族的民俗、说唱艺术及其华族文化色彩》⁴⁰。至于各本报记者在报章上所写的报道文学更多，如李振源的《蜕变在盛祭中的投影》(收入《后巷投影》一书)⁴¹，《犀鸟祭礼系列》⁴²，《加威歌灵甘系列》⁴³，包久泉的《马兰诺传统祭海节》⁴⁴，秋玲的《寻伊班祖先及人猿踪迹系列》⁴⁵，邓子富的《加威安都系列》等⁴⁶。

7.5 种族和谐 关怀弱势

除了探讨砂拉越各族的文化习俗之外，砂华文学作者也对较落后的原住民寄予关怀和同情，并对他们在发展洪流和“现代化”的冲击下的不安和困境作出反映。例如沈庆旺的诗集《哭乡的图腾》⁴⁷和散文集《蜕变的山林》，便写出山林民族在接受改变和保持传统之间的“两难”处境。黄泽荣的短篇小说《奴英的抉择》，揭露水坝建设所带来的后遗症，原住民的传统文化与原有的生活方式几乎被连根拔起，令他们难以适应。夏秋冬的小说《刺青》⁴⁸与《曼索的世界》⁴⁹反映长屋青年流入城市后彷徨失措的窘迫状态。鞠药如的小说《沙爹梦》⁵⁰，叙述一个会讲华语的伊班男孩，帮祖母在巴刹摆卖“米连”野菜时所看到的不公平现象。这些小说作者都表现了关怀弱势者的心理。

在宣扬种族和谐与亲善方面，英仪小说集《璀璨的人生》⁵¹中好几篇作品，写她在拉让江下游的伊班人聚落教书，与伊班学童与村民们之间建立的真挚感情。梁放的小说《森林之火》⁵²写与华人工程师共事的伊班厨师的纯朴性格，《玛拉阿姐》⁵³则以一个华裔男孩的视角，对一个伊班童妓表示深切的同情。至于反映异族通婚的小说，则有梁放的《龙吐珠》⁵⁴、石问亭的《梦萦巴里奥》⁵⁵、张永众的《源》⁵⁶等。此外，田恩的组诗《甘榜童年》⁵⁷与单篇散文《长屋里的魔术师》《在园丁马登家里》⁵⁸，也围绕着种族亲善的主题。

7.6 历史余波 劫难反思

砂华作者中，有不少人以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来作为小说题材，从历史事件衍生情节，或以某些真实的人物经历，作为铺垫，加上文学应有的想象和增益，来衬托出某个阶段的时代特征。这类作品与真正的历史撰述不同，它是属于小说的范畴。例如以1875年石隆门华工事件为题材的中篇小说，就有黄顺柳的《天地悠悠》⁵⁹、杨锦扬的《晨兴圣歌》⁶⁰、楚天的《灵泉祭》⁶¹与黄叶时的《河湾旧事》⁶²。黄顺柳还写了以实文然煤炭开采为背景的小说《炭山风云》⁶³。而以反殖运动为题材的小说，则有徐然的长篇《河岸的胡姬花》⁶⁴。写十年动乱的伤痕文学，有梁放的短篇《锌片

屋顶上的月光》和《一屏锦重重的牵牛花》⁶⁵，黑岩的《荒山月冷》⁶⁶，以及梦羔子将出版的《新村纪事》。写前砂共份子在“斯里阿曼行动”后重返社会，但因身份问题而致生活窘迫，不得不离家另谋生路的《流民》⁶⁷，其作者是凡民。这些小说以不同的角度，试图记录和省思历史劫难所带给人民的痛苦经验。至于人物传记而带有文学性质的，当推房汉佳写二战时抗日机工的《英雄的故事》与《世界著名摄影家黄杰夫》。

7.7 开荒辟地 田园讴歌

早期砂州华人有很多是务农的，所以有不少关于开荒辟地、披荆斩棘、建设家园、从事农作的艰辛过程的记载文字。例如黄顺柳的小说《垦殖者之歌》⁶⁸，写的是黄乃裳率领福州人，开发诗巫新珠山垦场的历史故事。黄俊贤的中篇小说《卜通叔传》⁶⁹，写的也是早期的“番客”只身南来，飘洋过海，出卖劳力，开芭种地的艰苦劳动生涯。巍萌的散文像《猿啸惊魂守禾芭》《流血流汗开芭地》⁷⁰等单篇，写的是惠东安籍的农人一家种稻割胶的生活体会。

由于农人与土地的密切关系，许多出身农家的砂华文学作者，都以饱满的感情写出对土地的热爱和对田园的讴歌。例如黄叶时的散文集《有情天地有情人》⁷¹，华雁的散文集《人间有情》⁷²和晨露的散文集《荒野里的璀璨》⁷³等。恰巧她们都是女作者，在描述农村事物方面，特别带着女性的敏感与细致，也给砂华散文增添细腻而善感的风格。而梦羔子的田园诗，更是独树一帜，一直被文学界称为“田园诗人”⁷⁴。

7.8 雨林美食 民间佳肴

出身木胶的蓝波，是一位喜欢以乡土题材来写作的砂华作者。由于他曾在砂州许多乡镇当过公务员，对各民族的风味美食，相当有研究，懂得各种民间佳肴的烹制方法，更喜欢以热带特有的食材，经过本身的调配而创造出别有风味的“雨林美食”。本身也是诗人和散文家的蓝波，善于把这些民间美食的烹调方法和品尝经验，以优美的文笔介绍出来。这些篇章成为他的《寻找不达大》和《砂拉越雨林食

谱》⁷⁵两本散文集的主要内容。写食谱而能和文学挂钩，蓝波可说是华文文坛的异数。对于推广本州旅游业，从味蕾吸引外地人对砂拉越的兴趣，相信蓝波应记一大功。

7.9 系心环保 热爱自然

砂华文学作者相当重视环保的题材，而且对于森林的被滥伐、生态的危机、环境的恶化与江河的污染特别敏感，经常作出忧心忡忡的警示，呼吁人们珍惜自然资源，保护环境，减少破坏的现象。散文方面的作者像林离的《水印》，黄孟礼的《情系拉让江》，都有好多流露环保意识的篇章。诗歌方面的作者更多，像田思、蓝波、李笙、万川、田风、雁程、蔡羽等，都写过为数不少的环保诗。特别是田风近年所写的《环保童诗》⁷⁶可说是别开生面，是寓环保于教育的一种新尝试。田思的学术论着《马华文学中的环保意识》⁷⁷，其中所引用和评论的环保诗文，有半数都是砂州作者的作品，可见砂华文学作者系心环保、爱护大自然，到了多么热切的程度。他们对于本地的环保课题的关注，有时是十分敏锐与及时的。例如今年初诗巫发生大水灾，文艺版编辑便组织了一个“与河对话”的特辑⁷⁸，反映了诗人们关心环境，对江河泛滥既无奈又愤慨的忧戚感。

7.10 多元生态 草木有情

砂拉越是婆罗洲的一部份，婆罗洲的特征就是多元景观、多元生态、多元民族、多元文化。这成了文学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泉源。由于砂州80%以上的土地为广袤的雨林，各种动植物的生态非常丰富。尤其是草木花卉方面，多彩多姿，习性各异，是大自然无穷尽的一个宝藏，也是世上少有的多元化生物中心。

以草木花卉为写作题材的作者，以黄叶时、蓝波和杨贻钫为代表。黄叶时的散文集《有情天地有情人》，其中有好多篇是介绍农家常见的花卉、观赏植物与药用植物。蓝波对于这类植物也很有心得，特别是对家乡木胶的海桑(不达大)、咸草(芦苇)、硕莪等植物，以及可以作为食材的各种雨林野菜，更是如数家珍。我们可从其散文集《寻找不达大》中看到

这些沾着浓厚乡情的植物介绍。杨贻钫在报章上所写的特稿《行道树系列》⁷⁹与《雨林果树采风系列》⁸⁰等，也将本州常见的植物介绍得很详尽，图文并茂，趣味盎然。

八、小结

砂华文学体现了作者们对犀鸟之乡的归属感和强烈的感情，热爱土地，关心人民疾苦，崇尚亲善精神，注重刻画和描绘砂拉越的风土人情及自然景物。在文学内涵上，不但反映了时代特征，而且具体展现了砂拉越在历史、地理和社会各方面的递嬗演变，具有丰富的本土特质。它不但与中国、台湾、北美等地的华文文学有所不同，而且与西马的华文文学也迥然有别。它是马华文学的一部分，但也构成风格殊异的区域文学特点。

砂华文学所具有的人文精神，提倡种族和谐与关怀弱势者，尊重传统，维护环境，揭示人性的真善美，追求生活品味素质等内涵，具有朴实的普世价值。正如鲁迅所说“越是乡土的，就越是世界的。”所以砂华文学有条件立足于世界文学之林，成为人类文化艺术宝库中的奇花异草。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在接受访问时说：“西方文化过于突出其城市性、技术性、妨碍了其他表现形式，如地方性、情感性的发展。人类的整个不可知的部分被理性所掩盖了。正是这种认识，促使我转向其他文明。”谈到砂华文学的特质，或许正是它较少受到西方文明中某些负面的影响，而表现了人类世界中纯朴真实的一面。这也是砂拉越本土文化中最值得自豪的地方。

愿我们携手努力，把砂华文学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注释

1. 田农《砂华文学史初稿》，诗巫：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1995，页51。
2. 马华文学最早的两个正式的新文艺副刊，分别为《新国民日报》的《南风》与《叻报》的《星光》，皆创刊于1925年。
3. 吴岸《盾上的诗篇》，香港：新月，1962，页44。
4. 吴岸《盾上的诗篇》(再版)，吉隆坡：南风，1988，页iv。
5. 田农编《马来西亚砂拉越华文诗选》(1935—1970)，古晋：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2007。
6. 田农《砂华文学史初稿》，诗巫：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1995，页52。
7. 韩拍岸《生命的痕迹》，香港：维华，1962，页1&5。
8. 林武聪编《石在》，古晋：砂拉越星座诗社，1988，页119。
9. 林离《水印》，诗巫：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1996。
10. 田思。傅承得编《最美的书。最爱的人》，吉隆坡：大将，2000，页53。
11. 游川等《吻印与刀痕》，吉隆坡：千秋，1999，页23。
12. 沈庆旺《哭乡的图腾》，诗巫：中华文艺社，1994。
13. 黄妃《反殖时期的砂华文学》，诗巫：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2002。
14. 周翠娟《砂华文学团体简介》，诗巫：中华文艺社，1996。
15. 陈大为等《赤道回声——马华文学读本Ⅱ》，台北：万卷楼，2004，页605。
16. 田思《沙贝的回响》，吉隆坡：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2003，页173。
17. 黄裕斌《书写婆罗洲Vs砂华文学——田思电台访谈摘录》，吉隆坡《星洲日报·文艺春秋》，29/6/2008。
18. 黄裕斌《书写婆罗洲Vs砂华文学——田思电台访谈摘录》，吉隆坡《星洲日报·文艺春秋》，29/6/2008。
19. 杨艺雄《猎约婆罗洲》，吉隆坡：大将，2003。
20. 俞诗东?梁娇芳等《林中猎奇》，诗巫：友谊协会，2000。
21. 古晋《星洲日报·星座》，11/1/2009起。
22. 李永平在台湾出版的以婆罗洲雨林为题材的小说，有《雨雪霏霏》(天下文化2002)、《大河尽头》(麦田2008)等。张贵兴则有《顽皮家族》(联合文学1996)、《群象》(时报1998)、《猴杯》(联合文学2000)、《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麦田2001)》等。
23. 参见吴岸《我行吟在婆罗洲山水间》，收于《生命存档》，古晋：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1998，页8。柔木《漫步在婆罗洲雨林的诗情画意》，收于《书写婆罗洲》，诗巫：中华文艺社，2003，页15。
24. 吴岸《美哉古晋》，古晋：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2008。
25. 房汉佳《世界着名摄影家黄杰夫》，福州：海潮摄影艺术，1995。
26. 黄孟礼《情系拉让江》，诗巫：砂拉越基督教徒写作人协会，2002。
27. 杨善《犀鸟乡跑透透系列》，诗巫《联合日报》15/2/2008起。
28. 杨贻钫《小镇故事系列》，诗巫《诗华日报》27/12/2007起。
29. 郭良《猫城?古城古意?情》，诗巫：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1994。
30. 蔡宗贤《在老街五脚基上看夕阳》，诗巫：漳泉公会，1996。
31. 蓝波《寻找不达大》，吉隆坡，大将，2008。
32. 李振源《串街走巷系列》，古晋《国际时报》，27/2/2006起。
33. 李振源《古晋古今系列》，古晋《国际时报》11/11/2008起。
34. 李振源《闽潮波澜系列》，古晋《国际时报》，18/6/2008起。
35. 温晓和《走进浮罗岸系列》，古晋《诗华日报》，29/11/2005起。
36. 蔡宗祥《伊班历史与习俗》，诗巫：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1992。
37. 蔡宗祥《砂拉越华族民间信仰》，诗巫：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1996。
38. 蔡宗祥《民俗探寻》，美里：美里笔会，2005。
39. 沈庆旺《蜕变的山林》，吉隆坡：大将，2007。
40. 林青青《砂拉越伊班族的民俗：说唱艺术及其华族文化色彩》，诗巫：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2005。
41. 李振源《后巷投影》，古晋：国际时报，1991，页162。
42. 李振源《犀鸟祭礼系列》，古晋《砂拉越晚报》，12/5/2000起。
43. 李振源《加威歌灵甘系列》，古晋《砂拉越晚报》，19/4/2000起。
44. 包久泉《马兰诺传统祭海节》，古晋《星洲日报》26/4/1999。
45. 秋玲《寻伊班祖先及人猿踪迹系列》，古晋《国际时报》，22/7/1999起。
46. 邓子富《加威安都系列》，古晋《国际时报》，27/7/1999起。
47. 沈庆旺《哭乡的图腾》，诗巫：中华文艺社，1994。
48. 许为青(夏秋冬)《刺青》，收于《文华小说散文选》，古晋：砂拉越留台同学会，2001，页20。
49. 夏秋冬《曼索的世界》，美里《中华日报?文苑》，15/7/2003。
50. 鞠药如《沙爹梦》，吉隆坡《星洲日报?文艺春秋》，13/7/2008与20/7/2008。
51. 英仪《璀璨的人生》，古晋：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1993。
52. 梁放《森林之火》，收于《烟雨砂隆》，古晋：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1985，页92。
53. 梁放《玛拉阿姐》，收于《玛拉阿姐》，古晋：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1989，页48。
54. 梁放《龙吐珠》，收于《烟雨砂隆》，古晋：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1985，页112。
55. 石向卓《梦萦巴里奥》，吉隆坡《星洲日报?文艺春秋》，25/5/2003、1/6/2003与8/6/2003。
56. 张永众《源》，吉隆坡《星洲日报?文艺春秋》30/3/2008与6/4/2008。
57. 田思《甘榜童年》，收于《心灵捕手》，吉隆坡：大将，2008，页129。
58. 田思《田思散文小说选》，诗巫：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1996，页21&26。
59. 黄顺柳《天地悠悠》，载于吉隆坡《蕉风》460期，1994年5/6月，页20。
60. 杨锦扬《晨兴圣歌》，收于《花踪文汇5》，吉隆坡：星洲日报，2001，页85。
61. 楚天《灵泉祭》，大马福联会暨雪福建会馆，2006。
62. 黄叶时《河湾旧事》，古晋《国际时报?世纪风》，14/7/2005与21/7/2005。
63. 黄顺柳《鞍山风云》，古晋《星洲日报?文艺村》，25/5/2002起。
64. 徐元福《河岸的胡姬花》，美里笔会，2009。
65. 梁放《玛拉阿姐》，收于《玛拉阿姐》，古晋：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1989，页67&81。
66. 黑岩《荒山月冷》，诗巫：中华文艺社，1994，页103。

67. 吴岸等《云过马当山》，古晋：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2008，页42。
68. 黄顺柳《垦殖者之歌》，收于《围乡》，吉隆坡：马来西亚通报，1983，页119。
69. 黄俊贤《卜通叔传》，古晋：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1994。
70. 田思编《巍萌及其作品》，古晋：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2008，页42。
71. 黄叶时《有情天地有情人》，古晋：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1988。
72. 华雁《人间有情》，古晋：佳印，1997。
73. 晨露《荒野里的璀璨》，美里：美里笔会，1998
74. 梦羔子《你那边的夜色黑不黑》《日子曾经锋利》，古晋：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1987与1989。
75. 蓝波《砂拉越雨林食谱》，吉隆坡：大将，2009。
76. 田风《环保童诗》，载于古晋《星洲日报·星座》，23/11/2008与22/3/2009。
77. 田思《马华文学中的环保意识》，吉隆坡：大将，2006。
78. 见《诗华日报·新月》，25/2/2009。
79. 杨贻钫《行道树系列》，载于《诗华日报》，18/12/2005起。
80. 杨贻钫《雨林果树采风系列》，载于《诗华日报》，31/1/2008起。



论南洋色彩文学 对马华文学发展的意义

新加坡 郑小燕

前言

上世纪二十年代新马南洋色彩文学的提倡，影响及当时的文艺创作，因而出现了大批反映本土题材的优秀作品。这股思潮的崛起，也对后来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批评界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30年代“马来亚地方文学”和40年代“马华文艺独特性”概念的提出，都是与南洋色彩文学主张一脉相承，最终促成新马华文文学摆脱“侨民文艺”的樊篱，确立了独立自主发展的正确方向。

南洋色彩文学的萌芽

新马现代华文文学萌芽于1919年，它的创立与中国的“五四”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最初南来新马的知识分子“侨民意识”十分浓厚，他们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思想，处处反映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受制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这时期的报刊也绝大部分以中国读者为主，办刊的宗旨总是围绕着“爱国”二字，来唤醒民心¹，一些文学作品中所提及的“国人”、“国内”、“国家”等，都是指中国，并非指他们侨居的国家。就如林独步小说《珍哥哥想什么》中，“以国货贡献父母”显示作

者对中国货的自豪：“以南洋土产贡献祖国”更显示作者对中国的深厚感情。²

与此同时，“南洋意识”也在萌生，南来作者在新马这块土地居留一段较长的时间后，对本土的认识逐渐加深、对本土的感情也与日俱增，他们就开始正视与珍惜身旁的一切，关心起本地的社会问题。这种关心新马社会的文字也开始出现在报刊上，如1923年创设的《南洋商报》发刊《新生活》编者就表示设立该副刊的目的在于打破谬误的旧思想，改变社会，介绍新文化，指出南洋社会的种种弊端，强调社会改革的意义及其重要性。

作为文学作品刊登园地的华文综合性报刊，如《益群报》于1919年创立“新小说会”，对文稿提出这样的要求：“最欢迎是写南洋社会的，但黑幕材料不要”，表现了对南洋社会事件的关心。1925年初《新国民杂志》和《小说世界》也刊登了一些取材于新马社会现实的小说，如李西浪的《蛮花惨果》，描写知识分子南来谋生，最终客死异乡的遭遇，全面体现了早期西婆罗洲的社会实况、风土人情，特别是下层社会“猪仔”的劳苦生活。³此外，还有李垂拱的《一个车夫的梦》⁴、陈桂

1. 痞鳩（张叔耐）《例言》，见1919年10月6日《新国民日报》副刊《新国民杂志》。

2. 见1921年10月6日至28日《新国民日报》副刊《新国民杂志》。

方修编《马华新文学选集》小说一，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印行，1967年9月版，页9。

李进楼著《战前南来作家小说评论》，宏华印务企业有限公司，2008年3月版，页30。

3. 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三）小说一集，页4。

见1925年1月31日至9月4日《新国民日报》副刊《新国民杂志》。

4. 见1925年3月4日至6日《南洋商报》副刊《商余杂志》。

芳的《苦》⁵和《人间地狱》⁶；前两篇反映劳工的痛苦生活，后一篇揭露逼良为娼的黑暗社会；篇幅虽然简短，由于素材来自本土生活，因此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这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中十分罕见。

可见早期南来作者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文学美学功能的重视。⁷尤其是小说，过于强调内容及现实性，重视说教而忽略美感，以致艺术技巧和语言的掌握差强人意。一些涉及“南洋色彩”的作品都是报刊编者个人的自发写作活动，缺乏有组织有意识的文学运动⁸，而且倾向于轻描淡写的浮面刻画，基本上没对南洋题材进行深度的切入与叙述。虽然这是时代使然的局限，但这种对南洋社会问题的关心与注意，给下一阶段南洋文学色彩的提倡与发展奠下基础。⁹

南洋色彩文学的提倡

以南洋生活为题材，描写南洋风土人情的作品，早在新马文学“侨民意识”浓厚的萌芽期就已出现，只是当时的人们还没自觉地从理论上提出“南洋色彩”的口号，未能形成一种蔚为风气，深入人心的新思潮。随着中国知识分子南渡者的一日比一日多，回返的少，以及“土生土长”华人人口的不断增加，他们的思想意识、文化意识、身份意识也起了变化，逐渐倾向于一种与“侨民意识”相对立的“地方意识”。

这种对南洋思想感情的变化与进展，使他们在从事文学创作和活动时，自觉地将文学视角从中国转移到南洋社会，想对南洋社会有

所回报。1925年《星光》编者谭云山在创刊号上表示他将以诚敬的“赤子之心”创办文艺刊物，作为对南洋社会的报酬和贡献。次年，编者段南奎更表示要以这副刊“来重新估定南洋的一切价值”，“改造南洋的社会”，“澄清南洋的思想”和“刷新南洋的文坛”。¹⁰此外，一些南来作者也认为南洋文艺应该反映南洋社会风貌和地理环境的独特性，于是陈炼青在《南洋的文艺批评》中提出：“有另辟新途径，建树南洋文学的必要。”¹¹

就在这种文人越来越关心南洋社会的基础上，1927年，我们看到“南洋色彩”口号的提出。这年《荒岛》主编黄振彝与该刊发起人张金燕在筹办这份副刊时，就“打算专把南洋的色彩，放入文艺界里去”¹²，在发刊的过程中，尤其是张金燕积极地从理论上提倡“南洋色彩”的主张，先后发表了《南洋与文艺》、《谈谈南洋的文艺热》等文章，以确定南洋色彩的文艺价值。这使《荒岛》成为新马华文学史上第一份有意识、有组织地提倡“南洋色彩”文艺的副刊。1929年，编者曾圣提在创办《南洋商报》副刊《文艺周刊》时，进一步提出要“以血与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¹³《叻报》副刊《椰林》的编者陈炼青甚至在副刊上宣告：“所登文字，一律以提倡南洋文化为标准，如有文艺创作，也一律以描写南洋生活和景物为限”¹⁴。这些主张的提出在新华文坛上引起很大的反响，表明“南洋色彩”的提倡已经深入人心，“本土化”已经迈上新的台阶，从而形成一股热烈的文学思潮。

有意识地提倡“南洋色彩”文学使这时

5. 见1925年1月3日《新国民日报》副刊《小说世界》。

6. 见1925年2月17日《新国民日报》副刊《新国民杂志》。

7. 郭惠芬著《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页138—141。

8. 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一）理论批评一集，页12。

9. 杨松年编著《新马华文现代文学》，新跃大学出版，2002年11月版，页56。

10. 谭云山《这是什么？》，见1925年10月9日《叻报》副刊《星光》创刊号。

11. 段南奎《星光今后的态度》，见1926年《叻报》副刊《星光》第45期。

12. 陈炼青《南洋的文艺批评》，见1929年8月9日《叻报》副刊《椰林》。

13. 张金燕《浪漫南洋一年的荒岛》，见1928年2月2日《新国民日报》副刊《荒岛》。

14. 曾圣提《〈文艺周刊〉的志愿》，见1929年1月11日《南洋商报》副刊《文艺周刊》。

15. 陈炼青《编者第二次的献词》，见1929年7月24日《叻报》副刊《椰林》。

期的作者致力于“南洋色彩”文艺的创作，因此涌现了大批具有南洋风味的作品。较早的小说，有《荒岛》编者朱法雨的《独身者》，张金燕的《三姨》、《曲路头》、《泥河哀籁》等，这些作品或从自然的景观，或以南洋景观为基础、渲染气氛，或直写南洋的社会环境，来呈现南洋的特色。但水平不高，取材颇嫌琐碎，未能反映当时当地的重要现象，有时连主题也不大明确，流于自然主义。随后发表于《南洋时报》副刊《荔》的小说，如陈晴山的《乘桴》和王探的《育南与但米》，就显得比较优秀，不但反映了当时较重要的现实，在处理题材，突出主题方面也十分高明。

“南洋色彩”文学在提倡期间，也受当时另一大文艺思潮，即“新兴文学”的影响。

“南洋色彩”作者在汲取“新兴文学”反映现实的特点后，创作态度从先前的“把南洋的色彩，放入文艺里去”的“浅度描写”渐次地转向“创造南洋文化”的“深度描写”，进一步地丰富了“南洋色彩”文学的艺术表现和思想内涵。随之响应的是《文艺三日刊》同人的小说创作，如曾圣提的《生与罪》、吴仲青的《梯形》、曾华丁的《五兄弟墓》，以及曾玉羊在《压觉》上发表的《生活圈外》；这些作品，从景物的描写，语言的运用，人物的对话，甚至社会生活的层面，都超越《荒岛》时期笼统地强调描写南洋的乡土文学，内容更加深入地反映了底层劳动者悲惨的生活画面。这是新马华文文学扩展时期，南来作者把中国文学理论与南洋地方特色相结合的成果，它为新马华文文学消化、吸收外来文艺理论并付诸实践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马来亚地方文学概念的确立

1931年前后，由于受经济不景气的打击，许多副刊停刊了。新马华文文学进入低潮状态，存于1931年至1933年的副刊，多是综合性的，而且多已变质并与先前的南洋色彩文学提倡期有非常明显的不同。文艺刊物普遍消沉，

文坛充满歪风邪气，形式主义再度抬头，趣味主义到处泛滥。

这种情况一直到1934年后才有明显的转变，文学编者对文风及文学刊物之缺乏目标深表不满，希望能鼓起文学的热潮及建立新的文学刊物的反向。这种严肃的对待文坛的态度，以及对南洋文艺发展前景的关心，就是“马来亚地方文学”提出的重要根源，也是当时知识分子深入探讨新马华文文学特色的关键。

从1934年和1936年引发的两场马来亚地方文学的论争就充分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1934年3月1日一位署名废名（丘士珍）的南来作者在新加坡《南洋商报》副刊《狮声》发表了一篇论文《地方作家谈》，文章提出了四大概要：一、坚决肯定马来亚有它的文艺；二、给马来亚地方作家下定义和定位；三、阐明地方作家的社会任务，坚决反对以上海文坛登龙的谬见；四、举出十四位有资格称为马来亚地方的作者。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场论争，首先是C君撰文《地方作家介绍的商权》¹⁶，批评废名对当时作者趋附上海文坛的异议，认为废名介绍的地方作家“太不科学”，只是“主观感情流露的捧场”。随后，则余也以《地方作家谈的检讨》¹⁷，否定废名所推荐的马来亚地方作家。论争由此扩大，一位署名姜生的作者自3月14日起连续在《狮声》发表了几篇介绍“地方作家”老张、金洪、郑文通的略历，结果再引起一轮争辩，而且参与的人数更多，直至同年5月才结束。

1936年9月2日及9日，《星洲日报》副刊《出版界》发表了曾艾狄的论文《马来亚文艺界漫画》，触发了另一场论争。文中讽刺了马来亚文坛喜欢搬用中国文艺理论和文学口号的现象，并强调“马来亚应该有马来亚文艺的生命，马来亚文艺界应该不是只‘搬尸’的公式主义的理论。”随后，一礁以《关于马来亚文学的诸问题》¹⁸一文反驳，他虽然同意马来亚文学应有其生命，但也认为马来亚是文化弱势的地区，面对强势的中国文化，搬取其中的

16.C君（梁志生）《地方作家介绍的商权》，见1934年3月5日《南洋商报》副刊《狮声》。

17.则余（林坤贵）《地方作家谈的检讨》，见1934年3月5日《南洋商报》副刊《狮声》。

18.一礁（陈子彬）《关于马来亚文学的诸问题》，见1936年9月22~25日《新洲日报 晨星》。

精髓还是应当欢迎的。参与的论者，其实都同意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代的文学还有它的地方特殊性。而豫观在总结这场论争时指出：“如果完全抹杀了马来亚的地方特殊性，一味地抄袭其他地区的看法，甚至不管三七二十一，看见旁的地方实践了，怕给人家说落后，也张冠李戴，那是需要纠正的。”¹⁹

这两场论争虽都带有意气之争之嫌，但在新马华文文学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新马华文文艺开始有了一个明确的地理概念。南洋色彩虽然在20年代获得积极的提倡，但人们对南洋的观念仍然是模糊的。有些作者以为它包括的是闽广及东南亚，有人以它为东南亚，有人似乎以它为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代称。因为在这时，仍没有马来亚文学之类的字眼出现。丘士珍第一次提出“马来亚地方文艺”，新马华文文学地方特色的概念才由笼统的南洋色彩缩小到马来亚地方文学观念。而在第二场论争时，一礁进一步提出应放弃原有的“南洋文学”名称，终于促成了“马来亚文学”名称的确立。²⁰

二、肯定了新马文艺的存在价值，提高了新马作家的地位。这两场论争，打破了新马华文文学自萌芽起，一直以中国文艺理论马首是瞻的公式主义，强调马来亚有它的文学，马来亚文学有它的地方特殊性；强调马来亚有它的地方作家，要求作家在创作中反映当地现实，为当地大众服务，赋予地方作家以推进和提高马来亚文艺的社会使命，大大地提升了地方作家的地位。

就是这种对马来亚地方性的提倡，有几个具有本地色彩的期刊在这么一个短短的期间创设了。《南洋商报》的《南岛》十日刊，创刊于1934年6月间，所刊登的许多总结性的文字都与新马有关，如醒侬的《1934年马来亚社会》、丘家珍的《1934年的马来亚文坛概

况》、冰子女士的《1935年南洋华侨妇女界之新希望》等。其他如《马来亚月刊》创设于1935年10月10日，编辑王仲广特别翻译了马来亚历史之作《马来亚史略》，还有《新南洋》周刊，创设于1936年4月30日，刊登了太珊的《客头的素描》以及庄和鸣的《株巴辖素描》，前者描写猪仔生活，后者描写马来亚地方风光。

这是一个在理论上迅速发展的文学时代，“马来亚文学”概念的提出，是当时知识分子对新马文学有更新一层的认识，对新马文学有更积极的投入，对新马文学的感情有进一步深化的结果。它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是前一时期所提倡的南洋意识、南洋色彩在理论上的更高层次的确立；“为40年代初期的‘马华文化现实化运动’埋下了种子，导致战后1947年发生的‘马华文艺’与‘侨民文艺’论争的远因，是新马华文文学自主独立运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²¹

马华文化现实化运动的推行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中国对日抗战全面展开，新马社会立即掀起抗日救亡狂潮，抗战文艺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文学一下子变成宣传的武器，之前所提倡的“马来亚地方文学”受到了重大的冲击，但并不因此销声匿迹。

此时的戏剧文学产品空前的繁盛。最初演出的一些救亡剧，一般把背景扩及中国的战区，如流水的《金门岛之一夜》、叶尼的《伤兵医院》、黄时的《觉悟》等等。但这种以描写中国题材的风气，很快就过去，原因之一是当时的救亡戏剧，大多是配合演出的需要而创作的，当地一般青年演员限于生活经验，演中国题材的剧作比较不讨好。其次是1937年底，叶尼的《伤兵医院》演出后引起的一场“南洋

19.豫观《文艺论战息争以后》，见1936年12月2日《星洲日报》副刊《出版界》。

20.一礁（陈子彬）《零零碎碎——给曾艾秋先生》，见1936年10月19日《新洲日报 星辰》。

21.欧清池《新马当代华文文学思潮初探》

“地方性剧本问题”的论争，也激起了一般剧作者多写一些反映当地救亡动态的剧本。因此，即使是在救亡戏剧前期（1937~1939），反映当地救亡现实的作品，在数量上也还是占着压倒性的优势，如爱同校友会集体创作的《怒涛》（1937）、黄清谭与黄祝水的《巨浪》（1938）、叶尼的《海外》、流水的《十字街头》等。文翔也将《怒涛》演出成功的原因归咎为：“演出剧本能取用观众熟悉的本地题材，演出内容的本地性与真实性让观众有亲切感。”²²

1939年9月，欧战爆发，殖民地政府颁布战时法令，严厉压制抗日救亡活动，抗战文艺由此走下坡，报刊上消极感伤的作品渐见增加，而且出现了种种不健康的论调，如强调本地文化落后，环境恶劣等等。文艺理论界为了扭转颓风，逐于1940年初在《新国民日报》的《新流》副刊，发起了“马华文化现实化运动”，由于它同文艺关系密切，因而又发展为“文艺现实化运动”。倡导文化、文艺现实化的作者，有之丘、力行、白木、免升、洪英等，尽管见解不一，但都要求文学要反映现时的马来亚现实；要“以马来亚援助抗战的内容为内容”，要以“摆在眼前的问题为题材”。²³

由此可见，不管是“南洋地方性剧本问题”的论争，或是“马华文化现实化运动”的提出，都说明了抗战时期的新马华文文学界并不因为日军加紧侵略的严酷形势，而影响作家们创建具有地方独特性的马华文艺。相反，更激发作家们，警觉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使他们对文学的健康途程更加关注，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学的社会历史使命。

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提出

日军统治期间，新马文坛一片空白。1945

年日本投降后，文艺活动才告恢复。从1945年至1949年文学作品所反映的意识看，有两个创作主潮：

一、本地意识再告茁长和发展，而且情绪较前高涨。这显然是经过3年8个月的日本统治后，新马华人对于所处的土地的热爱已告增加；其次是受到战后东南亚各地民族自主运动的影响，普遍要求摆脱殖民统治，所以对文艺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当时中国方面的民主运动，也同样迫切地要求新马华人社会——包括文艺工作者，给予大力的支持声援，而且不少南来作者侨民意识十分浓厚，大量描写中国题材，鼓吹“侨民文艺”。

为了继续战前的作者对建立南洋色彩文学的要求，对建立马来亚地方文学的要求；为了解决文艺作者在反映当地现实与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任务上的矛盾，明确马华文艺工作的方向；也为了纠正一般“侨民作家”在作品与作风上的不当倾向，“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口号就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提出。终于在1947年至1948年之间爆发了一场关于“马华文艺”与“侨民文艺”的论争。

1947年1月，马华文艺独特性的问题由新加坡后觉中学的一个座谈会中提出，其后引起一些作者撰文参加讨论，如漂青的《关于马华文艺的独特性》²⁴与凌佐的《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及其他》²⁵，文章明确地强调马华文艺独特性的特征。1947年年底，在星华文艺协会举办的马华文艺独特性座谈会上，秋风、杨嘉、吴楚、刘思、凌佐等人，都肯定了“马华文艺独特性是存在的，创造马华文艺形式是要以马华固有的文艺形式为基础，揉合外来因素去创造的。”造成论争的是周容于1948年在吉隆坡《战有报》所发表的《谈马华文艺》，文章

22. 文翔《从〈怒涛〉的演出说到南洋地方性剧本的需要》，见1937年12月11日《星洲日报》副刊《晨星》。

23. 洪英《马华文艺运动的现实化问题》，见1940年3月14日《总汇报》副刊《文会》。

24. 苗秀编选《新马华文文学大系 理论》第一集，1971，新加坡教育出版社，页199~200。漂青的《关于马华文艺的独特性》，见1947年10月4日《星洲日报》副刊《晨星》。

25. 凌佐的《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及其他》，见1947年11月《星洲日报》副刊《晨星》。

锋芒毕露，言辞尖刻地指出“马华文艺必须反映此时此地的现实，而没有独特性的文艺是侨民文艺。侨民文艺不是马华文艺的主导方向。侨民文艺作者则身在新马却写中国事物，犹如‘手执报纸而眼望天外’，不是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态度。处马来亚而等待中国人民大翻身，只能做逃难作家。”

文章发表后，李玄撰文《论侨民文艺》²⁶予以驳斥，他指出文艺除了忠实地反映现实之外，更应该负起提出人生的任务。马来亚各族在争取民主政治上，与中国人民追求民主的目的是一样的，描写中国的现实并不违反马来亚文艺的大原则。侨民文艺的存在，并不影响马来亚文艺的发展。当前的文艺重任，在于马华文艺的及时栽培，而不在于侨民文艺的矫正。另一侨民作家沙平的《朋友你钻进牛角尖里去了》²⁷针对周容的见解说：“文艺的形式可以是各民族的，而内容却必须是国际性的。马来亚并不怕有中国文艺的海外版，怕的是海外版太少，甚至没有。这场论争越演越烈，参加者也越来越多，甚至在香港的中国作者夏衍、郭沫若也介入。

最后这场论争于一篇总结性报告的出台而结束，——《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一个报告》²⁸的发表而结束。这个报告认为：独特性的提出主要在于提醒大家多写此地的问题，并不是反对中国的东西。马华文艺和侨民文艺有着不同的内容和形式。所谓侨民意识，其实是一种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因此凡是写中国现实的，都归入中国文艺。马华文艺自有其独特性，凡是反映马华现实的，统称为马华文艺。马华文艺工作者只要努力去反映马华的现实，通过自己的艺术去唤起马华大众，鼓励马华大众去奋斗，就是正确的方向。²⁹

这场论争以后，本地的写作人（从中国南来或是土生土长的写作人）才普遍地具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意识：马华文艺不应该再是中国文艺的一个支流或是附庸，而应该是道地的马华文艺；它不应该描写几千里外的中国的事情，而应该反映“此时此地”；它不应该唯中国文学的马首是瞻，而应该要有自己的“独特性”。³⁰ 作家们认识到新马华文艺的首要任务应是反映当地的生活面貌，他们更加积极地思考“本土化”的问题，同时也更有意识地去创作这方面题材的作品。

“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争推动了文学“本土性”的确立，由此产生了一大批反映新马当地现实的优秀作品。单行本小说集有萧林的《国术师》、白寒的《新加坡河畔》、苗秀的《旅》、丘絮絮的《时代绊脚石》、赵戎的《芭洋上》等。长篇小说有苗秀的《火浪》、赵戎的《在马六甲海峡》，林参天的《热瘴》等。中篇小说有苗秀的《新加坡屋顶下》、姚紫的《秀子姑娘》、赵戎的《海恋》、丘天的《复仇》等。诗集有铁戈的《旗下》、米军的《热带诗抄》等，突出地抒发了对土地的热爱，让读者感受到热带风光和民俗的浓烈气息；丁家瑞、彦群、漠青、若耶等合著的《怒吼吧，新加坡》则对不合理的社会生活提出尖锐的批评，感情真挚。散文集有杏影的《读书和写作》、《趁年轻的时候》，戚北华的《春耕》，萧村的《山芭散记》、《穷荒野草》等。剧作有岳野的《风雨牛车水》、《风雨三条石》，杨嘉的《星洲二房东》，杜边的《明天的太阳》等都受到广泛好评。

26. 李玄《论侨民文艺》，原载1948年1月8日《南桥日报》副刊《南风》。

27. 沙平《朋友你钻进牛角尖里去了》，原载1948年1月10日《风下周刊》108期。

28. 苗秀编选《新马华文文学大系 理论》第一集，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页15。星华文艺协会第二次座谈会记录《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一个报告》，见1948年3月27日星华文艺协会的机关刊物《文艺》第6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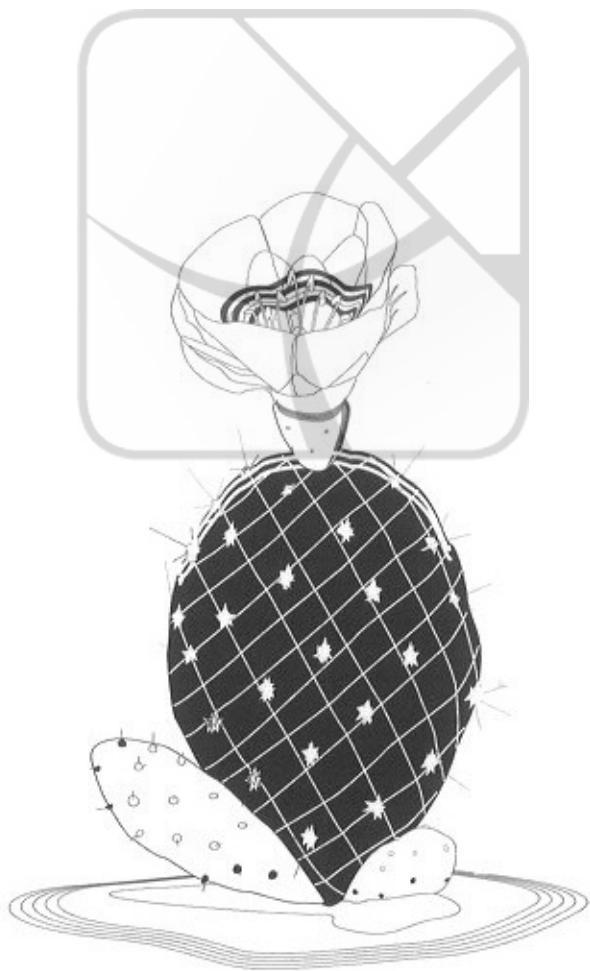
29. 杨松年《新马华文现代文学》，新加坡新跃大学出版，2002，页150。

30. 孟毅编选《新马华文文学大系 小说》第四集《导论》，1971年版，页2。

结语

综上所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新马华文文学所提倡的南洋文学色彩，对当时的文学与后来的文学的“本土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早在新马华文文学的萌芽阶段，陈桂芳、李西浪、李垂拱等作家的创作，已经显示出南洋地方色彩的端倪。20年代后期，以《荒岛》、《文艺周刊》、《椰林》等文艺副刊为代表，连续倡导作家创作具有南洋色彩的主张及其实践，突出地显现了新马华文文学界本土意识、自主意识的觉醒。到了30年代中期，丘士珍发表《地方作家谈》一文，标举了“马

来亚地方文艺”的概念，在理论上承接并深化了“南洋色彩”的口号。随后，曾艾狄的《马来亚文艺界漫画》又燃起了“马来亚文学诸问题”的争论，以至40年代期间，“马华文艺现代化运动”的推行和“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提出，都是与南洋色彩文学主张一脉相承，这也表征了新马华人对这片土地情感的逐渐深化。南洋色彩文学的提倡在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为新马华文文学开拓了一条新途径，摆脱中国文学的影响，从此迈向独立发展的新道路。



新华当代戏剧作者评介

新加坡 欧清池

新加坡独立以来的华语话剧由于面对着三大打击，即一、从1986年起全国教育源流统一，华文成为学校的单一科目，华文水平与日俱降，造成华文文学的读者大减，华语话剧的观众自然也随之下降；二、话剧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与政治挂钩甚紧密，剧作家关注现实，剧作多为批判丑陋现象之作，好多剧本因此无法公演，进入八九十年代，好多剧作者就转向采用现代表现手法，剧本内容也不再深入批判现实，并与政治疏离；即使对现实有些看法，剧作者也是轻轻点到为止；另一方面，大概由于剧作者在反映丑陋现实时为免触及当局的逆鳞，而采用魔幻或梦幻表现手法，致使有些剧本情节流于荒谬或猥亵，不合常理，导致观众日减，华语话剧由此一蹶不振；三、由于国家独立了，得全力培养国民的效忠意识，对国民和祖籍国与生俱来的情感自然就得有策略有步骤地削弱，由此导致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忽视、无知，以至于萌起厌恶之感，从而产生不爱阅读华文文学的恶果。在这样恶劣环境下，新华戏剧在此时期的发展道路更是崎岖不平。

戏剧除了遇到上述的三大阻挠因素外，还得面对电影、电视连续剧、光碟、录像带等等的竞争，正是在三大因素的挤压下，新华戏剧在其发展途上比其他文体遇到更大的挫折！

80年代后期，部分戏剧工作者尝试通过引进现代、先锋、前卫的理论与表演形式，推动小剧场演出，这曾为华语话剧带来一些新气象。但部分话剧工作者为回避政治课题，回归艺术本体，在情节方面和故事结构方面有所创新，却又由于矫枉过正，到了末流，观众不断减少。这种过分追求表演形式的新颖，在很大程度上忽略紧扣现实的重要性，造成剧本在内容上的贫乏，并呈现

出与诗歌、散文、微型小说的充满黍离之伤情怀全然不同的特点，彻底说明了此时期的剧本已脱离时代，因此逐渐遭到观众的遗弃。与话剧的作风相反，这时期的华语电视连续剧除了在形式上有声、色、影、音乐的优点外，它们相对来说比较能紧扣现实的作风，都是它们吸引大批华语观众的原因。

传统话剧在急速现代化的社会中，由于受到具新技术的电影、电视剧的冲击，观众逐渐流失；话剧为挽回观众，不得不探索新的戏剧样式、探索新的观演关系与剧场空间、探索戏剧的社会仪式化的可能性，这在东西方皆然。⁽¹⁾新华话剧因为有六七十年代剧本屡遭禁演的惨痛经验，剧作者在大力探索新的表演形式之时，却忽略了揭露现实问题的重要性，以致内容过于贫乏而造成大量观众流失掉。

郭宝崑曾把新加坡现代剧场分为六种。一、“统治的剧场”：即由政府制作，借用各种戏剧手段以达到政治宣传与建构国民意识的政治剧场，每年一度的国庆庆典为其集大成者；二、“消费的剧场”：经济富裕后，新兴中产阶级利用财力堆砌信心与地位，追求赶上国际时尚与艺术的需求，推动政府与私人机构输入商业味很浓的西方音乐剧和演唱会，这种剧场造成人们忽视自身的文化失落，并丧失自己的感性与敏锐性。三、“记忆剧场”：这是早期移民从他们的家乡带来，并使他们得以与家乡的文化有所联系的剧场，此剧场由于母语教育的没落而逐渐式微。四、“再造剧场”：是没有历史包袱的新一代剧场工作者从传统文化中自由截取语言与意象的片断，创造出郭宝崑认为最叛逆也最有创造力的多元文化剧场。五、“动员的剧场”：是从1930年代到1970年代之间具有强烈社会政治意识的剧

场，由于政府的限制，自1970年代末以来，此剧场几乎已不存在。六、“超越的剧场”：即超越种族文化、语言的藩篱，也超越政府的政治审查与艺术家的自我审查。此剧场挑战既定的各种限制，提出更深层的人性思考。

上述的前两种剧场的联结使得新加坡的后四种剧场更趋边缘化。前二剧场具有麻痹作用的“推拿”力量，使人们丧失掉“敏锐的批评能力”。⁽²⁾

准此，我们可以看到，新华话剧一方面面对着和其他文体一样的、母语在釜底抽薪窘境下读者或观众日渐流失的打击；另一方面，在同质剧场逐渐消失而失去相互扶持的力量的同时，却又在异质剧场大力挤压下日趋没落。

因此，当我们在整理新华话剧作者的资料时，我们发现话剧作者非常的缺乏，而作品的内容除了极为少数的一两部剧作外，和其他文体所呈现的充满黍离之伤情怀也迥然不同。与此同时，因为刻意追求表演形式的创新，有些剧作陷入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泥沼中去，以致赶走了大批原有的和潜在的观众。

天边彩虹 往日旧梦

马华戏剧一萌芽，就和萌芽期的马华问题小说一样，都是以抨击社会上的败风陋习为其创作动机的。这传统传承至1920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初期，又加进了宣扬改造社会制度的色彩。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伊始，话剧全面投入抗日救亡的斗争，其所肩负的使命更加重大。战后至独立前，话剧则负起争取独立自治的时代任务，并由此掺入歌颂向往理想政治的色彩，拟通过剧场来进行社会和政治批判，并呈现出一幅与主政者有关建构新加坡迥然不同的理想图像。

撇开政治批判的是非对错问题不谈，马华话剧带着的上述特点，毋宁说是中国文学文以载道的传统的继承与发挥。可归入此类型的剧作者有林晨、史可扬、刘仁心、王里、田流、朱绪、李星可、征雁、关新艺。

1、林晨：（1919—2004），祖籍福建，幼年生活在牛车水，就读于道南小学，后升至华侨中学，读至高一而后辍学。战前即投入文艺创作，并加入「业余话剧社」，积极投入抗日救亡

的戏剧活动，以艾蒙、白丹、白尼等笔名先后在《狮声报》、《风下周刊南洋周刊》、《星中报》、《文汇报》、《南侨日报》发表小说、散文和漫画。

林晨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崛起于华语剧坛，数十年来始终没离开过剧坛，他当过剧务、演员、导演、编剧，舞台生活经验丰富，写出来的作品都很适合演出。60年代先后出版了独幕剧集《建筑工地上》、《陋巷里》及多幕剧《浮沉之间》。林晨熟悉都市的中下层社会，出现在这些剧作中的人物有舞女、吧女、妓女、流氓、老子、小商人、学生、工人和文化人。他是一位温和的现实主义者，所创作的剧本多以生活中的小人物为主角，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社会阴暗的一角，感人心。

除了独幕剧创作，70年代初面世的，由林晨执笔、新加坡艺术剧场集体创作的多幕剧《第二次奔》和《阿添叔》，应可视为林晨剧作的两大高峰。此二剧作是集体创作，自然不能全部归功于林晨，然而，它们能成为此类剧作的代表性作品，却是因为林晨巧妙地处理剧情和运用细节描写的结果。⁽³⁾

2、史可扬（1937—2005），另署苏莉、林彤，原名林明洲，祖籍海南省。史可扬学生时代即积极参与戏剧活动，导演过舞台剧《孔雀胆》、《清明前后》、《螳螂世家》、《生活的旋律》。编、写、导俱在行，著有五幕剧《燕飞翔》、四幕剧《生活的旋律》、三幕剧《真相》、独幕剧《跟着大伙儿走》、《罪根》、《未完成的作品》、《我们要行动》、《被摧残的青春》等。剧作《公公你的名字好难叫》曾被拍成电视连续剧，轰动一时。

史可扬的剧作内容广泛充实，有描写年轻人爱情观的，如《真正的爱人》，有反映时代青年在失业的困境中仍然不放弃追求理想的，如《未完成的作品》，有刻画工人团结一致抗拒老板的剥削的故事的，如《跟着大伙儿走》，有刻画在时代巨浪中迷失了生活方向、而成为只会一味追求物质享受的知识分子，如《燕飞翔》；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剧作主题严肃，富时代色彩，紧扣时代脉搏，是属于向往理想社会制度的剧作家之列。他的追寻，直至生命的终点始终没放弃。

史可扬善于通过剧中角色阐述理想、信仰，成功处感人心肺，但有时会有流于说教之弊；文字驾驭能力有些也显得不那么高超！

3、刘仁心（1924—2000）祖籍福建闽清，生于砂劳越，他50年代初期就开始搞戏剧，献身话剧的热忱至死没减。创作了多部剧作，对戏剧理论也有一定的修养，著有《戏剧与人生》，内收80余篇评论文字，有谈论演员修养问题的、有评介话剧演出的优缺点的。

刘仁心的剧作，题材相当广泛。有歌颂在日治时期为保卫民族教育和文化而坐牢，却临死也不屈的知识分子的坚贞品格的，如《他并没有死》；有刻画一群在艰苦的山芭里办学校的知识分子和民众的高贵情操的，如《百年树人》；有嘲讽作风散漫、开会时言不及义、说一套做一套的妇女会会员的丑态的，如《废除妾侍》；也有反映在恰似鳄鱼潭边的股票市场沉迷终日的形形色色人物的丑陋嘴脸的，如《金鱼缸边》。

刘仁心的剧作文字幽默、流畅，人物对话活泼风趣。作品以反映教育课题的较好，反映其他课题的作品，内容稍嫌粗浅芜杂，主题挖掘不够深入，有时会流露出自然主义的弊病。

4、王里（1935—2001）：原名许智荣，1963年毕业于南大物理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活跃于剧坛，创作甚丰，著有多幕剧《归来》、《悬崖》、《都市橱窗》、《过去的年代》、《旧货》、《巷口》、《雨过天晴》；独幕剧《生日》、《虎子》、《欢喜冤家》、《差一点落伍的人》、《小夫妻》、《时代的脚步》、《骑楼下》、《临时抱佛脚》、《把国旗挂起来》、《看电视》；电视剧《水声笑影》、《凶手》、《新年礼物》、《楼上楼下》、《微波》、《黑吃黑》、《骗》；1993年，在停笔多年后又编写多幕剧《林谋盛烈士》，由创意剧团演出。

王里的剧本内容相当广泛，注重灌输国家意识，他的一些观点与特定的时代潮流有点格格不入，这或许是造成他的剧本不那么受一些人的原因。

王里常常“用一种相当纯然的剧本创作年代的现实目光审视过去，使人物完全被摆布于作者的历史观，削弱了人物的血肉感。”四幕剧《过

去的年代》、《悬崖》就有这些缺点。⁽⁴⁾

5、田流（1930—）：原名钟文灵，祖籍广东丰顺县，写作经验丰富，著作等身，包括小说、评论、诗词、散文、相声、剧本等。田流既写话剧，也写电视剧、广播剧、相声等，题材广泛，有嘲讽社会歪风陋习的，也有暴露商场丑类言行的，更有激励年轻人积极向上的。

他的剧作强调进步的思想主题，也注意剧本内容符合建国进程中的现实。

田流著作达千万言，能写能演也能导，可谓是文学界的全才，不足处是对题材主题的挖掘不够深入，有些剧本的故事也稍嫌平淡。⁽⁵⁾著有《三万元奖金》、《田流剧作集》。

6、朱绪（1909—2008）：原名朱季灶，著有《未完成杰作》、《和平以后》、《谁之咎》、《海恋》；剧论集《我与戏剧》、《新华戏剧45年》等。

7、李星可（1913—1996）：祖籍河北丰润，著有剧作《桥上》、《报穷》、《快艇》、《绿洲》、《乱世春秋》等等。他的剧作大多是描绘上流社会人士的生活故事，揭露一些富人靠不择手段致富的丑事。

8、征雁：著有《雨夜》、《封锁线》独幕剧集，后来再版，两书合印，更名为《征雁剧作集》。征雁早年生活于山城小镇，相当熟悉农村风貌，因此他的一些剧作如《夜渡》、《雨夜》，或反映农村恶霸强奸妇女、买凶杀人的黑暗面，或揭露地主走私贩毒，却又能逍遥法外的不合理现象，这些题材都是其他剧作者少触及的；另一方面，由于征雁曾长期在新加坡住过，他的剧本所写的也大多数是通都大邑的故事；也因此，他的剧作所反映的生活面就比其他剧作者广泛多了。

9、关新艺（1927—1996）：关新艺是专业艺人，走通俗表演路线，所写剧作从另一侧面反映了被侮辱、被损害的卑微人物的苦状，著有《学店》、《关新艺独幕剧集》等。

此外，值得一提还有曹兮，著有《鲜花、水果、笑》；曾四，著有《袋鼠》；罗大章，著有《新一代》；李廉凤，著有《晚来风急》；陈

伯汉，著有《生命的决堤》；长谣，著有四幕剧《蜗牛》。

暮霭笼罩 重新探路

新马华文文学从发轫至今，戏剧与其他文体一样，都在干预生活，揭露社会的丑陋现象。在某些时期，戏剧甚至较其他文体更直接反映生活、干预生活、暴露社会的偏差问题。话剧在上世纪80年代过后的衰落，原因不在于话剧工作者在思想上或表现技巧上赶不上时代，而在于语文教育的转向，华文没落了，华语话剧的观众自然减少了。因此，尽管80年代以来的戏剧工作者如郭宝崑、韩劳达等人多方涉猎戏剧理论，从西方引进新的表演技巧，话剧依然无法兴盛起来。

1、郭宝崑（1940-2002）：作为一个有思想深度的艺术工作者，郭宝崑对这社会的好些现象是很不满的。支撑着他的戏剧创作的两大支柱是：一、对弱小与受害者投以关怀的目光；二、强烈的批判精神，其作品隐喻着他特有的沉默的愤怒。⁽⁶⁾他早年的戏剧创作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如《喂！醒醒》、《挣扎》、《成长》、《青春的火花》和《萍》。前三部剧作所体现的思想内容与当时的新加坡社会及经济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从《喂！醒醒》对于社会转型、人心变相所发出的焦虑感；到《挣扎》、《成长》所展现的各种越来越尖锐的阶级矛盾，都显示了创作者与主导新加坡整体发展方向的政府，对于一个未来的理想家园，有着不同的构想以及策略选择。⁽⁷⁾

有些论者认为，郭宝崑从1976至1980年，因为曾被当局拘禁了四年，他的创作与理想有所改变。他们认为“1960年代，他政治左倾，作品属于社会现实主义，用华文写作。1976到1980年被监禁，尔后放弃政治，开始用英文写作。”

这样的理解是有偏差的，事实是，郭宝崑“1980年后的作品当中看不出丝毫这样（放弃政治性写作）的妥协。……无疑的，郭先生利用被囚禁的那段经验 自省，之后所作更为细致、简练、全无余赘，但同时也未曾放弃过自己的理想。……”

论者认为，1980年之后的郭宝崑，无论创作、思想或行动，都是前30年的延续，只是剧作

的内容、思想与表现手法有所不同而已。⁽⁸⁾

概言之，《喂！醒醒》、《挣扎》、《成长》这三个剧本，相当全面地体现了郭宝崑理想中的家园图像，也是他遭囚禁的根源所在。

郭宝崑把自己1980年以后的作品称为“通过戏剧与剧场对生活进行反思与批判，而不是把剧场作为社会政治运动的一个部分”，而把自己早期的作品称为“通过剧场进行的政治批判。”自此，我们可以说，从1950到1970年间，处在新马反殖、争取独立的激情中，且受到五四运动与文革思潮的影响，郭宝崑其时的剧作与政治理想密切相连，而1980年后，其剧作则力图摆脱狭窄的政治属性，转而寻找自己的艺术独立生命。

郭宝崑相当强调“批判性的敏感度”，这种观点源自于他既愿意投入生活，又能抽离生活的态度。他相当担心客观环境“在不知不觉中对人进行推拿”，使人逐渐丧失他的“批判性的敏感度。”⁽⁹⁾他通过寓言形式来抒发他对社会丑陋现象的愤懑之情，他后半生所创造的剧本，每一部都含意深远，《萍》、《棺材太大洞太小》、《单日不可停车》、《傻姑娘和怪老树》、《郑和的后代》都是其例。

郭宝崑在推动话剧方面贡献良多，他搞创作，办讲座，引进各国的戏剧家与戏剧理论家到本地开办课程，并且在戏剧理论探索上有所突破。他的理论往往与本地现实结合，在创造方面也如此，而不拘于一家之言。

郭宝崑并不反现实主义，他只是从西方引进一些新的表演形式，并结合本地现实 加以运用，他的成功在此，而他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与华文教育的消失此大环境 息息相关。

2、韩劳达（1947-）：原名韩永元的韩劳达从学生时代即在中正戏剧研究会接受艺术熏陶，在师训学院时期又参与院内戏剧活动及对外演出，其后又参加实践表演艺术学院课程。1972年联合发起组织南方艺术团（今南方艺术研究会），并开始创作，主要是写剧本与相声。常用笔名有谭天、海叔、常克。

在创造的道路上，韩劳达曾有所转向。他自称在“泡在‘主题先行’的乐趣的那些个年头，集体生活的温馨，人生经验的累积，社会层面的接触，无不在精神生活上得到丰硕的粮食。然

而，在个人的艺术创作上，却是高度贫血的。”“原因呢，恐怕和 满足于能夸夸其谈地告诉别人我的意图、我的主题……不无关系。”于是，从1979年起，他创作了《悬赏500元》短剧，初次尝到不说明确主题的滋味。从此，他尝试从人物着手叫形象说话，以此为创作根据，例如《门》就是一个例子。

韩劳达显然受到西方即兴剧的影响，也受到郭宝崑的影响，他摒弃主题先行论，他摒弃四堵墙方式，而创作了好些有别于传统话剧的剧本，寓言剧《乌拉世界》即为代表。此剧本揭露了社会上价值观颠倒的古怪现象，相当有深度。他的独幕剧多为生活小品，风趣有余，但深度不够。有些剧本甚至流于自然主义的泥沼中，例如《电梯》、《书小姐》等。

韩劳达对学生剧运的贡献也不小。他著有《关于相声》、《谭天相声集》、《劳达剧作》、《谭天相声二集》、《信步走过—80年代新加坡华语剧坛》、《陈嘉庚》、《乌拉世界》、《五个天平座》，长剧《金银花》、《门》，喜剧小品《悬赏500元》、《书小姐》、《一堆粪》、《电梯》、《养生有术》等等。

3、柯思仁(1964-)：柯思仁从1990年开写戏剧评论，1995年获颁“新加坡青年奖(文化与艺术)”，此前曾编制剧本《适度的梦》。著有《刺客·乩童·按摩女郎》、《市中隐者》、《独在异乡为异客》等。

柯思仁是研究戏剧的学者，他所走的戏剧路线介于郭宝崑和韩劳达之间，属于新生代的代表。他的剧作表现手法相当现代化，题材也涉及现实中的一些弊端。例如《刺客·乩童·按摩女郎》有反映来自乡下的按摩女郎，在工作中找不到生活的意义的；也有小部分内容影射中国当代社会的混乱情景的。《市中隐者》有点嘲讽现实意味的，如批评教育制度的偏向唯利是图目标；也有点及当局只是在口头上提倡创造文化以及轻微地点击政治，内容芜杂，批评力度很轻，几乎是点到即停。《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内容就更为芜杂了，有涉及岛国为邻国烟雾所困扰的窘

境的；有轻弹岛国的圣诞节只着重华丽装饰而缺乏文化内涵的；但都轻轻带过，浪过不留痕。

由于受到资料的局限，相信还有好多较年轻的戏剧工作者被忽略了。改次有机会和资料，定会再做补充。

注解

- (1) 周宁：《东南亚华语戏剧研究：问题与领域》（新加坡：斯雅舍，2008）页1-25。
- (2) 参阅李慧玲译：《一种推拿的生活方式》，文收郭建文、张夏伟编《风风雨雨又一生》（新加坡：阅新文化，2002年）页 111。
- (3) 参阅连奇《生活的现象和本质》，文收《新马汉华文学评论集》（新加坡：斯雅舍，2008）页26—45；文馨《剧场门里门外看林晨》、洪有和《品味戏剧家林晨》，二文均收《林晨剧作集》（新加坡：新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
- (4) 参阅徐迺翔、黄孟文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年）页 440-441。
- (5) 方修编《战后新马文学大系-戏剧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01）导言（二）第23页。
- (6) 日本黑篷剧场监制宗重博之的评语。
- (7) 柯思仁《另一种理想家园的图像》（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5）页Xiii-XXviii。
- (8) Janadss Devan “Reading Kuo Pao Kun Loud & Clear”,The Straits Times,21 Sept 2002.转引自柯思仁《另一种理想家园的图像》页XVii。
- (9) 李慧玲译《一种推拿着你的生活方式》，文收郭建文、张夏伟编《风风雨雨又一生》（新加坡：阅新文化，2002年）页111。

去来无处不天涯

——清末流寓南洋诗人萧雅堂

新加坡 李庆年

清末流寓南洋的诗人为数不少，萧雅堂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萧雅堂，福建厦门人，名不详，以字行，自署沧瀛过客、垄川旧客，流寓南洋汶岛、三宝垄、望加锡、泗水、新加坡各地近二十年。萧雅堂诗作浅显快畅，情真意切，寓意赋情，毫不雕饰，是流寓南洋诗人中极有特色的一个。

萧雅堂的《番客篇》，是至今仅见的以过番南洋为题材的旧体诗作品，诗中描写贪财之人将女儿嫁给番客（过番之人），造成两地分居，新妇独守空房，老来凄凉的情景。其诗如下：

南洋本番地，来者称番客。
客有得意回，囊中银千百。
多财归故乡，亲友共啧啧。
议婚日纷然，媒妁不断迹。
某家有女儿，窈窕好性格，
撮合原不难，所重在财帛。
果是金龟婿，爱女亦不惜。
聘以合浦珠，定以蓝田璧。
床头金欲尽，谋生又逼迫，
新婚席未暖，别妇下番舶。

海禁已大开，轮船日往来。
相将与俱去，不恤躊躇灾。
君今适异国，妾自泪盈腮。
古谚云去番，十去九不回。
人前不敢泣，强作笑颜陪。
送君出门去，一日肠九回。
深闺生暮寒，对影独低徊。
花开春又至，寸心已成灰。
闻道娶番婆，私心费疑猜。

郎心虽薄幸，且抚膝前孩。
姻缘本天定，敢怨命数奇！
嫁女与番客，不如长弃之。
新婚曾几日，又复伤别离！
春花与秋月，触景生远思。
红颜容易老，夫婿隔天涯。
纵有归来日，会合不多时。
依然出洋去，悠悠无定期。
可怜守空房，误此冰雪姿。
思妇多苦心，游子知未知？
寄语沧海客，试看弄潮儿！

一别几炎凉，幽闺日又夕。
归信卜灯花，无言想萍迹。
春风生枕上，夜月隔窗隙。
怀人常不寐，有梦未明白。
别意郎不知，惺惺只自惜。
远书珍重寄，情多纸盈尺。
郎怀何渺渺，妾心长脉脉！
漫此牛女星，何异参商隔！
屡约不回家，怕上望夫石。
闻说邻舍妇，昨夜归番客。

生是贫家女，嫁为番客妇。
贪财配老婿，倡随乎何有？
番银已无多，海外复奔走。
薄命失姑嫜，归宁依父母。
父母相继亡，良人况辜负。
教妾难为情，万事独消受。
螟蛉亦有子，鸳鸯自成偶。
思量远寻郎，来书道曰否。
岁岁误妾期，不觉春秋久。
报道藁砧归，头白已成叟。

入门不交谪，犹得事箕帚。
妾亦颜色衰，相对嗟老丑！

此诗原刊于1899年1月19日《天南新报》，刊出时该报附有编者按语，对远游之人提出不可乐不思返的劝告。其按语如下：

以文言道俗情，徘徊动人之处，令人有抛离家室，不如归去之思，较之唐诗“悔教夫婿觅封侯”一首尤为真挚，盖彼虽含毫蕴藉，固不若此浅近人人也。我华人之来南洋作客者，不下数百万人，其有此间乐不思蜀，不顾家室之计者乎？寄语远游人，尚其三复斯吟也！

《天南新报》按语一方面称赞此诗浅近真挚，另一方面劝戒南来之人不可不顾家室而另娶，实际上在当时，远离故乡的华人，不堪生活寂寞，只要条件许可，许多人都是另娶。由于华族妇女稀少，于是另娶的都是当地的土著妇女（或土著化妇女），这也是流寓人士在南洋数十年间迅速土著化的原因。因为另娶，形成两头有家的现象，而谋生在南洋，家乡妻子自然受到冷落。《天南新报》这一按语，为家乡之妻子叫屈，却忽略了远游之人无奈的心情！其实，诗中所描述之番客，正是萧雅堂的自身写照。

萧雅堂辗转在三宝垄、望加锡、泗水，汶岛各地，从事闽南语私塾教学，从他所作的《七日学堂祭圣祝文》（1895年8月27日《星报》）可以证明他的工作。1893年11月，因为回国，途经新加坡，他在报上刊登了不少诗作，其中一些作品又可以说明他回国之前的谋生地点是汶岛。在汶岛，萧雅堂大病一场，并写下了《汶山卧病喜起》和《病起赠黄河东》二诗。诗如下：

汶山卧病喜起

一病离奇实不堪，已拼客死在天南。
果能绝俗无烦恼，偏拟辞阳有再三。
正首欲归家太远，修身以俟我何惭！
幸邀天眷痊斯疾，此后应知蔗境甘！

病起赠黄河东

流落天涯客影孤，岂知一病泣穷途。

蒙君资赠情何重，比日应将生佛呼！
病起谁怜憔悴甚，沿街托钵苦无门。
斯文关切真高谊，到处逢人说受恩！
失路风尘孰可依，幸逢萍水话投机！
不言便有相怜意，慷慨如君世上希！
卧病长安杜少陵，新知胜过旧交朋。
我今情景浑相似，感子垂青喜不胜！

（1893年11月8日《叻报》）

萧雅堂得病非轻，然而“幸邀天眷痊斯疾”，而且得到黄河东的资助，绝处逢生，喜不自胜。在他得病期间，也得到一位红颜知己照顾，此人是谁，不得而知，不过萧雅堂病愈后写了《有赠十二首》，表示感激：

无聊有恨托闲吟，秋老天涯感慨深。
当在病中吾不忒，问君何事枉伤心？
穷途薄命两相怜，一缕情丝断复连。
输汝针神还济急，羞余枉说笔如椽！
贫贱何妨且耐冬，阿侬不是负情侬。
莫愁风雨年终暮，试听春雷起卧龙。
风尘欲老道将废，巾帼也知时命乖。
终日闲居聊养气，雏儿笑弄与君偕。
丈室维摩多病身，散花天女解怜人。
药铛累汝亲调遍，苦在心头不展颦。
琴书已卖尚徒然，兴到裙钗亦可怜。
不叹无衣聊卒岁，啼饥稚子费周旋。
不须谋作酒家佣，日向墦间乞祭供。
笑比齐人骄妾妇，出门富贵尽相从。
以客为家妾当妻，我归自外复依栖。
遥怜儿女家千里，望断刀环日又西。
当炉卖酒说临邛，德耀还同庇下春。
能贵须知又能贱，与君无处不从容。
乐天何必问升沉，时到花开任汝簪。
莫道牢骚乱闲意，科头抱膝且长吟。
多情转觉误归期，病逼途穷天实为。
无米可炊难怪汝，烹经我亦不充饥。
从前悔恨成何益？此后思量要用心。
内愧多于陶靖节，适非来去费沉吟。

（1893年11月11日《叻报》）

在此，萧雅堂“以客为家妾当妻”，他把

这位红颜知己当成客途上的妾侍。此人家中有“啼饥稚子”，而且“无米可炊”。根据“输汝针神还济急”，她可能是靠针线过活，家境贫穷的寡妇。虽然如此，“药铛累汝亲调遍”说明她对患病的作者照顾周到。萧雅堂在病中得到照顾，内心却是“遥怜儿女家千里”，对国内另一个家的牵挂，无法放下。这种两头为家的心理，是当时许多流寓南洋之士的矛盾现实，既想融入当地社会生活，又难以割舍国内情缘，海天万里，亲情难忘，于是陷入进退两难境界。他所写的《有怀二首》，生动地描述自己的心情：

异乡花草故园春，归去来时只此身。
安得多情似明月，夜来长照两边人。
故乡消息问梅花，以客为家又忆家。
即使归家翻似客，去来无处不天涯。

(1893年11月13日《叻报》)

此诗发表之后，邱菽园称之为“俗题而能雅”，并加解说：“商人重利轻别，闺中少妇盼断弄潮。往往在外再置室家，乐不思蜀。其或年时一返来去，寻常二女异居，无容作尹邢之避，古有之者，武帝听置左右夫人，贾充前娶于李，复娶于郭是也，谚谓为两头大”。(《五百石洞天挥麈》卷之十一)邱菽园所举的两头大例子不能恰当地说明流寓人士的处境，但是诗中的“夜来长照两边人”，“去来无处不天涯”，生动地概括诗人的心境。

萧雅堂在汶岛，凭吊从小认识的同学吴绍兰的坟墓，这位二十年前分别的老朋友，也是懂得作诗的诗人，竟然卖身三年充当猪仔(估客)，最终病死于异乡。作者同是天涯沦落人，写下《汶山吊吴绍兰墓》，为死者抱恨“生带愁来难自在，死埋忧去是便宜”，这是无助的感叹，也是流寓人士的悲歌。

二十年前忆送君，临歧别泪两纷纷。
远游此地成虚度，凶闻当时不忍闻。
三载相思空自苦，半生知己更谁云?
而今樽酒翻为奠，聊把新诗当祭文!

与君弱冠学为诗，文字交情道义师。
一别竟成千古恨，三生空订寸心知。
吞声有梦同工部，流水高山失子期。
墓草离离青到眼，我来似动故人思。

论交数月不多时，别后反为身后思。
生带愁来难自在，死埋忧去是便宜。
多情念我犹垂泪，末路怜君更作诗。
寂寂江山凭吊处，烟波今昔不胜悲!

三年估客此淹留，何事天涯惯写愁?
地异长沙偏感赋，人非宋玉也悲秋!
浮云有意怜陈迹，芳草无情没旧游。
苦忆遗诗成死讖，露零花有泪频流!(“露零花有泪，云冻月无颜”，本其遗句也)

(1893年11月9日《叻报》)

死亡是离乡背井的旅人最为伤悲的事情，海天漂泊，孤立无援，南来之人内心的恐惧，没有比死亡来得更触动人心，我们再看作者所写的这首《为友悼亡一首》：

无复腮前对晓妆，花残月落总伤神。
病中问药劳夫子，死后埋香泣老娘。
检点衣裳多散失，回看衾枕倍凄凉，
何时最是销魂处，风雨潇潇夜正长。

(1895年8月27日《星报》)

南洋世态炎凉，谋生不易，作者感触良深，他以歌行《汶山热水歌》抒发自己内心的郁闷，这也是海外旧体诗中所见的唯一歌行体作品：

汶山之西有热水，水由山生长不止。
昼夜沸腾热如汤，顺流营窟常。
自来可浴祓不祥，结茅为屋窟在里。
既传浴之病可除，岂真勿药真可喜。
三五成群招复招，丁男子妇欣相邀。
欲洁其身不计远，车行马走途路遥。
一浴而归去蒙垢，再浴小住度清宵。
曾闻沂水浴春风，圣人且与点也同。
又闻孺子歌沧浪，濯缨濯足俱相当。
今观此水热为名，趋炎附热人常情。
冷原是水热为火，火刚水柔能相生。
水火既济不相克，能刚能柔纯乎清。
请君试问滔滔者，安得温润如斯也?
洗濯去恶本素心，同乎流俗随上下。
沁我诗脾浴我身，乘风归咏亦洒洒。
天地之大无不有，热水热水传众口。
莫道水热太稀奇，世间无独必有偶。

君不见河南县中有温泉，浴于泉者病得痊？
温泉热水还别有，无非造化生其然。
或谓地气蒸如煨，泄出热水山之限。
澡身浴德君知否？涤污洗垢人去来。

吁嗟炎凉世态热中多，可怜冷淡之处无人过，
我本一片冰心清又净，今亦热肠聊作热水歌！

(1893年11月13日《叻报》)

萧雅堂回国途经新加坡，可是他在新加坡没有亲人，没有朋友，靠着能够作诗，也靠着新加坡有报纸，他尝试投稿以接触当地文人，看他所写的《咏怀三首录呈诸大坛郢政》，表达了他万里孤客的心中渴望：

天地纵然大，人犹憾其中。
世情花锦似，我性桂姜同。
万里为孤客，四旬成半翁。
栖栖江海上，吾道岂终穷！
水深犹可测，山险尚堪逾。
独有方寸地，常为荆棘途。
小人专弄巧，大智本如愚。
能贵又能贱，方成伟丈夫。
安贫身自在，知命理犹该。
好学浑忘老，能诗岂是才？
道柔观逝水，心澈有明台。
忧乐行乎素，反时归去来！

(1893年11月8日《叻报》)

此诗刊登日期为1893年11月8日，诗中自称“四旬成半翁”，可知萧雅堂此时四十岁。根据内容，他为人豁达，安贫知命，去来自如。他是否因此认识了“诸大吟坛”中的任何人，不得而知。不过却认识了两位南来谋生的人，一位是画家，一位是医师，陌路巧遇，他赠诗以表敬意：

赠翰墨林陈秉章二首

春生翰墨别称林，风雅名家亦足钦。
篆隶草真能仿古，云山花鸟恰宜今。
羡君书画传神笔，叹我文章费苦心！
韵士骚人齐仰望，海滨声价重兼金。

衣冠门第出南陈，品画评书妙入神。
顷刻笔花开似锦，纵横墨润润如春。

诗书气概原非俗，金石人家定不贫。
铁限踏穿门若市，停车问字客来频。

戏赠医士任远来

功参和缓本天真，妙手针砭善度人。
我有闲愁医得否，悲秋末了又伤春？
非病原思亦足伤，问君可有疗贫汤？
呕心吟就诗千首，不及先生药一方。

(1893年11月17日《叻报》)

这几首赠人诗，一面羡慕称赞对方，一面哀伤感叹自己，对比之下，自己穷途潦倒，没有一技之长是主要原因。另一首赠人诗，所描写的对象是马来女子，作者一幅欣赏态度，倒也忘却了自身困境：

戏 赠

不施脂粉本天真，小吃槟榔当点唇。
窄袖贯头衣太素，淡妆椎髻发轻匀。
长围画幔原非绣，不插时花却负春。
举止大家双足赤，亲操井臼便宜身。

(1893年11月17日《叻报》)

萧雅堂是第一位以竹枝词描绘新加坡景物的诗人，可以称得上是南洋竹枝词第一人，他所写的《新嘉坡竹枝词十首》概括描写了新加坡一些景物，是颇见特色的作品，诗如下：

一声爆竹响昏昏，异域犹将正朔遵。
中外一家同迓岁，桃符红遍贴春门。
王家山上草青青，竿木升旗日不停。
辘轳一丸斜吊起，轮帆报点入沧溟。
麟羽虫鱼物亦灵，聚之有院类奇形。
茂先老去景纯死，博物谁参山海经？
不须玉虎吸银泓，自有源头活水生。
行遍地中复入室，万家滋润四时清。
明明造物夺精英，点点能开不夜城。
任是黑云遮皓月，自来暗宝有光明。
日夜梨园演唱新，沿街标榜妙传神。
世间万事都如戏，富贵当场一曲春。
买春有客上高楼，真个销魂好办头。
放下重帘春有主，不风流处也风流！
摇钱树子一枝枝，嫣舌方言恰费词。
安得花开能解语，夜来含笑话相思！

碧玉何人为破瓜，瓣香私奠假悲嗟！
郎今既死依焉守？从此身同薄命花！
红粉青楼亦可伤，护花有主任从良。
及时早嫁为商妇，莫对桃花赚阮郎！

(1894年1月25日《叻报》)

1894年春，萧雅堂从新加坡经香港返回厦门探亲，途中写下《小春十日由叻

回厦将至香江舟中口占二十韵》，描述行船途中的经历，这是清末南来诗人唯一描写乘船经过的作品：

叻坡买归舟，舟中人已稠。
勉强下行李，一身任载浮。
江水渺然碧，帆檣森且修。
一声风笛响，轮船不停留。
水声长在耳，山色远凝眸。
天空飞鸟绝，海阔归路悠。
三日又五日，日夜风打头。
波涛怒欲撼，船在水中泗。
饮食不堪问，坐卧难自由。
秽臭扑鼻恶，我心黯然愁。
长途舟似狱，九百客如囚。
沧海渺一粟，性命等蜉蝣。
众客共咨嗟，相对悔且尤。
寄语同船客，到此不须忧。
纵然风浪险，砥柱贯中流。
我为道不行，朱君将何求？
想因乡梓切，皆作暂归休。
迟日到香江，咫尺是鹭洲。
香江果然到，山上有高楼。
彼岸谁同登，停棹且优游。

(1894年1月25日《叻报》)

1895年，萧雅堂又回到南洋，落脚点是三宝垄。此时日本正在朝鲜制造事端，不久甲午战争爆发，战败的满清政府割让台湾，诗人对此悲愤交加，写下了以下爱国诗篇：

朝鲜感事 有序

近见日本新出《战清宝纪》，其中诗词颇多，诸体俱备，或送从军，或哀阵亡，或观战，或在军，诗虽稍顺，意多荒谬。其稍自量者，五古有曰：持久恐非计”，其不自量者，七言有曰：“不灭中

朝誓不还”，更多无理之词，因感之而有是作，录请诸大吟坛郢正。

元明藩属与皇清，六百余年守职诚。
岂料强邻新不测，全凭上国力扶倾。
牙山克敌功难继，平壤失机罪已明。
何日东征诸将士，扫除倭寇复韩京？

二十年来蓄异谋，借端起衅东戈矛。
人民乱逐烽烟日，田野抛残战垒秋。
误国庸臣真可恨，从戎志士且同雠。
辽东直北军书急，征马奔驰速置邮！

东学党人生祸胎，声言定乱渡江来。
王遭逼挟三韩困，民遇刀兵四境哀。
恨杀东洋贪地利，愁看北海降天灾。
伤心蒿目时艰处，下士终无济世才。

不道渝萌起祸殃，穷兵犯顺实猖狂。
铁艘战海沉还破，甲士争城战又亡。
着意偏师侵内地，甘居戎首扰边疆。
中原尽有英雄将，比美谁同戚继光？

六月交锋军火热，三冬连战雪风寒。
剧怜戎马关山外，不离干戈壁垒安。
宋帅功高分水岭，赵军机溃大连湾。
敌人深入兵家忌，狼狈倭奴进退难。

无端黩武自殃闽，东北河山起战尘。
穴地炮台防要隘，穿江雷艇布通津。
兵来速死哀声动，国不聊生怨气频。
明治不明难以治，哭师相送有何人？

筹边防海日纷纭，南北终愁兵力分。
国事云龙常恐变，人心凤鹤每惊闻。
鼓鼙声振山河壮，炮火弹精夙夜勤。
王事靡遑严驻守，何时平虏靖尘氛？

国家多事起兵戎，和战纷纷议不同。
台北和倭曾失策，越南战法岂无功！
大军已集和休再，宿将犹存战最工。
宋室屡因何所误，断宜主战决雌雄！

和难了局战休迟，誓复藩封更灭倭。
将帅严明旗号令，王师慷慨指旌旗。
称雄列国期今日，扬武中朝在此时。
鸭绿江边金鼓振，会看胜敌固藩篱。
东望扶桑东可怜，惨滋他族敌当前。
君臣蒙难无余地，士庶怀仇不共天。

义愤千秋诛日本，公评万国护朝鲜。
用兵海上年将暮，忧国空吟诗数篇。

(1895年1月8日《叻报》)

抚时感怀

明知骨已冢中枯，恋栈依然仗节符。
和敌不才羞末路，营私败类信贪夫。
弥缝遑惜人言啧，奏议惟闻帝曰吁。
天听民瞻三十载，到头得忍负三无。

传车何日走降王，东海洪波永不扬！
无奈匈奴侵上郡，致令倭寇逆中唐。
虎牢险失龚黄遁，鸭绿船沉士卒伤！
惟有丁公能化鹤，九泉飞去总茫茫！

天戈东指出王师，箕子遗封赖护持。
笳散西羌思越石，路通东道遣张仪。
但期一德同心久，不信犁庭扫穴迟。
圣恩高厚勉驱驰，怕诵东征破斧诗。

黄沙白草雪飞时，桑榆收效军初振。
口口口口口口口，坛坫要盟事可疑。
已见冯唐驱北狄，不闻李勣伐东夷。
枕戈待旦全中外，舍却刘琨更属谁？

(1895年3月12日《星报》)

时事有感

总统师干负圣明，前锋故意不添兵。
戎机已失谁知过？和议自愚共不平！
深恨佞臣同胶丑，私通敌国误苍生！
斩奸抗疏安维峻，虽谪军台万古荣！

倭奴犯顺已难堪，薄海人心愤又惭。
战舰防营何足恃，文经武略只空谈！
督师乍擢刘坤一，御敌曾推宋祝三。
无可议和偏欲议，徒劳往返使臣驂。

每问时事倍心寒，不见红旗报捷音。
志士勤王争北上，疆臣守土恐南侵。
盛京未盛城多陷，威海无威舰半沉。
太息老奸何不死，负君误国到于今！

兵家胜败事之常，何必区区为国伤！
自有英雄兴草野，试看将帅靖边疆。
冯宫保老或能战，曾侯忠义不忘。
灭尽倭氛应可俟，后先比美戚南塘。

国家多故起兵戎，朝野纷纷议不同。

台北平倭曾失策，越南敌法岂无功！
大军已集和何事，宿将犹存战自雄。
宋室屡因和议误，前车可鉴望宸聰！

时事有感

能战方能守，能守方能和。
战守俱不能，和议将云何？
何不整师旅，重砺我干戈？
朝野求人才，英雄起岩阿。
将帅如谋勇，兵精不在多。
谋勇谁可比，曾左鲍靡陀。
强寇犹扑灭，奚患此妖魔！
汉城克复后，渡海捣穷倭！

读史有感

余日消闲尝读史，异哉宰相号浪子。
金人孤军围汴梁，扼而歼之立可俟。
不战不守偏主和，半筹莫展应愧死。
种少保才略堪嘉，李留守忠贞足恃。
奈何力阻二公谋，宋室之祸可知矣。
不特害君兼累民，言之伤心更切齿！
慨自往古与来今，庸臣误国多如此！
遗臭万年总不知，世世子孙蒙其耻！

(1895年4月3日《叻报》)

台事志愤

议割全台有大臣，数千里地万千人。
朝中执政还轻弃，不及区区仗义民！
改旗自主意何深，竟负台民万众心。
十日笑他称总统，割须逃出沪江浔。
鸡笼失守咎谁归？淡水城池一旦非。
料得台军终胜敌，扫除倭寇复邦畿。
扶危继绝郑成功，开创东都气象雄。
海上孤臣谁可比，黑旗刘毅略相同！
将军有女亦能军，驰骋疆场实罕闻。
为父分忧同御敌，试看巾帼立奇功！
心存孤愤丘逢甲，志切同仇林荫堂。
聚集民兵同守土，回天有力国之光。
义纾国难吴光亮，誓报夫雠张秀容。
共救时艰同雪恨，刚柔相济当前锋。
客民忠义胜官军，制梃犹能扑寇氛。
笑杀倭奴真丧气，桃园战败屡传闻。

元戎决策镇台南，捷报喧传已再三。
倭舰倭兵多覆没，南军聊洗北军惭。
台阳联络到台中，与地存亡众志同。
台北倭人频败北，虎旗民国独称雄。
义师连捷普天欢，惊破洞倭胆金寒。
却恨水师无战舰，破倭容易灭倭难。
三台士气壮山河，战守同心精且多。
慷慨誓师神鬼泣，何时东海息风波？
客里谈兵略破愁，喜闻大捷当封侯。
请缨无路空投笔，老我雄心又一秋。

(1895年8月27日《星报》)

萧雅堂以一个万里投荒，前途茫茫的流寓之士，却对国家顾念不已，这种情怀与去国的个人遭遇交织一起，表现出爱国的精神，正是南来之人可贵的品格，如此相对于那些被环境同化殆尽的人而言，这才是真正的民族精神。回国之后，萧雅堂又回到南洋，他仍然没有放弃想结交新加坡文人的念头，因此途径新加坡时，主动寄诗给《叻报》主笔何应源(渔古、渔鼓、腴古)，订定神交，真心诚意，一览无余，请看他的诗作：

七律二首赠渔鼓先生大词伯即请斧政
闻名吾爱何夫子，歌咏风流笔有神。
语为伤时多慷慨，文能道俗更清真。
著书有兴情何限，问字无缘意未亲。
论世知人犹尚友，况当宛在水之滨。

新篇传播到衡茅，朗诵琳琅手自抄。
下笔未消南浦恨，临文何让北山嘲。
史才著作追班马，诗派源流异岛郊。
一瓣心香私祝久，漫云今日订神交。

(1897年2月16日《星报》)

萧雅堂的诗作，处处流露出人在南洋而又思念家乡的心情，在异乡而又怀念故乡的矛盾心理，他在三宝垄的作品《垄川旅怀旧作》，在泗水的作品《泗水旅怀》，无不表现出这种情怀：

垄川旅怀旧作

浪游湖海转蓬身，到处羁栖似逸民。
岁月蹉跎空问世，江山阅历略知津。

故园松菊荒三径，客地莺花又一春。
无限牢骚离别意，垄川道上未归人。

以闲为业度年华，好饮耽吟兴不赊。
万里风尘书作伴，四时花月客为家。
离心不似初来日，归梦偶然随去槎。
何日得旋乡国隐，读书教子是生涯？

(1899年9月12日《天南新报》)

泗水旅怀

泗水栖迟欲如春，江干暮晚客愁新。
穷如可去非求富，道果能谋岂患贫。
故国关山前夜梦，残年风雨异乡人。
游踪落落天教定，聚散无常亦夙因。

南来到处逐舟车，壮志消磨两鬓华。
悟澈清虚心似水，愁看老大眼生花。
一身重累多儿女，半世轻离远室家。
最是客星频照命，故应飘泊在天涯。

海滨聊寄一枝安，客路游移强自宽。
贫为谋生忙逐利，老犹嗜学当加餐。
家山路远归心缓，亲友情深见面难。
别有离愁何处是，垄川又作故乡看。

廿年浪迹水之涯，风月江山处处宜。
吟就俚诗常独笑，养成拙病倩谁医？
亦知处世须求己，何必忧天又悯时！
去日苦多来日少，乐乎天命复奚疑！

驹隙匆匆逼岁除，烟波江上赋离居。
纵然客地迟花信，自有春风到草庐。
旅燕新巢虽已定，寒梅老屋竟何如？
归期早约春前后，不道萍踪又滞予！

(1899年9月12日《天南新报》)

《垄川三宝洞怀古》是萧雅堂对郑和下西洋的看法，这位七次下西洋的三宝公，在南洋留下一些遗迹，三宝垄的三宝洞是其中之一。

“耀兵外域振君威”的时代已经过去，明朝灭亡了，如今是“五百年中乡国异”，马彬、王景弘等随从全都消失，而郑和也成为神话人物，“遗像分明真似佛，闻名仿佛已成仙”，辉煌的下西洋活动，如今只是村老口中的轶事。作者以长期流寓人士身份发表对郑和下西洋看法，其感触是苍凉而又惋惜的。

奎川三宝洞怀古

耀兵外域振君威，奉使南来归未归。
香火千秋留古洞，声名四海溢蛮畿。
马彬等辈今俱泯，成祖江山昔已非。
五百年中乡国异，神灵如在尚凭依。
破浪乘风拥甲兵，宝船到处尽逢迎。
南穷瘴海通诸国，北望燕云是旧京。
惠帝潜亡何有迹，景弘并驾转无名。
洞天福地年年在，沧海桑田任变更。
海邦何处不流连，独把芳踪寄奎川？
遗像分明真似佛，闻名仿佛已成仙。
石藏树覆疑无地，水抱山环别有天。
洞口春溪芳草绿，落花啼鸟不知年。
久辞北阙滞南洋，重译朝天海不扬。
遍历殊方观异俗，远乘法驾渡慈航。
洞因神住山生色，地以人传草亦香。
轶事多谈村老口，瀛涯胜览独无详。

(1899年1月14日《天南新报》)

萧雅堂写南洋乡村景色，情景兼顾，各种特殊景物皆能捕捉入诗，构成乡村生活的真实画面。此首《森村》是萧雅堂在泗水的作品，森村是指树木围绕的村落，此诗写来轻快，乡村景物一一展露眼前，山水、田地、树木、门巷、鸟啼、狗吠、炊烟，平静中却带着贫困忧伤，由此揭露了荷兰殖民主义者苛政的压迫。

森村

绕郭树扶疏，临江亦结庐。
有园偏少菜，近水恰多鱼。
地瘦人何业，家贫子读书。
桃源风景远，误作武陵渔。
僻壤成荒境，山隈复水涯。
野平田有种，林密树如花。
活计工为女，生繁客是家。
此乡多古意，门巷寂无哗。
四邻分远近，一郭自东西。
椰瘦参天直，蕉高及屋齐。
隔篱龙也吠，穿树鸟频啼。
尽日横桥路，销磨轮与蹄。
此间非乐土，寥落自成村。
烟火千家共，青黄四野繁。

政苛斯地苦，俗朴古风存。

尽道沧桑变，浇漓不足论。

(1899年1月9日《天南新报》)

萧雅堂另有《锡江竹枝词》，描写望加锡土著化华人婚礼。黄遵宪在新加坡创作的《番客篇》是描述土著化华人豪门嫁娶的场面，而萧雅堂的这篇作品是普通人家嫁女的经过，是另一种描述，今引如下：

关雎未咏小星先，番女相从暂作偏。
胡越一家宜尔室，倘能终老亦良缘。

注：(至有身家而庆终老者，以偏为正，及其亡也，立主竖牌，以地为姓，曰锡氏云。)

曾闻长舌起风波，稚齿因之亦切磋。
想为是非防利口，瓠犀珍重细研磨。

注：(男女皆磨齿。)

儿女伊何割爱偏，后头痴望好姻缘。
惜阴分寸皆如切，漏泄春光在眼前。

注：(男女将近成人，各割前阴之皮少许，依番教也。)

不施脂粉不盘鸦，窄袖贯头衣不华。
报道良辰好事近，十尖红染女儿花。

小吃槟榔当点唇，垂肩时覆绮罗巾。
当筵借箸非长技，席地盘餐染指频。
佳期已近欲干归，忍饿含羞泪暗挥。
欢喜在心忧在面，可怜消减小腰围。

甥馆新婚迟合欢，鸳鸯独宿锦衾单。
成双夜待三朝后，喜报爷娘更问安。

注：(至成双之夜，婿衣冠叩岳父母寝门道好。)

婚嫁有约早梳妆，为庆三朝作伴娘。
前路双双车上坐，后车新妇伴新娘。

合婚龙凤烛双辉，龙自飞腾凤不归。
待到依家雏育后，有心惜别泪依依。
注：(新婚点龙烛，至生儿女点凤烛。)

守闺待字已多年，羞托良媒祇自怜。
不合孤鸾星照命，白头竟尔误因缘。
弟婚妹嫁姊云何，习俗成风怨女多。
过了青春容易老，守贞长作小姑娘。
从来养女原如寄，长大归共送迎。
喜结蚌胎珠欲放，如何转寄外家生？

(1899年1月4日《叻报》)

此诗从表面上看，所描述的新娘凿磨牙齿、行割礼、窄袖无领、覆盖罗巾，指染花汁，以手进食，完全是当地土著之婚礼习俗。然而其中的三朝回家，“合婚龙凤烛双辉”，又可以看出并非土著婚礼习俗，因此，新娘很可能是土著化华人，所以还保留一些华人婚礼习俗。此诗开头称“关雎未咏小星先，番女相从暂作偏”，小星即妾的俗称，说明作者娶此相从的“番女”当作偏房，还希望“胡越一家宜尔室，倘能终老亦良缘”。以此观之，他在汶岛那位红颜知己是另一个家，而望加锡这个“小星”又是另一个家，他在诗中也透露了另娶的讯息，如“故园松菊荒三径，客地莺花又一春”、“离心不似初来日，归梦偶然随去槎”（《奎川旅怀旧作》），“纵然客地迟花信，自有春风到草庐”、“旅燕新巢虽已定，寒梅老屋竟何如”（《泗水旅怀》）。不过，从诗中又可看出，当他面对新家时却又想起国内老家，还算是一个有情义之人。我们回看他的《番客篇》，他对于两头置家并无自责之意，然而他也明白长年在外，最终是“报道藁砧归，头白已成叟”，而“妾亦颜色衰，相对嗟老丑”对家乡的妻子是十分不公平的对待，尽管他洒脱地说“即使归家翻似客，去来无处不天涯”。

萧雅堂最后定居在泗水，而他的作品最后见报是三首诗与一篇碑铭，时间是1899年10月13日，此后毫无音讯，想是终老于泗水。这三首诗与碑铭都是为一位名为郑嫌而的人而作，据内容看，此人应是当地殷富商人，宅园广大，有亭台楼阁，而且捐资修路，便利行人，作者因此撰写功德碑，称赞其事。诗与碑铭如下：

瞻望亭(为郑太封嫌而翁作)

仰止高山望眼青，野花如绣四时馨。
一天飞白云留影，几点栖鸟树隐形。
自是儿孙看弗及，应知川岳下钟灵。
快哉燕喜供游乐，争及孝思瞻此亭。

阅江楼

楼记阅江轰石头，低徊两地有名楼。
置身高旷天何近，极目苍茫水自流。

孰道元龙超北海，犹疑黄鹤下南洲。
郑庄好客今犹在，何幸登临纪胜游。

观山阁

山中有阁阁前山，高隐何人在此间？
缥渺奇峰初日上，逶迤远岫白云闲。
送青如画匀眉黛，浮绿临春耸髻鬟。
举目晴岚看不厌，凭栏啸傲自怡颜。

重修凫宫石路功德碑记

盖闻立功树德，实种福以无穷；刻石铭碑，乃垂名于不朽。夫捐金行善，修路济人，始创者功固居先，继修者德亦不浅！若凫宫向东之路，实行旅必出之途也。自康熙年间，有郭鼎侯者，独力捐资，悉心碑石，计程三四里，纪年二百余，岁月既深，缺残甚，幸遇郑封君嫌而翁道经是地，善本诚信，见义必为，费财不惜，遂捐银千余两，治工数十天，不计其长，只增其阔。从此矩步咸歌王道之平，攘往熙来，共拜仁人之赐。所谓一人好善，满路无忧，功在此时，恩垂后世。既立功而树德，福自难量，合当刻石以铭碑，名垂不朽，是为记。

(1899年10月13日《天南新报》)



中国现代文化 建设中的五四新文学 ——夏志清对五四新文学的评价及其启示

中国 李勇

五四运动九十年来，对它的评价可以用众说纷纭来形容。普遍的现象是把它政治化，对它进行意识形态定性。把它作为启蒙与自由主义的旗帜也吸引了不少人。又有保守人士为维护儒家传统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名对五四反传统思想加以否定。近年来又有人借着反思现代性的思潮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言论片面夸大，否定五四反传统思想。在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的時候，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评价这场运动？任何评价都是从评价者的价值立场出发展开的。价值立场不同，评价的结论也当不同，而价值立场又不应该是一己之私，不是个别人的利益所系，而是评价主体对自身所处的时代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所做出的判断、所采取的态度。当然，“时代”又是一个可长可短的时间概念，人们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有属于较长的时间段中的基本问题，也有特定的时间点上的特殊问题。我们今天反思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应该立足于长时段的基本问题，结合今天的特殊问题展开。考察长时段中的基本问题在今天特殊的历史时刻有什么新特点，这些长时段中的基本问题对解决今天的特殊问题有什么帮助。

在对于五四的各种评价中，夏志清先生的看法独树一帜。夏志清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也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影响最大的几位学者之一。他的学术风格是特立独行。考察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对于

理清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从当今的立场评价五四，都有着重要意义。

夏志清先生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时曾写过一篇《五四杂感》，是专论五四运动的论文。在文中夏先生借用了胡适对五四运动的看法，明确地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区分。反对把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混在一起，以避免将新文化运动政治化。他同意胡适的说法：1919年5月4日由北京一群大学生所发动的爱国运动，只能算是新文化运动的一环，并不能代表这个运动的全面。这种区分看似简单，其实背后拥有浓厚的思想渊源。夏先生对于1919年5月4日的学生运动的态度和对于作为中国文化千年难逢的重大转折点的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是极不同的。对于运动本身，夏先生的态度耐人寻味。他当然肯定学生的活动是出于爱国热情，就这一点而言，他对这一天的运动是同情的。但是，对于这场运动的历史地位，夏先生有着清醒的判断。他说：“60的前‘五四’的大游行，出于自发的爱国热情，当然是值得纪念的。但游行示威，抗议政府丧权辱国的举止，到头来免不了要同维护公众秩序的警察发生冲突。这样开了一个学生界直接用暴力干政的先例，对国家有无好处，还是个值得我们沉思的问题。……我总觉得一大群学生火烧曹汝霖的住宅揪打一个驻日公使，没有什么光荣。即使把曹汝霖抓住了打死，又怎么样？国家这样弱，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即

使无意媚日，也很难为国家争还权利，对正在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而言，放火打人至少可说是无理性的暴行。”由此可见，夏先生区分作为学生运动的五四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有一个基本的意图，就是对五四运动要作公正理性的分析评价。不因为学生运动有爱国热情作为动因就全面美化这种运动，对其中的非理性因素，夏先生持尖锐的批评态度。这种批评态度，是作为一位有理性的知识分子，在清醒的状态下对于失控的群众运动的基本判断。

作为学生运动的“五四”超出了文学研究的范围。夏志清先生的论述主要围绕新文化运动展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指1915年至1927年在中国文学界、文化界发生的以反对封建礼教、提倡现代文明（科学民主）为主旨的思想潮。夏先生对于这场运动的分析和评价也仍然坚持理性的立场，反对激进主义。他在论述文学界发起的白话文运动时，对陈独秀的批评就是与对学生运动中过激行为的批评相一致。他认为陈独秀为回应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而提倡文学革命论时表现得过于情绪化，称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一文“内容泼赖，文字浮夸异常。陈独秀的这篇文章，以文学知识和立论态度来讲，真可谓集无知与不负责任之大成，其精神上和胡适那篇劝人不要用陈腔滥调，不要作无痛呻吟的文章可说背道而驰。”夏先生对陈独秀的批评一是因为其立论浮夸、激进，二是其对于新文化建设少有建设性贡献。他对五四时期其他激进人物的批评也多是由于这两个原因。比如对于钱玄同、傅斯年等人废除中国文字的激进主张，夏先生也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样的见解并无实行的可能性，在学理上也又难以成立。夏先生甚至对《学衡》派批评新文化的某些观点表示等同，认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对西方文学与哲学的深厚传统缺乏了解；他们只知贪新好奇，求转变，对国家在文化方面的实在需要反而置之不顾。而他们也因此可以说是没有尽读书人的责任，这实在是很可惜的事”。

夏先生对于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的过激言行都持批评的态度。但夏先生绝不是像林纾那样的保守人士。相反，他对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要改变中国现状的强烈愿望却又

给予积极评价。他明确指出：“清末民初的中国，……一切需要革新、革命。陈独秀、鲁迅诸人，不管他们后来怎样，刚在《新青年》上发表他们的言论、小说时的确算得上是爱国志士，……在那个时代，非把旧社会，旧文化完全否定，实在谈不上民族的自力更新。”“我们对那些五四文化斗士仍该承认他们建创新中国的贡献。”至此，夏志清先生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已很明确。一方面，他肯定当时新文化运动领导者改变中国现状的努力，另一方面，他又对激进的言行进行了理性的反思批判。他自己所认同的道路也就清晰可辨了，那就是走稳健的建设新文化之路。

这条稳健的道路是什么样子？首先在语言和文体方面，夏先生肯定了胡适、周作人等人对白话文的建设性构想，认为废除汉字是行不通的，也没有必要。但是可以从传统的白话文学，比如小说、戏曲、诗歌中继承一个民间传统，这样既可以避免古奥的文言文的艰涩难懂、无法适应新事物的弊端，又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当然，当这些传统的白话不够用的时候也还可以吸收文言和口语以及外来语。总之，要让白话变得具有生命力。夏先生的这种开放态度使他对于胡适的某些过激言论也表示了不满。比如他批评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他为了配合自己论调的需要，只得把旧诗中稍有艰深晦涩的，都看做拟古的、虚浮的或拘泥形式的，不论其地位多重要，都给予很低的评价。这当然有失公允的。”

其次，夏志清先生认为五四新文学建设中对“人”的关怀是一个突出的贡献。为此，他特别赞赏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提出的观点，认为语言文字的改革应以观念的变革为旨归，否则用白话文仍然可能写出违反人性的作品。夏志清先生称“无论就科学的或人文的眼光看，周作人这篇文章是当时最深思熟虑和最有建设性思想的一篇。”什么样的文学才算是人的文学？就是把人看做一种理性动物，维护人类尊严的文字，而传统的文学中大量的是压抑人性的、为政治或礼教服务的文学，要么就是描写人的本能的文学，把色情、暴力和幻想当成人性进行宣扬。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所希望创造的新文学是写平凡人的现实生活的文

学。从这些平凡人的生活中表现出爱心、同情心和道德感。夏志清认为“从此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正在寻找一种更能适合现代人需要的，足以取代儒家伦理观的思想。因此，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实在可以看做是现代中国文学成熟时期的开端。”

夏志清为什么对这两个方面特别关注？这是与他本人的思想观念直接相关的。夏志清先生在那篇有名的《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一文中指出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现状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他认为“中国的国耻，积弱和腐败，启发了1918—1937年间大部分严肃的作品。……这种觉醒反映出作家对人类尊严和自由的向往，……这些描写青年人和劳苦大众的作品，虽能唤起我们的同情心，但在今日看来，未免感情过激。不过，这些作品有其历史价值。因为它们反映出作家对中国的社会状况的深切体验。”在夏志清看来，中国现代作家对于国家的状况具有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促使他们呼唤人性，从而促进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夏先生本人也是一位具有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他对于五四一代作家的这种人文关怀就持自然的同情。他自己也写了一篇题为《人的文学》的论文，文中表露了自己的人文关怀与五四一代以及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之间的契合。他说，“读中国现代文学，读到旧社会的悲惨故事，我总不免动容，文字的好坏反而是次要的考虑。只要叙述是真情实事，不是温情主义式的杜撰，我总觉得有保存价值，值得后人阅读回味。”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认为“胡适和周氏兄弟都生在晚清时代，从小见到周围无知、贫穷、迷信的现象，把国家的衰弱归咎于社会的闭塞，传统文化的毫无活力，是理所应当的事。”夏先生在对五四作家的评价中也的确坚持了以人为本的标准。比如对于许地山的小说《玉官》的评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篇小说在夏先生之前的史家中无人提起，而夏先生却独具慧眼给予很高评价。其原因就在于小说揭露出了封建大家庭里对待女性的非人道的一面。由许地山的小说引发了夏志清先生的如下感慨，“旧社会里这类悲惨故事实在是讲不完的。象许地山，顾一樵二位挂名祖母这样的女

子，真不知有多少。国内报章上，最近常看到学者前辈赞扬我国固有的文化和道德，或把中西文化来个比较，证明中国固有文化要比西方文化优胜。每读这些文章，我总想起清末民初直至40年代作家写给我们的那些悲惨故事：一个真正代表开明文化、富有仁爱精神的社会，是不容这类故事发生的。”夏志清对于五四一代倡导的人的文学的认同，其实与他自己亲眼所见的中国社会的愚昧、落后、残酷的现实是有关的。他自己也曾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二三十年后的四十年代，——也是夏先生读大学的年代——还常常常见到五四作家们所描写的状况出现在现实生活中。或许是因为夏先生与五四一代仍有许多共同的现实体验，才使得夏先生认同于五四一代对于人的文学的选择吧。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论者批评夏先生只关注文学的艺术品位（而且是西方标准的品位），不关心文学与现实社会和历史的关系是有失公允的。

夏志清先生虽然推崇那些表现人性的作品，甚至说“我认为中国新文学的传统，即是‘人的文学’，即是‘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中国社会、个人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但是夏先生反对那些把文学当成工具宣传主义的作品也是事实。即使是备受夏先生推崇的周作人《人的文学》也因其提倡人的文学的目的在于改革中国社会而被夏先生指认为有局限性。夏先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中这种将文学当成改造社会工具的作法颇不以为然。他指出：“这种急欲改革中国社会的热忱，对文学的素质难免有坏的影响，现代中国文学早期浪漫主义作品之所以显得那么浅薄，与此不无关系。到最后，这种改造社会的热忱必然变为爱国的载道思想。因此，我们可以说，即使没有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中国的新文学作家，也不一定会对探讨人类心灵问题感兴趣的。他们亟亟以谋的，是要把中国变成现代国家，因此，他们写文章的当务之急是教导自己蒙昧的同胞。几位早期的作家都坦白承认他们选择文艺为事业的理由，无非是为了要对国人的愚昧、怯懦和冷漠宣战。他们认为文学在这方面是比科学和政治要有效的武器。这些作家对艺术的看法会有不同，但在爱国的大原则下，他

们的信念是相同的。”夏志清对于五四一代新文学家因为救国心切而干扰了文学的品位和素质感到惋惜，对于新文学家在介绍外国文学时也以题材、主题、思想为主，忽视文学艺术技巧感到不满。在他的观念中文学艺术的标准是绝不能放松的，更不能不顾艺术标准而把思想宣传当成评价文学作品的惟一尺度。正是本着这样的艺术观念，夏志清才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把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师陀这样的作家作专章讨论的对象。在左翼作家中他又把不被重视的张天翼和吴组湘作为重点论述的对象，他的理由就是这些作家的艺术方面独具特色，具有较高的成就。他自己也把《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宗旨定为“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可见，夏志清先生在评价五四时对于以认真的态度从事现代汉语文学的艺术探索的作家给予肯定，是与他的艺术观念直接相关的。坚持文学作品的艺术标准的首要地位，是夏志清不变的追求，也是他评价作家作品乃至像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重大的文化史事件的基本价值标准。在此观念的引导下，他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就和局限的评判才显得更发人深省。

总之，我们从夏志清先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的主要论点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各种激进言行持批评态度，特别是对这些激进言行所产生的负面后果给予坚决否定，这表明了夏先生的立场是明确的。其次，夏先生对于五四时期稳健的新文化建设活动持积极的肯定态度。一方面，肯定了五四一代面对封建礼教和落后愚昧的现实生活的批判立场，另一方面也肯定了五四一代为建立现代的人性观念所做的积极努力。在他看来建立一套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念以取代传统的礼教观念的努力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成果。其方向是正确的，尽管在具体的论点上还有不完善的地方需要后人进一步努力。再次，夏先生坚持文学家应坚守自己的岗位，在文学创作中应以艺术标准为宗旨，反对把文学当成宣传工具。但他也不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倡导者，仍然认为文学家应该探索人的心灵，表现美好的人性。

夏志清先生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这些论

述至迟也是在30年前了。近30年来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观点对于今天的人们有什么启示？我们今天又应该如何来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今天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当然应该立足于我们对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生活状况的基本判断。为自己确立一个基本的价值立场，再回过头去看夏先生的观点对我们今天有哪些启发，并进而确定我们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判。

那么，今天中国社会生活的状况如何？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可能在一篇短文中做出全面深入的讨论。但是有两个基本特点是十分突出的：一是随着全球化的加剧，中国已卷入世界历史发展的漩涡之中。这种融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是30年前无法相比的。二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文化的世俗化现象也是30年前无法相比的。经济利益的驱动、政策的引导以及普通民众思想观念中实用主义的支持，建立起了当代中国文化庞大的体制。这个体制的本质特征是世俗化。针对这两个特征，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既要发掘本民族文化传统中优秀的因素以应答全球化的挑战，另一方面也要坚守文化品位，抵制世俗化的挑战。

面对这两个基本任务夏志清先生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进行的评价给我们的启示有哪些？首先，夏先生肯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文学作家积极创造现代语文，同时又反对废除汉字的激进主张。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化面对全球化挑战时的一种积极主动的应对策略。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建设不应该以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色名义退回到传统的封闭状态。狭隘的民族主义一直是夏先生批判的对象。因此，推动中国文化向现代转型，推动中国现代文化面向世界开放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是无法抹杀的。但是中国现代文化融入世界潮流时又不可以忘记自己的特色。实际上，夏先生在1974年写的《文学的前途》一文中已明白指出：“我们的作家不应该跟人家走，迎上时代潮流就自感满足。自己是中国人，应当体会中国的传统，多读中国的文学。传统的文学看来和现代文学形式上、精神上毫无相似之处，但中国文学要在世界文学中占一重要地位，今日

的作家总还得借重自己的文学传统。”夏先生在评价胡适、周作人等人时，强调他们从中国文学传统中寻找适合的资源，寻找自己认同的文学家、思想家作为自己理论和创作上的依据，其实也是在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潜在地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某一些被压抑的因素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方面学习了西方，具有向世界开放的眼界，另一方面，又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环，处在古今中西的交叉点上。

其次，夏志清先生坚持文学的艺术品位，肯定五四一代作家对艺术的独特追求，反对将艺术工具化，也对我们今天应对文学世俗化挑战具有启示意义。今天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文学变成载道工具的现象已不明显，但文学的商品化、世俗化情形却有增无减。工具化与世俗化都是对文学的艺术性的威胁。坚持文学的艺术性也是应对这些挑战的有效办法。针对世俗化问题，夏志清先生也有过明白的忠告，他认为文学世俗化问题，就读者方面而言，主要就是要求文学满足读者的娱乐需求。在电影、电视发达的时代，娱乐方面的需求完全可以由电影、电视来满足，而且电影、电视的娱乐功能超过文学。作家不必在娱乐方面与影视竞争。作家还是应该安心地去追求文学的艺术独创性更好。他说：“终日笔耕，写文章、小说供人消遣，是最无聊的事，不如自己多读书，让那些读者去看电视、电影。作家应该想到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这种精神去创作，可能比较有意思。”值得注意的是夏先生自己坚持严肃的艺术追求，却不排斥娱乐。他对五四时期的鸳鸯蝴蝶派也持一种宽容的态度，认为这些作家中也有像张恨水那样水平高的人，比某些载道派的作家更高明。他在艺术品位与世俗娱乐之间抱着开放的态度，但若世俗娱乐淹没了艺术追求，把文学作品的品位降低为世俗娱乐，那就是应该坚决反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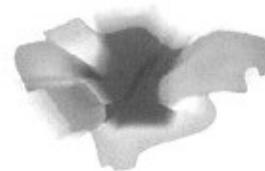
总之，九十年后回顾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可以得出站在今天这个时代立场上的基本结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底层中找到了向现代转型，与国际接轨的因素，以传统白话为基础建设起来的现代汉语文学适应了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参与世界潮流的需要。

五四时代所建立起来的现代文学的艺术品位仍然是今天的中国人应该坚持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仍然应该坚持人性的探索，以人性的探索支撑艺术的追求。

注释

- i. 夏志清《五四杂感》，见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
- ii. 夏志清《五四杂感》，见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4页。
- iii.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此外，夏先生还指出“文学革命”这个名词也是胡适在给《新青年》编辑的信中首创，而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倡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的当儿，竟把王尔德拉了进去奉为经典，岂不滑稽？”见《中国现代小说史》第4页。
- iv.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 v.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47页。
- vi.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 vii.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 viii.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 ix.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4页。
- x. 夏志清《人的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页。
- xi. 夏志清《人的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80页。
- xii. 夏志清《亲情与爱情》，见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第133页。
- xiii. 夏志清《人的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页。
- xiv.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 xv. 夏志清《文学的前途》，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0页。
- xvi. 夏志清《文学的前途》，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0页。

（李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论鲁迅小说中月的话语形构

广州 朱崇科

鲁迅小说中有关月的话语形构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论题，因为话语形构不是简单的意象归纳与分析，而是有其独特的话语功能。鲁迅小说中的月，既可以体现出时间的辩证、希望的现代性，又可以呈现出“月”与病的纠葛的悖论。当然，当我们聚焦《奔月》时，其中的月，既有常规性，又有其流动性、堕落性和现实性。

毋庸讳言，月（月亮、月光、月色等）和人类各个层面的关系可谓息息相关，虽然在表面上看来，普通人和月球的距离同样遥不可及。月亮既从物质上切切实实的影响着人类，比如月光照明、女人生理周期、身体健康等等，又从精神上潜移默化，比如月亮崇拜，有关月亮的传说与象征，月亮和心理健康等等。为此，月亮的神秘、伟大及有关想象刺激着人们的好奇心，探月行动也在有条件的国家如火如荼进行中。简而言之，月亮和人类生活可谓密不可分、如影相随。

可以理解的是，即使我们缩小范围，探讨月亮和中国文学书写的关系，我们也不难在汗牛充栋、五花八门的创作及研究资料中发现月亮的繁复功能与巨大贯穿性的通感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或睹物思人，或天人合一，或表明心志，或借景生情等等，不一而足。尤

其是，月亮的嬗变总给人带来诸多不同层次与形式的感伤、感悟，加上中和、阴柔作为长期以来文学追求的主流特征之一，有人甚至用“月亮文化”来比附中国文学中的阴性悲剧美感。由于相关论述资料浩瀚，此处不赘。²当然西方语境中，在很多神话系统中，都有有关月亮女神神话原型的三种形式：分别掌管天、地和冥界³。

耐人寻味的是，即使回到20世纪中国小说史，在现代小说之父——鲁迅那里，月的话语形构也是别出心裁：1912年的文言小说《怀旧》中，就有“月落参横”、“月光娟娟”等表示时间、天气的用法；其现代小说，从《狂人日记》正文的第一句话“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页1）⁴到1926年底《奔月》中有关月的复杂纠缠刻画，鲁迅最少有11篇小说涉及了对月的不同程度的描绘。这其中当然灌注了鲁迅对月亮的迷恋，“我最讨厌的是假话和煤烟，最喜欢的是正直的人和月夜。”⁵同时，也展现出他对月的话语功能的熟练操控。

有关鲁迅小说中月亮的研究并不多，专论的则有《鲁迅小说中“月亮”意象探析》（刘耀辉《德州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鲁迅笔下的月亮情结——试论鲁迅小说《呐喊》、《彷徨》中月亮的意蕴》（李爱梅《宝

1. 西方的论著可参（英）朱尔斯·卡什福特著，余世燕译《月亮的传说》（太原：希望出版社，2005）等。

2. 随手拈来，庄超颖《月亮意象的文化内涵——从时空合一思维的角度论述》，《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王莹《月亮意象：从古典到现代的流变》，《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刘茹斐《文化语境中的中西“月”意象》，《湖北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等等可供部分参考。

3. 简单的说明可参王琼等《从关联翻译理论分析中西文化语境下“月亮”意象》，《兰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页140。

4. 这里的鲁迅小说所用版本是出自金隐铭校勘《鲁迅小说全编》插图本（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年6月1版，1998年4月4刷）。如下引用，只标页码。

5. 增田涉著《鲁迅回忆录》（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页146。

《鸡文理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更多的焦点则集中在《奔月》上：或探讨其“故事”的结构与意义生成⁶，或探索其中英雄末路的无奈与精神苦闷⁷；也有论者考察其视觉经验心理无意识。⁸整体而言，上述研究奠定了深刻认知鲁迅月亮书写的基矗，但相关研究也有预留空间。本文的核心问题是：鲁迅如何在小说中展开有关月的话语形构？换言之，月在小说中发挥了怎样的话语功能？更具体一点，《奔月》中的“月”到底有何指涉？

为此，有关月的话语形构并非简单的意象归纳和描述，而是要认真探究字里行间，“月”如何运行其话语功能，同时也可能暗含了鲁迅对月亮认知的嬗变轨迹。因此，本文的主体结构可分三部分：1. 希望的现代性与时间的辩证；2. “月”与病的纠葛；3. 《奔月》的“月”。

一、希望的现代性与时间的辩证

整体而言，鲁迅对“月”有着更多的好感，在绝大多数涉“月”小说中，月都扮演了令人愉悦的角色。它对自身话语功能的发挥有多种，比如，时间的标志，照明（启蒙）、希望的象征、见证与再现等等，本节主要论析其主要功能：希望、时间/情景功用。

(一) 希望的现代性：从激发到怀旧。如果聚焦于希望的现代性，我们也可以从两个层面展开分析：1. 对希望的开掘；2. 对希望的具体化。

1. 第三只眼的激发：《狂人日记》中的月。有论者曾经讨论了《狂人日记》中看与被看的辩证关系，并指出小说开头“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更显示出“一种清冷色的光在静夜中颤动，眼睛对眼睛，目光对目光的较量与搏斗已拉开了序幕。”在笔者看来，月光在此处其实更是充当了第三只眼的辅助和揭示作用，它

担当了精神的照明或者说启蒙作用。

月光在《狂人日记》中共出现四次。第二次“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页2)不难看出，在此处月亮很显然地扮演了一种预兆角色，狂人的受迫害情结和警惕性在月光的照耀和辉映下尤显清晰。而在第六小节中，鲁迅间接提及了月光，“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页5)因为月光不在，第三只眼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而在黑暗中，邪恶机制更易施展拳脚，这可以从反面论证了其作用。

第八小节中，狂人和他对话时，问询吃人的事情，他顾左右而言他，“今天天气很好。”“天气是好，月色也很亮了。”(页7)月的出现此时有双重作用：对于他，这是可以开解和转移视线的借口，而对于狂人，这却只是一个可以立足更好追寻的事实，它既提升了狂人的洞见性，也是被跨越的事实，因为揭示吃人的本质更重要。

2. 怀旧的现代性：《故乡》与《社戏》。在《故乡》、《社戏》中，“月”承担了另外一种功能，它以怀旧的现代性表达了鲁迅对希望的判断。

《故乡》中月亮共出现了三次（其中两次重复）。相当经典的则是那幅众所周知的图像——“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页49, 56)，天空下有一个手捏钢叉刺猹的少年。还有一次，也是与此相关，看瓜时，“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页50)。毋庸讳言，《故乡》中金黄的圆月和月夜都呈现出鲁迅对圆满的期待和追求，原本清冷的月亮因为天人合一的时空结构，因为自然和谐、自由自在的成长的可能性，因为以人为本的朴素原则而变得可亲又温暖，当然，甚至因此有些乌托邦式的过度理想化倾向。耐人寻味的是，恰恰是此美好的被破坏引发了鲁迅的深层思考：关于希望，关于人生。尽管鲁迅反思了

6. 蒋济永《〈奔月〉的“故事”构造与意义生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2期。

7. 比如李怡《红巾不 英雄泪——《奔月》与鲁迅的精神苦闷》，《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8期；周海波《英雄的无奈与无奈的英雄——关于《奔月》与《铸剑》的重新阅读》，《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12期等。

8. 姚新勇《冷月下的凝视——鲁迅视觉经验心理无意识探微》，《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4期。

9. 姚新勇《冷月下的凝视——鲁迅视觉经验心理无意识探微》，页33。

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之间的可能平视姿态¹⁰，也未能够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但是，月光/月亮更是寄托了他在复杂的游移/犹疑中更希望坚定前行的理想。

《社戏》中月亮则呈现出迷人的抒情性，如去看社戏途中的“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页122）和好心情息息相关；而在看了一场并不精彩的戏夜半返回后，“月还没有落，仿佛看戏也并不很久似的，而一离赵庄，月光又显得格外的皎洁。”（页124）不难看出，这同样暗合了孩子们心情的雀跃与涌动。作为鲁迅极其罕见的温情脉脉的对故乡赞美的小说，月在其中其实也隐喻着鲁迅的希望：能够自由自在的成长——或许在怀旧的底色中，做什么并不特别重要，真诚的介入感、充实的欢欣和飞扬而激情四射的青春才更加难能可贵，尤其是对于历经人世沧桑和世故、污浊的人而言。

（二）时间的辩证。毫无疑问，月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喻示时间。这个在其第一篇小说《怀旧》中就有所呈现。需要指出的是，月在天文/物理上成为夜晚的标志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前提，而此处所言的时间的辩证则指向更复杂的意涵。

1. 力比多之死：《补天》。耐人寻味的是，《补天》中有关月亮和太阳的一段描述竟然完全是重复的，“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边，却是一个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页269，277）这段重复的书写显然不是鲁迅江郎才尽的表征，而是蕴含了一种时间的辩证及其力比多之死。

好比在操场绕圈跑步一样，从起点回到起点并非一成不变，而更可能是潜流涌动的表面类似。月亮第一次作为时间标志的出现，对应的情境是，“伊并不理会谁是下去，和谁是上来。”（页269）在此时期，女娲的力比多充盈、精力充沛，所以哪怕是伸展浑圆的臂膀，也将天空化为“神异的肉红”，将海水化成“淡玫瑰似的光海”（页270）。无疑，此时的女娲活力无限而有些无聊，但她却是主动

的，毫不理会时间的流逝。

而第二次有关月亮的雷同描写，场景却不太相同，此时的女娲补天补到筋疲力尽，“不知道谁是下去和谁是上来。”（页276）同时，对应地，此时的女娲身体不再是肉红色，因为灰土的覆盖和过度劳累，“使伊成了灰土的颜色。”不难看出，此时的女娲相当被动，已经无暇/无力分辨时间的流逝，最后“因公殉职”。

2. 成长的比照：《铸剑》。《铸剑》中，月的多次出现可划分为三个场景。

第一个场景是眉间尺月色下逗弄老鼠。他“借着月光走向门背后，摸到钻火家伙，点上松明”（页322）。然后，他开始逗弄不幸落入水瓮中的老鼠，不断更换松明，将老鼠折磨致死，母亲出现，问询他是救它还是杀它。

“松明烧尽了；他默默地立在黑暗中，渐看见月光的皎洁。”（页323—324）他的母亲告诉他快要16岁了，要为父报仇了，“他看见他的母亲坐在灰白色的月影中，仿佛身体都在颤动”（页324）。这个场景更多呈现出眉间尺成长中的某些曲折和不成熟，而月亮则见证了其稚嫩、优柔以及内心蠢动的矛盾性。

第二个场景则出现在母亲讲述父亲和铸剑的故事后去开掘青剑，结果“窗外的星月和屋里的松明似乎都骤然失了光辉，惟有青光充塞宇内。”（页326）月光和青光相比的色泽暗淡，预示着青剑的横空出世使得眉间尺从意识上变得相对坚强。

第三个场景则是眉间尺进城想复仇受挫出到城外，遇到黑衣人，跟随他到松树林边，

“后面远处有银白的条纹，是月亮已从那边出现；前面却仅有两点磷火一般的那黑色人的眼光。”（页329）此处的月亮和黑衣人的比较，则更意味着眉间尺的成长，作为复仇之神的黑衣人在月色中成为他报仇、得偿夙愿的引路人。从思想优柔到相对坚强，再到坚定不移，月光/月亮更是在对比中喻示了眉间尺的成长历程。

3. 孤独与困窘：《孤独者》。《孤独者》

10. 具体可参拙文《认同形塑及其“陌生化”诗学——论鲁迅小说中的启蒙姿态与“自反”策略》，《福建论坛》208年第1期。

中有关月的书写整体上是属于时间范畴的，但是其内在的情境关切确实相当复杂的，它更凸现出一种内心和灵魂的孤独与困窘。

小说中第一次出现月的书写则是在“我”和魏连殳两个孤独的灵魂对完话后，“我辞别连殳出门的时候，圆月已经升在中天了，是极静的夜。”（页213）这个描写中有一种意义的张力：两个矛盾和孤独的启蒙/革命的魂灵是非常寂寞的，月既见证了他们彼此的友谊，又见证了他们在沉睡世界中的无限彷徨和孤单。

而别有意味的是，当月第二次出现的时候，恰恰是在“我”参加完魏的葬礼后，“仰看太空，浓云已经散去，挂着一轮圆月，散出冷静的光辉。”（页221）“我”又想起了魏的像一匹受伤的狼的嗥叫，“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页222）魏的死去其实更隐喻了在现实狂欢人群中无比落寞的精神的萎缩至死，他的肉身之死也因此可以使得他现实中的无奈堕落得以完结，圆月更是见证了这种失败的孤独与绝望；但同时，他的肉身之死却又让人记起了他曾经的精神追求，在物质、精神；成功、失败和现实、理想的流动与回环中复杂纠缠，文末月亮的出现却也暗含了对黑暗、困境的某种绝望反抗。¹¹

二、“月”与病的纠葛

月亮与疾病的纠葛不该单纯理解为早期巫术、传说中对月亮的崇拜，或者说某些疯癫中的“吠月”传统，比如，月亮(luna)与发狂(lunatia)之间显而易见的词源学关系。实际上，今天许多科学研究也表明月亮与人类社会行为、健康、心理等等关联密切且幽深。当然，作为一个弃医从文的小说家，鲁迅在小说中也不乏对“月”与病的纠缠的思考，¹²当然，其关系未必一如常规报道。

（一）致病的吊诡。需要指出的是，有些

疾病和月存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性，当然，更准确地说，月未必是疾病的直接起源，但和疾病的发生难脱干系。

1. 痴狂的发作与洞见：《狂人日记》。如前所述，《狂人日记》中的月光/月色可以很好的激发小说中狂人的洞见与清醒：正是在很好的月光的烛照下，他可以发现自己的曾经发昏，可以敏感的觉察周边的危险，甚至可以有勇气探究历史、现实和就近空间中吃人的事件，并反复思考得出相关文化传统吃人本质的结论。同样，而在黑暗中，月光缺席时，狂人更可以感受到危险与阴沉氛围的浓厚、暴力铁幕低垂。

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内容恰恰都是小说正文中以现代白话文描述的状态。小说开头的文言文楔子却清楚表明，他患大病，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页1）。易言之，月在此时更成为狂人痴狂发作的一个诱因、促发或者强化。正是借助这样的言语、语体、结构之间的复杂张力，鲁迅揭示了铁屋中呐喊的必要性和实践性。当然，《狂人日记》中的狂癫、狂人的文化角色等都有更深层的内涵。¹³

2. 死神的引诱：《白光》。如果说《狂人日记》中的月亮作为第三只眼辅助狂人清醒异常，那么《白光》中的月亮则呈现出另外的角色，它变成了一面魔镜。

一再落第的陈士成失魂落魄，无心寝食，而在万家灯火俱熄后，“独有月亮，却缓缓的出现在寒夜的室中。”“月亮对着陈士成注下寒冷的光波来，当初也不过像是一面新磨的铁镜罢了，而这镜却诡秘的照透了陈士成的全身，就在他身上映出铁的月亮的影。”（页104）不难看出，这里的月亮已经变成具有魔力的诱引，它对于神智不清的陈士成起到了恐怖的刺激功用：我们固然可说是陈士成自己心志不清，将追求功名的手段跨越，在无意识中将目标锁定为其应考目的——（升官）发财，

11. 具体可参汪晖著《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尤其是1920—1936年间的“自我的困境与思想的悖论”论述。

12. 相关研究在新闻报纸上不断出现，也可参看某些论文，如蔡连华《月亮与健康》，《北京物价》1998年第21期；白云德《月亮对人体的影响》，《世界科学技术》1998年第4期等。

13. 具体可参拙文《论鲁迅小说中的痴狂话语》，《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但对月光和（金银财宝）白光的混淆终于使得陈士成在混沌中有了固执的靶心。

他开始掘地挖宝，无果后，又听到新的指令，“到山里去”，而“他突然仰面向天，月亮已向西高峰这方面隐去”（页106）。不难看出，在转折和绝望关头，月亮又成为致病恶化的推手，它将陈士成彻底推向了死胡同和牛角尖，而其最后的赴死也就顺理成章/理所当然了。

月亮的本体喻意在此时不断变化，它变成了“铁的光”，和白光沆瀣一气，同时又成为新的暗示，但对陈士成来说，它却是糖衣炮弹，“软软的、正经的、阴森的，既捕又放、既擒又纵，极尽玩弄之能事。”¹⁴

（二）治病的吊诡。颇富意味的是，月不仅担当了致病的角色，同时它也可以见证乃至治病，我们不妨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辨析。

1.无月之死：《药》。在小说《药》中，鲁迅对月亮有一处提及，“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页16）这段描写从字面意思看，首先是月亮的时间功能，但除此以外，我们也会发现月亮与死亡也密切相关。

在无月之夜，华老栓辛辛苦苦换来了为小栓治病的人血馒头，尽管他视这个纸包如同新生的种子，“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甚至更进一步，“太阳也出来了；在他面前，显出一条大道，直到他家中”（页18）。即便如此，结果人尽共知，小栓仍然死了。

将无月与死挂钩并非偶然，如前所述，月往往是鲁迅所钟爱的希望的象征，也是对新生和某种现代性的说明、填充，因此，无月的《药》中，只能是死亡，哪怕太阳也已出现。类似的，我们也可进一步思考《明天》的操作。在单四嫂子漫长的明天期待中，鲁迅对月亮不着一字，反倒是对黑暗中无聊的闲人和单四嫂子的紧张心理加以仔细刻画，最后，我们知道，宝儿没有明天，单四嫂子也是。

2.有月之生：《弟兄》。无独有偶，鲁迅不仅书写了无月可以致死，而且，他也提到了有月表明可生的反面逻辑。

弟弟生病后，在西医普大夫暂时不在之时，沛君只好看同寓的中医白问山，却被诊断为红斑痧（西医的猩红热）。震惊之余，他联系上了普大夫，却被告曰忙，甚或不来。此时，他对普大夫不乏期待，“经过院落时，见皓月已经西升，邻家的一株古槐，便投影地上，森森然更来加浓了他阴郁的心地。”（页245）皓月与阴影的对比预示了沛君内心的焦虑，也可能隐喻了月与疾病的抗争。

在等待中，对面的寓客还未返回，“强烈的银白色的月光，照得纸窗发白。”（页246）这句描写既蕴含着对他心境无聊的刻画，同时也暗含着西医生存力量的强大，普大夫最终必来。普大夫最终来了，诊断为出疹子，开药处理，结果“院子里满是月色，白得如银”（页248）。月色普照，其实已经预示着其兄弟靖甫从中医那里“死”而复生。

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肥皂》。鲁迅对月亮也不乏精彩书写，四铭送了薇园和何道统离开，却没有受到家庭里任何成员的关注，很有失落感，于是踱步，“他看见一地月光，仿佛铺满了无缝的白纱，玉盘似的月亮现在白云间，看不出一点缺。”（页185）有论者认为，这是四铭面对月亮自喻的“道学家的自恋、自我神圣，自我完美的内心表现”。¹⁵但在我看来，此时圆月更当作为揭穿四铭伪善的见证人作用，因为早前和家庭人员讨论肥皂无果后，在黑暗与黄昏中，他可以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在无月的夜晚，“仿佛就要大有作为”（页171）。而圆月书写更是吻合了友人、家庭对其伪善本质的洞穿与揭露。

某种意义上说，鲁迅在“月”与病的纠葛中更加独到的彰显出了月亮的不同角色和功能，它既可以致病、杀人，又可以治病、救人。所以有论者指出，“总的来看，鲁迅笔下的月亮基本上脱离了它的传统意义，而被赋予了一种现代性：与悲观、阴暗、荒凉的精神状

14. 姚新勇《冷月下的凝视——鲁迅视觉经验心理无意识探微》，页36。

15. 刘耀辉《鲁迅小说中“月亮”意象探析》，页22。

态有关。”¹⁶当然，鲁迅小说中月的话语功能也是不断变化的，我们也可结合其他作品探讨其嬗变轨迹。

在鲁迅最欣赏的五部作品（三本小说集加上《野草》、《朝花夕拾》）中，另外涉及月的描述都来自《野草》。《秋夜》中两株枣树指向奇怪而高的天空，也“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鬼眨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¹⁷鲁迅散文中的月亮，在此处显然更是天空的帮凶，狡诈卑怯，¹⁸但又不是主谋，它因此和孤傲的枣树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关系。

《希望》中鲁迅两次提及月亮，“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卧的胡蝶，暗中的花”¹⁹等等。此时的月光，很显然是身外青春的标志之一。鲁迅对月的话语功能的更复杂解释来自于他对月的最后集中虚构——《奔月》。但是，如前所论，对月的批评和反思在此之前已有所端倪。

三、《奔月》的“月”

写于1926年底的《奔月》成为鲁迅小说书写月的尾声，个中姿态与原因无疑耐人寻味。当然，我们首先必须解决的是，《奔月》中的“月”到底指向如何？和现实的关联性何在？

（一）月的常规及隐喻。《奔月》中月当然不乏主要话语形构的相关功能：比如希望与时间等。

1.美好的抒情与希望。小说中月的首次出现则是在羿与老太太、逢蒙的遭遇过后，尽管两次遭遇令人不爽和疲惫，“幸而月亮却在天际渐渐吐出银白的清辉。”（页285）不难读出，月亮在其中有着美好的抒情性，当然，也

暗示这已是夜晚时分。而且，尽管不乏波折，但考虑到今天收获的小母鸡，可以引嫦娥高兴，于是，羿觉得，“圆的雪白的月亮照着前途，凉风吹脸，真是比大猎回来时还有趣。”此段有关月的书写，无疑可以彰显出强烈的抒情性，同时，圆月和快乐嫦娥的希望捆绑也可仔细品出。

更进一步，甚至是当他初步顺着女辛的手指去看嫦娥奔上去的月亮时，“只见那边是一轮雪白的圆月，挂在空中，其中还隐约现出楼台、树木；当他还是孩子时候祖母讲给他听的月宫中的美景，也依稀记得起来了。”（页286—287）这段描述虽然是对他暴怒前的书写，但我们仍可读出他对月亮的好感与充满希望，但同时，因了嫦娥的飞升也潜伏了祸端。

2.时间喻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月在《奔月》中不仅意味着夜晚，而且同时更是记录了羿辉煌时代的完结——他从太阳时代步入月亮时代，“羿首先不是出现在有九个太阳的时代，而只是一个无聊而空虚的时代社会里，他所面对的不再是九个太阳和凶猛的动物，而是他的虚荣的妻子嫦娥和满目的凄凉。”²⁰

同样，也因此可以理解，由射日变成射月，本身也是一种嘲讽，“曾经一举击落熊熊九日的神弓在温文尔雅的月亮面前竟然会无能为力，在飞禽走兽的世界气壮如牛的夷界在人间情网里也如此的一筹莫展！”²¹英雄末路，其实和时代的变幻、现实的堕落密切相关，而月亮本身也标志着不同的时代变更。

（二）月的流动与堕落。《奔月》中，月的话语功能也在流转，而月的内涵也是流动的。

1.月的堕落。在高诱所注的《淮南子·览冥训》记载中，嫦娥被视为“月精”，“娥，羿妻。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娥

16. 张箭飞著《鲁迅诗化小说研究》（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页114。

17. 《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页163。

18. 类似观点可参孙玉石著《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上海：上海书店，2001）和丸尾常喜作，秦弓译《《野草》解读》，《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

19. 《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页177—178。

20. 周海波《英雄的无奈与无奈的英雄——关于《奔月》与《铸剑》的重新阅读》，页35。

21. 李怡《红巾不英雄泪——《奔月》与鲁迅的精神苦闷》，页37。

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也。”²²而在《奔月》中，嫦娥奔月之后的月亮也有类似的象征，“他对着浮游在碧海里似的月亮，觉得自己的身子非常沉重。”（页287）不难看出，这时候的“月”已然堕落，至少在羿的眼中，她是自私的独自逍遙的。

愤怒的羿决定射月，然而曾经的英雄已经变成想当年了，除了“使人仿佛想见他当年射日的雄姿”外，“月亮只一抖，以为要掉下来了，——但却还是安然地悬着，发出和悦的更大的光辉，似乎毫无损伤。”英雄末路，即使他降格射月，可惜今非昔比，游戏规则已变，而月的变异超出了他的能力。

甚至他大喝一声，看了片刻，“然而月亮不理他。他前进三步，月亮便退了三步；他退三步，月亮却又照数前进了。”（页287）可以想见，羿和月的博弈以羿基本失败而告终，因为月似乎早已掌握其规律，避其锋芒，进退自如，这既可以理解为战士和无物之阵的对峙，又可理解为不合时宜的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蕴涵。此时的月亮更是一个自私狡猾又阴险多智的性格综合体——月精。

2. 月的现实性。在1927年1月11日，即将由厦门赴广州的鲁迅写信给许广平一封信，提及了他和高长虹的冲突：高的攻击鲁迅是因为一个女性，“《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鲁迅开玩笑道，“我是夜，则当然要有月亮的。”（页421）当然，这也是《奔月》写作的由来之一。

我们当然不能坐实了小说虚构与现实关怀的一一对关系，但我们也不妨反思二者之间的再现关联。其实，鲁迅的小说中并未完全实现“夜”对“月亮”的当然拥有。相反，羿

本身就是被抛弃的牺牲品，从此角度看，这反倒更寄予了鲁迅灵魂深处深深的不被理解的寂寞、被背叛的悲凉以及俗世中神圣的孤独感，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将此与现实比附。

反过来，如果将现实楔入小说，鲁迅对高长虹的戏弄不仅仅体现为通过老太太的旁述造谣、与逢蒙的直接遭遇，而且，也将他分身化在作者对“月”的形构中：月的狡猾、逍遙、灵活多变等性格其实也暗含了对高长虹的部分影射。换言之，嫦娥的背叛、狡诈与逢蒙的特征有其巨大交集，所以，有关“月”的现实性内涵其实说明这里的“月”更是多元角色的混杂——嫦娥、逢蒙、高长虹等等。或许，不无关联的是，当鲁迅和许广平真正结合后，鲁迅对月的小说形构也就就此戛然而止。

需要指出的是，单纯从现实性思考是有其偏颇的，小说虚构毕竟不能等同于现实对应，另外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的再现和原初含义，超越历史与现实层面的更高哲学追求都是应该众声喧哗的意义关注点²³，而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结论：有关鲁迅小说中月的话语形构其实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论题，因为话语形构不是简单的意象归纳与分析，而是有其独特的话语功能的。鲁迅小说中的月，既可以体现出时间的辩证、希望的现代性，又可以呈现出“月”与病的纠葛的悖论。当然，当我们聚焦《奔月》时，其中的月，既有常规性，又有其流动性、堕落性和现实性，从此意义上说，它类似月神的三位一体：常规的月、堕落的月、现实的月。当然，有关月的话语形构只是一个样板，有关其它事物的话语形构则或许可藉此展开。

22. 《诸子集成》（七）（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初版，1986重印），页98。

23. 具体可参拙著《张力的狂欢——论鲁迅及其来者之故事新编小说中的主体介入》（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中编。

抒情美典的濠濮之思

——浅论高友工教授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石

中国 杨旭辉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这则出典于《庄子·至乐篇》中的经典寓言，就被美籍华裔学者普林斯顿大学高友工教授用以阐述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知”与“言”的关系，详见高友工《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试论“知”与“言”》¹。在这则寓言中，庄周和惠施都相信“经验之知”的存在，惠子明白“分析之知”不能够了解“经验之知”，因此认为经验之知没有传达的可能性；而庄子则通过“自我此刻与现象世界的感应”或是“现象世界中自有的感应”，在濠上享受“知鱼之乐”之乐。

这样类似的命题，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实属频见。文学作为人生现时、主观经验之外现，往往是不落言诠的，试以一例言之。纳兰词之“抗情尘表，则视若浮云；抚操闺中，则志存流水。”²“流水”之操之中所蕴的情韵和主观“心象”，其中“尤多慨心者”，对于自己而言，正乃“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纳兰性德《饮水词序》）然“歌与哭总不能自言，而旁观者更莫解其何故”，（顾贞观《祭纳兰容若文》）“此殆有难为不知者言者”。³对于这种“心象”的表达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经过裁剪、调整之后的一种创作。要对此作差近实相的研究和批评，若完全依靠西方知识论的“分析语言”，通过命题而外向追求所谓“真理”或“真知”，其结果也只能如惠子之所

遇。高友工则以海德格尔（Heidegger）试图通过分析方法辨其“经验之知”的困惑，进而暴露出近代分析哲学基础的脆弱和致命症结。他在对西方知识论反思之后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分析语言而得来的“现实之知”虽在现代学术传统中被视为“知识”的主干，但它比和中国传统对“知”的解释相比更显偏颇。⁴中国的哲学思想，非但未以此为最高“价值”，其核心问题是要超越此现实层次，进入一个以“想象”为主的“经验世界”。

高友工教授在勾画其“美学理论”蓝图时，针对中国古典文学这一独特的研究对象，对西方理论反思之后，或加以改造，或者灵活运用，尽量使其贴近具体对象的特点。“一方面是接受了这分析传统的语言和方法，但另一方面却能兼容中西文化中的美学范畴与价值。”⁵因而，在他一系列的论文和论著中，对中国哲学与文学传统的辨认，以及关于“经验世界”、“心象”等基本概念的理解，也就构成了他进行比较研究时较为含蓄的、几乎未被察觉的出发点，也自然成了“美典”的理论基石。

与现实之知在结构上极端相反，“经验世界”若着眼于真伪，则不免落入惠子的名辩层次。不同于现实之知的外向指向，它完全是一种内向指向，说白了就是人内心的意境，“‘经验’孤立地看是个人在某时某地的一种‘心理状态’，或简称为‘心象’（mental state）”“是整个人和环境接触而生的‘感

应’。”⁶ 艺术就是通过“观赏”、“反省”之结合而形成的现实之外创造出的想象界之“代表现实”与“象征心象”的两种倾向，这两种倾向中包含着两个字汇“自我”和“现在”，也正是这两个字汇成为了主观时空轴上的两个永恒不变的定点。“在这主观、即时的想象界中综合万象的是一种‘同一关系’。

‘同一关系’可以是自我此刻与现象世界的感应，亦可以是现象世界自有的感应。……前者是‘我’因‘境’生‘感’，有‘感’生‘情’，终于‘情境’可以交融无间。这是一种自我因‘延续’(extension)而导致的‘同一’，创造一个无间隔距离的‘绵延’(continuity)世界。后者是‘我’以‘心’体‘物’，以‘物’喻‘我’，因此‘物我’的界限泯灭。这是一种自我因‘转位’(transposition)而形成的‘同一’，由于物物‘相等’(equivalence)，因而有一个心游无碍的世界。”⁷ 所谓“心游无碍”，也即是陆机《文赋》中所说：“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理想境界，有了这样活跃而又自由的“神思”之力（刘勰《文心雕龙》中一个关键性的术语，高友工曾在《中国抒情美学》中借此展开论述），作家或诗人的“即时”、“主观感应”也就与物之融合为一，这正是中国文学中所强调的“境界”，而高友工借用结构学派文学理论家柯勒（Jonathan Culler）的一个术语“inscape”（并译成“内境”），以强调美感经验深潜内化的意义和价值。

创造性体验是抒情美学关注的首要问题。作为内在的、同一的精神状态，它必须建立在有意义的形式的直觉和反思的基础之上，且要通过文艺的审美形式（包括用表现性语言媒介建构的审美形式）表现出来。正如前文所述，创造性体验包括将“物”纳入自我意识的内化过程和将内化了的精神符号化或象征化这两个层面，所以，创造想象界和经验世界，不得不注重语言转向感性之心象，而作为文学的研究，也应该具有这样的能力。在《中国抒情美学》中，高友工以历史的经线对音乐、书法、绘画等中国艺术诸门类作了系统的总结和归纳，寻绎出“抒情传统”在华夏文化中的地位和发展

脉络，将中国传统归结为抒情美典所携带的特征，即通过内化与象意的方法来保存抒情性的经验。

向心性的“内省”式“观照”和体验既已构成了中国文学和文化表达的主要因素，那么，无论是创造，还是研究创造性想象界，不得不注重语言等手段转向感性之心象的过程。高友工认为：“唐宋以来文人诗画的创作过程常被视为一个美感经验的起点”，而技巧问题已不再干扰他们的创作，“这活动自可溶入一个经验内省的过程中。……于是这类创造追求的理想是自然，是神思”，“创造的目的不是在艺术，而是在其经验本身”，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就能“反映了生命活动的真谛。”⁸ 文学美感经验的境界作为这样一种“内境”，高友工引柯勒的话说：“在意义彻悟的瞬间，形式呈现为整体，表层表现了深层”，所以这一“内省、观照”而形成的是一个整体的感觉。中国词论中有所谓“七宝楼台，拆下便不成片段”之说，文学美感经验通过语言、形式等的外向寻求，最终还归到由无数感性观念之组合与叠复的整体中。那么，包括结构主义在内的各种“新批评”，若是将中国古典文学的这座“七宝楼台”，以分析之知的方法进行拆分、解析之后，往往不成片段，只能是更为烦琐，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成了作茧自缚了。这样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自然也就不能臻于“第一义谛”了，因为佛家《大乘入楞伽经·集一切佛法品》有云：“第一义者是圣乐处因言而入，非即是言。第一义者是圣智内自证境，非言语分别智慧。言语分别不能显示。”曾与高友工合作，尝试新批评研究中国古典诗词的梅祖麟教授也认为“新的批评法不见得比旧的印象式批评好”⁹ 高友工在《理论基础》一文中说：

“在这里，我并不是在提倡恢复中国的传统的批评方法”，而紧随其后的一句又说道：“我承认今天谈文学批评已经必须接受这种分析的方法和态度”，“应该细读古人的印象批评，想办法了解古人只言片语背后的动机与真正的涵义”。中国传统的直觉式、印象式批评和研究，诸如设譬、形象、评点等，就是纯然以一种即时性的感性观念来把握文学作品中（尤其

是诗、词)经由创造者内化、象意后的人生经验、价值,即内向美典。高友工对传统艺术精神的发扬是与徐复观有着一定的渊源的,这他曾有过明言,而他确实也力避了徐复观所讲的那种弊病:“尤其是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偶而着手到自己的文化时,常不敢堂堂正正地面对自己所处理的对象,深入进自己所处理的对象;而总是想先在西方文化的屋檐下,找一容身之地。但对西方文化的动态,又常陷于过分的消息不灵。”¹⁰

在全球化浪潮中,海外汉学研究中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文化、艺术、历史乃至宗教的他者化,其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不顾研究对象(如:中国古典文学)的异质和精彩,而将其弃置一旁。高友工先生在海外汉学研究中,以其卓特的理论勇气,兼容会通西方新批评和中国传统的美学范畴和价值,着力建构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论——“抒情美典”。通过对“言”与“志”关系,“知性”与“感性”等诸多关系的全面性阐述,我们不仅看清了“言”在“抒情言志”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志”这类的“经验之知”如何呈现其内在价值而为人所分享。中国传统文学中“言不尽意”的命题,庄子所说的“得意忘言”等也都在美感经验和抒情美典中得以完满的解¹¹。正所谓“濠濮会心岂在远,便可泛宅仍浮家。”¹¹

注释

1. 高友工《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试论“知”与“言”》,高友工《中国美典与文学研究论集》,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1页—第20页。
2. 叶舒崇《皇清纳腊室卢氏墓志铭》,纳兰性德《通志堂集》附。
3. 姜宸英《跋〈同书集〉后》,《慈溪姜先生全集》卷十八。
4. 详高友工《文学研究的美学问题(上):美感经验的定义与结构》,高友工《中国美典与文学研究论集》,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21页。
5. 同注4。
6. 同注1,第10页。
7. 同注1,第14—15页。
8. 详高友工《文学研究的美学问题(下):经验材料的意义与解释》,高友工《中国美典与文学研究论集》,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48页。
9. 转引自杨文雄《诗佛王维研究·绪论》,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10.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自叙》。
11. 王士禛《通州水月庵三用清虚堂韵》,《渔洋山人精华录》卷三。

本文作者是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



以卫风《氓》为例浅评《诗经》

印尼 郑享中

诗经卫风《氓》是一首早期的叙事诗，开启了叙事诗的先河，同时也是古代以婚姻爱情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的优秀篇章，无论在是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这是一首被喜新厌旧的丈夫无端抛弃的女子的自伤之诗，全诗通过回忆倒叙法，叙述了女主人公婚姻悲剧的全过程，运用赋，比，兴三种艺术手法，成功塑造一个忠于爱情，吃苦耐劳，性格刚强的古代妇女形象，在叙述过程中，有时插入女主人公的议论与抒情，因而成为一首抒情色彩很浓的叙事诗。下面就用历代诗评家的观点和当代的看法对这首古诗作一个浅评。

一、卫风—《氓》

卫风就是春秋时卫国的民歌，卫国位于今天河南北部到河北中部地区，风在诗经中共有160篇，分为15国风，大都是春秋初期至中期的诗，一小部份是西周后期的，总的地区包括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北部地区，分属15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些作者是劳动人民，有些则是贵族，这些作品多姿多彩，主要内容有：劳动者之歌，行役之怨，情诗恋歌，妇女婚姻，国家兴亡，民俗风习，讽刺民谣，没落哀歌等类。

《氓》是一首叙事诗，叙述妇女婚姻的不幸，内容是一个被遗弃的妇女自诉从恋爱，结婚到被遗弃的过程，泣诉了她错误的爱情，不幸的婚姻，她的悔，她的恨和她的绝决。她与丈夫原来由恋爱而结婚，过了多年的劳苦，勤劳的日子，而她年老色衰，竟被丈夫无情遗弃。全诗六章，每章十句，一章写订婚，二章写结婚，三章追悔陷入情网，四五章写丈夫负

心，遭受遗弃，六章写对负心人的怨愤，表示从此决绝。这首诗也典型反映了旧社会妇女在婚后被任意遗弃的悲苦命运。

本诗是四言体，四言句式音节和谐，多用双声叠韵词，优美动人，虽有少部份杂言，但节奏明快。其中一些句子今天改成成语，如“载笑载言”，今天的“载歌载舞”由它改变而来，“信誓旦旦”这句成语也因诗中的氓违背了誓言，今天被当作贬意词使用。

二、赋，比，兴，的应用

诗的开始就用赋的形式直接拉开序幕，第一章那个年青人笑嘻嘻来找女主人公约会，他两人原是情侣关系，一起渡过淇水，到顿丘的地方去旅游，两人订下婚约，男方请媒人说亲，秋天以后结婚。第二章也是用直赋的方式描写婚前的等待与爱情们欢乐，一切都顺利和完美。第三章则是兴与比共同使用来说明女主人公太沉迷于爱情，何况身为女人，在爱情方面吃亏就大了，“桑之未落，其叶沃若”的起兴句来说女主人公年青貌美，男女感情浓厚。但这不是美满生活的保证，为什么呢？因为“于嗟鸠兮，无食桑葚”来比喻男女的爱情，女人太沉迷爱情是会吃亏的，“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优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转而用赋方式直接说出男女在爱情方面的差别，男人沉迷爱情就没有问题，而女人不可以。第四，五章是兴和赋一起应用，“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的起兴，女主人公因操劳家务，缺少打扮自己变成了黄脸婆，男子对她情意也衰。男人便“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以后以直赋方式叙述她受到不公平待遇，只好“静言思之，躬自悼矣”第六章是结

东部份，女主人公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来比喻她的灾难无穷无尽头，再用赋的方式回忆小时的快乐时光和那个男人在恋爱时的“信誓旦旦”她还是无奈的接受事实“亦已焉哉”。诗从开始用赋转入兴和比交替使用，由于使用适当，达到很完美的艺术效果。

三、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思无邪”是孔子给《诗经》的评价，“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孔子给《关雎》的评语。《氓》这首卫风是否也达到这一标准呢？《氓》的第一章写恋爱到结婚，开始女主人公和情人到屯丘旅游，这一段重点在于女方认为“子无良媒”叫他请媒人来说合，并不多写她两人的情感纠缠和甜言蜜语，在结婚前的日子里，女主人公虽沉醉在爱情中，也没有含色情的描写，而是写出了“乘彼危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的美丽语言。以后女主人公被弃，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很悲哀的，但女主人公除了抒发自己的怨恨之外，并没有一闹二骂三上吊的情景出现，而是很理智的为自己辩护。“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至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而最后是用“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来结束这段不美满的婚姻。女主人公虽然哀但并不影响她的生活，一切从新再开始。所以此诗可说达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效果。《氓》在思想上是不是达到“思无邪”？照语言文字上来看是一篇端庄文雅的诗文，但其内容就各从各的角度来分析了。若从封建思想角度来分析，此诗真是“思有邪”因它对男人体妻作一个合理的解读，对妻子有成见的丈夫可“莫须有”的罪名休弃妻子，而不受社会谴责。朱熹，理学大师在他的《诗集传》说：“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道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朱熹从诗中的哪些句中读出女主人公是一个淫妇呢？原因是女主人公是自由恋爱，而且与情人出外旅游，而在等候婚期间的丰富感情被朱子认为是淫妇。在今天的立场来看，看法完全相反，女主人公是一个勤劳的女人，她在诗中并无对她的行为悔恨，而是她受到不公待遇而发出怨恨之言。是合情合理，所

以说是“有邪”。 “诗无邪”是孔子对诗三百的概括，孔子删诗，取其无邪者而已。一说是能使读者受感化，使人无邪。另一说是作诗者无邪，这种看法肯定不对，《氓》的作者不详，很可能是个女性，她从女性的立场来表示反对男人对女人的不公，也可能是同情女性的男性所作，不论作者是男还是女，肯定都有同共目的，那就是以诗言情，利用女主人公的自述，控诉社会的不公。

四、发乎情，止乎礼、怨

《毛诗序》说“故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氓》这首诗就是收集在毛诗里，其内容正符合“发乎情，止乎礼”诗中的第一章写爱情和恋情，由情转向礼“子无良媒，秋以为期”第二章写女子对男子的情意，一日不见如三秋，最后还是礼“以尔车来，以我贿迁”第三章的起兴和比喻也受礼的约束，含糊说说而已，第四五章女主人公的抒发怨恨也只是叙述普通的家务事和道出丈夫的变心，“士也罔极，二三其德”最后一段自己认输，“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这都是受到礼的约束，止乎礼。“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止乎礼”是先王之泽吗？非也，是礼义干涉了诗歌的自由和独立性，因为采诗和编诗，选诗都是当时的统治者，士大夫之流，民间诗歌如果违背了礼，早被他们删掉了，那有留传到今天给我们欣赏呢？所以在诗经里只能“发乎情”，但不能发展情，情发展到一个程度，就应“止于礼”。用礼来规范诗。

“怨”，“诗言志”和“诗缘情”，心中有不满，气愤和怨恨，都可以经诗发泄出来，《氓》就是女主人公发泄内心不平的诗，它不言志，只言情，抒发心中愤怒的怨情，抒写不满情绪，批评不良的社会现况，引发同情者的情感共鸣。

五、《氓》的今解

《氓》的时代离我们太遥远了，二千五百年以上，但它的故事就好象穿越了时空发生在我们的眼前一样，它的故事内容在今日生活中随处可见，尤其是印尼社会，离婚，弃妻，外

遇，第三者，包二奶司空见惯。但很可惜，此诗不完整，它应该有一个完整的故事，被删改后存下一段女主人公的自述，作者是以当事人自述其事，或是其他文人代述，这都是一面之词，可信度不高，而对方也可以反驳，谁是谁非，没完没了。作者应以第三者的角度来描写他们之间的男女关系，使读者不生误解，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一样，人物形象分明，是非清楚。

但此诗真实的反映出西周末年的社会形态，尤其在爱情和婚姻方面，当时的男女恋爱和今天根本上没有两样。《氓》女主人公是自由恋爱，诗的开始她的男友就借买卖丝来与她约会，两人相约渡淇水出游，女主人公也能决定自己的终身，只是多请个媒人吧了，这种自由的婚姻在今天也不过如此，现今一些女孩的家长还时常阻止女孩跟男朋友出门约会，女主人公实在太幸福了。但很可惜，女主人公还是选错了人，结果她被爱人抛弃了。

由爱到结婚，从两小无猜，青梅竹马，而且还“信誓旦旦”，感情有相当的基础，为什么短短的三年时间就反过来变心呢？原因是是不是女主人公所说的“三岁食贫，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至其笑矣”吗。结婚后“三岁”本来是虚数，可能不止三年，但重复用了二次，那应该是实数，结婚三年，可能连孩子也未生下，又是三年的贫苦生活，在那个须要劳力的时代，丈夫是十分须要她的，为何又要向她施暴力呢。比兴上说“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也是与事实有不符的，年轻女人结婚三年，该是更成熟的美，加上家里穷，丈夫更没能力在外再找女人。照以上推测，丈夫休妻就有另外原因了，女主人公只道出小部份不合逻辑的理由。其离婚原因或是：夫妻性生活不和谐，女主人公虽劳，但不会理财，或性情暴躁与家人不和，吵闹，给大夫戴绿帽子都能造成家庭破裂，但由于《诗经》受到礼的约束，无法写进诗中，我们只好猜想了。

最后女主人公就做对了，下了决心和丈夫决绝，“反是不思，亦已焉哉”长痛不始短痛，从头再来，当今社会也是如此，该离的应

该离，对男女双方都有好处，“穷则变，变则通”。这是《易经》上的人生处世哲理，不会错的。

结束语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代表作，在那战乱时代，礼乐崩坏，为了保持社会的安宁，百姓生活有保障，孔子主张恢复周礼，礼就是当时的法律，用来约束君王，也用来统治人民。孔子删诗，用礼规范诗的内容，是一大成就，使《诗经》在封建社会传承上成为经典，是中国的文化瑰宝。而《氓》也创了叙事诗的先河，给以后的叙事诗打下基础，经过时代的向前发展和文人参与诗歌的创作，一首有完整故事内容，人物形象分明，而且主题思想明确的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终于在汉代产生了。但《氓》诗在思想和教化上有缺陷，它只给读者文学艺术欣赏吧了，内容上达不到孔子的要求“思无邪”。诗中的怨情也只有同病相怜者有同感而已，她这种悲情在社会上太普通了。

参考资料

- 1.《中国文学批评史》，教学讲义，林英德编辑。
- 2.《中国古代文论》，李壮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 3.《十三经讲座》，夏传才著，广西师范出版社出版。
- 4.《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简编》。郁贤皓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附录：《氓》全诗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吁嗟鸠兮，无食桑葚。吁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至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日军政权下的新马华侨华人教育

菊池一隆著 施爱军译

蒋介石的重庆国民政府及汪精卫傀儡政权都极为重视华侨教育。这是在鼓舞民族意识的同时,也为了扩大并巩固自己的阵营。此外,华侨华人(以下,原则上统一为华侨)认为,教育可提高自己在居住国的地位,也可强化与祖国中国之间的纽带。对此,日本在国内,殖民地台湾,朝鲜及南洋为确立支配权,安定统治,也重视华侨教育,进行了强制管理。于是,华侨教育成为华侨行政的重要一环,也成为一个核心问题。尤其在考察抗战时期的华侨史时,绝不可忽略华侨学校及华侨教育问题。并且还应留意新马与殖民地台湾朝鲜不同,实际上是在日军政权下这一事实。因此,对马来亚“昭南岛”华侨学校的再编可说是暴力强求,当初就埋下了“大检证事件”中杀害英语教师等众多矛盾。

一、日军的方针

华侨学校在英国殖民地时期具有相对的自由,但在日军政权下基本消失了。马来亚“昭南”(新加坡)地域前期的实权最高负责人为第25军军政部长,武断军政派的渡边渡。渡边接受了内阁参议,本愿寺前法王大谷光瑞的“应将日语作为必修课”的助言。渡边废除了作为文教,读成指针的西洋式教程,强行推进以“八弘一字”为基准的日本精神的涵养及作为“共通语”的日语普及(注1)。在日军占领后,他全力抹除英式教育。不得不使人怀疑,对于华侨学校,马来学校,印度学校的各种民族语言课,其具有“决不可忘,唯有民族语言教育可发现民族文化,民族历史并弘扬民族意识”的危机感(注2)。基于此论,可旁证其单纯地认为,如能普及日语教育,便可抑制各种民族意识,并可

“日本化”。

为推进华侨教育,在日本军政监部内设置了文教科。其职务为 1、教育。 2、日语。 3、宗教。 4、其他文化设施,文化事业。据文教科称,英国殖民地时期,国民政府以三民主义为基本,设定了培养民族主义的教育目标。教员也以服从者为条件,接受领事及本国派遣官吏监督。由于大部分教师在中国本土接受教育,文教科想像其具有抗日色彩(注3)而加以警戒。

学校教育再编是在何等方针政策下强制进行的呢?从文教科原案“秘,学校教育整备刷新纲要(案)”开始论讨。

第一,基本方针:基于“马来亚现地人将来成为天皇的国民,故学校教育应以皇道教育为核心”,为此在各教育阶段实施日语教育及精神教育,培育规律,协同,随顺的生活态度,强制“绝对信仰日本”。

第二,学制整备纲要(一)普通公立学校缩短履修年限,并更新教育内容。(1)履修年限为5年,6岁以上,13岁以下。(2)教育内容(甲)公民科为修身,日语,历史,地理。(乙)理科为算术,理科。(丙)体育为体操,教练,作业。(丁)美术为音乐,图画,手工(女生为裁缝,手艺,家务)。(3)教师用语为日语。但现地教员在熟练掌握日语之前,作为辅助语言允许其使用方言。

(二)中学,女子中学。(1)履修年限为4年,普通公立学校毕业生及具有同等学历以上者。(2)学科为(甲)公民科为修身,日语,方言(马来语,中国语,印度语中择一)。(乙)理科。(丙)体育。(丁)美术延用普通公立学校之规。(丑)实业科为农业,工业,水产,商业。作为州(市)立学校免收学费。

(三)技术学校属军政部直属州(市)立。(1)甲种(履修年限3年)对乙种技校毕业生及具同等学历者传授高等专门知识及技能。开设科目为行驶作战,军政时必要之物。(2)乙种(1年)对普通公立学校毕业生及具同等学历者,在时局下传授最重要的专门技术,基础知识,技能。

(四)师范学校为州(市)立,干部教员为日本教官。女生部另设为女子师范学校。(1)本科(2年制)培育普通公立学校教员,从中学,女子中学选拔合格者。科目为公民科(修身,日语,地理,历史),教育学科(教育学,心理学,教授法),理科(数学,理科),体育科(体操,教练,武道,卫生学,作业),艺能科(音乐,图画,工作,书法,女子为裁缝,手工,家务),实业科(农业)。(2)炼成科(1年以内)对普通公立学校教员实施短期再教育,重视日语和精神训练。

(五)马来高级师范学校(1)本科(2年制)培育中学,女子中学,技校教员。从师范学校毕业生及具同等学历以上者中选拔。(2)干部训练科(1年制)对现任校长,视学,视学辅,将来有望就要职者实行教育训练。定员,教科受军政监督,由校长规定。

此外还有马来医科大学。(1)预科(4年制)对普通公立学校毕业生及具同等以上学历者实行上本科所必要的预备教育。(2)本科(3年制),除预科毕业生以外,如有可能,中学毕业生也可入学。学科,定员受军政监督的认可,由校长制定(注4)。由此可探知,其以“日化”为核心,依学历创造出重构造,企图强化管理,并试图培育专门医生等专门人材。于是,“皇民化”被推进,以日语教育,精神教育来谋求对日本的服从。对于现地教员实行思想检讨,还对一部分教师进行了“整理”。有些州还迫使发誓“忠诚”。特别是华人学校中助长排日运动的势力不少,今后也需注意。各州等待日本文教人员的充实,但至少需要科长,视学各一人(注5),以安排日本人来谋求强化对教师的思想调查和学校管理。

43年5月以后,军政监部的教育政策中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对于渡边在公文书中打出的“禁止使用英语”,昭南特别市市长大达茂雄强烈反对,由此立遭撤回,陆军省内部对此牵强作法的批判也不断升级。结果,受陆军中央之

命被掉换到东京(注6)。

但战后,吴体仁在《枷锁统治与奴化教育》(新加坡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编《大战与南侨—马来亚之部—》1947年所收)中总括了日本军政下的教育,严厉批判了各级水平的学校实态。例如,(1)普通公立学校原称华文学校,是因其应华侨协会之求而设立的,经费由学校理事负责准备。最初比较自由,但很快被日军强行改编为普通公立学校。对此深感不满的教师提出辞职,但未被批准。中国语被减为一周两节(一节40分钟),各学级基本用日语讲课,还强制宫城遥拜,年号也用“昭和”与“皇纪”。(2)实业学校—甲种实业学校为4年制,乙种为1年制,普通公立学校毕业生可入学。虽教授农工技术但水平极低。(3)在上级师范学校—军政监部直辖下,本科2年制培育师范学校,中学各教员或行政人员。干部训练科为6各月或1年,普通公立学校教员听课。但是,学科数极少,供餐恶劣,极似“苦行”。特别成为问题是,华侨,马来人,印度人共同学习,却对马来人挑拨说“马来亚是马来人的马来亚,为何华人如此之多”(注7),其用意是煽动民族矛盾。

二、日军的初等教育再编

在此,以初等教育为焦点,具体研讨日军的华侨学校再编的实态。昭南市市立华侨学校首先接受改组,整理后,1942年7月1日正式开学。属数校合并为一。如此,华侨学校被合并,整理成易受日本统治,且减少。尤其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联结发挥了效果。此状况被报导,向各界摆明了华侨学校的进展,以此引出有利的支援(注8)。即将家庭卷入再编,且诱发各华侨学校的竞争心,以此顺应日本的意图来一举功成。还可见,当初,有力的华侨成为再编的主干。

华侨学校在占领前,有1522所,但减少为185所(12.2%),教师从5364人减少至889人(16.6%),适龄学童数从13万7328人骤减至2万4087人(17.5%)。对此,马来学校未增大,但学校从1219所减至930所(76.3%),教师数从4888人减至3654人(74.8%),学童数从14万5266人减至9万4881人(63.3%)。印度学校从912所减至434所(47.6%),教师数从1129人减至773人

(68.5%)，学童数从3万5221人减至2万3331人(66.2%)。观望地域，例如，昭南特别市在占领前，曾有369所学校，至42年8月剩21所(5.7%)，柔佛州从254所骤减至12所(4.7%)(注9)。可以说，各民族学校都在减少，华侨学校更甚。那么，为何只华侨学校骤减呢？这可左证，日军当局深恐华侨学校潜在的对日抵抗力，并进行敌视，视其为军政的障碍。

但具军政监部调查部的长屋有二称，受占领后压制华侨政策的影响，即使有再编可能的华侨学校也有受压制的倾向。根据当局的方针，42年4月首先制定出“有关小学校再开之件”，与日语并行使用马来语和印度语的学校被认可，使用中国语的学校不被认可，显示出只废除中国语的方针。10月下达了“有关教育的指示”，将日语和马来语定为初等教育机关用语。中国语作为辅助用语使用的学校被认可，华侨学校又有了再开的可能，但不得已之时允许使用印度语，英语，荷兰语，中国语在使用一段时间后，逐渐不再被认可。即并不是被全面认可。如此，显示出只将日语和马来语作为上课用语的方针。但与马来语学校，印度语学校，日语学校(旧英语学校过渡使用英语而遭再编，可说英语学校主要被改编成日语学校)相比，华侨学校的再编率最低。但具长屋有二称，这并不单是压制华侨政策，在占领前，即使只有10名学生，只要有一个班就可承认为“学校”。例如，在商店街2层聚集10多名儿童学习的私塾也称学校。将这些进行整理，便呈减少局面。43年7月发表的“有关初等学校名称及教科项目之件”中，未明确规定上课用语为何种语言，但马来语，印度语，中国语一周中可在上课中使用3小时以内，这表示将马来语与印度语，中国语放在了同等地位(注10)。由此可知，日本军政下的教育政策，对中国语的使用反复变换，并未做出一贯的方针。

各地的状况又如何呢？霹雳州政厅“机密，霹雳州概况”(43年5月)称，各民族初等学校的再开率为马来学校90.7%，印度学校76.9%，华侨学校11%。有关将来华侨学校的再开，认为“应加以慎重考虑，要无遗漏的对华侨进行指导”。另外，霹雳州川村长官表明忧虑称“华侨小学至今尚未开校的很多，因此绝大多数有

差别感，即使无直接表不满者，将来也会抱不安，还会影响到治安”(注11)。其在地方长官会议中陈述道，(1)对于华侨学校，特别应强化日本人教官的指导监督(2)不要让华侨对多民族抱有差别感，应分段进行(注12)。可见，华侨华侨极具差别感，潜伏着很深的不满。

三、科目及教科书等诸问题

什么科目受到重视了呢？让我们从各科目的时间分配及其倾向与特征来看。例如，“吉礁州”文教科承认30所州立国民学校(与普通公立学校同水平)的设立，以下为华侨学校各周“标准课程”的时间分配。1—5年级最重视日语，各年级皆为6小时。还应注意的是，中国语，马来语各为3小时，两语同等，中国语并未被消减。算术也被重视，1,2年级为6小时，3年级为4小时，4,5年级为3小时，逐步减少。减少的部分4,5年级各上2小时珠算，以补充算术。修身课1年级2小时，3年级1小时，时间意外少，但以“常识”(伦理，一般科学)来补充。从3年级开始的“史地”(历史地理)为“昭南岛”史地，可想而知，此举以日本打破英国的侵略这一构图，可有效隐蔽日本侵略问题，灌输“大东亚共荣圈”思想。

虽没收了英殖民地时代的教科书，但日本人编纂的教科书极少，没有准时接壤。原则上使用日本教育部所定“南方诸地域用日语教科书”为日语教科书，图书，但未能实现。一时，军政监部发配的初步只有2种5册而已，仅为使用假名的日常会话。此种教科书也未得到充分供给，各州都有教科书不足的烦恼。的确，1943年1月14日发布了“教科书使用方针指示”，但军政监部免费发配的教科书因供纸不足，补充困难而成为借贷形式，不得不打出学习终了后还给学校，下年度再度使用的方针。不得已而使用以前的教科书，但思想对策上需检讨，

“要严厉监督”。这之间，“昭南”特别市，槟榔屿，雪兰峨编纂了各自的教科书。教科书未统一。对此，43年7月军政监部发出通牒，原则使用军政监部编纂发行之物，但作为补充使用州市编纂之物时，应事前得到军政监的承认(注13)。军政监部以“承认”的形式，维持自己的权限，焦头烂额地维持自己地底盘。

在学校也发生了问题。长屋有二称，(1)惹起教师间的民族对立，阻害“统帅”校长的一致协力。例如，众多中国人教师中的马来人教师被完全孤立，众多马来人教师中的中国人教师也有同样窘状。(2)与异民族的共学，异民族教师的教育，对此，某些父兄深感不快。特别是马来人父兄中，有宗教意义上的对中国人教师教育子女具有反感。另外，中国人对马来人也持轻蔑感。所以他进言道，虽因“民族融和大理想”而产生不满，但与其激化民族间的对立，不如刺激民族间的对抗意识更有利于日本的教育施策。长屋有二认为，于学校组织上，如认可民族分立，将“大东亚共通语”日语作为授课用语的同时，承认其各自的马来语，印度语，中国语成为自然的措施。为此，在尊重马来亚地区各民族的牺牲以上，不可能否认其固有语言(注14)。有屋所说的肯定日本国策，组织中所称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共通语的日语具有极大限界，“认可各民族语言”这一主张锐利地揭示了其本质。

44年3月，具军政监部所制“机密，初等教育刷新强化方案”称，方针为“对学童重点实施民族熏化，通过初等教育渗透军政，并唤起对皇军的感谢信仰之心，确立军民一体化的基础”。此外，还对校长，视学，视学辅等马来教育界的干部彻底实施“皇道精神”。对华侨的文教施策方针，要领为(1)禁止私学，学校不教中国语，强化日语教育。(2)承认华侨私塾作为对一般人进行日语教育的设施续存。(3)对现役私塾日语教师进行思想，人品考核，并在考核日语能力后发凭证。(4)即使在主要收华侨子弟的普通公立学校，中国语也不作为一门课。周3小时以内可教授中国语的项目也被消除。但作为日语教授的辅助语，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无任何问题。(注15)44年3月左右，作为辅助语，虽附带“但是”一词，日军却不得不承认使用中国语。华侨如积聚不满，治安会恶化，为了政治安定，必须获得华侨的强大力量。日本抱有这样的不安。另外，对私塾教师也进行思想，人品调查。换言之，与其说日军在实行软硬兼施，不如说裸露了日本军政的矛盾，可见其并未打出确定的方针。这种动摇显示了军事的弱体化。

44年2月左右的初等学校，师范学校的各民

族教师，学生数的统计。调查对象为“昭南”，马六甲及柔佛，森美兰，彭亨，雪兰峨，槟榔屿，霹雳各州的官立，私立1715所学校。这是一场极大的规模的调查。其内容为：以马来人为主的学校721所(42%)，以中国人(华侨)为主的学校203所(11.8%)，以印度人为主的学校482所(28.1%)，人种混合学校308所(18%)，及国民学校1所。初等学校教师共6108人，日本人8人，马来人3350人，中国人1492人(24.4%)，印度人1062人。学生共16万5285人，日本人132人，马来人9万4113人，中国人3万7951人(23%)，印度人2万5940人。师范学校教师共57人，其中日本人34人(59.6%)，占绝大多数，掌握学校的行政与管理权。马来人9名，中国人印度人各6名。学生共417人，无日本人，马来人314人，中国人129人(30.9%)，印度人50人(注16)。还应着眼人种混合学校，其与其他学校不同，日本人3名，马来人中国人印度人教师间，学生间的对立也可推测。

44年5月长屋有二重点调查了昭南华侨私立学校11所的禁止华侨私学，禁止中国语授课的影响。11所都是理事制的同乡团体经营，理事都具实业关系。籍贯分别为：福建4所，广东3所，潮州客家各2所。学级总数94，教师总数88人，学生总数3666人，一名教师教41.6名学生(公立学校13所中，一名教师教32.6名学生)。教育状况与公立学校用同种课程表，每周课节数(一节30分。一节30分或40分未被统一，可推測为，可能根据时期有所变化)为1、2年级49节，3年级以上49节。其中日语1、2年级13节，3年级以上14节，中国语为4节，3年级以上7节。上课用中国语，华侨学校的气氛浓厚。教育环境略劣于私立学校。日语教育不论时间而论成绩。(1)最大原因为教师的日语能力低下。为此，周3次下课后，教师学习日语，但努力学习者极少，并缺乏积极性。(2)日语教科书供给不足。(3)日本人教育要员极少视察授课。(4)作为授课用语全科目基本使用中国语，相当一段时间内未能禁止。教师的理由为“北京话为中国统一用语”，有关禁止中国语授课问题，应从包含印度语在内的南方语言政策论述，且作为华侨政策的重要一环相互关联地进行论述，提出“要慎重考虑给予学生的对于华侨的不公平的心理压

迫感”(注17)。长屋的这一主张贯彻始终。日语教育却未取得相当成果。教师义务出席日语讲习会(全部的公立学校及一部分私立学校发给补贴),却缺乏积极性,因此显示了教师的“日语能力低下”未能解消。

四、日军所希望的教师不足及再教育

1943年5月左右,有关马来西亚海岸各州的教师培养,再训练,在柔佛,马六甲,森美兰,霹雳,槟榔屿,吉打各州设立了训练所,镰成道场,培养场。现役教师的再训练为190人,培养教师230人,共420人。专门实施现役教师再训练,流利的日语教员培养所即对现役者进行再教育,也培养新教师。期间为2—6各月,工资及补贴虽不同,但每月支付。实施的训练多为集训。

观视对教师的日语教育,例如,昭南市华侨教师日语班,原本分散,后由日本人教师(例如,教授板本于新加坡时期任日本人女学校校长)在12月21日至1月4日于普通公立学校下课后,男教师一律在“小坡亚里口”的男校接受讲义,女教师在维多利亚女校接受讲义。(注18)柔佛州宗教教育科为提高教师的日语水平,利用新年开设讲习会。12月26日开学式,教师一百一十多人参加。伊丹长官训话说“教师是社会的模范。大家努力学习日语,将所得传授给学生及社会人士,定将日语普及于柔佛州”(注19)。培养现地教师也重视日语。43年4月上旬,吉礁州教育部从应募教师训练班的14名华侨中,通过考试采用了10人。可说,将华侨教师赶出教育现场,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此外各州也顺应日本意图,认可并实施对教师的日语教育,再教育。但此期间,军政监部的指示未贯彻,42年4月的通牒中,只有“校长及教员登录后,如有可能,思想检查后任命于各校”,由此可知,不仅教师,校长也接受检查。同年10月的“有关教育指示”中,下达了“市,州主管下,复兴旧师范学校,培养现地人教员”的指示。43年4月,基于前述“有关教育指示”,对师范学校指示了详细要项,但当时各州已用独自的计画实施了培育教师及再教育,统一极需时间(注20)。

五、日语普及政策的界限

日军普及日语的主要目的之一为驱逐“敌性语”英语。如次状况下不断产生了如日语学校,日语私塾般的学校。兴亚日语专习学校在昭南岛为新设的日语学校之一。元为英文商工学校,4层建筑,为理想校舍。兴亚日语专习学校开学以后,不仅马来,从福建,广东,北京也以各种方式竞争报考。学生达200余人(注21)。英殖民地时代的校舍也被利用。另外,南京汪伪政权下的中国各地也来了入学者。

华侨协会也设置了高级,初级两个日语班。学生各30人。入学资格为,具有初小毕业学历或同样学历者可入初级班,昭南岛日语学校学习3个月以上的人可入高级班。具入学考试选拔。期间为6个月。学费3元。初级班下午5点半至6点半上课,高级班6点半至8点半上课。初级班教师为玉置守,高级班教师为日比谷光刚(注22)。从姓名可判断二人皆为日本人。此作为日本有组织的改编成立的华侨一侧的对于日语教育的积极性受到注目。

为日军政权下的诸民族“协和”召开了协同运动会,连合学艺会,儿童联欢会。在昭南市还举行了各民族小学校运动会,42年10月3日举行了预备选考。于此,包括领导,裁判,华侨也参加了。从华侨各男校参加了167人,各女校参加了90人,共157人(注23)。对于各民族参加的运动会,最为华侨方面,在日军手下也有必要显示融和姿勢并积极参加。

43年4月29日为“天长节”(天皇生日),“大东亚”各地举行了庆祝仪式。在昭南,前一天举行了盛大祝筵,昭南市各普通学校数千学生集合列队,聚于市政厅前举行拜贺式。后警察乐队领队,男女学生手持“日之丸”小旗,边唱边跳的前进。上午10点,军政监部于“国语”(日语)学校召集职员,学生,在校前举行了遥拜式。国谷教官鼓舞学生努力学习,共建新亚洲(注24)。如次在各地展开了顺应日本的动员。

与表面上的融和,日语普及相反,日军的想法并未推进。43年5月大政翼赞会调查会提出了“关于华侨对策的调查报告书”。此中称,特别是学校教育中对子弟注入了反日思想。

在英领域的英人本位，在美领域美国人本位的情况一直持续，一朝一夕对此进行“革新”十分困难。因此，于文化设施中有必要引诱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协力者(注25)。其还指出，不仅日语，连日本本位的华侨教育也未充分发辉效果。因此可说，日本到此时期，也还不得不再度打出“文化设施革新”。

结束语

总结以上可知以下情况。

日军政下的南洋华侨教育特色为，为解决日语教育，普及及粮食问题，而增产农作物。在此，以日语教育，普及为焦点论述，即将马来，新加坡从英文化圈割出，强行再编入日本文化圈。当然也可说，在经济上形成的圆筒状与再编入日本文化圈形成相互连动关系。

日军的学校教育再编较英殖民地时代恶劣，但作为实际问题，日方教师不足问题极为深刻，不得已而在当初就起用英殖民地时代的教师。因此，日军怀疑学校内潜伏着华侨的抗日精神，故此将重点放在了抑制华侨学校的再开，废校，及对教师的再教育，培育新教师上。“昭南日报”显示了其成果，但实际上并不单纯，碰了很多壁。简单的日语会话但且不说，在教育现场，现地教师虽义务出席日语讲习会，但并不热心。

日军认为，因多民族而形成的马来亚，“昭南”的难题，在于日军政下促使各民族融和。对此，无经验的日军强行执行，到底未能如愿。围绕中国语的使用，学校教育方正摇摆不定，未贯彻始终。军政内部也未统一，俨然存在如长屋有二之辈主张异论，即占领后期，虽以日语为核心，也认可其他各民族语言。其还利用马来人与华侨间的矛盾对立，消耗，刺激各民族以利于日军统治。剥夺各民族固有的语言，特别是从教育现场驱除“敌性语”英语，中国语进而统一成日语的强硬方针自然很勉强，可称为一梦想。因此可说，日本法西斯在学校教育政策，教育现场上都失败了，并自己挖了自己的坟墓。

本文作者菊池一隆为日本爱知学院大学教

授，译者施爱军为日本京都橘大学博士，现从事翻译工作。

注释

- 明石阳至“解题”“军政下的马来亚，新加坡教育事情史，资料(1941—45)”第一卷，龙溪书舍，1999年，2页。以下，略称“教育事情史，资料”。
- 军政监部内政部文教科“马来教育事情”第一卷，1943年3月，24,66—69,82页。
- 同上。
- 文教科原案“秘，学校教育整备刷新纲要(案)”“教育事情史，资料”第一卷所收等。
- 军政监部内政部文教科，前揭“马来教育事情”第一卷，76,78页。
- 明石阳至，前揭“解题”6页参照。
- 新加坡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编“大战与南洋—马来亚之部”(1947年)所收，吴体仁“枷锁统治与奴化教育”45页。
- “布立十五华校正式开课”“昭南日报”1942年7月3日。
- 军政监部内政部文教科，前揭“马来亚教育事情”第一卷，60—63页。
- 南方军政监部调查部(长屋有二)“占领后的马来初等教育”1943年12月，“教育事情史，资料”第二卷所收，159—160,197—199页。
- 裴拉州政府“机密，裴拉州概况”1943年5月，“教育事情史，资料”第二卷所收，113—116页。
- “地方长官会议资料”1943年7月，“教育事情史，资料”第二卷所收，96—97页。
- 南方军政监部调查部(长屋有二)“占领后的马来初等教育”1943年12月，“教育事情史，资料”第二卷所收，184,191,197—199页，前揭“马来教育事情”第一卷，66—69页。
- 同上。
- “机密，初等教育的刷新强化方策”1944年3月，“教育事情史，资料”第二卷所收，225—226,235—237页。
- 马来军政监部文教科“马来教育通览”1944年5月折入表。
- 长屋有二“昭南华侨私学校调查”，马来军政监部调查部“调查部报”第5号，1944年7月5日。
- “华校教师日语班”“昭南日报”1942年12月29日。
- “柔佛州教师年假，日语讲习会开学”“昭南日报”1942年12月29日。
- 前揭“占领后的马来初等教育”“教育事情史，资料”第2卷所收，187页。
- “兴亚日语专习学校”“昭南日报”1943年1月8日。
- “华侨协会增设日语班两组”“昭南日报”1942年10月23日。
- “昭南日报”1942年10月4日，1943年5月1日。
- 同上。
- JACAR 04018704100(国立公文书馆所藏)大政翼赞会调查会第十委员会“华侨对策调查报告书”1943年5月10日。

论日本古典园林色彩的民族文化基因

不同文化体系下的世界各国对色彩这一重要的视觉信息，有着不同的偏爱，其中隐含着各民族的文化基因。本文针对日本古典园林主色调的无彩色，从日本固有的文化“古层”去掘发日本园林无彩色这一“无意识的基质”，从而揭示其“隐秘的原因”。

中国 曹林娣

色彩是视觉获取的全部信息，色彩牵涉到诸多学科，包含美学、光学、心理学和民俗学等。色彩一般可以分无彩色与有彩色两类，前者指白色、灰色、黑色等单调色彩，后者指红色、黄色、蓝色等鲜艳色。色谱由主色调、辅色调和点缀色组成。

对色彩这一重要的视觉信息，不同文化体系下的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偏爱，色彩的象征含义也千差万别。如具有海洋文明背景的古希腊人把意味着深海色彩的“紫色”视为无上高贵和神圣，并把产于腓尼基的一种紫色看得特别贵重。具有内陆文明背景的中国则视象征土地颜色的黄色为神圣高贵之色。

弗洛伊德引勒帮对集团心理的描述中这样说：“我们的有意识行为是某种无意识的基质引起的。这种无意识的基质主要是由遗传影响在心理中形成的，它由无数代代相传的共同特征所组成。这些特征便形成了一个种族的天赋。在我们的行为背后有我们承认的原因，在这些原因后面无疑还有着我们不承认的隐秘的原因，而在这些隐秘的原因后面依然还有许多我们自己也不清楚的更隐秘的原因。我们绝大部分的日常行为都是由我们尚未观察到的某些隐藏着的动机所造成的。”

法国著名色彩学家郎科罗(J.P.LEN CLOS)教授提出了“色彩地理学”(Geographie de la Couleur)的概念，认为色彩意识，是由特定地域的环境、气候、人种、习俗、文化和历史等

人文历史积淀的产物。

日本古典园林最基本构园材料是低矮的常绿树、块石、砾石、藓苔和水体。色彩一般为绿色、灰色、褐色和斑驳的浅色，这样，无彩色成为日本园林的主色调，并形成一种超稳定的风格。

本文尝试着从日本固有的文化“古层”(日本学者丸山真男语)，去掘发日本园林无彩色这一“无意识的基质”，从而揭示其“隐秘的原因”。

一、自然色与神道教

日本园林崇尚自然色，与基于原始自然崇拜的神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神道教能够长期成为日本国教，又缘于日本恶劣的自然环境。

日本“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这个弓形的千岛之国孤悬于西太平洋上，碧波粼粼的大海，瞬间海啸怒涛，吞噬人畜。境内群山叠嶂，山地和丘陵占全国面积的85%，却集中了世界上活火山的十分之一，有“火山国”之称；“地灾”即地震频仍，平均每天有四次地震，有“地震国”之称。

自然的不可制服，使日本人感到恐惧和神秘，感到人生的渺小和无常，似乎冥冥之中，人都被自然神灵所支配，从而本能地产生一种解脱和超越的渴望，于是，自然力被人格化，遂产生了有着浓厚自然本位的神道教。神祇镇

守山岳、村庄，给人们赐福，神道的目的就是表达对所谓“八百万神”这些自然灵迹的尊崇。

本来，“万物有灵观念、自然精灵、自然神，是大多数自然神形成过程的模式。”^{iv}但原始落后的神道教直到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还成为日本的国教，自称为神道教主神儿子的日本天皇，居然可以不靠权力，而光靠来自神道的权威统治日本，直到1946年，联合国军进驻日本后，作为活生生的人的日本天皇，才发表了《人的宣言》，承认他不是“活神”，而是普通的人，这一文化现象在世界上却是独无仅有。

日本神道教的主神、日本高天原的统治女神是太阳女神，据说她出生时光辉耀天照地，依邪那岐甚喜，遂将其命名为天照大神，天照大神的圣光被比喻为太阳，在太阳的照耀下，众神的脸上反射出白光，表现出生机勃勃，快乐有趣味。日语中的“面白”（むもしろい），汉语的意思是“有趣”。

据成书于公元712年的《古事记》记载，开天劈地的配偶神男神依邪那岐与女神依邪那美，将其第四子筑紫岛（九州）一分为四，其中筑前和筑后两国统称为“白日别”，即明亮的太阳，“白日别”的“白”字是《古事记》中首次出现的关于色彩的名词。

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书纪》中出现了作为国名的“日本”，以太阳为国名，用日章旗为国旗。据《隋书·东夷传》记载，日本曾在一份致隋炀帝的国书中，自称“日出处天子”，而称炀帝为“日没处天子”。又《旧唐书》卷199上“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中国正史之用日本名称，以此为始。汉代古籍《淮南子》中有“日朝发扶桑，入于落棠”之语，中国人也常以“扶桑”来指称日本。

缘于原始的太阳崇拜，日本民族尊崇白色，偏爱本色，虽然日本先人并不知道“白光是所有色光的复合”。^v

伊势神宫，是日本神道教最重要的神社，

也是天照大神的主要祭祀地。神宫中日本式的建筑原型是源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干阑式建筑，日本称高床式建筑，牌坊式建筑“鸟居”也源于中国。

伊势神宫建筑使用杉、松、柏等软白木材，保留了原木清晰的纹理，不涂任何油漆，甚至不剥树皮；木造部件与部件的接合不用金属材料，而用原木造的榫，芭茅葺屋顶，屋檐无起翘，室内无天花，自然古朴，毫无人工修饰和人工技巧，排除一切违背纯粹性原则的装饰。构成基本要素省去一切虚饰，简洁、朴素、自然、明快，以体现自然素材感和自然质地感。伊势神宫努力与自然融为一体，神宫背负着幽深的森林，面临清流，与大自然融合。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会像日本民族一样，在日语中对自然物如“水”加敬语“御お”。日本国歌《君之代》用“犹如小石成岩，岩上生苔，永无止境”来比喻天皇的万世一系。崇尚自然的日本人同时也崇尚自然色，他们惯以花命名色彩，如将“粉红色”命名为“樱桃色”，用色泽娇艳、粉红迷人的桃花命名，据说此颜色在八世纪曾是军队的制服颜色。“淡红色”称“今彩言”，用日本国花樱花命名。

自弥生时代发展而来的神社建筑，使用木料的原色，这样，自然、单纯、质朴的色彩，成为日本建筑固有的传统特色，始终保持至今，成为日本人美意识和日本文化形态的特质。

中国明代时日本人的居室是：

房屋低小，罕有楼阁门台。覆不用瓦，俱以板盖上，加油灰抿抹，则无渗漏。年久板朽，再倍其板，以板压板，以屋板盖高垒者，则为故旧之家。装修墙壁，皆以木板为心，外以泥灰粉之；贫者以草结苦为壁。……虽皇宫殿室，上不盖瓦，下不砌砖，盖本国泥土不胶，是以无砖瓦匠之故也。^{vi}

贵族皇宫也不例外。位于京都西南郊的桂川的桂离宫，是日本现存面积最大的回游式庭园。

桂离宫内是竹编的御幸门，其他建筑物也矮小，精巧，清一色的白木结构、草葺或树皮葺“人”字型屋顶，加上白墙、素色的格子门窗，排除一切人工装饰、设色和多余之物。鸟居简化到只剩两根立柱，柱上架横木，省去了一切装饰。建筑布局依山就势呈不对称格局，古书院、中书院、御幸殿、月波楼等多栋建筑主要集中在西侧，没有中轴线，各建筑物彼此相辅相成，使整个建筑群自由地融汇结合，又与自然地势浑然一体，一切顺其自然，各部分建筑又具不同样式，保持各自的艺术独立性。表现出简素、纯雅的纯日本式的皇家建筑模式，完整地体现了日本建筑追求的纯粹、朴素、简单、调和的自然性格。

桂离宫最完美地继承了伊势神宫的古建筑文化传统，它的出现，被认为是继伊势神宫之后日本建筑艺术的发展达到的第二个高峰，是“日本独一无二的天才建筑”，“冠绝文化世界的唯一奇迹”。

二、白色与神域

日本庭园钟情象征着太阳神圣之色的白色，于是白砂成为园林重要的构景材料。白砂，俗称“金米糖”，为白川地区所产。是一种风化的花岗岩白砂，颗粒较大，有棱角，适宜在砂石面上造型且不易变形。铺满白砂之地代表着神圣之域。

古代日本天皇集政治、军事权力于一身，天皇也是具有宗教权威的祭司。故朝廷内往往铺满代表圣洁的白砂，以表示朝廷为神佛所在的庄严之地。此俗流传下来，至平安时代仍受到重视。

《源氏物语》中描写平安时代宫廷贵族庭院中，普遍流行白砂造景。如《源氏物语·柏木》：“但见庭中一片嫩草，正在青青发芽。铺沙较少的荫处，蓬蒿也正欣欣向荣。”

^{vii} 《源氏物语·紫儿》“但见宫殿的构造与装饰富丽堂皇，庭中的铺砂像宝玉一般光亮剔透。”

“寝殿造”的建筑形式是日本在飞鸟时代从中国大陆引进的一种建筑样式，至平安时代

逐渐成熟流行开来，依附于这种建筑而发展起来的寝殿造系园林也成为平安时代园林发展的主流。

据江户时代天保年间泽田名垂所著的《家屋杂考》载，寝殿之前部为广庭，亦称“南庭”，地面铺砂，前面有池，池中有岛，池南筑假山，池北架以拱桥连中岛，池南则架以平桥与中岛联系。铺满白砂的南庭成为平安时代寝殿造式园林景观上的特征之一。

京都御所花园在内里是天皇及家人居住和办公的地方，位于整个地块的中心偏北，以土木墙围合，东有建春门，南有建礼门，北有朔平门，西有皇后门、清所门、宜秋门。内里以建筑为主，最重要的紫宸殿区，是天皇即位、接受朝贺的地方。紫宸殿前面的南庭全部铺以白砂，建筑前面对植两种植物，东面是樱花，西面是橘子，前者春花烂漫，后者秋实累累。紫宸殿西北部建清凉殿，为天皇起居处。殿坐西朝东，东、北两面为回廊。庭院铺以白砂，建筑前植两棵竹子，一名吴竹，一名汉竹。

天皇常在院内祭祀皇祖天神，白砂之庭成了天皇祭祀活动的神圣之地。

神社为祭祀日本祖先神之神圣之域，伊势神宫、热田神宫、出云大社及各地大小神社主建筑周围总是铺满白砂。佛寺为俗外世界，佛之圣域，庭院中也是大面积铺设白砂，以示寺内为圣洁之域。

白色也是连接人与神的纽带，通神的神官们穿戴着白色衣服，以象征神圣性。参加祭典仪式者，为表达人们的敬畏心情也要穿白色衣服。

古代日本用白色礼服象征清纯洁净的心灵，白色光辉也是生命焕发的象征。但日本新娘穿白色婚礼服，却与神灵有关，白色的神圣性使其与人产生了距离，新娘穿白色婚礼服，象征她在父母心中已经远去，与中国古代所说的“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同样意义，寄托着父母希望女儿永不离开丈夫之家的祝福。所以，日本古代在女儿出嫁时，要进行扫除并熏烟，采用的是移走尸体后的净化仪式。与此心理相关的是，紫色波是波长最短的可见光，

而且紫色最易褪掉，所以，日本新娘的婚礼忌服紫色，穿了紫色婚礼服就意味着新婚夫妇的婚姻好景不长。

黑色与白色是对色彩的最后抽象，都属于无色彩，代表色彩世界的阴极和阳极，极端对立，但两色之间却有着共性。黑白两色都可以表达对死亡的恐惧和悲哀，都具有不可超越的虚幻和无限的精神，在中国也都可以作为丧服。在日本，黑色还象征庄重，日本已婚妇女在参加重大庆典时才穿黑色和服。中世纪以前，日本列岛上九州沿海人民还有染黑牙的习俗，其土官本身宗族子侄并首领头目，皆染黑牙，“与民间人以黑白分其贵贱。女子年及十五已上，不分良贱，亦染黑牙始嫁”。^{viii}

纯色是从罪恶与污秽中升华出来的洁净神圣之色，被视为高贵等级的象征。“妇人衣纯色裙，长腰襦，束发于后，佩银花，长八寸，左右各数枝，以明贵贱等级。”^{ix}

一种颜色通常不只含有一个象征意义，对同一种颜色的密码，在日本也会作出截然不同的诠释。如黑色还有肮脏、邪恶、死亡及黄泉下的黑暗等象征意义，黑色的死亡又是以红色的鲜血为前提，所以赤色也就成为了可恶的污秽色。《古事记》八岐的巨蛇吞噬着年轻的女人，其“双眼红若酸果……观其腹，红肿溃烂，血迹斑斑”，这种嗜血的赤色正是危害万物的怪兽的标志。

日本将赤色用于建筑是在中国及朝鲜文化传入之后，在此以前，赤色一直作为污秽之色绝对不用于修饰神社、宫殿以及民用住宅。

日本古人对色彩“似乎感到莫名其妙，尤其面对大自然展现的色彩的戏剧性变幻，更感到无比惊愕、惶恐”，所以，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妇女则为神灵附体的妇女标志，穿满身大团花锦和服的女人，一定是装神弄鬼的巫婆。

三、无色与日本禅

出于“石立僧”之手的日本庭园充满了禅味和涩味，无彩色营造并渲染着这一氛围，这也是因资源匮乏而强调精神第一的日本园林特有风貌。

日本的禅渊源于中国禅宗，但日本禅却是一种发展、一种文化态势和延伸。^{x1}查尔斯·艾略特在《日本佛教》说：“禅对于东方的艺术、知识及政治生活来说具有伟大的力量。禅也是日本式性格的表现。其他所有的佛教都没有禅宗那样‘日本式’。”“日本禅”是中国禅宗和日本神道教嫁接的产物，禅“以一片草作六大金身”^{x11}、“以小见大”的思维方式，正好与因资源匮乏而一贯重视精神的日本审美观、道德观相契合，成为日本人的精神象征。

日本先民在汉和朝鲜等归化人没有到来以前，几乎与世隔绝，不会耕织，不懂冶炼，没有文字，长期处于以渔耕采集为经济基础的绳纹时代。直到中国汉魏文化多渠道向东辐射的公元前3世纪至2世纪，才使他们进入了弥生农耕社会，但依然处于极端蒙昧和落后的状态。

《三国志·魏书·倭人传》描述3世纪以前即日本弥生时代（前2—3世纪）后期日本列岛上的情况：

土地山险，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径。有千余户，无良田，食海物自活……子无大小皆裸面文身……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女被发屈紱，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雀。兵用矛、楯、木弓……冬夏食生菜，皆徒跣……食用用笾豆，手食……

以近代日本列岛上相继出土的遗物、遗迹相对照，上述记载绝大部分是正确的。

日本矿藏资源匮乏，仅有少量的铜、煤、铁矿。“日本人从摇篮到墓场都一直依赖外国资源。”^{x111}虽然不免夸张。但作为资源小国，日本一贯崇尚精神而轻视物质，强调精神就是一切，“他们说，精神是永存的。物质当然也是不可缺少的，但那却是次要的，瞬间的。日本的广播电台经常叫嚷说：‘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没有千年不灭的物质，这是永恒的真理。’”二战期间，“甚至说在战斗中，精神可以战胜死亡这种生理上的现实。”^{xiv}

就是这样一个物质资源匮乏、自然条件恶劣、意识形态落后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从蛮荒时代一跃而起，便匆匆走上了近代化道

路。在“爆发”起来的日本人心理，祖先的奋斗历史还记忆犹新，生存的危机感时时还在撞击着他们的心头，原色、白色依然那么美丽，白屋茅舍依然那么亲切！

以禅意为原点的枯山水庭院，即《作庭记》所谓的“于无池无水处立石之庭园”。枯山水庭园是镰仓以后新型造园方式，庭园内原来仅象征海滩的白砂，直接代表了茫茫大海。用大片白砂代水铺满庭院，耙制成水波纹，再在白砂上以形状各异、大小不等的石头代山，散点式群置，点缀些许松针苔藓。没有碧水细流，只有白砂与石头的各种组合，从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海、岛屿、孤峰、小桥、流水、偏僻的山庄、缓慢起伏的山峦，充满了禅意的枯寂美与幽玄美。

建于15世纪的京都龙安寺中的庭院布景是日本枯山水的典型代表作之一，平庭呈横长方形，长28米，宽12米，占地50余坪（约165平方米），一面临厅堂，其余三面围以古老的低矮的土墙，庭园地面上全部铺白砂，内无一树一草，15块大小各异的假山石，按不同的距离、比例、向背，以二、三或五为一组，共分五组，零星错落安置在耙成东西向水纹状的白砂中，白砂、绿苔、褐石，但三者均非纯色，从此物的色系深浅变化中可找到与彼物的交相调谐之处，构成了一幅活生生的自然美景：一望无垠、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分布着星星点点的岛屿山峦，岛屿山峦上生长着茂密的森林，咫尺之地幻化出千顷万壑的气势……

日本室町时代的京都大德寺大仙院书院庭院，是枯山水庭院的扛鼎之作，时值禅宗在日本最发达的时期。大仙院在不足66平方米的空间，东北部相对而立两块丈高青石表示断崖绝壁，为庭景之焦点，两石顶部尖耸，高度不同，其后部为高出地面80多厘米的土山，山上筑有枯瀑布石组，土山上部覆盖着修剪成圆形的灌木丛。以上述两青石为中景、青石背后的土山、瀑布则表示深山远岭和远山中的瀑布，在庭的观赏点稍近处则置有石桥，更近处则有表示宝船的巨大的长船石。

这类枯山水庭园纯属观赏的庭园，仅以石头组合就创造了由深山幽涧的复杂景观，也是

佛教在一粒微尘之中发现全宇宙生命的泛神论哲学的艺术表现。游人只能坐在庭园边的深色走廊上观望，静思默想布道者深沉的哲理，这种“可观可望”而不可“游”的园林，无异于一种“精神园林”。

四、白砂与洁癖

充斥着日本庭园的白砂，从圣域象征到海滨、海景象征，体现了日本人的崇海心理。日本为岛国，四面环海，海是日本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海有着特殊的感情。

《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称，大海是一开始就有的，开天辟地的男神依邪那岐和女神依邪那美在高天原的浮桥上，用矛搅拌着青海原，后来矛尖上滴下的海水，滴成日本的一个岛屿。二神到了岛上结为夫妻又生下四国、九州、对马、本州等八个岛（不包括萨南、冲绳、北海道、北方四岛）。后来又生了海神、山神、树神、田野神自然诸神。

首代天皇神武的母亲及其祖母，都为海神之女。天皇既是海神之子，即位的第二年，总要派女官前往难波津，使天皇的御衣（亦即新天皇的象征）附有“大八洲之灵”，象征性地赴海边进行一次获取神圣统治者资格的加冕仪式。

仿造海景一直为日本园林所热衷。中国蓬莱神话传到日本后，飞鸟时代的苏我马子，就在院子里挖地造岛，以象蓬莱仙岛。到七世纪末，天武天皇之子草壁皇子的庭园里增加瀑布和海滨，奈良时代后期，庭园池中放入水鸟，并伴以小桥，池中采用岩石，仿造海景容姿，使不易见到海的山间地带因而可以欣赏到大海风景。橘诸兄的庭园，中臣清麻吕的庭园，都属这种类型。

日本园林这种追求海景的强烈意识，进入江户时代后又有了更大的发展。日本庭园中出现了以低矮灌木为主景的修剪式枯山水，如滋贺县的大池寺庭园将杜鹃灌木丛修剪为几何形体，象征一艘“船”在波浪中航行，从而展现了一幅禅宗海景图。不少大名还把园林直接建在了海边，以大海为借景，引海水入园池，

建造了所谓“潮入式园林”，如蓬莱园（江户初期建，今废）、乐寿园（江户中期建，旧称芝离宫）、浜离宫（江户初期建，德川永别墅），均为这种园林。在这里，海池边大面积的白砂浜又由抽象回到了具体，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海滩。

《作庭记》在“立石手法”一节列举了“大海式”的置、掇石方法。由于仅造掇石无法表现出“大海式”，又特别强调了“应该在所见之处铸造沙洲和白砂浜，种植松树等”。在说明构筑各种岛屿的手法时，也要求所有的岛屿造型，均需要配以白砂浜，显然，白砂浜在表现海景时有画龙点睛之效。

爱大海的情结与海水的涤污作用紧密相连。据日本《古事记》记载，日本土生土长的原始宗教“神道教”诸神，是男神依邪那岐洗刷污秽时生出来的：依邪那岐到黄泉国找到了因生产火神时被烧死的妻子依邪那美，却因发现了妻子的秘密反被女神追杀，他在逃离“黄泉国”的归途中，于筑紫桔之小门的阿波岐原脱去身上的衣物，跳入大海洗涤在阴间沾染上的污垢，这是日本民俗中“祓”的起源，他脱掉的衣物与洗涤的部位顿时生出20多位神祇。最后在洗脸时，洗左眼生出一美丽女神天照大神，送她八坂琼曲玉，并命其司理高天原(诸神所居之处)。洗右眼生出掌管月亮的月亮见尊(月读神)，洗鼻孔生出素盏鸣尊(《古事记》里称为须佐之男)。

在日本最古老的神话中，日本祖先神之间的危机首先就是因脏污而发生的。而神为了去除身上的污浊最先采取的行动是洗澡。污秽不洁象征着荣誉的丧失，视“精神就是一切”的日本人，丧失了荣誉，就成了一具行尸走肉。因此，一个人越是为“名誉”牺牲其财产、家庭及自己的生命，就越被认为是道德高尚的人。日本古典著作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称：“所谓武士的名誉，就是人格的尊严及价值的意识”，强调严守忠义和名誉是日本武士道的中心道德，并把羞耻感纳入道德体系，“知耻的人”有时译成“有德之人”、“重名誉之人”，任何人都十分注意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

所以，日本的祖先神可以容忍一切，却对脏污十分恐惧、嫌恶，日本人爱清洁的原因，正是来自羞耻感，对于这一点，冈仓由三郎是这样说的：

所谓日本人的心理特异性，很多来自喜爱洁净及与之相联系的厌恶污秽。否则无法解释这种现象。我们被训练成(实际情况如此)遇到侮辱家庭名誉或者国家荣誉，就视若污秽或疮痍，必须通过申辩洗刷干净，否则就犹如不能恢复清洁或健康。对日本公私生活中常见的报仇事例，不妨看作是一个喜爱洁净成癖的民族所进行的晨浴。

冈仓由三郎接着说，日本人最理想的是过“清净无尘的生活”，“晨浴”就是用来洗净别人向你投来的污泥，只要你身上沾一点，就不贞洁。

既然污秽即为罪恶，而象征着生命洁净即为良心的存在，基于这一“心理特异性”，憎恶脏污、爱洁成癖自然就成为日本的国民性之一。

日语中的“きれい”一词，既表示“洁净”、“干净”之意，也表示“美丽”、“漂亮”，因此，“洁净”与“美丽”在日本人意识中是同等的，洁净就是“美丽”。

日本人以“清明”为美的境界，清明本来是指水的清澈如明镜，是一种美的含义，如言水光波影之妙，朝霞娇月之丽，清澈透明的溪水和普照大地的阳光，这其间的亮丽色调具体化即为白色。

“官宅门壁……地以白砂铺之，乃为洁丽。”^{xvii}

日本也成为世界上最爱洗澡的民族。“洁癖”的审美意识，同样深深影响了日本人的造园活动。例如，作为市中山居的茶庭，尽管表现出的是山野之趣，但是在如何根据山野特点表现出洁净这一点上也下足了功夫。最典型的是“三露”。所谓“三露”，是在茶客来临之前对茶庭进行的三次洒水清洁工作。第一次洒水称一露，以洗去石上植物上的尘埃为主，等水差不多要干时，再洒第二遍水，称“二露”，目的是使石、地苔、植物保持湿润。待客人快到时，再洒上一遍“化妆水”，使庭

内景物微带水迹。通过“三露”，当茶客迈入茶庭时，仿佛进入了雨后初霁的山径野道，树绿、石润、苔鲜、草翠，满目清新，心旷神怡，尘世中的琐事自然也就忘在了身后。^{xviii}

园林白砂，也象征着用海水荡涤污秽。寝殿式园林的南庭和其它泉池式园林池边水际的白砂，覆盖了一切污物，使园林中出现一块洁白明净世界，给人以洁美的享受。茶庭内的“厕所”地面铺满白砂，似白雪覆地一般，故称“雪隐”，象征被海水洗涤过的洁净之地。

寺庙和茶庭中都少不了洗手净口的清水和洗手钵，在通向茶室的路上会发现一两个石水钵，它通常被置于茶庭的荫蔽一角，用以饮茶前的漱口或净体仪式。水钵前方通常有钵请木（如南天竹），其枝条垂挂于水钵上方，当其叶片落入水钵中时，可以为水消毒、杀虫。些许个石灯笼照亮庭园小径，冬季，灯笼顶部覆盖上一层装饰性的白雪，衬出其仪态大方。

接触处理污秽的人在古代日本是“贱民”中的“秽多”，即“污秽”的贱民。日本有四个世袭等级，依次是士（武士）、农（农民）、工（工人）、商（商人），等级最低的是贱民，而“秽多”是贱民中的最下等，他们主要从事各种被人们所忌讳的职业，包括清道夫、掩埋死囚者、剥取死兽皮及制革者等。在日本社会中，“他们是不可接触的人，或者更为准确地说，他们根本不被当做人看。甚至连通过他们居住村庄的道路的里程也不被计算，似乎这些地方和居民都不存在。”^{xix}他们用过的碗也要被砸掉。“秽多”部落民只存在于西日本。

余论

羞耻感使日本国民严以律己，追求完美，并塑造出独特的以成功为导向的价值观。^{xx}但日本封建时代视为武士高尚道德的名誉感，并没有被认为是内在的自觉品格，而是外在的“社会的好评”，即把他人和社会的评价作为衡量的标准，是“面子意识”，即是以外在品格为中心的意识。正如日本人洗净的是“别人向你投来的污泥”，罪恶及污秽是由外界巧

合而附于身上的不幸，只要象古日本诸国神祇官至大河处被罪，利用风力将罪恶放逐到大海深处，天下便成清净之地了。只需要借助外在的力量，而不是内在的反省，诚如今道友信所说，罪恶的净化是在良心之外进行的，而一些日本人，对良心的存在及作用的意识几乎等于零。“这种放任的、缺乏执着追究的习惯仍存在于今天的日本，如对事件不进行充分的内心反省，不去追究犯罪的责任，而一味地‘流之于水’、‘任其发展’、‘凭借风向’”^{xxi}

R.H.沙夫(Robert H.Sharf)在讨论日本现代禅与民族主义关系的文章中也指出，20世纪30年代所“制造”出的日本禅学，以一种日本文化优越论和独一性的方式，成为“残酷和非正义的”民族主义。^{xxii}

这些，也许正是日本民族文化基因中的“优劣二重唱”吧！

当然，“在战后二三十年的一段时期内，一些正直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从日本战败这一冲击中汲取教训，对日本的民族精神做出了认真的自省。在痛定思痛之后，奋起对残存的封建主义作了不妥协的斗争。川岛武宜，丸山真男，桑原武夫，加藤周一等学者便是代表。”^{xxi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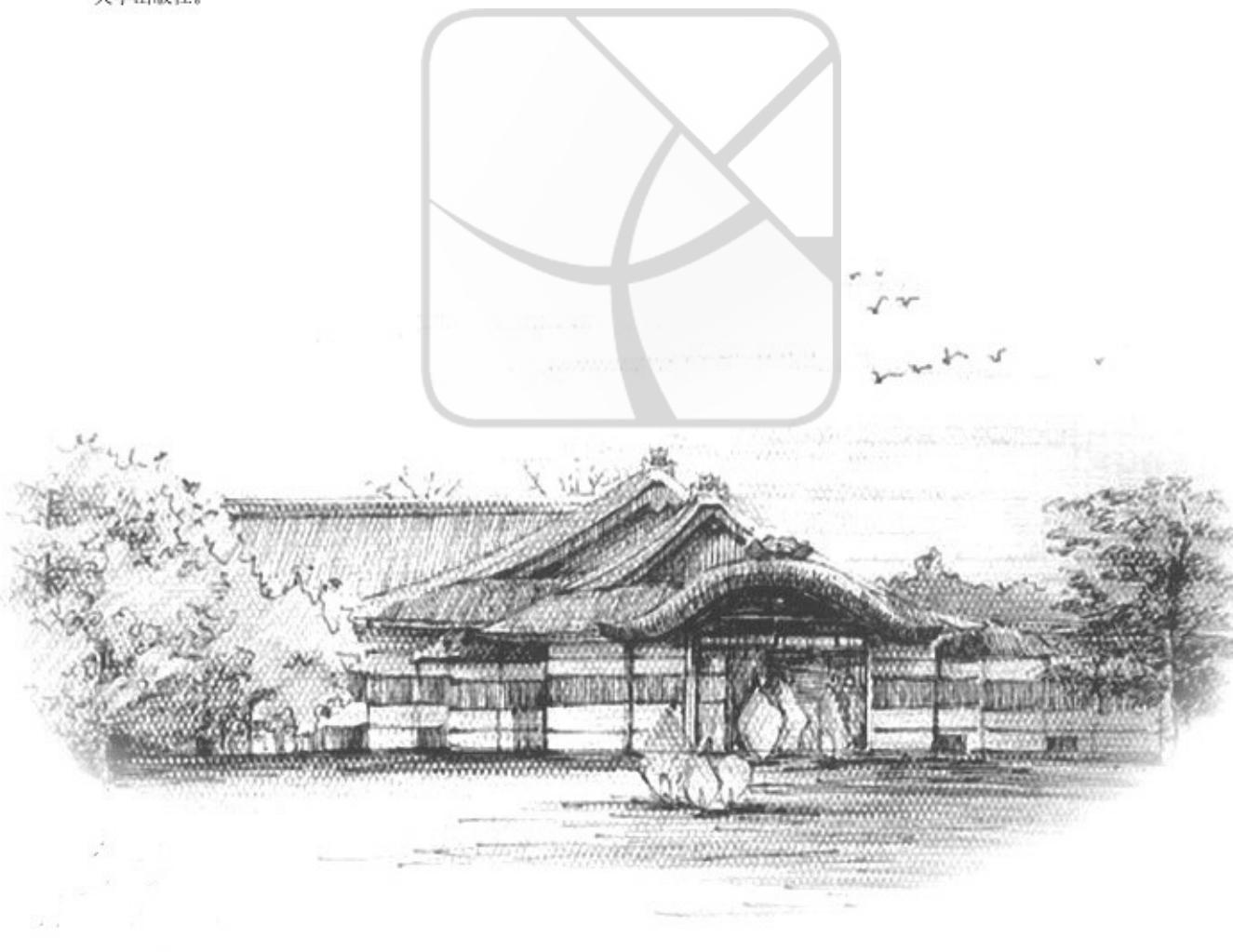
注释

- i. 温克尔曼：《论希腊人的艺术》，载《世界艺术与美学》第2辑第347页，文艺美术出版社1983年。按：希腊这种紫色是从大海中的骨螺中提取出来，给贵人染衣服之用。中国道教象征超生出世的紫色，乃是指道观所在的山岭间的紫气。
- ii.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林丛、张唤民、陈伟奇译：《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年第78页。
- iii. 晋陈寿著：《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
- iv. 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第17页，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
- v. 科学家牛顿曾将阳光引进漆黑的室内，观察白色的阳光

- 穿过三棱镜后，白色的纸上映出七色彩虹——红、橙、黄、绿、蓝、靛、紫，因而得出此结论。
- vi. [明]李言恭、郝杰编撰，汪向荣、严大中校注：《日本考》，第89—90页，中华书局1983年。
- vii. [日]紫式部著，丰子恺译：《源氏物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 viii. [明]李言恭、郝杰编撰，汪向荣、严大中校注：《日本考》，第69页，中华书局年，1983年。
- ix. [后晋]刘 撰：《旧唐书·日本传》卷199。
- x. [日] 本孝维、藤 英昭著，成同社译：《色彩心理学》第2页，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
- xi. 赵巍《禅意识对日本民族性格之影响》，《探索与争鸣》2006年05期。
- xii. [日]铃木大拙等著：《禅与艺术》，第23页，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
- xiii. 见1979年10月29日《东京新闻》‘资源小国’日本衣、食、住全靠外国”。
- xiv.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熊达云 王智新译：《菊与刀》第17—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
- xv. [日]大林太良《东亚有关海的民间信仰》，见贾蕙萱 沈仁安主编《中日民俗的异同和交流》第154—15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 xvi. [日]冈仓由三郎：《日本的生活与思想》，第17页，伦敦：1913年。
- xvii. [明]李言恭、郝杰编撰，汪向荣、严大中校注：《日本考》，第89页，中华书局1983年。
- xviii. 曹林娣、许金生：《中日古典园林文化比较》，第238页，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
- xix.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熊达云 王智新译：《菊与刀》第4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
- xx. 2003年7月20日，香港《亚洲周刊》载文《日本无罪恶感就无法反省》。
- xxi. [日]今道友信著，孔令敬译：《东洋的美学》见《日本人的审美意识》，牛枝慧《东方艺术美学》，第116页~128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
- xxii. 龚隽：《二十世纪的日本禅、京都学派与民族主义》，《世界哲学》第2期。
- 陈敦秀：《不成熟的日本文化论》，《读书》1987—11期。

本文作者是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园林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宫崎骏动画电影的后现代主义现实关怀

(中国) 吴雨平 张一楠

“学会成长”是日本著名动画片导演宫崎骏作品中仅次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二大主题，他的多部成长题材的动画电影，通过对后现代身份认同焦虑的探索和回答、以非现实印证现实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以及对于理想的不断追求，实现了他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超越和现实人文关怀。

1941年出生于东京的日本著名动画片导演宫崎骏(宫崎骏, Hayao Miyazaki)不仅是日本动漫界的一个传奇，在全球动画界也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他是一位用自己坚毅的性格和永不妥协的奋斗，将动画上升到人文高度的思想者，同时也是日本三代动画家中承前启后的精神支柱。宫崎峻的动画电影产生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后现代语境中，人生、生存、梦想、环保等等令人反思的讯息，都被融合在他那些题材各异的作品中，而《千与千寻》、《魔女宅急便》、《龙猫》、《梦幻街少女》、《海潮之声》等以成长为题材的电影，由于表现了他对成长乃至人类生存的后现代主义现实关怀而极大地提升了动画电影的审美品格。

一、后现代身份认同的焦虑： 我是谁？

后现代通常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着科技与经济的高速发展，西方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与这种后现代社会相伴而生的文化思潮，就是后现代主义。它是一种以本体怀疑论为思想基础，以偏激的反理性、反权威、反中心、反科技乃至反文化，倡

导多元、差异等为理论主张的文化思潮。

日本在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中，已经从农业、工业、后工业社会三者混杂的状态发展成为和欧美并驾齐驱的后现代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繁荣，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在社会生产力增长的同时社会购买力也飞速增长，人们拥有了更多的经济实力和更多的闲暇时间，即使是普通民众也可以频繁地出入一些诸如高尔夫球场、棒球场、咖啡厅、酒吧等高档消费场所，从而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消费文化。与此同时，随着现代都市的大规模形成，千篇一律、缺乏个性和人情味的高档住宅楼一座座拔地而起，这种现代化的公寓阻隔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形成了一道道有形和无形的墙壁。对日本这个注重集体意志和团队精神的民族来说，这种失去了外在对象的生活让他们感到孤独和无聊，许多人觉得自己处在一种无援的境地，关于“我是谁”的困惑也就成为日本社会中人的普遍焦虑。宫崎骏关注到这个问题并用自己独特的动画语言给予了回答。

进入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和消费社会时期，面对科技的高度发达和物质的极大丰富，非但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陌生，作为个体的人也越来越迷失自我、迷失前行的方向了。宫崎骏的这种忧虑在《千与千寻》中有着充分的展示。《千与千寻》的故事发生在小镇上一个叫“油屋”的澡堂里。澡堂里的每一个人都已经被小镇的独裁者、澡堂主人汤婆婆施以法术，不记得自己是谁，而名字一旦被夺走，就无法找到回家的路，他们只能日复一日地进行着简

单繁重的工作。影片的小主人公、十岁女孩荻野千寻在误入神秘的小镇后，被汤婆婆改名为“千”，从而成为一个只有“符号”而失去原本之“我”的人。千寻是宫崎骏以朋友的女儿为原型，“刻意”塑造的一个毫不起眼的“平凡的人物”，她不是宫崎骏作品中一贯描写的可爱女孩，性格上也没有特别之处，而这种表面的个性淡化和平庸化，实际上正象征着后现代社会自我身份的丧失；另一个主人公少年白龙也在那里遗忘了自己的真名，被汤婆婆的诅咒所控制，成为汤婆婆的助手，为她从事见不得人的勾当。其他人物如澡堂的客人“河神”进入澡堂之前是一个散发着恶臭、满身污泥和垃圾的“腐烂神”，人们根本无法辨别他的真实身份；神秘怪客“无脸人”更是一个具有强烈象征主义的符号，是人性被社会阴暗面污染的写照，他全身黑色，头戴白色面具，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甚至除了“千”以外没有能看得见他；汤婆婆的独子虽然身体巨大，却是婴儿模样，因为害怕细菌而躲在玩具和枕头堆里拒绝成长……。总之，影片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幅“自我”迷失的无助甚至令人恐惧的画面。

然而，宫崎骏的叙述没有停留于此。与仅仅是在怀疑中表达一种人与社会的对立情绪不同，他用成长的主题实现了自己对“我是谁”的探寻和回答。宫崎骏讲述了千寻和白龙历经磨难找回自己的名字而终于成长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避免成长，但如果每个人都是“千”，每个人都像“千”那样，在必须经历的磨难中，学会忍耐、学会尊重、善待生灵、诚实守信，那么我们就都能找回失落的“我”，都将不再孤独、彷徨、焦虑。这正如当代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所说：

认同问题经常同时被人们用这样的句子表达：我是谁？但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一定不能只是给出名字和家系。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意味着一种对我们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东西的理解。知道我是谁就是了解我立于何处。我的认同是由承诺（commitment）和自我确认（identification）所规定的，这些承诺和自我确认提供了一种框架和视野，在这种框架和视野之中我能够在各种情景中尝试决定什么是善的，或有价值的，或应当做的，或者我支持和

反对的。

在《魔女宅急便》中，小魔女琪琪遇到的最大困惑同样是迷失自我、得不到认同，而在她经过历练、最终恢复法力并得到大家的认可后，宫崎骏的设计是，曾经充当她“另一个自我”的黑猫吉吉就不能和她对话了——因为琪琪已经长大，她找到了“自我”，不再需要“另一个自我”。宫崎骏关注着当代社会中人的生存境遇，并以东方传统的审美道德完成了一次次奇异的成长礼，也实现了他对后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我是谁”这个问题的人文主义关怀。

二、现实与非现实的纠结： 我在哪儿？

后现代艺术家坚持认为现实只是一种虚构物。他们认为世界根本不可触及，人们拥有的不是原本世界，而是对世界的见解，见解又通过某种载体来表述，但由于载体的意义不确定，这些载体就成了不可靠的工具。以不可靠的工具“表现”的世界同样是不可靠的，它是虚构的——现实、历史都是由语言等载体虚构的。所以在后现代主义作品中，世界是在主观意识里构成的，它们不仅以荒诞的、幻想的、闹剧的、滑稽模仿的创作形式来展示现实的虚构性，而且还往往郑重声明甚至讨论它的虚构性。用动画电影表现现实的虚构性或者说非现实性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而宫崎骏充分利用了这一有利条件。宫崎电影最常用的一种方式就是以非现实性的手法来表现现实的虚幻性。他往往将日常生活导入非现实的世界，用离奇、荒诞的非现实表达形式来表现自我存在的异化，以此展现现代社会的本质状况，突出现代人的不安感。

宫崎骏作品的最吸引人之处莫过于现实与非现实两个世界的不断撞击，即以非现实印证现实，以荒诞表现理性，在充满寓意和象征的张力中展现现代人无根基性的生存状况以及他们的困惑与悲哀，凸现了现代人性中最真实的一面，也颠覆了传统动画电影“真实”与“虚构”二元对立的模式。这方面的代表作是《龙猫》和《魔女宅急便》。

《龙猫》是宫崎骏根据幼年时在家乡听到的传说，为渴望长大的孩子们编织的一个精巧的梦。“在我们乡下，有一种神奇的小精灵，他们就像我们的邻居一样，居住在我们的身边嬉戏、玩耍。但是普通人是看不到他们的，据说只有小孩子纯真无邪的心灵可以捕捉他们的形迹。如果静下心来倾听，风声里可以隐约听到他们奔跑的声音。”这部充满温情的动画电影，讲述了小月、小梅姐妹俩和爸爸搬到乡村的新家后发生的故事：她们看到了传说中的大龙猫，跟龙猫们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并且在乡亲们和龙猫的帮助下，完成了对重病住院的妈妈的心愿，而就在这个过程中，姐妹俩成熟了、长大了。

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后现代社会，人的价值和意义开始虚无，人的主体性逐步消解，每一个普通人都有太多的困惑和迷茫，因此人们渴望找到自己的生之意义，渴望主体性的回归。而在消费主义观念充斥的都市生活中，人们不可能拥有真正的自由，也很难回到人的本真状态，那么远离都市的大自然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呢？《龙猫》告诉我们，人类是从自然中走出来的，要想找到真正的自我，得到真正的成长，也许还要重新回归自然，重新接受自然的审视和拷问。在工业化、商业化高度发达的日本，《龙猫》展现给观众的是一幅多么独特的人景谐调、平和安闲的生活图景！

为了烘托新家的这种非现实性，宫崎骏对一家人去新家的沿途作了一番精心的设计：汽车（现代工业文明的象征——笔者注）穿过一段茂密的森林，就如同进入传说中的桃花源先要乘船通过一段桃花林一般。阁楼上的黑精灵煤虫、神秘高耸的老橡树、姐妹俩跟龙猫的亲密友情都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个现实的所在，但生活在其中的却不是童话世界里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们都是我们身边普普通通的人；身为大学教授、考古学家的爸爸只要乘坐公交车就可以离开这里，回到城市（现实生活的象征——笔者注）去完成他的工作。宫崎骏就这样让场景在现实和非现实之间自由切换，而这种魔幻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运用却能让观者的心得到最真切的共鸣。海德格尔认为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但是在人潮涌动的此岸世

界，人却越发地感到寂寞，因此寻找诗意的精神家园就是宫崎骏在超越后现代社会后开给观众的一个处方。

《魔女宅急便》1989在日本公映后，当即成为了卖座率第一的电影。《魔女宅急便》的故事也不复杂，但是同样带有强烈的魔幻色彩：在魔女的家族，小魔女13岁时必须离开家，到一个没有魔女的城市独自生活一年，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魔女。影片从小魔女琪琪带着她的黑猫、骑着扫帚在夜空中飞向一个陌生的城市开始，讲述了琪琪面对困难如何克服并且最终成长的故事。琪琪到达的城市据宫崎骏所说是“一个大混居的地方，就像那不勒斯、里斯本、斯德哥尔摩、巴黎，甚至是旧金山。所以城市的一边好象是濒临地中海，而另一边则与波罗的海相临”，它有点像想象中50年代的欧洲，那里没有发生过“二战”，但似乎又适用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某个海滨城市。也许在宫崎骏看来，电影描写的故事发生在哪里并不重要，因为它和魔女家族一样本来就是现实中不存在的、虚构的，但是魔女（代表非现实世界）与人类（代表现实世界）却在那里和平共处，如同《龙猫》中自然精灵与人类之间的友爱互助一样，他们一起“严肃地对待那里的源始的单纯的生存”（海德格尔语），共同面对人性中令人悲哀的阴暗面。源自现实生活的诸多细节将故事打造得分外可信，奇幻的外表下又是宫崎骏对于现实世界的关怀。

另外，虽然《魔女宅急便》故事的背景是在城市，但宫崎骏却极少用大量的笔墨去展示现代都市的浮躁与繁华场面，电影中给人印象最深刻、最令人神往的地方，还是那些远离都市的、平静安宁的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即作为彼岸的自然——人类的精神家园。绿色的森林，碧蓝的大海，还有伴随着琪琪飞翔的大雁，都如诗一般美好，宫崎骏也因此有了“动漫诗人”的美誉。

三、超越后现代：追逐理想

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中，所有的理想都不过是虚妄之物，没有什么理想值得人们去苦苦追求。如法国当代思想家福柯认为，主体被束

缚在一个复杂的、规戒性的、全方位的权力网络中，对事物变化发展的结果没有丝毫的影响力，根本无力改变现实，这种对事件、行动和后果无足轻重的主体，使理想的设定和追求成为纯粹多余的事情。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当今社会许多人的生活状态正如博尔赫斯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中的费斯所言：“……后现代社会，多数人一天至少要看四个小时的电视，他们接触到难以记数的叙事，我们的生活趋向于我们所看的电视节目，把广告、肥皂剧、情景喜剧、动作片等节目融合在一起，这些叙事，这些模拟的东西对人往往有一种颠覆作用。我们变得像鬼魅、像幽灵，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自己的感情。我们过着没有感情的生活，所有体验是通过电视或电影得到‘二手情感’。”理想似乎逐渐离人们远去，它那激荡人心的精神魅力仿佛已经永远成为尘封的记忆。

后现代主义者对理想的否定，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说，从对理想的简单肯定和盲目迷信到对理想的质疑、否定，的确在一定意义上昭示了人类理性的进步。因为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太多的乌托邦和虚幻之梦曾经被人们当作理想而狂热地追求，结果却让人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然而从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者对理想的否定并不能使人信服，因为后现代主义者的反思以取消主体、否定人的能动性为主旨，这就无法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指明正确的方向。作为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宫崎骏的作品没有迷失在后现代主义的虚无主义、享乐主义、商业化的消极情绪当中，他的电影始终倡导关怀——对历史、现在和未来，对他人和自然都给予充分关怀，强调不同背景下人类的相互理解；同时关注其他生命的生存，重视环境伦理，强调人对环境的义务，追求生态平衡。和所有伟大的艺术作品一样，宫崎骏要反映的就是对于平等、祥和世界的渴望，就是自由、平等、博爱这几个最

基本的信念。而相对于那些晦涩的艺术电影，宫崎骏作品对这些理念的阐述显然更为深入浅出。

“学会成长”是宫崎骏作品中仅次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二大主题，因为他相信，每个人都必须成长，成长的过程就是追求理想、实现理想的过程。在宫崎骏成长题材的动画电影中，始终贯穿着对理想的不懈追求。而如果说《魔女宅急便》等早期作品中对于成长的描述，主要集中在通过勇气与坚强面对困难来实现理想的话，那么到了后期的作品如《千与千寻》中，博爱与宽容逐渐上升为推崇主题——千寻回归人类的理想得以最终实现，不仅是因为她的勇敢坚强，更多是因为她总是用那颗纯洁善良的爱心去对待异类。

飞翔是人类的梦想，每个人的童年时代可能都有过这样的幻想。在宫崎骏的动画世界中，有一个突出的意象，那就是他对于“飞行”的热爱。几乎在他的每部作品中，都有对于飞行的浪漫描写。《魔女宅急便》以飞翔作为故事主线；《龙猫》中姐妹俩在似梦似真中与龙猫一起飞过大树、飞过田野，飞到了梦与希望的世界——爱的理想国度；而《千与千寻》最后也安排了一段千寻与白龙的携手翱翔。飞翔代表着人类摆脱地球引力的梦想，是所谓“终极自由”之一，人类自古以来一直为飞得更快、更高、更远而努力着。可以说，宫崎骏通过对飞行的描写寄托了他对自由和理想的向往以及对未来的期待。德国思想家卡西尔说过：“思考着未来，生活在未来，这乃是人的本性的一个必要部分”，而“对未来没有想法的人是阳光下的狗。”ⁱ宫崎骏用线条和色块将动画片提升到了一个通常难以企及的高度，而理想的实现通过外表柔弱的少女完成的冒险旅程来进行，则给予剧情以更多的张力。

虽然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过：“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性时期，而是正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其中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普遍化了。”ⁱⁱ

i. 转引自陶东风：《全球化、后殖民批评与文化认同》，见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页。

ii. 此言出自希腊文学家克斯特纳《阳光下的狗》。

iii. [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但是也有人认为后现代已经被取代、被超越，当下的文学艺术已经处于后后现代主义阶段，而假如我们果真生活在一个“后现代”社会，那么如何超越这个社会，实现人类的终极理想，宫崎骏已经通过他的电影开辟了一个完

整的世界，也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在当下人的责任。

本文作者是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苏州中学国际班学生



运用灵活手法表现内心世界

新加坡 史英

写诗近四十年后，笔者总结创作经验终得出个人看法，选材入诗的来源有二：一是取之于现实生活，另一是取于内省经验。两者虽有差异，但却具有互辅作用，而非处于对立状态的写作素材，若能灵巧相融加以运用，则是丰富诗的创作内涵及促成作品独特性的催化素。

笔者认为：进行诗创作老取材过于如实、单一，易引致抒怀的泉源枯竭，同样的道理，取材纯属冥想而不纳入写实的基素，也易导致抒情流于空洞乏韵味。因之，如果把来自现实生活和源自内心世界的题材，经筛选而加以揉合或交替用于诗创作实践，为诗情得以不断勃发的导因。

须知，内省经验为诗人对现实有所感触时经理性过滤而形成的一种理念，常具有独特的优点，将之融入连串意象加以体现，可望写出形象完美的诗。它与概念化的作品截然不同，是酿自心灵的精神结晶。虽说它的自我色彩较浓郁，但是多变的敏锐触角，是丰富无比的创作泉源之一。因此，否定内省感悟用于文学实践的重要性，是不智之举。依我的看法，它是避免写诗呈现一般化弊病的消解要素。

一般来说，理念在诗人内心形成时已隐含具象，一经想像的牵动，自会寻求贴切的意象融入，而概念则无此效能，只是从乏实感的理性层面表达观点，没法融入形象加以体现。由此点明便可知，以理念作为写诗的要素是可行

的创作途径。它易使精心营造的意象隐含自我色调，从而显出诗人之作那别具一格的风韵。

内心的感触固然是写诗的泉源之一，而现实生活所蕴藏的文学素材，也是引发写诗灵感不可忽视的触媒。若是取之巧用于创作实践，既能鲜活揭示生活的本质，亦可达致褒善贬恶、明辨是非的批评效能，从而对净化人们的心灵生发良好的作用。然选材于生活付诸诗创作实践时，须从特殊角度切入以取得客体的精髓给予体现，才能使所写作品具独特的神韵。

从以上表述可得知，现实社会暨内心世界均是诗创作那活水的源头。不过在采用这两种截然迥异的题材入诗皆须重视表现手法的灵活运用，有些素材可用单纯美的写实技法以抒情，有些则要运用繁复美的错变技艺以表意；所谓写实型技法即是由此及彼、形象序列、表意直接的创作手段，而所谓错变型写技则是强调通感、跨越时空的运用、意象重叠的营造等多变之技艺。两者若是灵巧交替用于诗创作，则可望写出诗心深沉、形象丰美的佳作。如再添加富浪漫主义情调之夸张型技巧的掺和使用，必更写得生动多姿、令人阅之而难以忘怀。

另有一要点，笔者要特意提及的，那就是写诗不论以何种技艺落笔，诗心的表达均勿过于浅露或晦涩难解，务要达致蕴藏不露的境界。依笔者的看法，写来疏朗而含蓄当是诗创作至高的未。

凌江月之诗已显露独树一帜的特征

新加坡 仲原

凌江月涉足文苑始于一九八八年，至今仍笔耕不息。她除了写诗之外，兼及写散文诗、小说及散文，说得上是文学上一位多面手。在多种文体叫中，她在诗领域所取得表现最亮丽。

起步写诗时，凌江月倾向于单一的表现手法，诗心的显示稍嫌直露，这是一般初写诗者难以避免的缺憾。惟经一段时期的磨练后，诗艺渐悄然走向成熟。可以说，到了后期表现手段已然改变，多采用象征的技法以体显内心的感受。正因此故，近几年所写之诗，有不少作品具有多义性，隐露诗意图朦胧的特色。此乃她力求提升诗艺、经长期努力所换得成果。

笔者总认为，写直露的诗，常不如意蕴朦胧之作所含的诗味浓烈。不过，有一点得要指出，笔者所说的朦胧并不等同晦涩，而是含蓄的延续；意指诗行间虽有跳跃性，但却留有暗示性的伏线，得让人阅读时能依轨迹而作出联想，不至陷于谜般难解的困境。凌江月后期的诗已具蕴藉表意的潜能，可望日后写出更成熟之作。须知，写诗欲求达致诗质纯然的境界可不易，不经摸索过程中努力求变创新，是无法在诗创作的征途上走出一条别具一格的路向。而凌江月正朝独树一帜的目标迈进。这从她写诗历程的演变可看出端倪。然她的努力能否收到预期的效果呢？到目前还很难下论断。不过，笔者相信，只要多涉猎不同流派关于诗的理论，进一步加深对诗质的认识，多吸取不同诗派的优点，而后融人诗作中，持之以恒走自己的路，是有望如愿以偿的。

为了印证对凌江月写诗所抱的期待言之

有据，笔者特此引录两首诗加以简析，便可从中看出，她具有在诗领域取得别具一格的潜能——

一弯孤月

将轻易地跨过

广阔无垠的天际

一根寂寞的弦

只需凑合了旋律

琴声不会休歇而孤立

一朵挂在边缘的菊

挽不住浪荡的秋风

忽视淡黄菊色

逆水而去

菊的郁悒

最怕浪潮来袭

催下零落的花瓣

随着大浪漂离

不曾驶入

热闹的城市

只得穿越边缘的隙地

不愿接触喧嚣

只能走近稀疏的林木

已是渐沉渐冷的时刻

掌握一片蓝天

不是菊的本性

期盼东篱

也不是菊文化的主题
——城市边缘的一朵菊

此诗运用象征的技法以抒怀，看重于体现心世界的感念，隐含哲理的色彩，意在显露作者淡然面对喧哗生活的心态。她借用所营造之菊花意象以暗喻自我虽处于城市生活边缘，然不作非分的奢求，但望有一隅立足之地便够了，既不敢妄想活着能掌握一片的蓝天，也不期盼他日得以在东篱下悠然享乐，乃因她认定生命的存在价值有如“一根寂寞的弦／只

需凑合了旋律／琴声不会休歇血孤立”。作者如是表意时，是以淡雅的诗行加以体现。遣词用字不落俗套而略显创意。例如为表达内心隐忧，作者不以直露的写技显示，而以朦胧的诗句作隐约的显露“菊的忧悒／最怕浪潮来袭／催下零落的花瓣／随着大浪漂离”。如是的写法，刻意在诗行留有较大的联想空间，目的在于增浓诗味。与《城市边缘的一朵菊》所抒发的淡定情怀迥然不同，凌江月另一首题为《沿着生命的边缘走下去》之诗，在内涵表达上呈现出的情绪带有愤满之象。——

一切待列的风景都苍白后
满眼姹紫嫣红即将褪去
能便心中灵动的一隅
也快被喧嚣所淹没
那份涂满泥沼的心情
一再陷入迷惑的旋涡里
茫然若失的迷惘中
竟还保存着一双诗意的眼睛
在情绪慌乱的片刻中
冒出一丝朦胧景象
牵动犹豫的神情
引发探索的憧憬
在触动灵感的字里行间
依然有梦在驰骋
若要诗的脚步
在生命的边缘走下去
就得继续寻找
那片白色的土地

此诗写来风韵委婉，意蕴隐含于内而不露，一起句便引入注目“一切期待的风景都苍白后／满眼姹紫嫣红即将褪去”很能传达出她悲切的心境；一种在逆境中求存、追理想的亮丽情思，由于所抱的期待无法实现而因之笼罩着愁怅之迷露。作者只通过两行诗加以表意就悄然散发出来，用字说得上既精简又有创意。

尽管生命处于茫然若失的迷惘中，诗人的思绪不因此坠入绝望之渊，她依然保有寄情于诗的赤忱，常藉之以排遣苦闷，从而得以走出无奈的困境，决意续“沿生命的边缘走下去”。这样一来，诗中原先略嫌消极的情绪，由是转化为对生命的重新审视后而发出勇于面向现实的呼唤，致使诗内所蕴含的沉郁氛围稍变爽朗。

以上两诗的内涵一经剖析，再加细读其他未加引录之作，不难看清凌江月的诗作特色：写诗喜用象征的技法以抒怀达意，造象不落俗套，例如在《泥塑历史，泥塑心情》一诗里，她因游故城有感而落笔指出“历史将柔软的泥／塑成坚硬的垣壁／泥塑过的王朝／兴盛在遥远模糊的年代里”便不是俗套，而暗喻明比常以奇特方式显示，例如她在《相约：在秋季》一诗中提到季节的转换时，以“想必是秋日里的枫红／渲染了你的心境／早已将夏的绿意／遮掩在时光的背影里”四行诗即作出生动的形象。

有一点，笔者要指出的是，对凌江月的诗作深入解读后便察觉，她的作品由于多倾向于内省经验的抒发，因而染有淡淡的自我色彩，但却有一部分心血结晶偏重以写实为基素，则隐含批判现实的浓郁色调；换言之，她写的诗除了蕴含小我的氛围之外，亦常兼有大我的神韵，说得上诗作的面貌新颖多变。依笔者个人的看法，凌江月的诗之所以具备如是优点。乃因诗人创作时取材多样化有以致之。君不见，她某些诗作既有对社会病态作尖锐的揭露，亦有对环保的生态给予殷切的关注和对人文精神的高度重视。例如诗人因目睹烂赌者的丑态而表意时，就在题为《虚拟幻象》一诗中毫不留情道出心里话，直指赌徒的追梦是虚拟幻象，

说它总有一天会像玻璃那样爆裂成碎片。诗人在另一首题为《水梅梦影》的诗里表达了对美好景物流失的人文关怀：她为莫泽熙所苦心培植的大批盆景在狮城不受重视，以致转送到他国保存深有感触，认为任由如是精湛的绿色技艺平白流失实属不该，诗人为此而：写诗以表愤慨。为扩大诗创作的取材范围，凌江月也曾写下一些暗含哲思之作、其中有一题为《失落岛屿》的诗写来悲惨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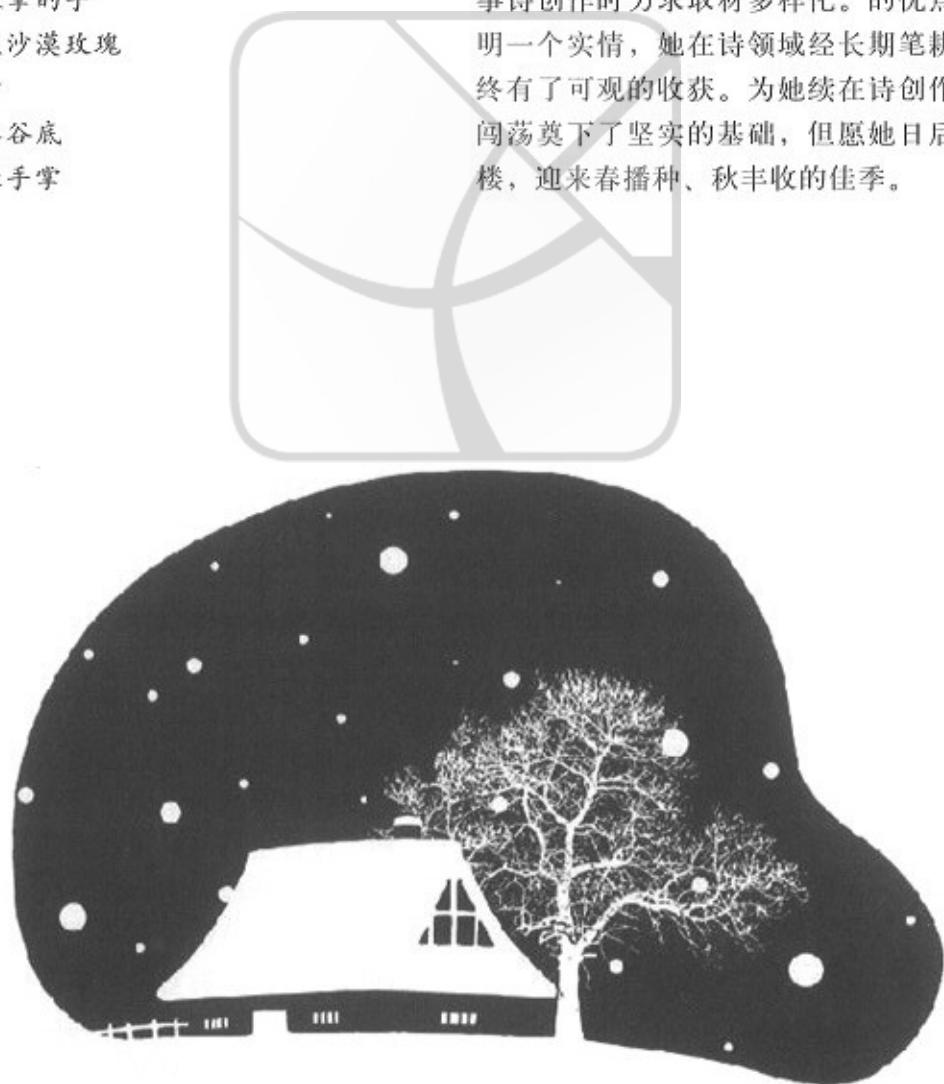
一份盈满倦意的心情
沉沦在城市一隅尝试再飞的劲度
已降至零的边缘

培植过仙人掌的手
总希望培植沙漠玫瑰
干旱的风沙
将生机沉落谷底
纵有一双绿手掌

也难养活一株
野雏菊
……

显然的，诗中所显露的思绪虽说稍嫌消极，然对饱经生活之风霜煎熬者来说，却是一种真情的流露，此乃对冷酷的现实所作无奈的抗议。试想“干旱的风沙／将生机沉落谷底”亦即陷于极度逆境时欲求脱困又谈何容易？须知“培植仙人掌的手”纵然灵巧，也难在沙漠裁出玫瑰。如是一写不就把在生活中悟出的哲理巧妙地道出来吗？

笔者举诗两首，又节录最多处诗行作为简介凌江月的诗作特色之依据，并道出她在从事诗创作时力求取材多样化。的优点，意在说明一个实情，她在诗领域经长期笔耕的结果，终有了可观的收获。为她续在诗创作的征途上闯荡奠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愿她日后更上一层楼，迎来春播种、秋丰收的佳季。



菲华新诗史料汇集

菲律宾 云鹤

菲华新诗史料中的“诗选”与“个人诗集”部份，三年前笔者曾在报端刊发一次，因资料缺乏有所遗漏，现虽重新整理，应尚不能尽善，欠缺与谬误，盼诸前辈指正。

自二十年代末迄今，菲华新文学已走过近八十年，据有关史料，诗人许冬桥二十年代已开始在华文报刊上发表新诗作品，但八十年来新诗选集与个人诗集，笔者个人资料中只有寥寥几十册！

现笔者把这十册诗选与个人诗集的出版年代、出版机构、编（著）者以及选集目次稍加整理，列下以供参考：

诗 选

《海》：一九五一年一月长城出版社出版，柯叔宝、施颖洲合编。收入本予、邢光祖、杜若、亚薇、芥子、林立、明德、若海、浪鹏、梅津、许冬桥、荒山、尔蓝十三人二十七首诗。另收入施颖洲、施秀英二人译诗七首。

《菲律宾华侨新诗选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第一出版社出版，亚薇主编。收入芥子、邢光祖、亚薇、杜若、若艾、小英、绿石、林立、龚震、本予、庄稼、黄明德、白雁子、梅津十四人六十四首诗。

《一九六一自由诗社选集》：一九六一年三月文教出版社出版，自由诗社编。收入该社社员小夜曲、月曲了、冬松、冬云、艾鸿、念强、南根、南山鹤、浪村、夏牧、海雁、海韵、晚霞、云声、云鹤、嵩山鹤、剑鸿、衡山雁、薇明、蓝菱二十人九十五首诗。

《诗潮第一年选》：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以同出版社出版，云鹤主编。该诗选主要收入华侨商报《诗潮》诗专版中发表的诗作，共收有菲华及台湾两地五十二位诗人，一百零三首诗，其中菲华部份有小夜曲、月曲了、白凌、艾鸿、吴天霁、念强、和权、南根、洪维扬、浪村、夏牧、海韵、陈恩、渊云、云谷、云龙、云鹤、嵩山鹤、剑鸿、燎原炎、蓝菱二十一人四十九首诗。

《菲华新诗选》：一九八三年十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菲华新潮文艺社选编，收入丁香山、云山海、月曲了、文志、云谷、忆梅、云鹤、叶若迅、艾鸿、白雁子、江一涯、亚兴智、刘岷、伊凉、刚敏、谷风、吴天霁、克明、陈恩、若艾、英奇、林海、林淙、诗雁、宝颜、施曼、秋笛、晓阳、浪村、浩青、海韵、曼、嵩山鹤、楚复生三十四人一百十七首诗。

《玫瑰与坦克》：一九八六年九月台北林白出版社出版，张香华（台湾）、主编。收入月曲了、文志、王若、王勇、平凡、白凌、白雁子、江一涯、吴天霁、林泉、林泥水、和权、南根、亚薇、浩青、佩琼、若艾、陈一匡、许芥子、许露麟、庄垂明、陈默、寒松、云鹤、楚复生、绿萍、剑虹、郑承伟、刘岷、蔡铭、静铭、谢馨、灵随三十三人九十首诗。

《万象诗选》：一九八八年十一月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现代诗研究会选编。收入一乐、小蓝、心宇、王勇、白雁子、林泉、林健民、明澈、和权、若艾、南根、浪村、夏牧、夏默、陈一匡、寒松、云鹤、楚复生、叶若迅、蒲公英、玮松、剑虹、郑丽玲、晓阳、谢馨二十五人六十六首诗。该选集一九九〇年一

月由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翻印出版，书名改为《菲律宾万象诗选》。

《菲律宾泰国新加坡三国诗选》：一九八九年七月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云鹤、贺兰宁、潘亚瞰合编。菲律宾部份由云鹤选编，收入一乐、月曲了、文志、王勇、云鹤、许冬桥、刘岷、庄垂明、玛宁宁、明克兰特、吴天霁、亚兴智、和权、林泉、明澈、南山鹤、晓阳、谢馨、蒲公英、楚复生、静铭二十人六十二首诗。

《千岛诗选》：一九九一年一月千岛诗社出版，千岛诗选编辑委员会选编。收入该社菲华及台湾社员三十四人一百七十首诗，其中菲华有一乐、小钩、文志、心宇、王勇、王锦华、月曲了、平凡、白凌、江一涯、吴天霁、林泥水、卓培林、南山鹤、幽兰、浩青、佩琼、范零、陈一匡、陈默、高陵、许露麟、庄垂明、曾幼珠、张斐然、张灵、郑承伟、蔡铭、刘岷、谢馨、灵随三十一人一百五十九首诗。

《杂碎TSAPSUY》：一九九七年华裔青年联合会出版，施华谨译著。此书乃施华谨多年来以菲律宾国语「大家乐」文译著的有关菲律宾华人的论文及文艺作品，全书共分六辑，其中第三与第四两辑为华人学者、作家、诗人反映菲律宾特色的文章与诗作的翻译。第四辑收入云鹤、吴天霁、白雁子、英奇、谷风、亚兴智、陈恩、晓阳、文志、刘岷、月曲了、吴文焕十二人三十二首诗（中菲对照）。

以上十册诗选中，一九九七年出版的菲文文集《杂碎》中的菲华诗选，仅占全书六辑中的一辑，该书译著者以反映菲华的内容为选材重点，严格说来，并不足以代表菲华新诗的时代风貌。

一般选集，其内容与风格，大抵依赖于编辑者个人的喜恶，以及其接触的范围。而各别团体选编的选集，亦局限于其组织中的成员之作品。上列十册选集，不乏以此自囿的例子。

个人诗集

笔者个人搜集的菲华新诗诗人个人诗集出版资料，仅有以下寥寥数十册：

- | | |
|------|-------------------|
| 1975 | |
| 许冬桥 | 《船》 嘉禾出版社 |
| 1959 | |
| 云鹤 | 《忧郁的五线谱》 以同出版社 |
| 1960 | |
| 白雁子 | 《白雁子诗选》 华侨第一出版社 |
| 小英 | 《北斗》 椰风出版社 |
| 嵩山鹤 | 《被牵引的灵魂》 华侨图书公司 |
| 蓝菱 | 《第十四的星光》 新疆印务公司 |
| 南山鹤 | 《恋的哲学》 华侨图书公司 |
| 云鹤 | 《秋天里的春天》 以同出版社 |
| 1961 | |
| 白雁子 | 《年灯》 大路出版社 |
| 亭玄 | 《原野》（不详） |
| 云鹤 | 《盗虹的人》 以同出版社 |
| 云谷 | 《黑色的回音》 文教出版公司 |
| 1962 | |
| 云鹤 | 《蓝尘》 以同出版社 |
| 亚薇 | 《情诗三十首》 新疆印务公司 |
| 1964 | |
| 蓝菱 | 《露路》 蓝星诗社（台湾） |
| 1967 | |
| 林泉 | 《窗内的建筑》 笠诗社（台湾） |
| 1963 | |
| 云山海 | 《寄你的祝福》（不详） |
| 1972 | |
| 寒松 | 《流星集》 耕园文艺社 |
| 林泉 | 《心灵的阳光》 笠诗社（台湾） |
| 1973 | |
| 蓝菱 | 《对答的枝桠》 创世纪诗社（台湾） |
| 1975 | |
| 若艾 | 《大赌赛》 剧艺出版社（台湾） |
| 1985 | |
| 许冬桥 | 《寻梦集》 嘉禾出版社 |
| 云鹤 | 《野生植物》 友谊出版公司（中国） |
| 1986 | |
| 月曲了 | 《月曲了诗选》 林白出版社（台湾） |
| 和权 | 《橘子的话》 林白出版社（台湾） |
| 1988 | |
| 蒲公英 | 《四十季度》 世界日报社 |

玛宁宁 《我的诗》世界日报社
 明澈 《起点》世界日报社
 1989
 云鹤 《诗影交辉》摄影画报有限公司
 (香港)
 林泉 《树的信仰》菲华文化事业公司
 1990
 刘岷 《小镇车站》友谊出版公司(中国)
 谢馨 《波斯猫》殿堂出版社(台湾) 谢馨《说给花听》(中英对照, 施约翰英译) 殿堂出版社(台湾)
 1991
 和权 《你是否抚摸到衣襟上被亲吻的痕迹》华晔出版社(台湾)
 1992
 和权 《落日药丸》现代诗研究会
 1994
 明澈 《野水莲》首都文具制造公司
 1997
 林泉 《视野》现代诗研究会
 1998
 吴新钿 《吴新钿诗集》华文作家协会
 平凡 《平凡的诗》洪仁玉
 2000
 江一涯 《菌之永恒》华文作家协会
 苏荣超 《都市情缘》亚华作协菲分会
 玛宁宁 《音鸣: 一本诗集》(中、英双语诗集) ANVIL
 2001
 张琪 《想的故事》亚华作协菲分会
 庄垂明 《瞭望台上》庄良有
 谢馨 《石林静坐》(自印)
 2002
 吴天霁 《耶稣的怀念》宿务东方学院
 月曲了 《月曲了诗集》王国栋基金会
 云鹤 《云鹤的诗一百首》世界日报社\KAISA
 2003
 云鹤 《云鹤的几首诗》(中外文对照)
 (自印)
 白雁子 《白雁子诗选》陈永裁
 2004

平凡 《平凡诗集》文史哲出版社(台湾)
 2005
 叶来城 《白凌诗集》文史哲出版社(台湾)
 2006
 云鹤 《野生植物及其它》(中英对照)
 福建电子音像出版社(中国)
 2008
 吴天霁 《跨世纪诗选》菲律宾让德吴氏宗亲总会
 2009
 王勇 《王勇诗选》菲律宾博览国际传播公司

除以上诗集外, 尚有二套华语朗诵光盘的制作, 分别为:

1999
 谢馨 《新诗朗诵》(自制)
 2006
 明澈 《明澈的诗》福建电子音像出版社(中国)

后记

以上数据如果完整的话, 菲华新诗坛从一九五七年至二〇〇九年五十二年, 扣去菲律宾军事统治八年(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九)无华文出版物, 四十多年中菲华新诗诗人仅出版个人诗集五十五平均每年仅一本强, 成绩实在薄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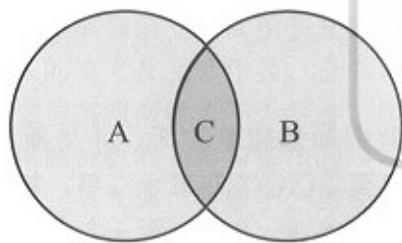
不可否认的, 由于环境并不鼓励文艺书刊的出版, 尤其是诗集, 菲华有许多优秀的新诗诗人迄今尚无个人结集出版。

东南亚七国华文诗人自发组织的「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 目前正策划编纂《东南亚华文新诗史稿》, 菲华部份在资料极端缺乏的困境中, 笔者不自量力地把五十年来新诗诗人个人诗集书目尽力收集整理, 相信必有欠缺与谬误之处, 盼诗友与读者们不吝纠正与提供宝贵的意见。

汶莱华文文学的主要推手

林岸松

汶莱华文文学(汶华文学)基本上由三组 / 类主要参与者组合而成，他们是：写作者(A)；文学活动者(B)；文学工作者(C)，这三组 / 类参与者对汶华文学 / 坛各作出不同程度的贡献。本文尝试用Venn图——利用相交或重叠的圆形来解说各组合的性质和组合间的相互关系——来帮助读者更进一步去解读这三组 / 类参与者的紧密连接。三者对汶华文学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孰重孰轻，本文略有述及，读者也可自行分析或下结语。



图、汶华文学的主要参与者 / 推手写作者(A)；文学活动者(B)；文学工作者(C)。

写作者(A)：或称作家，他一般鲜少或没有参与文学活动，主要是把精力放在写作文章(例如诗歌、散文、小说)，发表或刊登在华文报副刊文艺专栏、文学刊物，或把作品结集出版成书。写作者可以比喻成文坛上的“先驱”，若不是先有文学作品，也就不可能会有文学活动者或是文学工作者的存在。汶莱——甚至是供应华文报刊到汶莱的砂拉越——目前的文学环境，并未有全职作家的出现，写作者除了自食其力写文章供发表

外，有一些也同时介入文学活动。如果写作者也介入 / 涉及 / 参与文学活动，他即提升到文学工作者(C)的层次，即是集写作者和文学活动者于一体， $C=A+B$ 。

文学活动者(B)：他一般鲜少或没有亲自写作文章，但却介入一些不同性质的文学活动，例如参与文学研讨会或聚会，接待外地作家或文学工作者到访汶莱，协助把汶华文学作品或文学团体介绍给媒体，赞助举办文学活动或设立文学基金。文学活动者对推介汶华文学也做出了一定的和肯定的贡献，至少他的存在使到更多人(尤其是本国和砂拉越的读者)知道和了解汶华文学 / 坛的情况和现状。文学活动者也包括一些不甘寂寞，爱搞宣传和搏出位，利用报纸媒体促销自己和把自己与文学 / 化界挂勾，如社会闻人一样赶场作秀的一类人物，有者 / 时也带有意识形态或“帮会”的动机或色彩。一旦文学活动者也介入写作文章，他即跃升到文学工作者(C)的层次，即是集文学活动者和写作者于一体， $C=B+A$ 。

文学工作者(C)：他是汶华文学三组 / 类主要推手中最“德高望重”者。他可以是写作者经常参与文学活动($A+B$)，或文学活动者经常参与写作($B+A$)。他身兼两种主要的文学任务或身份，既是写作者也是文学活动者，除了常有文章在报刊文艺园地或文学刊物上发表外，也常参与各种文学活动，例如到国内外参与文学研讨 / 座谈会，担任报纸副刊文艺专栏或文学刊物的编辑工作，推动本国

华文文学的发展和提高其知名度，把汶华文学作品通过各种管道包括互联网介绍到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团体，他对汶华文学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并不亚于甚至凌驾纯粹的写作者或文学活动者，因他集后二者于一体。

上述三组 / 类文学参与者的定位并不是处在一种固体 / 定状态。如果一名文学工作者(C)因频频参与文学活动而没有时间或鲜少致力于写作，有一段长时间没有再发表文章，他的“文学工作者”地位也跟着转变成或还原到“文学活动者”，即B=C-A。同样的，如果一名文学工作者(C)因他在文学活动中鼓吹某种意识形态而遭到排斥，他也仅有还原到“写作者”的位置，即A=C-B。

如果一名写作者，他本身仅致力于写作文章而没有参与写作以外的文学活动。他充其量也仅仅是一名写作者或作家：一旦他除了写作之外也参与文学活动，他即成为文学工作者(即身兼写作者和文学活动者)。如果一名文学活动者仅仅是在搞文学活动而没有从事写作供发表在报刊书籍上(例如我们在华文报章上常看到的那几位熟悉脸孔)，那他也仅仅是一名文学活动者：一旦他也介入写作和常有文章发表，他即跃身为文学工作者(即身兼文学活动者和写作者)。

一个社会团体，如果仅仅有写作者(作家)而没有或缺少文学活动，这个社团的文学依然活着，虽然会较为沉寂和低调。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团体设有了写作者，文学活动也会

因缺少了提供活动的“原料”而声销迹匿。写作者的重要性更甚于文学活动者显而易见。如果一个社会团体写作者人数寥若晨星而文学活动过于频繁，这可能是不正常的现象，倒过来才是可喜的情况。再者，写作者要有自知之明，若参与太多的文学活动，势将影响到写作的成绩和素质。生活在现今这个时代的作品人，除非下了最大的决心，尽量杜绝一些(不必要的)与外界的关系，减少一些无谓的应酬和活动，否则他不太可能有充裕的创作时间，以致难生产出有一定水平的文学作品。

以上三组 / 类文学参与者(或文学推手)的分组 / 类仅是作者个人主观的看法。按照以上三个组合或类别，汶莱华文文学的部分——本文仅例举7位、参与者名单如下：写作者(A)：海庭、梁友情、林岸松、刘华源、一凡等人；文学活动者(B)：海庭、刘华源、孙德安、一凡、俞庆在等人；文学工作者(C)：海庭、刘华源、一凡等人。名单中名字同时出现在A、B、C三个组合或类别当中的文学参与者即是汶莱华文文学界的最主 / 重要的推手，他们集多项任务于一身，孜孜不倦地从事崇高的文学工作，数十年如一日，受人敬佩，他们对汶莱华文文学的推展和发扬光大所作出的努力和奉献值得称颂。



从网络术语 看中西思维的碰撞与融合

新加坡 卓梅华

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的动机

电脑科技起源于西方国家，它的进程和发展自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面世以后直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都是由西方国家所主导，尤其是美国。因此，这一领域的术语绝大部分首创于西方国家，以英语形式问世的电脑术语需待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其较权威的或较通用的汉语形式才会出，被收入工具书中。英语作为电脑术语的主要载体可说是占尽了优势。相对来说，汉语在电脑领域里则成了较弱势的语言。

将英文电脑术语翻译为中文不单涉及语言的转换，还涉及文化的转换，更是思维交换的过程。翻译活动之所以能够进行，是因为人类具有共同的思维规律，即思维共性，但人类思维除了具有共性之外，还具有个性，即思维的民族性。不同的民族，其思维方式自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在语言上就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透过语言这种形式去透视和探悉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契机。

一般学者在描述中西思维差异时习惯用对峙的两分法。有人认为“东方的思维方式为精神的、内向的、整体的、直觉的和主观的，西方的思维方式是物质的、外向的、分析的、逻辑的和客观的……西方人重视准确性，东方人喜欢模糊性。”¹也有人说：“中国思维注重语言的整体性、象征性和暗示性……而西方则

重视语言的分析性、逻辑性和形式结构化。”²

随着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各民族间的交流日益密切，不同民族的价值观也因此相互影响、渗透，出现了异文化交融的现像。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以上所列举的思维对峙两分法是否还合乎时宜？崛起的中国在电脑领域里有后起直追的迹象，中西思维的差异在这个科技领域里是否因此被缩小？即或不然，是否能够体现以上所述的思维方式？笔者对这些问题深感好奇，于是决定从中英电脑词汇的造词法和词义为依据，对其进行归纳分类、对比研究。目前电脑词汇的数量很多，有些出版的词典或词汇就有10万余条，如果是逐条去讨论，那将是耗时费力的工程。为了比较深入地进行对比，论文将集中研究网络术语。

二、研究的价值

将电脑术语从英文翻译成中文在本质上是思维方式的转换，因此它们之间是有可比性的。这一对比有助于揭示不同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从而提高跨文化交际和科技翻译的精准程度。探索电脑术语本身就是一个有价值的课题。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有利于人们更好地掌握电脑语言，从而更好地使用电脑，并且有利于电脑术语的命定、审定、统一和规范化。目前有关电脑术语的研究都是集中于对英文词汇和文体的分析、海峡两岸电脑术语的协调一致问题、电脑词汇对修辞的影响等等，但

1. 廖七一，《文化观念与翻译》，四川外语学院，2002年，176、180页。

2. 毛海燕，《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与差异》，哈尔滨师范大学，2007年，第六期，211—212页。

从思维方式这个层面来比较中英电脑术语的则缺乏。笔者希望这篇论文研究能够填补这方面的空缺，并发挥抛砖引玉的作用。

三、名词释义

电脑术语

“术语是凝集一个学科系统知识的关键词。”³它是专业用言的核心组成部分，而电脑术语是指信息科技学科中的专用用语。它基本上可分为四大类：软件术语、硬件术语、操作术语和网络术语。

网络术语

网络术语的词汇体系可分为四大类：网络硬件、网络软件、网络操作、网络安全。

“网络软件”是网络可运行的全部程序的总称，它包括了为运行、管理、维护和开发网络所编制的程序、编程语言和协议（例如：package—软件包，FTP—文件传输协议。）“网络硬件”是构成网络系统的各种物质实体的总称（例如：modem—调制解调器，gateway—网关）。“网络操作”是指人在操作网络时所使用的指令或操作方式，使电脑执行不同任务的语言（例如：download—下载）。网络安全是指为维护网络的安全而设置的各种软体和硬体设施（例如：firewall—防火墙，two-factor authentication—双重认证），它也包括危害网络安全的电脑病毒（例如worm—蠕虫）和防病毒的程序。

思维模式/方式

思维是大脑的一种功能，是人类以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反映客观世界的过程。当人们习惯性地遵循某种一程序或角度进行思考，就是思维方式。根据同文培的定义，思维模式(Patterns of thought)有别于思维方式(method of thinking)。所谓思维模式，指的是“用以进行推理、思考和解决问题、带有一定文化特色、相对比较固定的认知图示

或心理过程。”⁴而思维方式是思维模式框架下的一个支架，它是指“由成套的思维程序或步骤组成的、较为具体的、或简或繁的方法体系，是指着眼于思维活动的具体行为的思维类型分类，其动作性最强，也属于相对动态的概念。”⁵这篇论文在谈到思维方式时并不特别去区分二者，而是揉合了二者的定义。

词义

词是句中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而词的意义就简称词义，是词的语音形式所表达的内容，是“人对客观事物进行主观认识的结果……是客观世界在人们头脑中的概括反映……概念存在和表现的形式。”⁶有些学者认为“词并不就是概念，二者的区别是：词义是词的内容，概念是思维的方式。”⁷本篇论文在提到词义时并不特别去区分二者，而是涵括了二者。由于所研究的课题是与科技有关的电脑术语，全篇所着重的是概念义（即词义中同表达概念有关的意义部分），色彩义则不在讨论范围内。

四、研究范围

本论文的研究范围将专注于网络术语。随着互联网的应用与发展，形形色色的网络词汇应运而生。广义的网络词语大致包括与网络有关的专业术语（即网络术语）、网络文化词语（博客、网吧等）和网络聊天用语（如美眉、菜鸟、灌水等）三类。那些还未经规范、在聊天室和BBS中常用的词语和符号是属于狭义的网络语言，不在术语的范围内，因此它们都不在此论文的研究范围内。选择网络术语的决定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绝大多数的中文电脑词汇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但近几年来，由中国人原创的中文网络术语开始有增加的趋势，许多与网络相关的事物、观念、概念的命名首先出现在汉语中，而非借助英语。因此，在对比中西思维

3. 郑述谱，《术语的定义、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黑龙江大学，2005年第1期，6页。

4. 同文培，《全球化语境下的中西文化及语言对比》，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47页。

5. 同前注。

6. 苏新春，《汉语词义学》，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50页。

7. 杨润陆、周一民编著，《现代汉语》，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72页。

时，网络术语要比其他类别的电脑术语提供更均等的比较平台。即使是翻译词，它们的构词方式还是按照汉语特有的形式，结合了形、声、义和功能。这包括：直译（例如：broadband—宽带，window—窗口）；意译（例如explorer 网络搜索器，package—软件包）；音译兼意译（例如：pentium—奔腾）。

二. 网络在中国十分普及，使用率即将成为全球第一。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北京发布《第2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显示：截止2007年12月31日，中国网民总人数达到2.1亿人，仅以500万人之差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CNNIC预计在2008年初中国将成为全球网民规模最大的国家。⁸因此，研究网络术语要比研究其他类别的电脑术语更具意义性、广泛性和实用性。

由于信息科技突飞猛进，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在与时并进的情况下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习惯为电脑部件定名的，在各自发展的情况下产生差异是十分自然的现像。海峡两岸更因为政治因素在长达30余年隔绝的情况下无法进行科技交流，所以产生了对电脑术语不同的理解和使用。为了比较集中的讨论，笔者在研究网络术语时，将把研究的范围局限于在中国大陆通行的词汇，而不包括其他华人社区所使用的术语。

五、研究的步骤

第一个步骤：界定中西思维倾向

首先，根据前人的研究和文献，在已有的基础上为中西思维在语言上（尤其是网络术语）的呈现进行界定。笔者将选取对中西思维比较具威信性的说法为每个思维方式进行界定。

第二个步骤：界定造词法和词义所体现的思维方式

接着，笔者将在网络术语世界里常见的造

词法一一罗列出来，并为每个造词法和与它相关的词义所呈现的思维方式进行界定。

第三个步骤：选择样本

研究时采用的方法是抽样检测。为确保样本有足够的代表性、涵盖面充足，笔者从网络术语中抽取100对中文词汇和英文词汇，共计200个词汇。在筛选的过程，笔者尽量避免那些生僻的术语和不具可比性的术语，尤其是那些从英文音译过来、不具汉语色彩的音译词汇（例如：copy—拷贝，internet—因特网）。

第四个步骤：对比术语体现的中西思维方式

所筛选的样本就被呈列在【网络术语与中西思维对比分析表】以进行对比，100个英文网络术语对比100个中文网络术语（见附录一）。笔者根据每个术语的造词法和词义所呈现的思维方式进行打分。为了简化打分标准，一个术语所体现的、最明显的思维方式将得到1分思维积分。如果该术语兼具两种思维方式，那就各得0.5分。

每一个思维方式都会有一个“思维组别积分”。所有的“思维组别积分”又将根据它们所属的范畴（“英文术语／中式思维”，“英文术语／西式思维”，“中文术语／中式思维”，“中文术语／西式思维”）被积累成“总积分”。

第五个步骤：做出分析和结论

最后，针对第四个步骤所得到的结果作进一步的分析，以便做出结论。

第二章 中西思维与语言体现

论文标题的“中”是指“中国”。中国文化对亚洲的影响与辐射比其他国家大，其思维模式最能体现东方思维的基本特征，因此一论及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当然是以中国为主。“西”则是指以英国和美国为主的西方。由于英文的国际性影响，英美人的思维成了西方思

8. <http://www.cnnic.cn/uploadfiles/pdf/2008/1/17/104156.pdf>

维模式的代表。

对于同一个事物，中国人和西方人会因为各自文化背景的差异、异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生活方式等原因而引起观察角度的不同，进而产生不同思维方式。中国现代著名语言学家申小龙曾就此课题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着眼于整体而非个体，着眼于动态，而非静态，着眼于事物的功能、属性而非具体结构，而要把握运动形态中的有机整体，不能靠逻辑分析，只能靠直觉顿悟。”这种思维方式非常重视直觉和体悟，因此，带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主观性。

多位中外学者都曾经对此课题做了深入的探讨，基本上他们对中西思维差异的见解颇有共同之处。以下的思维对峙表是集合了各个学者的研究心得，加以浓缩后的要点：

李丹、周晓玲 ¹³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重形象思维 ·重综合思维 ·重本体思维 ·圆式思维 ·顺向思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重抽象思维 ·重分析思维 ·重客体思维 ·线式思维 ·逆向思维
吕艳梅 ¹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重形象思维 ·重群体：整体优先，由大到小、由前到后。 ·内向型 ·重视曲线思维 ·重悟性、辩证思维 ·主体与客体相互混融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重抽象思维 ·重个体：主体为基点，由小到大、由个体到总体。 ·外向型 ·重视直线思维 ·重理性、逻辑思维 ·严格区分主体与客体
王健平 ¹⁵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注重一体性、体悟性、政治功利性 ·注重人与人的伦理关系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理性主义，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研究和发现事物的规律 ·注重人的本质和价值
张治英 ¹⁶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注重辩证思维 ·主体与客体相互混融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注重形式思维 ·严格区分主体与客体

列表(一)、[中西思维对峙两分表]

学者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简称“中式思维”)	西方人的思维方式 (简称“西式思维”)
申小龙 ⁹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直觉思维 ·整体思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重演绎法、抽象和分析 ·区分主体和客体、重客观性
何文培 ¹¹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善于形象思维 ·进行逻辑思维时，偏重归纳法 ·由大到小，从宏观到微观 ·集体本位，趋同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善于抽象思维 ·进行逻辑思维时，偏重演绎法 ·由小到大，从微观到宏观 ·个性本位，求异
李岩 ¹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偏好形象思维 ·偏好综合思维 ·习惯跳跃式思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偏好抽象逻辑思维、 ·偏好分析思维、 ·习惯机械式思维
学者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简称“中式思维”)	西方人的思维方式 (简称“西式思维”)
	注重统一	注重对立

从以上的列表中，我们可以察觉到各个学者的看法都有重叠和互补的地方。为了更集中地讨论，笔者综合了他们所提出的观点，归纳整合出以下几个要点作为本论文的思维依据，并进行界定。

一、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

形象思维是指广泛运用类比的方法，通过具体的事物表达思想感情的思维方式，而抽象思维则是运用概念表达具体的事物，是“人在认识过程中借助于概念、判断、推理反映现实的思维方式。它以抽象性为特征、撇开具体形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¹⁷

中国人的文字是象形文字，以形传意，对

9. 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371。

10. 同前注。

11. 同注4，57—65页。

12. 李岩，《浅谈中美思维方式的差异》，黑龙江：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8年1月，180—181页。

13. 李丹、周晓玲，《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与翻译》，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学报，2006年12月，第六卷4期，57—60页。

14. 吕艳梅，《从思维差异看英汉句法》，周口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17卷第4期，2000年7月，83—84页。

15. 15. 王健平，《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若干特点及变革取向》，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第34卷第1期，2008年1月。

16. 张治英，《英汉民族的思维差异对翻译的影响》，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6月，第八卷，第2期，35—36页。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北京：《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2005年，900页。

形象思维的塑造产生重要的影响。古代传统哲学讲求观物取象，即取万物之象，加工成为象征意义的符号，来反映客观事物。因此，一般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具有较强的形象性，注重直观把握，不太重视纯净意义的抽象，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有较强的抽象性，喜欢用抽象概念表达具体事物。申小龙就此课题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中国人习惯于用相应的具像使概念生动可感而有所依托……汉语的语词对客观事物加以抽象反映的语义也必然有具像性。”¹⁸

这种思维差异表现在语言上是：“汉语较少使用抽象概念的名词，而较多地使用具有实质意义的具体名词；但在英语中抽象名词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汉语。”¹⁹高倩倩认为这种思维差异体现在科技语言的领域里是：“科技汉语表达具体、生动，表现在喜欢用动词来表达具体的行为，倾向于动态，而科技英语则大量使用抽象名词和介词来表达动作和状态，使语言呈静态倾向。”²⁰例如：“奔腾”这个动词和电脑芯片原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但在中文网络术语里却被转化为名词，做为pentium的中文译词。“奔腾”不仅和Pentium有近似的读音，还非常传神地使人联想到芯片强大的力量，充满了动感，极富形象性。

每个民族都具有形象和抽象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只是不同民族有不同的侧重和选择。在英文网络术语中也有不少具形象性的词汇，例如：worm（蠕虫），zombie（僵尸），virus（病毒）等。在中文网络术语中也有具抽象性的词汇，例如：版台、加密、霸道等。

二、综合思维与分析思维

综合思维是指在思想上将研究对象的各个部分联合，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然后才进行由大到小、从宏观到微观的分析。这种思维方式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既见树木，又见

森林。

中国人的传统哲学观是人为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即所谓的“天人合一”，强调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和统一性的认识，注重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因此，比较倾向于综合的思维方式。

分析思维则是在思想上将一个完整的事物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越分越细，才进行由小到大，从微观到宏观的分析。这种思维方式注重把具体问题从总体中分离开来，单个地进行分析、归纳和研究，它促使人们去探索万物的本源、深入地分析事物的本质，很注重准确性和绝对性，但其可能产生的缺点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西方人对宇宙的思考与中国人的整体方式不同，他们的思维模式比较倾向于分析思维。他们在对客观世界进行认识和解析的过程中，以分类方法为主要手段，试图从物象的类别中提出该类物象的共相，再递级上升做抽象性的概括，将各类物象的共相归在一起。

有些学者认为，这种思维上的差异表现在语言上是：“英语造句重视形式、注重显性接应、注重以形显义，而汉语造句注重隐性连贯、注重功能、意义、以神统形。”²¹另一些学者如付桂桂、廖涛等人则认为综合思维在汉语语言中的体现是使用意合句，分析思维反映在语言上是注重形合句。若单就词义来看，综合思维方式表现在语言上是：许多词汇运用了相同的语素，以类聚的方式出现在词典中，体现了它们之间的同源关系和普遍联系。

三、主体思维与客体思维

中国传统哲学以人为本，倾向于用主体修养代替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认为认识了人自身也就认识了世界。国学大师钱穆对此有精辟的见解：中国文化以人文为中心，以人为本，最富人文意识，最重人文精神。这种人本文化的长期积淀，形成了中国人本体型的思维方

18. 同注9，334页。

19. 同13，58页。

20. 高倩倩，《中西思维差异与汉英科技文体对比》，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9卷，397页。

21. 同13,59页。

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们的认知判断常常和价值判断纠缠在一起。这种思维方式从主体的需要和实用出发，以人的伦理道德和审美情趣为标准，凡事都有很强的主体参与意识，主观客观区分不明显。

这种人性因素、情感因素在西方思维方式中也存在着，但没有中国传统思维那样明显。西方民族为了使观察、分析的对象具有客观性，从一开始就将主体和客体严格区分开来，竭力排除主观性。笛卡尔就曾明确地提出把主体和客体对立起来以“主客二分”作为哲学的主导原则。申小龙就认为“西方语言是思维客体化的产物，汉语是思维主体化的产物。”²²

这种思维差异在语言上的体现是：“在句法上表现为汉语常以有生命的名词做主语，而英语则多用无生命的名词做主语……根据统计，科技英语教科书里约有1/3的动词用于被动语态句，而科技汉语则大量使用主动语态。”²³由于本篇论文不包括句子分析，所以在分析对比时将以造词法和词义内涵来分辨主体和客体思维。

第三章 从造词法和词义透视中西思维方式

语言学家认为，思维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如果说思维是语言的内核，那么语言属于词的形式就是思维的外壳，思维支配着人们的语言，而语言也制约人们的思维，它们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因此，中西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必然直接反映在语言上。这在一定的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透过造词法和词义去透视和探讨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契机。

网络术语是近几十年来才出现的新词汇，在创造这些新词时，采用了借用法、复合法、词缀法等方法。本论文将其统称为造词法，由此透视思维倾向。网络术语同任何术语一样，

词义的内涵是对科学概念的体现，更是思维方式的呈现。词的构成方式是属于词的形式研究，虽然人们一向来把词的形式看作是一种纯物质性的语言载体，其实，词的构成方式同样凝聚着人文意义，是民族文化精神的观照。

由于同一个造词法所造出来的术语可以呈现不同的思维方式，如果单就造词法来决定所体现的思维方式肯定是笼统、有缺周全的。为了使到整个界定更加细致精确，词义所呈现的思维方式也在考虑的范围内。

笔者综合了在第二章所论述的中西思维差异和它们在语言上的体现，为网络术语的造词法和它们的词义内涵所体现的思维方式进行了界定。在辨析个别术语所体现的思维方式时，笔者将以这个界定表为准则，把造词法和词义结合在一起考虑（请看下表）：

列表(二)、[造词法与词义—思维体现界定表]

造词法	词义	中式思维		西式思维		
		综合	形象	主体	分析	抽象
借用法	比喻 本体与喻体有共性	表层义 属于物质的、外向的，词义呈静态		✓		
		深层义 属于精神的、内向的，词义呈动态		✓		✓
	假借 本体与借体无共性	假借义 松散随和、非正式。主观性强，带有相对性。		✓		
复合法	合成型	将具体的意义浓缩在一个词汇里，讲究精简。	✓			
	短语型	注重准确性、技术性强。			✓	
	类型型	类型义—与其他词汇具有联系性。	✓			✓

22. 同注9, 2页。

23. 桂桂、廖涛《汉英思维差异与科技翻译》，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第六期，2005年12月，144页

词缀法		客观性强，带有绝对性。				✓
缩略法		结构严谨、精确、信息浓缩、具有概括性。			✓	

一、借用法

新词汇的大量涌现是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深化的结果。但是，如果人们把所有的新事物、新发现都赋予新名称，那么语言中的词汇数量将庞大得令人无法消受。因此，通过“借用法”赋旧词予新义成了网络术语中很常见的造词法，而在这种借用中往往包含着一个转化、引申或假借的过程，即原词的某一义项被扩展、延伸，或原词所描述的事物或概括的内涵被比喻、被象征等等。借用的方式有两种，现详述如下：

甲、甲、比喻—形象、抽象思维

借用法的其中一种类型是比喻，即是“借用一个词的本义来比喻另一种事物。”²⁴ 本义的指称在形态、功能或性质等方面与喻体存在着一定的相似点，这种相似点往往成了借用法的造词理据，即是“通过隐喻或直喻的手法，把一种概念映射到另一种概念中去、赋旧词于新义的一种构词法。”²⁵ 通过比喻型构成的新词与旧词之间只有词义变化而无形式或结构方面的差异，词义所体现的内涵有两种不同层面：

(1) 表层义—形象思维

词汇有“确定的指称对象（包括客观的指物义和凝结在其中的主体意识）、有独立使用价值的意义。”²⁶ 用这种方法造的术语通常是名词性的术语（例如：tree、mouse、笔记本、病毒等），词义呈静态，因此所体现的是形象性的思维方式。

(2) 深层义—形象兼抽象思维

词汇无确定的指称对象，所表达的深层义是“隐含在表层义内部的词义意义。它不与特

定的具体对象相联系，只是一种宽泛、粗略的意义指向，并依附在表层义上起作用。”²⁷ 用这种方法造的术语通常是动词性的术语（例如：surf、crash、霸道、奔腾），词义呈动态，所呈现的是形象兼抽象的思维方式。

乙、乙、假借—主体思维

假借与比喻的不同点是：本体和借体毫无共性，即新词和旧词不论在形态、功能、性质或意义上都毫无相似之处，只不过读音相同罢了。造字阶段的“假借”即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所说的“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在英语的网络世界里有不少这样的术语（例如：hog, boot等）这类借自生活用语的术语展现了造词者的随意性和主观性，虽然他们是以客观的事物为构词的理据，但所显示的却是主观性的思维方式。

二、复合法

复合法(compounded)是指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现有语素重新组合起来（也是既定概念的组合），产生新词的方法。

丙、甲、合成型—综合思维

在英文网络术语里，复合词有不同的写法：紧密式、连接式、松散式。紧密式的复合词往往是“语素+语素”的结合，在书写时是紧密的、不留任何空间。（例如：hot+fix=hotfix。）

在中文网络术语里，用复合法造的术语往往是“语素+语素”的组合。它们的最大特征是：两个语素是不能分离的，一分离之后就不表示原来的意思了。例如“带宽”、“选单”等。

许余龙认为：“对于同样一个语义上较为复杂的概念或事物，如果我们用一个词来表达，那么这种表达方式称为‘综合型’表达法。”²⁸ 因此，我们可以说合成型的术语具有“综合性”的思维方式。

24.周一民编著，《现代汉语》，新加坡管理学院，2002年，59页。

25.郭爱萍，《从构型理据谈科技术语的汉译》，北京：中国科学技术语，2007年第5期，42页。

26.同注6，32页。

27.同注6，70页。

28.许余龙，《对比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53页。

丁、乙、短语型—分析思维

连接式的复合词则是“语素+横线+语素”组合起来形成的术语（例如：digital-analog）。

有时候，由两个语素组合成的合成词并不足于表达一个新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用两个以上的词拼凑在一起形成一个短语式的新术语。“短语是词和词的语法组合，它和词都表示一定的意义。”²⁹（例如：Bandwidth consumption attack）这类英文术语写法松散，每个部分都是一个“成词语素”，都可以独立自主成一个词。因此，“短语不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单位，它是可以分离的，中间往往能插入别的造句成分。”在中文和英文网络术语中，类似这样的术语俯拾即是。

许余龙也认为：“如果我们用一个短句来表达来较为复杂的概念或事物，那么这种表达方式称为‘分析型’表达法。”³⁰因此，我们可以将短语型的术语界定为“分析性”思维的体现。

戊、丙、类聚型—综合兼客体思维

只要打开任何一本电脑词典，就会发现到许多词汇有相同的语素，最常见的语素有data (database, datagram, datachain), band (bandwidth, bandspread), 网(网络、网桥、网卡、网址)等。

这类术语彼此间没有特定关系，但因为共同的语素显示了它们之间的同源关系。苏新春把这种词汇所显示的特征名为类型义——“类型义是指有某种词形联系纽带或标志的、在一群或一类词身上共同体现出来的词的意义要素或词义特征。”³¹造词的人必须具有宏观的视角、整体的观念，才会造出以类聚的形式存在的新词。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类型义所体现的是综合性的思维方式。

此外，这些语素 (data, bytes, band) 的作用和一般的词缀有点类似，它们是用来修

饰、限制另一个语素的。因此，类聚型的术语也和用词缀法造的术语有相似的思维体现，即是客体思维。

三、词缀法—客体思维

词缀法是指在词根上加上前缀或后缀来构成新词的方法。一般来说，所添加的前缀往往对词根的语义加以修饰或限制，并不改变词类，而后缀则具有很强的语法意义，通常会使词类发生变化。在英文网络术语中常见的前缀有micro-(微型)，后缀有-able(具有某种特质或特点)，-er(指操作的人或机器)。一般上，与微小、微型有关的事物就以micro为前缀，属于多元、多项的就用multi。即使是不熟悉电脑术语的人都可以望“缀”生义，揣测其中的意义。

词缀法是人们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构词模式，所遵行的是一种非主观的社会约定性。因此，由词缀法所造的术语所体现的是一种客观性的思维方式。

四、缩略法—抽象思维

缩略法是指把原来比较长、比较复杂的术语按一定的规则简化它们，以便更简要、快速地表达。缩略法有两种：（一）取词组中的开首字母或辅音字母联成一个词。例如：WWW—World Wide Web （二）对原来完整的词进行加工，缩短其中一部分字母，构成新词。例如：email—electronic Mail。

汉语也有缩略词，其缩略词就是事物的名称或固定词组被简化了的称谓。由于汉字是表意文字，一个字代表一个语素或单词，即没有形态变化，也没有表音性，所以缩略词的构成只能以字为中心，围绕字进行缩略，即是抽取词组中的几个代表语素，缀合而成。

缩略法不是人对自然现像的模拟，而是人为规定的信号，是一种结构符号和语音系统的直接对应，具有高度浓缩性、概括性和抽象性的特征。因此，用缩略法所造的术语体现了抽

29.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253页。

30. 同注28。

31. 同注6，33页。

象思维。

第四章 英文网络术语与思维方式

信息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新网络术语的产生自然也就层出不穷。各种不同的造词法在网络术语中可谓展现得淋漓尽致：借用法、词缀法、缩略法、复合法都发挥了它们在构词中的主导性作用，而每一种造词法都体现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现分析如下：

一、借用法

在英文网络术语中，以具体实在、表象可触的客观事物造的新术语还真不少，它们都极富形象性，体现了一般人认为只有中国人才有的形象思维方式。虽然中西思维有很大的差异，但在差异之间依然有一些共性。从以下的例子，可见一斑。

己、甲、比喻表层义—形象思维

列表(三)、【比喻表层义—英文术语举例】

术语举例	词义内涵
Backbone (脊椎或骨干)	连接其他网络的一种大型高速网络或缆线系统，用于远程的数据传送。
Firewall (防火墙)	设置在因特网与用户设备之间的一种安全设施，用以阻挡黑客入侵。
Gopher (地鼠)	互联网上提供双向沟通的查询系统。
Trojan Horse (特洛伊木马)	黑客在正常程序中隐藏一个能破坏系统或进行诈骗功能的程序，乘人不备之际进行攻击。
Worm (蠕虫)	一种自我复制能力很强，以小型计算机为攻击对象的病毒。

backbone的英文本义是指脊椎，支柱或骨干，在网络术语里则是指支撑其他附属网络硬件的枢纽“主干网”，在操作功能上和人的脊椎骨有异曲同工之处。

Gopher的原义是地鼠，但在英文网络术语中却是指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开发的通路诱导系统。信息在网络上钻来钻去，动态上很像地鼠，因此美国人就拿Gopher这个日常用语来套用，这是一种很具形象性的比喻。长年居住美

国的人就会意识到这是美国人幽默地使用一个现有的名词来形容他意的借用字。

Trojan Horse是一种电脑病毒的名称，中文简称“木马”。它是出自希腊神话中的一次战争策略。相传麦尼劳斯派兵讨伐特洛伊国王，他们假装打败，然后留下一个大木马，而木马里却藏着最强悍的勇士。最后等晚间一到，木马里的勇士就冲出来把敌人打败了，这就是后来的“木马计”。英文网络术语中的Trojan Horse是暗喻那些表面上伪装成正常程序的电脑病毒，它们把预谋的功能隐藏在公开的功能里以掩饰真正的企图，一旦这些被程序启动时，它们就会获取系统的整个控制权限。

庚、乙、比喻深层义—形象兼抽象思维

列表(四)、【比喻深层义—英文术语举例】

术语举例	词义内涵
Sleep(休眠)	虚拟机处于静止状态，停止运行，但它可以在一个规定的时间间隔结束时被唤醒。
Crash(碰撞)	网络系统或计算机发生严重故障，而停止操作。
Surf(冲浪)	在互联网上浏览网页的动作

“冲浪”是盛行于西方的水上体育运动，是充满刺激性的运动。冲浪者站在冲浪板上迎接每一个接踵而至的浪涛。他们以高超的技巧平衡自己的身体，顺着每个浪头的势头浮站在海面上。若是浪头翻滚过高，人不敌巨浪被抛落水中，冲浪者就要在半浮半沉之际快速重新站立起来，迎接下一个浪涛。当人们在互联网上浏览时，排山倒海而来的信息瞬息万变，令人应接不暇。由于信息的转递非常快速，一切充满变数，这和冲浪的刺激性有相似之处。Surf这个借自生活用语的动词很形象地勾勒出人们从一个网页漫游到另一个网页的行径，与此同时，它也转达了表层义下的深层意蕴—网络讯息的万变和使用者的应接不暇，这是抽象思维的体现。

辛、丙、假借义—主体思维

在英语的网络世界里，有不少应用“借用法”造的术语，但它们与原词不论在意义、形态或性质上都完全风牛马不相及，没有相似之

处。例如：

列表(五)、[假借义—英文术语举例]

术语举例	原义	假借义
Bed	床	版台
Boot	靴子	驱动
Bus	巴士	总线
Clobber	击打	乱码
Demon	魔鬼	端口监督程序

二、复合法—综合、分析、客体思维

在英文网络术语中，复合词主要分布在信息性文本中，但也延伸到程序性领域中。随着新科技的发明、新软件的推出，用复合法造的词汇量也在迅速增加。

列表(六)、[复合法—英文术语举例]

类别	术语举例	思维体现
合成型	紧密式：Hot+fix = hotfix	综合思维
	net+work = network	
	Pass+word=password	
短语型	连接式 digital—analog off-line	分析思维
	松散式 Bandwidth consumption attack One-way encryption algorithm	
	Store-and-Forward Switch	
类聚型	Databank database datagram data bits data chain	综合兼客体思维
	Bandwidth Bands scrambler band spread band pass band splitter	

三、词缀法—客体思维

采用前缀构成的单词在英文电脑术语中占的比例比较大，词根加后缀比较少。常见的前缀有micro-, inter-, multi-等，后缀有-er, -able, -ing等。

列表(七)、[词缀法—英文术语举例]

词缀法	术语举例	词义内涵
词根 + 后缀	Encryption (加密)	纯文本数据变成密文的密码转换过程，可以隐藏起数据本来的意思，以防止被别人了解或使用。
	Server (服务器)	保持主机与网络的连接的电脑硬件，以回应客户端传输给主机的要求。
	Scheduling (调度)	在操作系统中，对计算机系统资源的管理，称为调度。
前缀 + 词根	Debug	确定和修正程序中的故障或错误。
	Decode(译码)	编码的逆过程，即将按一定规则编码的字符转换成原来的数据。
	Microchips	微型晶片
	Microprocessor	微型助理机
	Multiplex	多路复用，即在单个信道上交错传输两个或多个报文。
	Multitasking	多任务处理，即是同时执行或交错执行两个或多格任务的多重程序设计。

Bug原指昆虫，在网络术语里被引申为“故障”，即指程序或系统中的一个差错。这个术语的由来可以追溯到早期使用继电器机械式计算机的年代，一个不可思议的错误竟然是由于继电器的接点之间有一只死昆虫而引起的。后来，人们将bug加上de为前缀（就是“除虫”的意思）用来指确定和修正电脑故障的行为或动作。

四、缩略法—抽象思维

缩写词简练好记，一目了然。这种缩写词法不仅带来书写的方便，加快文本的传输速度，又可节约电脑的内存资源和硬盘空间，因此，缩略词在英文网络术语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使用频率也高。有些缩略词被固定下来后，几乎是已经完全取代了全词。虽然它们看起来很抽象，但对熟悉信息科技的人来说并不会造成阅读上的困难。例如：WWW, DOS, CPU, ROM, TCP/IP, ISP等早已成为行内人耳熟能详的缩略词，而它们的原词倒是被人忘记了。即使在中文的网络世界里，这些缩略词也被全盘吸收出现在科技文献中，没有另译新词。由此可见，缩略词大有后来居上的架势。

列表(八)、[缩略法—英文术语举例]

英文	词义内涵
URL-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URL(统一资源定位器)是描述3w中全球文件及其他资源的地址的术语。它包括了用来访问文件资源的协议名字，标识因特网上某台特定的计算机的域名，以及路径名。例如： http://www.networkdictionary.com/index.php
SAINT Security Administrator's Integrated Network Tool	SAINT(安全管理员集成网络工具)是评估一个网络安全的工具。它能够扫描网络安全缺陷攻击并详细报道这些弱点的广度和严重性，也提供链接来确定和介绍安全程序。
SSH-Secure Socket Shell	SSH(安全接壳)是一种基于Unix的指令接口和协议，广泛应用于网络管理员远程管理网站和其它服务器的工作中。SSH指令以好几种方式进行加密。客户机和服务器连接的两端使用数字证书进行身份识别，口令以加密的方式进行保护。

第五章 中文网络术语与思维方式

英汉译者对于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的新术语的对策就是用汉语语素、语音、词序来创造具有汉语特色的词汇。在英译汉的过程中，除了采用音译、直译，音兼意译外，还需要创造性的翻译。直译是指根据原文的表层意义来翻译的方法，即重视意义，也重视形式。意译与直译的不同点是意译不重视形式，只重深层意义，其目的是再现原词的隐喻意义和精神。在意译的过程中，往往需要造新词。不论是直译还是意译，这些译词是按照汉语的构词方式形成的，所以不算是外来语。

一、借用法

壬、甲、比喻表层义—形象思维

英文网络术语中有不少新词通过比喻法赋

予旧词以新义。针对这种通过比喻法造的英文词汇，英汉译者在直译的过程中通常采用直接对应的词汇，只着重于词的表层义，例如：

列表(九)、[比喻表层义—中文术语举例]

术语举例	词义内涵
笔记 (notebook)	在外形和体积上像笔记本的微型电脑。
病毒(virus)	破坏系统或进行诈骗功能的程序。
后门(backdoor)	入侵者发觉系统的入口有破洞，于是便悄悄地潜入，在对方的系统中植入特定的程序或修改些设置，以方便随时出入。这就好如入侵者偷偷配了一把主人的钥匙，随时进出而不被发现一样。

11、癸

12、乙、比喻深层义—形象兼抽象思维

如果用直译的方法给以下的英文术语造对应的中文词汇，肯定会变得不伦不类，充其量也只能顾到表层义。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求形似，不如求神似，折衷的方法就是用意译把词的深层义表达出来。中国近代学者傅雷曾经提出这样的翻译理论：“以效果而言，翻译应当像临画，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³²这样的理论在网络科技翻译中有很好的实践。从以下的例子可见一斑：

列表(十)、[比喻深层义—中文术语举例]

术语举例	词义内涵	英文原词
窃听	利用同网络接口的个人电脑或其他设施，非法监听和记录他人的数据，以窃取机密。	Line-tapping (搭线)
霸道	指过量使用计算机资源（如内存或磁盘）或需要很长执行时间的程序。	Hog (原指“猪”或“贪婪自私的人”或“鲁莽的驾驶者”)
偷梁换柱	“偷梁换柱”是指在两个通讯者之间进行攻击。攻击者在一个公共密钥交换中截取信息，然后转发它们，取代自己的公共密钥为被请求的一个，这使到这两个最初的通讯人似乎仍在直接通话，但通话的对象已经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改变了。	Bucket Brigade Attack

³² 巴尔扎克著、傅雷翻译《高老头》的《重译本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二、复合法—综合、分析、客体思维

中英属于不同文化传统，因而不存在某种绝对的对应。即使有对应意义的中文词汇，翻译者也选择不用。那是因为有些具对应性的词汇不符合电脑学科中的概念和内涵，不符合科技术语体系的要求和规定。为了加强词汇的技术特征就在翻译的过程中根据英文术语的引申义或隐喻义重新组合，以造新词。在中文网络术语中，用复合法造的术语主要有三种呈现：

列表(十一)、[复合法—中文术语举例]

类别	术语举例	思维体现
合成型	脱机	综合思维
	选单	
	下载	
	密码	
	鼠标	
短语型	带宽消耗攻击	分析思维
	单向加密算法	
	存储转发交换机	
类聚型	数据库 数据表 数据位 数据链	综合兼客体思维
	频带宽度 频带置乱器 频带扩展	

合成型术语的特征是正式、严谨，讲求准确性。在意译的过程中主要是以词义的深层内涵为主，按照汉语的文字特点、语言习惯，结合形态、功能和意义于一体所造的新词。例如，Menu原本直译为“菜单”，但后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委员会》经过长时间的论证和冥想，才选定了“选单”作为menu的术语。

“选”这个字表明了“单”的功能性。这个结合了形态和功能的名词得到很多国内外人士的赞赏，认为它是非常确切的术语，因此使用范围逐渐扩大。

在汉语里，与mouse直接对应的词汇是“老鼠”，但在电脑术语里，译者却选择了以形体和意义结合的译词“鼠标”——“鼠”是喻体；“标”是功能性，强调的是语言的精神层面。“鼠”和“标”这两个语素是不能分离的，一分离之后就不表示原来的意思了。

在中文网络术语中，也有类聚型的术语。有些表现了它们之间的等差关系（例如：千字节、兆字节、千兆字节、兆兆字节），有些则反映了它们之间的同源关系（例如：网关、网桥、网孔、网卡、网页等）。这类术语在与认知对象的匹配中，获得了意指功能，通过同类聚中各个术语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区别，体现出概念间的区别特征，把对象分解开来形成范畴，使到术语有区别功能。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类聚式的术语是体现综合性兼客体性的思维方式。

三、缩略法—抽象思维

虽然一般学者认为，中国人是思维方式是倾向于形象、综合和主体的思维方式，在中文网络术语也有不少呈现西式思维的术语。在中文网络术语里，为了使所造的新词具精简性，缩略法也常是构词手段之一，例如：

列表(十二)、[缩略法—中文术语举例]

术语举例	词义内涵
加强密锁->加密	是指纯文本数据被转换成密文的密码转换过程，作用是为了将数据本来的意思隐藏起来，以防止被别人了解或使用。
领域的名称->域名	在互联网中，域名可用来对某个组织或其它实体进行寻址。例如“www.javvin.com”这个域名可用来对199.20.0.2的网点“javvin.com”进行寻址，而特定的主机服务器名称为“www”。域名中的“com”部分表明该组织或实体的性质。“javvin”定义了该组织或实体。
频带的宽度->带宽	带宽是指计算机之间数据传输的频率范围。在这个规定范围内，所传输的数据量必须在所规定的极限之内。

汉语缩略词和英语缩略词一样，都是高度浓缩的词汇，因此，所体现的是抽象的思维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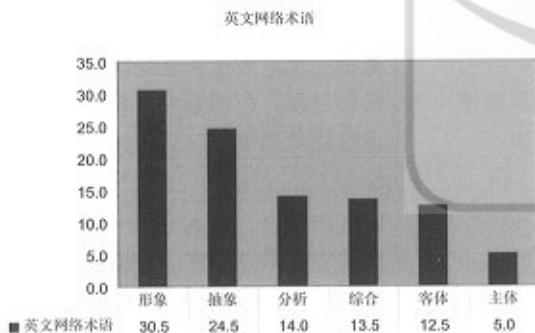
第六章 网络术语与思维方式的对比分析

从第四章和第五章所举的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思维方式在网络术语世界里出现了碰撞与融合的现象。到底这种相互交融的程度有多大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当然要有一些数据来进行验证。笔者从中英网络术语中选取了100对比较常见的术语以进行研究（见附录一）。为了确保所选择的样本具有代表性，在筛选的过程中就特意在网络软件、网络硬件、网络操作、网络安全这四个网络术语类别中各选25个词汇（见附录二）。

一、中西思维组别积分一个别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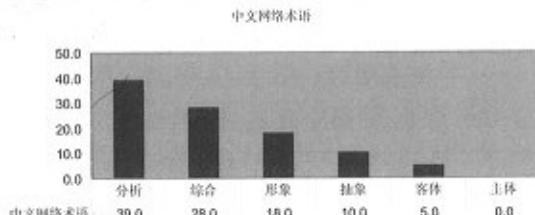
接下来的两个图表是根据思维积分的高低顺序来排列的。中文网络术语和英文网络术语有各自的图表。

图表(一)、《英文网络术语—思维组别积分表》



以上的图表显示：在英文网络术语中，形象思维独领风骚，比起抽象思维更胜一筹，这和一般人对中西思维倾向的看法有出入。另一方面，其分析思维的积分比综合思维的积分高，客体思维也比起主体思维高，这和【中西思维对峙两方法】所列出的相吻合。

图表(二)、《中文网络术语—思维组别积分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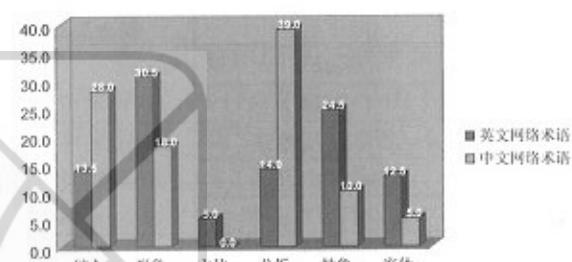


在中文网络术语中，分析思维独具鳌头，拥有最高的思维组别积分，甚至比综合思维还要凸显许多，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因为这和传统的看法“中国人比较倾向于综合思维”有出入的地方。至于形象思维比抽象思维积分高，大体上和传统的看法吻合。由于中文网络术语没有含假借义的术语，所以主体思维的组别积分是零。

二、中西思维组别积分一对比分析

以下的图表将英文和中文网络术语的每个思维组别积分并列在一起做比较：

图表(三)、《中西思维组别积分—对比分析表》



13. 甲、中式思维

就综合思维来说，英文网络术语和中文网络术语所呈现的思维倾向和【中西思维对峙两方法】吻合一后者显然比较倾向于综合思维，差别是14.5分。

就形象思维来说，英文网络术语比中文网络术语拥有较多具形象性的术语(30.5对比18)，这和一般学者的认知有抵触。从附录一的实例，我们可以察觉到许多英文词汇大都构词简单，源于日常用语。这类源自生活用语的网络术语即不失精确性，又添形象性，新义与旧义各司其职，互不干涉，通常运用的场合不同，因此不会被人们误用。相对来说，中文网络术语反而有更多具分析性质的术语。

就主体思维来说，英文网络术语和中文网络术语所呈现的倾向是5对比0，会让人误以为英文网络术语更具主体思维，而中文网络术语全无主体思维倾向。前者的样本中有5个含有假借义的术语，才有主体思维的呈现，而后者相对应的中文术语有些也体现了主观意识，但因为界定的标准是以最明显的思维呈现为主，所以就出现了零积分的现像。

14、乙、西式思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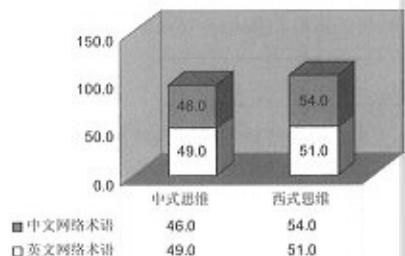
就分析思维来说，中文网络术语要比英文网络术语更具分析性（思维积分是39对比14），差异是25分。在信息科技领域里，中国人也和西方人一样拥有缜密的分析思维，并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有点出人意料。

就抽象思维来说，英文网络术语要比中文网络术语拥有更多具概念性和抽象性的术语（思维组别积分是24.5对比10），这和诸多文献中所归纳得来的结论“西方人比较倾向于抽象性思维”相吻合。

就客体思维来说，英文网络术语和中文网络术语的思维积分是12.5对5。这也和传统的看法“西方人比较倾向于客体性思维”相吻合。

三、中西思维总积分一对比分析

图表(四)、(中西思维总积分一对比分析表)



15、甲、横面分析

以上的图表所显示的是根据组别所累积的总积分。从横面来看，不论中文网络术语还是英文网络术语，“西式思维”的总积分都高过“中式思维”的总积分。这似乎是意料中之事，毕竟所研究的是与科技有关的课题。这样的数据显示：科学的头脑不是西方人独有的，最先学会造纸张、火药和指南针的中国人也拥有抽象性、分析性和客观性的思维方式；在科技领域里，偏向于综合、形象和主体思维的中国人也会随之应变，做出下意识的调适、以科学的头脑来进行研究。由此可见，人类与生俱有的思维共性在科学领域里的体现并不会因为国界和种族的不同所造成的隔阂而产生极大的差异。

值得一提的是：英文网络术语的“中式思维”总积分和“西式思维”总积分非常接近，差别只有2分。这个数据显示，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中，中西思维在碰撞的过程中出现了水乳交融的

现象，或中或西已不再那么明显。

16、乙、纵面分析

从纵面来看，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中文网络术语 / 西式思维”的总积分（54）竟然高于“英文网络术语 / 西式思维”（51）。换言之，中文网络术语比英文网络术语更倾向于“西式思维”。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中文比英文拥有更多具分析性的网络术语。另一方面，“中文网络术语 / 中式思维”的总积分（46）竟然低于“英文网络术语 / 中式思维”（49），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英文网络术语拥有比较多具形象性的词汇。这样的结果与传统的【中西思维对峙两分法】所呈列的思维倾向出现了相互抵触的地方。到底数据的背后透露了怎样的信息？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解读，但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中西方对网络这门新兴的信息科技把持着不同的态度。

在西方，研发新软件、发现新事物的往往是在籍的大学生、人们眼中无所事事的“网虫”或职场上的科技新贵。这些人往往是基于好奇心、兴趣、甚至是恶作剧，终日与电脑为伍、醉心于研究，才有了新的发明和产品，而他们在为这些新事物、新软件命名时，往往是以信手拈来的方式，借用许多现有的词汇来命名。这其中并没有经过严谨、缜密的考量，而一旦这类名称流通市面以后，人们也就约定俗成地使用它们，最终将它们加入词典中并成为专业术语。（从所选取的样本中，你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术语。）由此可见，西方人对电脑科技的态度是讲究创造性、实用性和便捷性。

中国人在为网络新事物命名时都尽可能根据词的内涵或概念定名，使名词准确表达一个概念的内涵和本质属性。例如：mouse被定为“鼠标”，而不是老鼠，garbage被命名为“无用垃圾”，而不是不雅的“垃圾”，menu是“菜单”，而不是俗称“菜单”。在中国，更有为规范科技术语而成立的《中国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这个官方组织设立网站、出版刊物，鉴定术语以确保新术语复合科技术语的格式规范，在西方则没有这样的官方组织。单就规范电脑术语这件事情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人对科技术语的态度是正经八百、一丝不苟的。也因为如此，许多与英文网络术语相应的中文术语，

不论构词还是词义都超出了人们的日常用语，是属于技术领域的书面语言。相对于英文网络术语的通俗简易，中文的网络术语就显得正经严谨得多了。由此可见，中国人对电脑科技的态度讲究的是规范性、严谨性和准确性。

第七章 结语

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是知识、经验、信仰、文化、价值、宗教以及时空观念融合后的体现，而这篇论文研究的只是限于100对术语，样本的数量稍嫌单薄一些，但毕竟起了以小见大的作用。由于研究的范围不包括句子和语态分析，只能凭着造词法和词义来鉴定思维方式，这其中有一定的局限。有心对此课题做更深层研究的人士，可以就网络科技文献的句法、语态等做深入的挖掘，相信会有更多的新发现。

中西思维方式不分优劣，有的只是擅长与不擅长、习惯与不习惯的问题。随着全球化脚步的加速、中国的崛起，中西思维方式碰撞、交融的现象将会越来越加剧，这样的现象在日新月异的网络世界里将更是如此。我们可以预见的是：更多具原创性的网络术语会出自中国大陆，届时，英语世界也可能出现汉译英的网络术语，而中西思维方式将会逐渐汇集、糅合一体，不分彼此。

参考文献

(一)、专书

1. 巴尔扎克著、傅雷翻译《高老头》的《重译本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2. 白靖宇《文化与翻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3. 陈伟《翻译与词典间性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12月。
4. 池昌海主编《现代语言学导论》，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
5. 崔应贤《语言文章论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3月。

6.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一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7. 廖七一《文化观念与翻译》，四川外语学院，2002年。
8. 刘宓庆《刘宓庆翻译论文著全集（十）——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年10月。
9. 刘重得主编《英汉语比较与翻译》，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年1月。
10. 中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11. 苏新春《汉语词文学》，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
12. 王军《汉语词义系统研究》，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
13. 许余龙《对比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
14. 闫文倍《全球化语境下的中西文化及语言对比》，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
15. 杨润陆、周一民编著《现代汉语》，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16.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0年。
17. 周一民编著《现代汉语》，新加坡管理学院，2002年。

(二)、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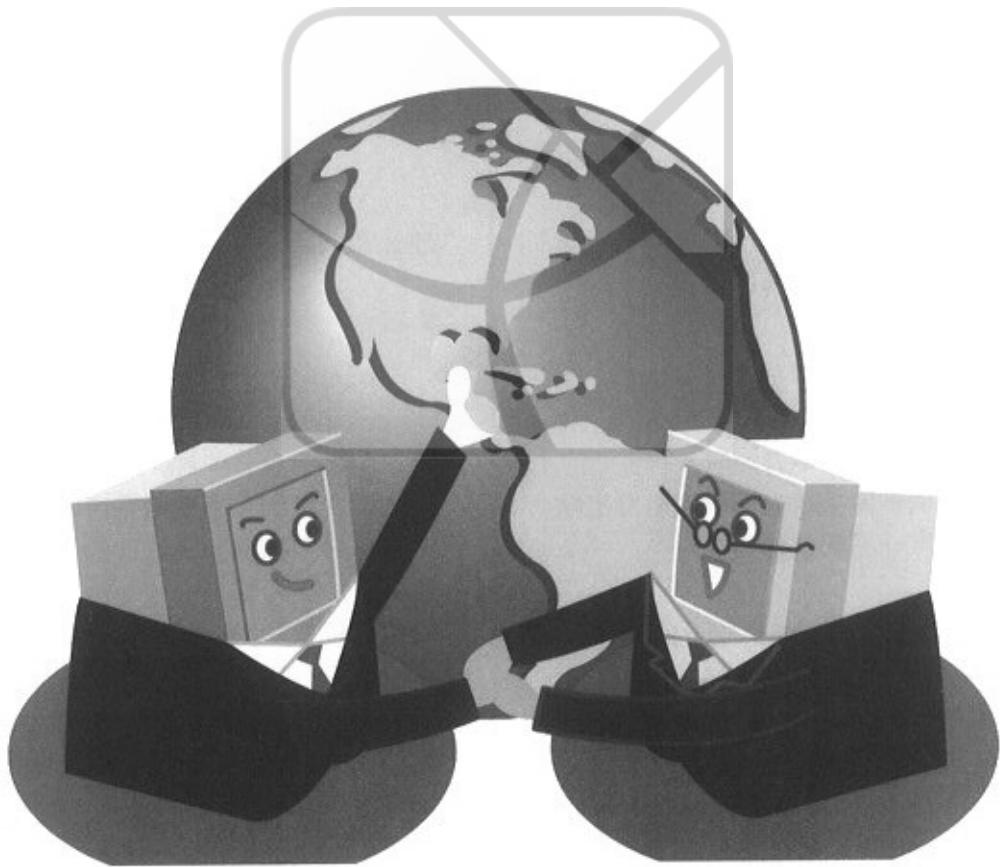
1. 付桂桂、廖涛《汉英思维差异与科技翻译》，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第66期，2005年12月。
2. 高倩倩《中西思维差异与汉英科技文体对比》，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9卷。
3. 郭爱萍《从构词理据谈科技术语的汉译》，北京中国科技术语，2007年第5期。
4. 李丹、周晓玲《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与翻译》，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学报，2006年12月，第六卷4期。
5. 李岩《浅谈中美思维方式的差异》，黑龙江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8年1月。
6. 吕艳梅《从思维差异看英汉句法》，周口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17卷第4期，2000年7月。
7. 吕艳梅《英汉思维差异在语言上的表现》，河南大学学报，第39卷第四期，1997年7月。
8. 毛海燕《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与差异》，哈尔滨师范大学。
9. 王健平《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若干特点及变革取向》，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第34卷第1期，2008年1月。
10. 严佳、卞好宁《从对比分析角度看英语、汉语中“词化”程度的比较》，苏州教育学院学报，第24卷第4期，2007年12月。
11. 杨梅《电脑词汇的分类与来源》，金陵职业大学学报，第16卷第2期，2001年6月。
12. 杨梅《电脑词汇的特征》，金陵职业大学学报，第17卷第3期，2002年9月。
13. 张治英《英汉民族的思维差异对翻译的影响》，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6月，第八卷，第2期。
14. 赵莲、徐秀忠《中英电脑词汇的文体差异》，解放军学院

- 学报, 1998年5月。
15. 郑述谱《术语的定义、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 黑龙江大学, 2005年第1期。
16. 周永涛《简谈计算机英语的特征》, 潮州师范学院学报, 1999年10月。

(三) 词典

1. 胡志勇《英汉信息新词库》, 上海: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7年4月。
2. 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 《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年。

3. 谢益裕主编《英日汉计算机与通信辞典》,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1996年。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现代汉语词典》, 北京: 商务印书馆, 第五版, 2005年。
5. 在线汉英词典<http://www.term.gov.cn/index.jsp>
(这是由中国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设立的网站, 认网民查询任何电脑术语。)
6. 在线英文词典
<http://www.networkdictionary.cn>.
<http://www.thefreedictionary.com>
<http://www.the-power-of-it.com>



文学作品中常见拟声词简表初稿（上）

忠扬 编撰

A

啊嚏

读音：ā tì

词义：打喷嚏的声音。

词例：连声阿嚏。

句例：他患鼻敏感，闻到花粉就连连阿嚏。

唉唉

读音：āi āi

词义：小儿啼哭的声音。

词例：哭声唉唉。

句例：半夜里，小儿唉唉啼哭声从邻家传了过来。

欸乃

读音：ǎi nǎi

词义：（一）木船摇橹的声音。

词例：橹声欸乃。

句例：河上往来的小木船发出欸乃的摇橹声。

词义：（二）划船时唱歌的声音。

词例：歌欸乃，橹咿哑。

句例：晚风中，渔夫们欸乃之歌从河面上飘了过来。

说明：常用于书面语。

嗷嗷

读音：áo áo

词义：（一）饥饿时发出的哭声。

词例：嗷嗷求食、嗷嗷待哺。

句例：挨饿的婴儿在摇篮里嗷嗷啼哭。

词义：（二）哀号啼喊叫声。

词例：嗷嗷悲声、哀鸣嗷嗷。

句例：被困在孤岛上的灾民又急又饿，哀鸣嗷嗷，正待救援。

读音：áo cáo

词义：杂乱喊叫声。

词例：嗷嘈呼号。

句例：广场上，锣鼓声、观众喊叫声嗷嘈不断，震耳欲聋。

说明：可连用，作“嗷嗷嘈嘈”。

B

叭

读音：bā

词义：硬脆东西的折断声。

词例：“叭”的一声。

句例：树枝突然“叭”的一响，折断了。

说明：也作“吧”。可连用作“叭叭”、“叭叭叭”。见“叭叭”条。

叭叭

读音：bā bā

词义：枪支或类似的物体击发的声音。

词例：叭叭枪响。

句例：宵禁的夜晚，街上突然传来了叭叭叭的枪响。

吧	读音: bā 说明: 同“叭”。见“叭”条。	说明: 可连用作“嘟嘟”。		
吧嗒	读音: bā dā 词义: (一) 物体轻微碰击的声音。 词例: 吧嗒一声。 句例: 他轻轻地把房门吧嗒一声关上。 词义: (二) 抽北方旱烟斗时发出的声音。 词例: 吧嗒地抽着烟斗。 句例: 老农民坐在大树下吧嗒吧嗒抽着旱烟斗。	嘟嘟	读音: bāng lāng 词义: 撞击物体的声音。 词例: 嘟嘟一响。 句例: 他用力一推, 嘟嘟一声, 把闸门关上了。	
吧唧	读音: bā jī 词义: (一) 踩踏在烂泥上的声音。 词例: 吧唧声声。 句例: 他挑着担子在泥泞路上吧唧吧唧地走着。 词义: (二) 用手轻轻拍打水面发出的声音。 词例: 吧唧作响。 句例: 婴孩的小掌把水盆的水拍打得吧唧吧唧响。	说明: 一般指用的力度较大。	嘣嘣	读音: bēng bēng 词义: (一) 爆破声。 词例: 嘣嘣声响。 句例: 开山修路的爆破声, 一大早就嘣嘣响了起来。
吧叽	读音: bā jī 说明: 同“吧唧”, 见“吧唧”条。	说明: 可单用作“嘣”。	咇	读音: bì 词义: (一) 撕裂布料的声音。 词例: 像的一声响。 句例: 只听得咇一声, 她把布帘扯开了一道长长的口。
嘟	读音: bāng 词义: 敲击木头的声音。 词例: 嘟嘟响声。 句例: 他用力敲着大院的木门, 发出口嘟嘟的响声。	说明: 也可用作机器之类发出的鸣声。	咇剥	读音: bì bō 词义: 有节奏的声音。 词例: 像剥跳动。 句例: 我一紧张起来, 心里就咇剥咇剥跳个不停。

说明：可连用作“咇咇剥剥”或“剥剥咇咇”。

发

读音：bō

词义：（一）疾风劲吹的声音。

词例：劲风发发。

句例：晚风越来越大，渔舟上的风帆发发作响。

词义：（二）鱼跃出水面的声音。

词例：发发声响。

句例：他们收网时，网兜里的鱼儿发发发跳跃出水面。

说明：此处不读“fā”。

曝

读音：bō

词义：（一）物件落地声。

词例：曝然一响。

句例：只听得曝一声，水壶掉到地下，壶里的水流了满地。

词义：（二）东西迸裂声

词例：曝然裂开。

句例：老树经不住强风疾吹，突然曝的一声，枝干断裂了。

说明：注意与“曝”不同。

跔

读音：bō bō

词义：（一）皮鞋踏在地上的响声。

词例：皮鞋跔跔。

句例：他跔跔的脚步声渐渐地远去。

词义：（二）蹄子踏在硬地的响声。

词例：牛蹄跔跔。

句例：老马驮着东西在路上跔跔地走着。

啵啵

读音：bō bō

词义：（一）子弹炸裂声。

词例：枪声啵啵。

句例：靶场上啵啵的枪声不绝于耳。

词义：（二）汽车排气声。

词例：啵啵巨响。

句例：大货柜车刚停了下来，发出啵的一声巨响。

说明：也可作单用作“啵”。

剥啄

读音：bō zhuó

词义：轻轻的敲门声。

词例：门声剥啄。

句例：他剥啄剥啄敲着窗门上的玻璃。

C

读音：cā

词义：物体的摩擦声。

词例：嚓的一声。

句例：汽车嚓的一声，在街口停了下来。

说明：见“喀嚓”条。

嘈嘈

读音：cáo cáo

词义：（一）喧闹声。

词例：人声嘈嘈。

句例：他们嘈嘈地争相说着各自的经历。

词义：（二）乐声急而嘈杂。

词例：琴声嘈嘈。

句例：练习厅里，乐师们各自在练习，琴声嘈嘈，震耳欲聋。

嘈噭

读音：cáo áo

词义：（一）吵杂的鸟虫声。

词例：嘈噭啼鸣。

句例：日落西山，归巢的乌鸦在树梢上嘈嗷盘旋。

词义：（二）不单一的音乐声。

词例：云韶何嘈嗷。

句例：派对场上的强劲音乐嘈嗷，非常刺耳。

说明：可连用作“嘈嘈嗷嗷”。

噌

读音：cēng

词义：短促而急速行动的声音。

词例：噌的一声。

句例：看到有人走了过来，鸟儿噌的一声飞走了。

说明：不读“曾zēng”。

嚓

读音：chā

词义：短促的断裂或摩擦声。

词例：嚓嚓地响。

句例：他们走在积雪的路上，脚下发出嚓嚓嚓的声音。

说明：可连用作“嚓嚓”。或“嚓嚓嚓”。

喳喳

读音：chā chā

词义：小声说话的声音。

词例：喳喳地说。

句例：演出开始时，她俩还一直在喳喳说个不停。

说明：可与“嘁嘁”连用，作“嘁嘁喳喳”。

潺潺

读音：chán chán

词义：流水声或下雨声。

词例：泉水潺潺、雨声潺潺。

句例：溪水潺潺地流着，仿佛细语般地诉说着自己的故事。

说明：用于较细的水量。

嘲啾

读音：cháo jiū

词义：（一）错杂的读书声。

词例：诵声嘲啾。

句例：课堂里，传出孩子们嘲啾的读书声。

词义：（二）鸟叫声。

词例：鸟声嘲啾。

句例：群鸟嘲啾，打破了午间园林的寂静。

噌哝

读音：chēng hóng

词义：钟鼓敲击声。

词例：钟鼓噌哝。

句例：寺庙里每天清晨总传出噌哝之声。

琤琤

读音：chēng chēng

词义：（一）玉器碰击声。

词例：玉佩琤琤。

句例：古人走路时，腰间所系的玉佩琤琤有声。

词义：（二）琴声。

词例：琤琤琴声。

句例：在深夜里，琤琤的琴声听起来特别清脆悠远。

词义：（三）水流声。

词例：水琤琤而响谷。

句例：大河水琤琤流动，响彻了深深的幽谷。

说明：注意，“琤”不读zhēng。

琤纵

读音：chēng cóng

词义：弦乐、水流的声音。

词例：琤纵有韵。

句例：环佩琤纵如泉水般的声响。

嗤嗤

读音: chī chī

词义: (一) 忍不住而发出的笑声。

词例: 嗤嗤而笑。

句例: 她俩说到开心事, 禁不住嗤嗤而笑。

词义: (二) 导火线轻微的燃烧声。

词例: 嗴嗤作响。

句例: 导火线嗤嗤燃烧着, 火花直窜。

词义: (三) 摩擦声。

词例: 嗴的一声。

句例: 嗴的一声, 他划亮了火柴枝。

吃吃

读音: chī chī

词义: (一) 细碎的笑声。

词例: 吃吃直笑。

句例: 听到好笑的时候, 她们就吃吃地笑了起来。

词义: (二) 吞吞吐吐的说话声。

词例: 吃吃而语。

句例: 他们两人躲在角落里吃吃地交谈着。

说明: 有意压低声音。

哧哧

读音: chī chī

词义: (一) 忍不住而发出轻细的笑声。

词例: 呲哧地笑。

句例: 也不知有什么好笑的事, 她们竟然哧哧地笑个不停。

词义: (二) 撕裂东西的声音。

词例: 呲的一响。

句例: 他不小心一扯, 呲的一声, 衬衣被撕了一个口。

哧啦

读音: chī lā

词义: (一) 冷水浇在热铁器的声音。

词例: 呲啦一声。

句例: 铁匠把烧红的铁枝投到冷水里, 立即哧啦一响。

词义: (二) 旺火炒菜声。

词例: 呲啦一响。

句例: 妈妈在厨房里哧啦哧啦地炒着菜。

哧溜

读音: chī liū

词义: 迅速跑动或滑动的声音。

词例: 呲溜一下跌倒了。

句例: 他不小心哧溜一下摔在溜冰场上。

刺

读音: cī

词义: (一) 撕裂声。

词例: 刺的一声。

句例: 刺的一声, 塑料布给他刮破一个洞。

词义: (二) 摩擦声。

词例: 刺刺作响。

句例: 花炮在地上刺刺地窜动, 可就是飞不上天。

说明: 可连用作“刺刺”。

刺啦

读音: cī lā

词义: (一) 撕裂声。

词例: 刺啦有声。

句例: 刺啦一声, 她就把牛皮纸撕成两片。

词义: (二) 迅速划水声。

词例: 刺啦作响。

句例: 运动员划动双桨, 小艇就刺啦刺啦破浪而去。

说明: 可连用作“刺啦刺啦”。

刺棱

读音: cī lēng

词义: 动作迅速的声音。

词例: 刺棱而起。

句例: 霎那间, 只听得刺棱一声, 老猫已经跳上屋顶了。

刺溜

读音: cī liū

词义: (一) 脚下滑动的声音。

词例: 刺溜而响。

句例: 他在溜冰场上刺溜刺溜地飞滑着。

词义: (二) 迅速滑过的声音。

词例: 刺溜而过。

句例: 鸭群一跳进水就刺溜刺溜飞扑游动。

说明: 可连用作“刺溜刺溜”。

纵纵

读音: cōng cōng

词义: 金属碰击声。

词例: 钟声纵纵。

句例: 他把祈福的大钟敲撞得纵纵鸣响。

纵瑢

读音: cóng róng

词义: 佩玉碰击声。

词例: 剑佩纵瑢。

句例: 他轻轻敲着手上的玉佩, 铸瑢有声, 清脆悦耳。

琤琤

读音: cóng zhēng

词义: 玉器碰击声。

词例: 玉佩琤琤。

句例: 他轻轻一敲, 玉壶即琤琤发声。

淙淙

读音: cóng cóng

词义: 流水声。

词例: 山泉淙淙。

句例: 青山间的泉水淙淙而流。

说明: 注意, 不读zóng。

泓泓

读音: cóng cóng

词义: 水声、雨声。

词例: 流水泓泓。

句例: 昨晚, 夜雨泓泓, 直到天明。

琮琤

读音: cóng zhēng

词义: 水流经石头时发出的声音。

词例: 泉音琮琤。

句例: 溪水琮琤地从他们家门前的小河流过。

欸欸

读音: chuā chuā

词义: 整齐的步伐声。

词例: 步伐欸欸。

句例: 军队跨着整齐的步伐欸欸地操过检阅台。

欸拉

读音: chuā lā

词义: 煎炒声。

词例: 欸拉作响。

句例: 黑椒汁淋到铁板的牛肉上, 发出欸拉欸拉的声响。

绰绰

读音: cuì cài

词义: 走动时衣服摩擦的声音。

词例: 华装绰绰。

句例: 模特儿穿着长裙, 走起来绰绰有声。

咷

D

读音: dā

词义: 吆喝牲口行走的声音。

词例: 咻咷。

句例: “咷——驾”老汉吆喝着马儿赶路。

哒

读音: dā

词义: 短促而响亮的声音。

词例: 哒哒敲打。

句例：他把铅笔在桌上敲得哒哒响。

说明：可作连用“哒哒”。

嗒 读音：dā
说明：同“唰”、“哒”。

嗒嗒 读音：dā dā
词义：（一）鸟啼声。
词例：鸟啼嗒嗒。
句例：清晨树梢上的鸟儿，不停地嗒嗒鸣叫。

词义：（二）滴水声。
词例：水声嗒嗒。
句例：雨后的屋檐还在嗒嗒滴着水。

词义：（三）机枪声。
词例：枪声嗒嗒响。
句例：机枪嗒嗒不停地向敌方阵地射击。

铛 读音：dāng
词义：金石撞击声。
词例：铛铛作响。
句例：铛的一声，小石子正好击中了铁桶。

铛啷 读音：dāng lāng
词义：金属物件撞击声。
词例：铛啷作响。
句例：铛啷一声，铁桶从架子上掉了下来。

当 读音：dāng
词义：同“铛”。

嘚 读音：dē
词义：马蹄声。

词例：嘚嘚马蹄声。

句例：马儿走在石板路上，发出响亮的嘚嘚声。

嘚儿 读音：dēr

词义：赶马声。

词例：嘚儿，驾——驾。

句例：老汉不时嘚儿、嘚儿，赶着他的驴子走。

蹬 读音：dēng

词义：（一）物件碰击声。

词例：噔噔有声。

词例：石匠噔噔噔地探击石块。

词义：（二）脚踩楼板。

词例：噔噔作响。

句例：他怒气冲冲，噔噔噔地独自走上楼去。

说明：注意，“蹬”不是“蹬”。

滴嗒

读音：dī dā

词义：（一）水滴声。

词例：雨声滴嗒。

句例：下半夜，老天竟滴滴嗒嗒下起雨来了。

词义：（二）钟表摆动声。

词例：钟摆滴答响。

句例：深夜里，滴答滴答的钟声，听起来特别响亮。

说明：也作“滴答”，可连用作“滴滴嗒嗒”或“嘀嗒滴嗒”。

滴滴

读音：dī dī

词义：水滴断续落下声。

词例：屋檐水声滴滴。

句例：一天的大雨，只听得屋檐下水声滴滴。

滴沥

读音: dī lì

词义: 水连续往下滴的声音。

词例: 滴沥声声。

句例: 从昨夜傍晚开始, 就滴沥
滴沥地下着雨。

说明: 可连用作“滴沥滴沥”。

嘀里嘟噜

读音: dī lī dū lū

词义: 快而听不清的说话声。

词例: 嘀里嘟噜。

句例: 他们两人在房间里嘀里嘟
噜地说个不停。**玎珰**

读音: dīng dāng

词义: (一) 瓷或玉器轻微撞击
的声音。

词例: 杯盘玎珰。

句例: 她一挥手, 手上的两只手
镯, 随着发出玎珰声。

词义: (二) 金属撞击的声音。

词例: 玳玷作响。

句例: 铁匠挥起锤来, 把烧红
的铁打得玎珰响。说明: 见“丁当”条。也作
“叮当”“丁当”。**丁当**

读音: dīng dāng

词义: (一) 金属撞击的声音。

词例: 铁马响丁当。

说明: 铁匠把烧红的铁条捶打
得丁当响。词义: (二) 瓷器、玉器撞击
的声音。

词例: 银铃丁当。

句例: 檐前的风铃被大风吹得
丁当丁当响。

说明: 也作“叮当”“玎珰”。

丁东(丁冬)

(叮东/叮咚)

读音: dīng dōng

词义: (一) 玉石碰撞声。

词例: 寒玉丁东。

句例: 他把玩手中的玉器, 不时
发出丁东的声响。

词义: (二) 金属碰撞声。

词例: 丁东有声。

句例: 小孩把铁罐子敲得丁东
响。说明: 也作“丁冬”、“叮东”、
“叮咚”。**丁零(玎玲)**

读音: dīng líng

词义: (一) 铃声。

词例: 铜铃响丁零。

句例: 小猫一跳动, 脖子上的铜
铃就会发出丁零的声音。

词义: (二) 小金属撞击声。

词例: 风铃丁零。

句例: 他走得急, 腰间挂着的那
串钥匙就丁零丁零响。

说明: 也作“玎玲”。

丁零当啷

读音: dīng líng dāng lāng

词义: (一) 金属连续的碰撞声。

词例: 丁零当啷。

句例: 铁桶从台阶上丁零当啷滚
了下来。

词义: (二) 瓷器连续撞击声。

词例: 丁零当啷响。

句例: 风铃被大风吹得丁零当
啷响。**咚咚**

读音: dōng dōng

词义: 鼓声或敲门声。

词例: 战鼓咚咚。

句例: 他把大门敲得咚咚响。

说明：也作：“鼕鼕”。

嘟 读音：dū

词义：汽车或轮船的鸣笛声。

词例：嘟嘟鸣响。

句例：轮船起锚时，汽笛声就嘟嘟响了起来。

F

咚 读音：fēng

词义：打鼓声。

词例：鼓声咚咚。

句例：喜庆的节日里，到处都可以听到咚咚的鼓声。

哧 读音：fú

词义：吸气或吐气。

词例：哧哧吹气。

句例：她跑得急了，站在路边哧哧换着气。

G

嘎 读音：gā

词义：（一）紧急刹车声。

词例：嘎的一声

句例：汽车嘎的一声，在行人过道边上紧急地刹住了。

词义：（二）易脆物折断声。

词例：嘎然有声。

句例：枯萎的树枝突然嘎的一声折断了。

嘎巴 读音：gā bā

词义：易脆物折断声。

词例：嘎巴而响。

句例：扁担经不住重压，嘎巴一下断成两截。

嘎嘎 读音：gā gā

词义：（一）鸭子或鸿雁的叫声。

词例：嘎嘎乱叫。

句例：鸭子在池塘里不知受了什么惊吓，突然嘎嘎乱叫。

词义：（二）开心大笑声。

词例：嘎嘎大笑。

句例：他们开心极了，不停地嘎嘎大笑。

说明：也作“呷呷”

嘎吱

读音：gā zhī

词义：物体受重压而发出的声音。

词例：嘎吱作响。

句例：挑夫肩上的扁担被压得嘎吱嘎吱直响。

咯嗒

读音：gē dā

词义：鸡叫声。

词例：咯嗒咯嗒地叫。

句例：下了蛋的母鸡在院子里咯嗒咯嗒地叫个不停。

咯噔

读音：gē dēng

词义：（一）皮鞋走路发出的声音。

词例：咯噔咯噔的皮鞋声。

句例：他穿着新皮鞋咯噔咯噔地走来走去。

词义：（二）物体撞击声。

词例：咯噔咯噔响。

句例：楼上人家在搬东西，传来咯噔咯噔的声响。

词义：（三）骤然心跳声。

词例：咯噔地跳。

句例：听见他的声音，她心里咯噔一下，慌忙走开。

说明：常作连用“咯噔咯噔”。

嗝嗝

读音: gé gé

词义: (一) 呕吐声。

词例: 嗳嗝而吐。

句例: 他喝醉了, 还没回到家, 就嗝嗝吐了一地。

词义: (二) 禽兽叫声。

词例: 嗳嗝鸣叫。

句例: 猫头鹰嗝嗝乱叫, 让人听起来毛骨悚然。

咯咯

读音: gē gē

词义: (一) 鸡叫声。

词例: 咯咯而叫。

句例: 觅食的母鸡一找到食物, 就咯咯地叫唤着小鸡。

词义: (二) 爽朗的笑声。

词例: 笑声咯咯响。

句例: 她们笑得咯咯响。

咯吱

读音: gē zhī

词义: (一) 木竹器受压而发出的声。

词例: 咯吱咯吱响。

句例: 他肥胖的身体一坐下去, 竹椅子就咯吱咯吱响。

词义: (二) 踏雪声。

词例: 咯吱咯吱的踏雪声。

句例: 他脚下踩着厚厚的积雪, 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响响

读音: gòu

词义: 野鸡叫声。

词例: 叫声响响。

句例: 山里不时传来野鸡响响的叫声。

说明: 注意“响响”不是“狗狗”。

呱嗒

读音: guā dā

词义: 走在硬地上的声音。

词例: 呱嗒呱嗒响。

句例: 他穿着拖鞋, 呱嗒呱嗒地赶着路。

咕咚

读音: gū dōng

词义: (一) 重物掉落声。

词例: 咕咚一声。

句例: 她不小心, 手机咕咚一声掉到水里去了。

词义: (二) 大口喝水声。

词例: 咕咚地喝水。

句例: 我口渴极了, 咕咚咕咚一下子把一瓶水喝光了。

说明: 表示连续, 大都连用作“咕咚咕咚”。

咕嘟

读音: gū dū

词义: (一) 水翻滚声。

词例: 咕嘟直响。

句例: 这个泉眼的泉水竟然又咕咚咕咚地冒了出来。

词义: (二) 快急的喝水声。

词例: 咕嘟吞下。

句例: 他咕嘟一声, 把一杯烈酒喝了下去。

词义: (三) 水沸腾声。

词例: 咕嘟冒气。

句例: 水开了, 咕嘟咕嘟地滚动。

呱呱

读音: gū gū

词义: 婴儿的哭声。

词例: 呱呱啼哭。

句例: 邻家的孩子病了, 整夜都在呱呱啼哭。

说明: 注意, 此处不读guā。

汩汩

读音: gǔ gǔ

词义: 水流动声。

词例: 汩汩而流。

句例: 凿开了田埂, 河水就汩汩地流进了田里。

说明: 注意, “汩汩”, 不是“汨汨 mì mì”。

咕咕

读音: gū gū

词义: 鸽子、斑鸠、母鸡等的低鸣叫声。

词例: 咕咕低鸣。

句例: 鸽子经常会发出咕咕低鸣的声音。

咕唧

读音: gū jī

词义: 水被挤压出来的声音。

词例: 咕唧有声。

句例: 他走在泥泞的路上, 脚上的鞋子发出咕唧咕唧响。

说明: 也作“咕叽”。

咕叽

读音: gū jī

说明: 也作“咕唧”。见“咕唧”条。

咕隆

读音: gū lōng

词义: (一) 雷声。

词例: 雷声咕隆。

句例: 天边响起咕隆咕隆的雷声, 看来快下雨了。

词义: (二) 蒸汽火车行走声。

词例: 咕隆声响。

句例: 旧式的火车咕隆咕隆地奔驰在偏远的草野上。

咕噜

读音: gū lū

词义: (一) 东西滚动。

词例: 咕噜鸣响。

句例: 石头从山上咕噜咕噜地滚了下来。

词义: (二) 急湍的流水声。

词例: 河水咕噜。

句例: 雨后只听得狭隘河道里的水咕噜咕噜地响。

词义: (三) 大口喝水声。

词例: 咕噜一声。

句例: 咕噜一声, 老李就把一杯汽水喝光了。

词义: (四) 肚子饥饿声。

词例: 饥肠咕噜。

句例: 两天没吃东西, 他饿得咕噜咕噜响。

说明: 也可连用作“咕噜咕噜”。

呱哒

读音: guā dā

词义: 清脆、短促的撞击声。

词例: 呱哒之声。

句例: 他穿着拖鞋, 走起路来呱哒呱哒响。

呱呱

读音: guā guā

词义: 鸭子或青蛙的响亮叫声。

词例: 呱呱直叫。

句例: 只见一群鸭子呱呱大叫, 直奔到池塘里去了。

说明: 注意, 此处不读 gū gū。

呱唧

读音: guā ji

词义: 鼓掌声。

词例: 呱唧呱唧。

句例: 台下听众呱唧呱唧地鼓掌叫好, 他心里甜滋滋的。

说明: 也连用作“呱唧呱唧”。

咣	<p>读音: guāng 词义: (一) 响亮的关门声。 词例: 晁的一响。 句例: 怒气冲冲的他, 晁的一声把门关上。</p> <p>词义: (二) 敲击声。 词例: 晁的一锤。 句例: 他晁的一锤敲在厚重的大锣上。</p>	<p>词例: 嘎碌碌地滚动。 句例: 那个孩子从楼梯上骨碌碌地滚了下来。</p>
咣当	<p>读音: guāng dāng 词义: 连续响亮的声音。 词例: 晁当巨响。 句例: 建筑工地上, 打桩的机器每天都发出晁当晁当的声响。</p>	<p>读音: guō 词义: (一) 蛙鸣声。 词例: 嘎嘎鸣叫。 句例: 天刚黑, 青蛙就在野地里嘎嘎地叫个不停。</p>
嘎碌碌	<p>读音: gū lu lu 词义: 物体滚动声。</p>	<p>词义: (二) 咽水声。 词例: 嘎嘎地喝水 句例: 他口渴极了, 嘎嘎地喝了三杯水。</p>

(未完, 下期续)
2009-10-01初稿

[作者曾任朗文出版(亚洲)有限公司辞书部高级编审]



南洋当代知识分子群像录 —评析风沙雁先生的小说《遥远的期待》

中国 党 阳

《遥远的期待》是新加坡华文作家风沙雁先生的第二部小说。与他的第一部小说《追逐阳光的人》相同的是：作者仍称这是在他偶拾的曾民颖的札记的基础上整理加工发展而来的，仍然殷切的关注新加坡的文化教育问题和华族文化的延续发扬问题，并一如既往的描写以李世雄、王弘扬为代表的南洋大学毕业生和华族海外高级知识分子的高尚品德和情操，表现他们在逆境中的奋发，漂泊海外的悲情，以及为华族文化的发展进绵薄之力的决心。《追逐阳光的人》侧重于描写南洋大学毕业生在海外漂泊的悲凉心境，他们对母校被取缔、华文教育被忽视的愤懑，还有他们在异国为事业奋斗、生生不息的精神，以及他们办学校、创报刊、致力于弘扬华族文化的不懈的努力。而这部《遥远的期待》主要表现的是新加坡社会知识分子中的“清流”和“浊流”不同的众生相，以及由王弘扬串联起来的一群“清流”知识分子为华文的教育与传播、华族文化的维护和发扬做出的无私贡献和不懈努力。^①

在前言中札记的“原创者”曾民颖说：“这一本札记是有关桃花源岛上的知识分子的动向与心态的……，我这半生所见所闻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大体勾勒在此札记本中。”作者也称：“我是抱着为时代留下一些脚印的目的来写这本小说的。”^②据此，本文将重点评析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群像，以及这些知识分子的经历遇背后的思想感情，表现的文化观念、呈现的“士人”心态、寄寓的理想抱负，并以此为基础讨论小说文本形式上的优劣得失。

小说的主人公王弘扬从日本回到家乡，加入桃花源岛的南淡晨报担任评论版主编，想用自己的学识和能力为发展华族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一开始受到总经理和总编辑的赏识鼓励，写的文章也得到读者和有识之士的好评。正在王弘扬踌躇满志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报馆里一些流言蜚语开始出现，某些同事也开始在背后对他冷嘲热讽。更严重的是他的旧交李路明在背后放暗箭，罗织罪名，轻信的老总撤掉了他的职位。之后，第二老总魏道义接二连三的打压排挤王弘扬，千方百计的阻止他发表文章，王的主管箫岩斌也在年终评估的时候落井下石。最终他被派去编无关紧要的趣闻版。在这样的遭遇下，平时一起喝酒的同事都疏远了他。经历一连串的打击后，他意识到报馆人事斗争的复杂和精神生存环境的恶劣，一度心灰意冷，生活也变得无聊枯燥。但是，王弘扬自省的内心告诉他要改变这种生活，他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寻找机会在华文大学里兼职，并开始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联合有志之士办一份旨在弘扬中华文化的《新时代学报》。王弘扬和他的朋友发动所有社会关系联系并拜访桃花源岛、马拉诗雅国、东方之珠岛、台北、鹭鸶岛的学者、作家、诗人，邀请他们做学报的顾问或者为学报供稿。王又携妻子远赴日本、新西兰、英国、夏威夷等地拜访新朋故交，共商大计。最终，在报馆人事变革的风波中，王弘扬和一些同事被裁退。之后他全心全意的投身于学术、文化教育和办学报的生活中，为理

想的生活和理想的事业而努力。

在小说中作者描写的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以魏道义、杨应南、李路明、萧岩斌等为代表的“浊流”。这些人不仅从来没有想过办好报纸为民族文化发展贡献一些力量，而且千方百计的排挤打压同事中的优秀人才。他们为了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会使出各种卑鄙龌龊的手段。魏道义，谐音“伪道义”，报馆的第二老总，他目光短浅，心胸狭隘，无任何才能，专心于铲除异己。因为自己学历低便宣扬“学历无用论”，一直在公共场合赞扬低学历职员更杰出能干。他一再贬低王弘扬的职位，寻找各种机会打击王弘扬。报馆的高层领导相继离开，杰出人才张松青、刘观玉、李秀浪等也被迫辞职。李路明是弘扬的旧交，以前在日本旅游时王弘扬对他热情相待，王得以谋此职也是李的推荐。但是，当王弘扬的优秀盖过他的光芒时，出于嫉妒和恐慌，李路明不惜在总编辑面前诽谤中伤朋友，并逐渐暴露出趋炎附势、对上司奉承讨好、对同事挑剔排挤的小人面目。

上层领导昏聩视听，中层魏道义兴风作浪，再加上李路明这样的爪牙小人得志，报馆大部分员工不是勤于工作，而是善于勾心斗角，忙于传播流言蜚语。南淡晨报早已不是“民族文化最后的一个堡垒”，ⁱⁱⁱ早已失去其作为桃花源岛大报的社会文化职能，基本上没有有份量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出现。文中的牛南阳说：“这是个淘汰人才的公司。人家的公司是淘汰无能者，我们的却是淘汰人才”，^{iv}这句话道出多少人心中的愤懑！

第二种人，是李遵荣、牛南阳、李扬青、林维富、柳捷敏等中间人物。他们有一定的才华，尽职地工作，不做伤害别人的事情。但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生活，虽然偶尔也对文化现状发点议论和牢骚，对自己的处境表示不满和气愤，但是没有知识分子心怀天下的理想，也没有对自己的遭遇做出反抗。比如李扬青，他的家庭经济情况并不富裕，裁员风波来临的时候，他还是要忍痛去买公司新上市的股票，以为这样可以表明效忠公司的心意，可以避免被裁掉。他们的品格也不是没有瑕疵，例如在王

弘扬处境危险的时候，牛南阳和林维富为了避嫌开始疏远他；柳捷敏听信谗言降了王弘扬的职，事后心怀愧疚但碍于面子也没有道歉。相对于王弘扬们关心的民族文化延续问题，牛南阳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工作、家庭、薪水等现实生计问题。他们只是在灰色生活中为自己奋斗的普通人。

第三种人，就是以王弘扬为代表的一批“清流”知识分子，是小说表现的主要对象，也是作者认为可以担当起弘扬中华文化重任的人。当王弘扬在报馆陷入困境后，他和好友莫天骥决定挣脱报馆这个“茧”，联合经营印刷馆的吴恩世，团结起东南亚、欧美等国研究华族文化的学者，办《新时代学报》。在他们奔走各国拜访这些专家学者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为学报的诞生拍手叫好，并热忱的愿意为学报贡献力量。马华文学史家袁治文德高望重，身已年迈却念念不忘马华文学史和思潮史未写，叮嘱王和莫一定补上这个空白；书法家施卫艺豪爽热情，主动要求免费为学报设计封面和题字；事业有成的程如旧愿为学报提供经费，李家驹自动请缨在本国推销学报；东方之珠岛的程捷成，台北的林如阳，大陆的夏安谊等学者对王弘扬的到来热情相待，愿用自己的专长为学报供稿；日本学者菊池三郎不同意日本政府歪曲侵略历史的做法，专心研究中日现代史，要写文章向世人昭明事实；海外的一批华裔学者纷纷表示要以平生所学为弘扬华族文化贡献力量。还有刘观玉辞职不做人事斗争的工具，胡可园辞职独善其身，都是极其可贵的品质。

王弘扬等人的一份学报，一次周游诸国的“串连”行动，凝聚起无数知识分子用平生所学弘扬华族文化的心。文中几个人说的话代表所有知识分子的心声：“知识分子不应只求独善其身，只要能力做得到，我们总该多为民族或族群做点事”，^v“只有积极的做这种保留中华文化的种子的点滴工作，我们才有可能把中华文化弘扬开来！”^{vi}不管身处本国还是海外，不管是不是曾遭遇政府不公正的待遇，不管经济上贫穷还是富裕，他们都拥有可贵的精神和品格：要么正直豪爽，嫉恶如仇，要么

不畏权贵，勇于直言，要么真诚善良，宽容大度，并且都无私而乐于奉献。正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当他们在海外事业有成学有专长时，并没有忘记在合适的机遇下为民族文化做点贡献。相对于魏道义这样的“浊流”，王弘扬这样的“清流”身上保留了民族精神的精魂。一个民族有了这样有觉悟有品格能担当愿奉献的知识分子，历史与传统才不会断层而得以延续，文化和教育才不会式微而得以发展，世道人心才不会污浊而得以激浊扬清，天地正气才不会泯灭而得以涤荡一新。

小说中的三种人，是王弘扬生活环境遇到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但是也可以影射到作者生活的社会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全部。在小说中的桃花源岛，现实中的新加坡社会里，不乏魏道义李路明之流，牛南阳之辈也应该比比皆是，王弘扬等人的遭遇也许是其他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共同的遭遇，南淡晨报的现状也应该是新加坡社会中其他文化机构的共同现状。或许可以把这部小说称为“问题小说”，若是要追溯这种种问题产生的原因，还要探究其政治社会及文化根源。

新加坡为了发展经济，一直重视物质发展轻视文化建设，语言上重英轻华，标志事件就是在1980年将以华文为主的南洋大学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这成为所有南大生心中永远的痛。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虽然经济水平飞速提高，城市建设也一路领先东南亚诸国，但是文化园地上一片荒芜，甚至原有的一些文化传统也逐渐消失殆尽。从南淡晨报的现状我们可以看到，管理者根本不懂文化教育等问题，从来没有想过采取某些举动为文化建设做点事情，他们关心的就是：报纸是不是卖的比商报多；一边盖豪华高楼建形象工程，一边裁员以节省开支；不敢大胆客观的报道事实，怕得罪权贵；不关心文章质量，纠缠于照片的大小，错别字的多少。不仅如此，不尊重知识和文化，不珍惜人才，只要挡了自己的路便统统踢开。唯一有心想“为民族文教献出一点力量”的总经理王如旧也被排挤走了。其他员工更是过着无聊乏味的生活，他们冷漠而缺乏同情心，善于勾心斗角，裁员风波到来时更是热衷于传播

小道消息，惶惶不可终日。另外，南大生中英才众多，在自己的国家不受重用而不得不跑去异国开疆辟土。这大概不是个别现象，可以反映出更普遍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在以物质追求为生活目标的社会里，忽视文化发展不仅造成与传统断裂，人文精神的缺失同样严重地戕害人类精神和日常生活的丰富和美好。

报馆中稍有觉悟的人都陆续的离开此地，去寻找理想中的生活：可以是清晨在湖畔散步，树荫下读唐诗宋词；或者“良禽择木而栖”，去一个薪水不高但人事关系单纯的地方，日子过得逍遥自在，是金钱买不到的生活；或者像王弘扬一样联合有志之士从事理想中的文化建设事业。借用书中的一句话：“馆外的空气更清新，馆外的天空更广阔，馆外的气氛更自由，馆外的疆场更有活力。”^{vii}他们的选择，是不是为偏颇的政策和某些人偏颇的追求开出了一剂有效的良方呢？只能拭目以待。

二

通过描写王弘扬周游东南亚诸岛和欧美诸国的经历，作者的笔墨或浓或淡的涉及到众多华族知识分子的华族情结，思想心态，文化观念等问题，这些描写更生动完整地呈现出华族知识分子的群像。

“一位失去民族传统与文化滋养的海外华人，无论如何也难以摆脱心灵深处那种时常让人绝望的飘零感”，^{viii}这句话深切的道出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华族情结。在《遥远的期待》这本小说中，主人公王弘扬行动的主线只围绕一个目的：为弘扬华族文化努力。《新时代学报》言明的宗旨是：研讨中华文史哲问题，以及中华文化在世界各个角落落地生根并已本土化的现状。学者们相聚后讨论的中心也是华族文化传播与发展现状，叹息华文教育在本国衰落，民众华文水平下降。新西兰的黄瑞秋身在异乡，王粲、陶渊明的诗句仍能脱口而出，张松青辞职后在唐诗宋词中重寻生活的简单与美好。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感情为何如此浓厚？究其根源，南洋诸岛上的居民很多祖籍在大陆，中国传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根深蒂固，近现代华人社会的文化与中国社会及文学也休戚相

关，这些南大毕业生接受的教育多是华文教育，海外的学者在别国也是以传授和翻译中国文学为生。因为深受中华文化的浸润与熏陶，他们现实中的家园在五湖四海，精神家园却在中华文化中。因此，当在现实中遭遇打击时，在异国时常感到孤独飘零时，浓重的文化失落感促使他们回头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同时，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使他们在面对自己国家的文化荒芜时不能袖手旁观，他们深知文化延续和建设的重要性，民族文化建设好了，社会上所有的人才能都拥有健全的精神家园。因此，他们自觉地承担起重任，在中华文化式微的逆境中逆水行舟，勇往直前。

小说中呈现的另一重要问题是他们宽容开放但又极具民族立场的思想心态和文化观念。有一些学者是以前在政治风波中受到迫害而移居海外的，有些是身为南大毕业生在国内不受重用而被迫在异国谋生，有些是对岛内现状不满才定居他乡。他们或多或少都遭遇过不公平的待遇，但在王弘扬邀请他们的时候，没有人拒绝而且大都热忱相助。话里有牢骚不满之词，心里却没有睚眦必报之仇。这与林如阳口中那位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却崇洋媚外的华裔作家截然不同。极其值得肯定得是众学者的文化观念，从他们的话中可略见一斑。“这是环球化的时代，我们不可固步自封，也不应该死守陈规，我们的宗旨是立足本土，放眼世界”；“我们要海量容纳异己，不以政治倾向或立场取人，但是坚决反对台独分子”；¹日本学者说：“日本侵华是我们的过错，我们得正视并吸取历史教训，我是不同意政府一意想隐瞒或歪曲历史的做法的”；还有反对中国某个时期把文学当做政治工具，学术研究套上马克思主义外衣，把文化现象过度意识形态化的做法；认为中国原汁原味的文化可以用来抗衡美国单边霸权文化，为世界文化多元发展做出贡献；以及对孔子学院建立后得失的分析，都表现出他们开阔宽容的文化视野。

三

风沙雁先生的第一本小说《追逐阳光的人》，有人称之为诗化或散文体小说，那是

因为从文本表现形式来看，它名为小说却不以讲故事为主，不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结构，情节语言全都是散文式的笔法。第二本小说《遥远的期待》仍具有这些特点，但是在此基础上已与前者有所不同、有所发展。《遥远的期待》不再是“金钱串珠”式的结构，而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独立的篇章。相对于第一本小说的结构和表现形式，它更符合长篇小说的特点：故事完整，线索清晰，并成功塑造了一批知识分子形象。但是，它仍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如果把它称为“文化问题小说”，“纪实小说”，或者“对话体小说”或许更合适。理由有如下。

其一，作者虽然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并不以讲故事为主，着意经营的不是故事情节的变化起伏，浓墨重彩表现的是他所关心的文化问题。作者前言中说是对别人札记的加工整理，从小说中我们也确实可以感受到明显的现实生活痕迹：人物的安排，情节的发展都是按生活常理出现的，所以显得真切可感；但是并没有按小说艺术的规律进行取舍与雕琢，所以有些地方产生模式化叙述。例如作者写王弘扬对各国学者的拜访，方式大多是先描写国家美景，再与朋友相聚，然后邀请他们加入学报，最后大家畅谈理想。在现实中这是很正常的行动规律，在一般读者眼中可能有模式化的印象和雷同感；另外，作者主观性叙述过多，以“全知者”的立场叙述一切，没有给人物性格留下充足发展的空间。所以，故事的“纪实性”大于其“小说性”。但是这些在一般读者眼中可能是缺点的处理方式却为作者留下了更大的讨论空间，在这一点上，风沙雁先生的小说得到了五四时期冰心为代表的“问题小说”家的真传，不让小说的形式干扰小说所讨论的问题。

其二，作者在小说中塑造了许多人物形象，这些人物群像感很强，个别的形象突出。这与作者描写人物时的表现手法有关，小说中大部分的场景是人物对话，作者擅长通过描写人物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侧重于通过对话展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文化观念，却不注重外貌、神态、心理、动作等方面的描写。这是

文化问题小说的本体特征决定的，也是这种小说类型的独特之处。人物的性格是通过他们的思想观念表现出来的，对话是他们表现性格的最有效的途径。对话写成功了，性格就成功了。表面上看，作者刻画人物的手法变少了，可是人物描写的难度反而加大了。我们在《遥远的期待》中看到了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与突破。

因此，如果把《遥远的期待》看做“文化问题小说”，“纪实小说”，着眼于它的文化意义和现实意义，作者的知识分子情怀和赤诚之心所产生的感染力，它形式上小小的缺憾完全不必苛责。这部小说不是以故事吸引人的，而是以“以气动人，以情感人”。它的意义在于披露，在于警示，在于呼唤，在于期待，在于挽救传统，记录现实，在于汇聚力量，在于凝聚人心。因此，瑕不掩瑜，它必定在新加坡当代文学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笔，影响深远。

不管是在哪个国家哪个历史时期，知识分子都会遭遇黑暗遭遇困境，而他们的意义正在于在困境中逆流而上，以勇者精神守卫自己的精神家园，守卫民族的精神家园。道路漫长修远，只要求索者与希望永在，精神之火便不会熄灭。王弘扬们是怀有希望的：“桃花源岛上有一股潜伏着的先进潮流在汹涌着，这股先进潮流以人文关怀为主，这是桃花源岛的希望所在……”，^{x1}风沙雁先生也是怀有希望的：“万顷碧波中有携带垃圾的浊流，也有一尘不染的清流，好多好多我所认识的中国的外国的学者，都是清流，这股清流，会流向何方，尚难确定，但它流向哪里，那儿就有希望。”

清流知识分子的存在就是希望，他们是社会的灯塔，是文化的命脉。

注解

- I. 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创意园工作室2003年2月，第81页。
- II. 风沙雁《遥远的期待》，新加坡风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7—8页。
- III. 风沙雁《遥远的期待》，新加坡风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74页。
- IV. 风沙雁《遥远的期待》，新加坡风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4页。
- V. 风沙雁《遥远的期待》，新加坡风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20页。
- VI. 风沙雁《遥远的期待》，新加坡风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22页。
- VII. 风沙雁《遥远的期待》，新加坡风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83页。
- VIII. 周宁《寻梦寻根诗人文人——风沙雁创作论》。
- IX. 风沙雁《遥远的期待》，新加坡风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63页。
- X. 风沙雁《遥远的期待》，新加坡风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63页。
- XI. 风沙雁《遥远的期待》，新加坡风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95页。
- XII. 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创意园工作室2003年2月，第81页。

(党阳，苏州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逐梦、筑梦的 民族文化“弘扬”者之歌 ——评风沙雁长篇小说《遥远的期待》

中国 朱厚刚 翟红

一册由新加坡风云出版社推出的《遥远的期待》呈现于眼前时，不禁为其精美的图案和精良的装帧而迷住。当阅读完那些透着墨香的文字后，更是在心里认定：这是新加坡华文文学创作的又一次大收获。

作者风沙雁是新华文坛的“多面手”，在文学创作（他有着多套笔墨：诗歌，散文，政论，小说等）和学术研究（已获博士学位）上都有建树，且著述颇丰。他2003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追逐阳光的人》后广受好评。《遥远的期待》紧接着其首部长篇对知识分子（“南大生”）的关注，将目光投注在一群为桃花源岛华族文化不倦守护的知识分子身上，刻画了当今以报馆记者为职业身份的海外华族知识分子或文人的群像，唱响了一首赞歌。

小说采取回顾叙述的方式，讲述发生在华文报社南淡晨报里的权力纷争和职位纠葛的故事。秉持不同观念的两群人，围绕关乎报社定位发展的高层职权和办报方针，一方利用权力打击排挤“异己”巩固势力，一方循着良知发展传承民族文化而展开一场“派系”斗争。虽无刀光剑影的血雨腥风，读来却也着实动人心魄，颇多感慨。

王弘扬在报社高层柳捷敏、王如旧等的大力邀请下，从外贸公司转到华文报社《南淡晨报》试图一展才华，实现心中夙愿。局面很快得以打开，王弘扬的加盟带来报纸销量的攀升

和个人才华尽情施展的双丰收。但好景不长，由于才华出众木秀于林，引来妒忌而流言渐起，更由于魏道义的极力打压排拒、“报馆的复杂人事关系”^{[1][P16]}等制度问题和欠缺主见的柳捷敏不能力排他议，王弘扬等人遭到排挤和冷落。本以为可以峰回路转，奈何知交李路明试图架空弘扬的“忘恩负义”，萧岩斌的落井下石见风使舵，都使得王弘扬等发展和传播民族文化的愿望搁浅。他在失望和无奈下、在小心和忍耐中只好另谋他路——转向学术研究并到高校任教，并牵头创办学报发展民族文化，最终达成所愿。

这是一群迷醉民族文化的知识分子。在处于中华文化大环境之外的海外华族移民后代身上，文化的延续性与统一性实在是重要的。中华文化的深沉浑厚博大精深使他们迷醉其中并用手中的笔自觉担负起传承之任，即便前路并非坦途满是泥泞。

这是一群肉体在俗世，精神在高空的文人。他们既考虑眼前，又有长远之思；既有抱怨牢骚，也有隐忍不发；既求生存的余裕，也思精神的余裕；他们工作之余也喝啤酒说粗话，但念念不忘心中的理想——致力于将祖国桃花源岛建成华族文化的“桃花源”。

这是一群孜孜不倦的寻路人，王弘扬、莫天骥、吴恩世、凌野草、施卫艺、张松青等人，虽在话语权竞争中居于下风，没有发挥才

力的场合，依然想方设法冲出令人气闷的“铁屋”创办《新时代学报》，为民族文化的薪火传承助阵呐喊。在对民族文化的自觉认同和维护文化尊严的道路上劈波斩浪一往无前，将短暂的人生投入到长久的文化传承事业之中。

这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传统”故事。故事的主角王弘扬同样是一位“多面手”，在同道者“三顾茅庐”般的诚意相邀下投身报社，寄望以手中的笔为民族文化宣传做贡献，可谓用心良苦。但在外部原因的冲击下，他对社会进言的梦想破灭，几成“遥远的期待”。令人感怀的是，王弘扬们依然毅然地追逐和构筑着他们不灭“文化的梦”。小说结尾时，各路“英雄”在余杭大学举办的世界华文文学论坛中的大集会无疑是另一种形式的梦圆。

随着风沙雁笔下干净优美的文字、耐心舒缓的人物对话和温暖宜人的笔下景致的渐次展开，一群文人的喜怒哀乐、沉浮命运也得以生动地全景呈现。李路明的口吃症与其心口不一相互映衬，林奕泉和童武镇暗中较劲的虚情假意，牛南阳的“咩”字腔调，那些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相互划界和暗算，都写得鲜活灵动真实可感。叙述者对人物形象的臧否好恶无疑体现在小说人名的设置上，由魏道义和王弘扬身上就可见一斑。

魏道义（谐音“伪道义”），身为报社高层（第二老总）却不学无术，是一位外强中干的强为的强势者，更让人心寒的是他妒忌人才，无容人之量，对王弘扬等人鸡蛋里挑骨头式的排挤打压均是其一手操作，营造的让人窒息的工作氛围也窒息了他自己的生命，最后落得罹患绝症病亡，也算天谴。按理说身为华文报社的高层领导，应该肩负起推进华文传播发展的任务，正所谓“在其位，谋其政”。但令人气恼的是，魏道义不光不谋其政，反而出于私人目的阻遏他人的作为，如面对南淡晨报与北陆商报在竞争报份中渐渐落后的事实，本末倒置地采取不当应对措施，以致失去市场份额和读者人心。魏（伪）道义的知识水平和狭小胸襟导致了他的盲视和偏颇，无知和浅薄，这提出了一个领导者（尤其是从事属灵工作）的

德才问题。正如学者艾云所说“人类精神的事务需要更多的同道者的共鸣、参与和呼应。如果为了使自己显得不凡而把所有的人都压下去，这只能是一统意识形态下的恶劣遗风，一种霸道。”^{[2](P141)}无意之中精到地切中了南淡晨报和魏道义的病灶。这也延续了作者风沙雁对海外华文建设问题一贯的思索着眼点——有关当局应该给华文提供生存空间。这样的思考是符合常情且明智的，如若没有这样的生存空间，华族文化和华族文人都会遭到“陌生化”和边缘化对待，处境无疑会更加困窘。

在海外，华文报可说是华文文学界的重镇和重要传播媒介。新闻写作也是一种写作；新闻记者是一群写作或玩文字的人，报馆就是他们的舞台空间。而“文人相轻”几乎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和文化陋习，南淡晨报也不例外，加之报馆高层魏道义等人无法胜任报馆各色人等的“润滑剂”角色，于是便有“枪打出头鸟”和他人看热闹的剧目不断上演且花样频频翻新。作为华文大报的南淡晨报无疑是桃花源岛彼时社会结构的缩影，报馆的高层管理员之间与中下层人员之间即使同族同文都明争暗斗各怀心事，人微言轻者人心惶惶担惊受怕，工作环境烦闷单调了无生机，大家都无心于正常的有创造性的工作，以致报馆在同行竞争中处于劣势。就如叙述者在小说中说的“文化界与官场一样，处处都在争权夺利，所谓的见义勇为，仗义执言都可以抛到天边去，那只是书本上的道理，在桃花源岛这个人人讲究实利的社会，只有傻人才会遵守的。”^{[3](P31)}那般，王弘扬们对桃花源岛国人文精神的失落感到痛心疾首，对传统文化中精华部分（如见义勇为、仗义执言）的流失感到深深无奈，对同宗同文者间的“相煎太急”感到愤恨委屈，但他们用具体行动对精神故土荒芜的危险进行着抵抗，试图校正桃花源岛文化发展的罗盘，他们的不满本身就是对健康和谐的人文生态的真诚呼唤。

王弘扬之“弘扬”，弘扬的是一种对文化负责的自我担当的勇气，弘扬的是对自由的执着呼唤与守护，弘扬的是对高远精神追求的

执着之念，弘扬的是有所信的灵魂坚守……他在受到冷遇与冻结后，虽身在“淘汰人才的机构”实则暗下决心要“冲出这地狱”并未雨绸缪早有准备。当魏道义等人举着写有“此路不通”的牌子封堵了原有道路时，王弘扬拒绝享受个体的安逸的生活，抵抗消费社会的贩卖文化的思想的侵袭，在与英文语种的“地盘”争夺中拒绝拱手相让，继续着桃花源岛的华文建设征程，坚持理想不言放弃。他“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联合有志之士办专业学报，利用业余时间奔赴马拉诗雅国、东方之珠岛，秋海棠叶国、新西兰、英国、美国等地“串联”学者写稿，很快取得反响而应者云集。罗兰·巴尔特曾说：“人是由其语言呈现和托出的”，事实也确实如此。一个民族的延续和振兴虽不以文化的延续和振兴为全部内容，却是以文化的延续和振兴为其最高表现形式和最高精华。王弘扬们对母语华文的守护和信靠，就是在守护自己的族源，就是对“把根留住”的执着，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浓重的华族情结。

精神的有所求及自由飞翔与行动的不自由和无所作为，理想的高扬与现实的制约，造成了王弘扬报社生涯的悲剧性，给他带来精神上的痛苦，更为要緊的是“写文章的自由”都被剥夺，其个体言说的权利消于无形，失去在公共空间发言的可能性。他在冷遇和等待中被报馆裁员，转而到东海大学教书——以另一种言说方式发声，持守理想并实现了自我价值。世纪之交，身处物的时代，王弘扬应该是称职的有良知、有见地的文人。王弘扬曾在电话中对张松青说：“我们要求个人的解脱，有何困难？但若只如此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4] (P56)}是的，王弘扬作为独立个体必须致力于建立并维系一定的价值观，才能赋予自己的日常生活以价值意义。风沙雁自己也说过“在物质生活丰足，而精神生活贫乏的时代，深恐前路无知己的人有时是得自己营造个精神休憩所的”。^[5]弘扬自己民族的文化便能促成这样的心愿，找到精神的故土。即便身临无所依附的漂泊状态，但他们考虑并追问的是如何使生命的价值与知识的价值，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得

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如何顶住压力肩起责任为社会事务进言献策。按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本色应该是：在受到形而上学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去看，王弘扬是彼时代一名合格的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曾预言说“知识分子的声誉将会逐渐走下坡路，依据知识分子的思考所建立的价值也将衰微”。与时代一同跳动脉搏的敏感如王弘扬者定然有着相同的喟叹。难能可贵的是，王弘扬们“痴心不改”身体力行，坚持做民族文化守护路上的主力和干将，报社逐梦不成便创办学报自己筑梦，一直担着弘扬者的角色，为民族文化的不绝如缕、一线以继而贡献力量。

风沙雁笔墨间浓重的“中国情结”昭示其拳拳之心，也让人不由记起李贯通的获奖中篇小说《天缺一角》。痴迷于金石学“迂腐”十足的文化馆官员于明诚，因老馆长文革中的托付而誓死守护国家文物汉代石碑的高尚举动和正义事业，本应获得善终。奈何经济利益诱惑下的“一石激起千层浪”，惹出几多的风波。“浪花”淹没了认真执着的于明诚，那些曾对文物私动心思的人则依然无事般活着，而石碑的保护工作并未得到真正重视与落实。

《遥远的期待》和《天缺一角》虽在不同时空出现，结局或喜或悲，但都写出了清醒的“糊涂人”——知识分子的良知、梦想以及苦苦追寻理想的艰难历程，读来真实感人。人文理想遭遇的尴尬、贩卖文化的无知举动、生活的艰难困窘以及社会发展中的种种弊端，都随着细腻的叙述而铺展在我们眼前拂之不去，引人深思。

王弘扬对民族文化的迷恋和执着，总会让人记起古斯塔夫·勒庞说的“没有传统，文明是不可能的。”的警策之言；他们逐梦与筑梦的切实行动，亦是对赵园看似漫不经心的写在其专著中的“承启，是每代人的使命。”的遥相呼应和躬亲实践。“真正的勇气，真正的理想，真正的力量不是天马行空、无所羁绊，而是在与现实各种力量的冲突较量中，在百般的

磨损中，依然一息尚存，那才是真正可贵的质地，那才是历史得以存留延续的真正线索。”^{[6](P424)}王弘扬们既书写着自己的人生历史，也努力存留那些文化“延续的真正线索”，藉此，文化的质量也得以提升提纯。这无疑是所有的华族子孙都希望看到的。

纵览整部作品，我们可以说《遥远的期待》无愧于“真正意义的文学批判，源于作家对人类生存现状与理想价值的人文关注，出自良知与历史使命感。”^{[7](P277)}之谎言。因为挚爱，源于清醒，书写时代理想时内含呼唤吁求，面对时代罪恶也有揭露批判，足见其真情和胆识。通过写作本身，风沙雁既拥抱这个世界也被这个世界拥抱着。王弘扬们努力实现现时代知识分子个体使命和坚持设计自己的心灵前途的举动，都昭示着：遥远的期待不会再遥远，梦想正在趋于真实。

注释：

- [1]. 风沙雁，遥远的期待[M]。新加坡风云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16页。
- [2]. 艾云。用身体思想[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41页。
- [3]. 风沙雁。遥远的期待[M]。新加坡风云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31页。
- [4]. 风沙雁。遥远的期待[M]。新加坡风云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56页。
- [5]. 转引自：李小平。根系中华文化的古典美和现代情——论风沙雁的散文创作艺术[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
- [6]. 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424页。
- [7]. 张韧。新时期文学现象[M]。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277页。



文化困境中的破茧重生 ——风沙雁小说《遥远的期待》的文化认同

中国 广西 张淑云

文化认同或身份认同，在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是个备受关注的议题，这个议题之所以在当代学术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源自于当代世界正经历着全球化的社会转型这一现实。全球化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而全球化进程大体上又和西方价值观尤其是西方文化对世界其他民族的渗透同时并进。文化维度作为考察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参照点体现为全球化在文化生活各领域内导致的所有变化。文化作为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延续，体现了个体、民族、社会与国家对自身的认同。当代对文化认同的关注，也是围绕着“认同危机”而产生的。如何在文化危机中重建文化身份，也是海外华人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重要问题。面对现代化工业文明、西方文明的冲击，海外华人遭遇着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认同危机，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就表现为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因此，寻找文化身份成为后工业化时代处于“认同危机”的海外华人所关注的焦点。

“所谓文化认同，是指人们对于某种相对稳定的文化模式的归属感。它包括社会价值规范认同、宗教信仰认同、风俗习惯认同、语言艺术认同等，其特性比起政治、经济结构更加牢固。文化认同作为国家的‘软实力’是一个民族国家最基本的内在要求，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但是，由于

华人在整个国度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而使华族文化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体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新加坡知识分子在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中表现出强烈的文化认同感。新加坡著名华文作家风沙雁先生在对中华文化自觉认同和关注、关怀的基础上，创作了一系列散文、小说作品，以此来审视当代新加坡变化万千的社会生活。长篇小说《遥远的期待》表现出在华族文化日渐式微的状态中，寻找自我身份和文化家园的主题，具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意识。

一、文化碰撞中的认同危机

“所谓文化认同危机，就是指文化认同的矛盾和不确定，即主体与他所属的社会文化传统失去了联系，失去了社会文化的方向定位，不知道自己是谁，从而产生观念、心理和行为的冲突及焦虑体验。”^[2]新加坡作为以华族为主体的多元民族国家，早期离乡背井到新加坡再创家园的移民者将各自的文化传统带入新加坡，使得新加坡具有多民族的文化传统。在新加坡华文文学的背景上，我们看到的不是那种文化的综合性与一致性，而是差异或冲突。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交融也有冲突，中西文化的冲突与碰撞在某种程度上也形成了新加坡华人生存的文化认同危机。多元种族的社会环境使华文文学的发展失去了社会基础，语言的分裂，多语并行、英语强势、华语式微的局面使

华文文学处在一种独特的文化生态中，在文化与社会断层间挣扎。受中华文化传统熏染的风沙雁出于对母族文化与母语的关怀，对文化认同危机作出了生动而真实的诠释。

全球化进程改变了海外华人的生存状态，从而对他们的生存身份产生了新的影响，对他们的身份归属和文化认同带来危机。置身海外文化圈的华文作家们将各自对于文化危机的体认溶于作品之中，演绎出文化身份的众生相。风沙雁先生在小说《遥远的期待》中写出了被挤压在社会边缘的知识分子形象，反映出了文化式微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如作家在小说的前言写道：“这一本札记是有关桃花源岛上的知识分子的动向与心态的，从侧面反映了在中华文化式微过程中，多少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遭受压抑，多少受华文教育者被边缘化了，与此同时，又有多少昧着良心的知识分子，把中华文化论斤论两来变卖以换取个人的一点蝇头小利和生存空间。”^[3]这无疑是海外华人在面对历史与文化纠结时滋生的矛盾复杂处境的一个真实呈现，反映了华人在特殊的境遇中的尴尬心态和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和重构危机。中西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交汇、碰撞所带来的困扰，是任何一个海外华裔都难以回避的问题。

小说中的众多人物都面临着这样的文化身份认同和自我定位的危机。主人公王弘扬日本归来怀着“为华族文化尽一点绵力”的壮志加入南淡晨报，用力写时评呼吁提高母语水平。风沙雁将主人公定名为“弘扬”，想必也是取弘扬民族文化之意。然而王弘扬在报社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渐渐被“冷藏”。作家以犀利的笔调刻画了报社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撞击下的复杂心态和现实处境。柳捷敏、王如旧、魏道义、萧岩斌、李路明等人处处都在争权夺利矛盾斗争中，彰显了他们精神的焦虑和危机。文化冲突的深层结构借助于复杂的人际关系与权利争夺的矛盾得到了隐喻的实现。

在一个经典日渐死亡的年代，在一个隐喻与诗性不断消亡的时代，风沙雁的小说就是

华裔知识分子发出的声音，正如小说中写道：“南淡晨报报份降至今日这么低的数字，全是报社内斗的结果，而母族文化与语文式微至现在这么低的水平，也全是我们内部少数人为了个人一点小利益而出卖原则的缘故。”^[4]深刻地揭示出文化式微的重要根源。在新加坡共同社会环境中，由于不同宗教信仰，不同语言的并立，分解了读者。华文报刊读者面在逐渐缩小，面对这种情形华人知识分子怀着爱护母族文化与母语的热忱，对华族母语与华文文学的给予深切的关注。然而，在文化的冲突中，这些知识分子并没有完全迷失自我，而是坚守着最后的精神家园。小说中的南淡晚报副总编张松青来晨报改革，充实报章副刊内容，使晨报报份上升。张青松、王弘扬等人对于自己的文化，内心里有着根深蒂固的保护意识，为华文文学与文化的发展积极努力，作家风沙雁先生用毅然抉择的精神勇气和细腻的笔调为读者传达了新加坡都市里的华人知识分子的生存体验。

二、自我身份和文化家园的重建

后工业化社会，人们面对的最基本问题是：我是谁？我们的国家（民族）身份和我们的文化身份是什么？身份是一个个体或族群界定自身文化特性的标志，所涉及的除了个人的文化身份外，还包括民族语言和文化身份的问题。人如何找到自我身份，是海外华文作家努力追寻的话题。他们主张解构西方的强势话语，颠覆西方传统文化的霸权地位，从而建构边缘群体的文化身份。这一主题既是对新华文学传统中寻求文化身份主题的继承，又是对其进一步的发展。新华作家置身于西方强势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双重文化背景下，为了生存被迫采取各种文化生存策略，作出各种不同的反应，来获得文化身份的认同。这些被西方中心主义边缘化的华文知识分子难以克服中国文化的情结，竭力想保留中国文化的根，以固守华夏中国的文化身份来对抗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化的排斥。在这两种对立的价值取向之上，他们

主张解构西方的强势话语，颠覆西方文化的霸权地位，从而建构边缘群体的文化身份。对历史和传统的追寻实际上是在寻找自我身份和文化家园。

在某种程度上，文化身份具有理论上的“建构”之含义，也就是说，人们通常把文化身份看作是某一特定的文化所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而对于从事华文创作的作家来说，身份的建构则伴随着更为清醒也因此更为痛苦的精神历程。

《遥远的期待》揭示了华文知识分子的复杂的心态。他们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文化心态，西方文化不可能根本动摇他们的中国文化的本位立场。华文知识分子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保持了精神的统一性，更加体会到了中国本土文化的“根”性的重要性。中国是他们的根，是他们生命的一个源泉，在文化心性上他们是这一国家与民族的一分子。从宽泛的意义上说，整个华裔文学都具有文化怀乡基调上的寻根特征。华裔作家通过自觉地追忆华人的传统来寻找与确认自我在现实中与精神上的归属。

风沙雁先生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从中汲取精神力量。于是他们从反抗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排斥压迫，从固守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来寻求自身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

《遥远的期待》中的王弘扬在复杂的人际纠葛中冲突出来，专注于学术研究，并与同仁志士创办《新时代学报》。“我们的学报探讨的是文化课题，主要是中华文化史哲问题，及中华文化在世界各个角落落地生根并已本土化后的现状研究。”^[5]他们在文化身份认同的艰苦思索和不懈努力实际上反映了他们置身于多元文化背景下寻求自我身份的认同，试图建构属于自身华族的文化家园。对于海外华裔来说，只有在共同的文化基础上，他们才能找到共同的目标和指南，来一起勇敢应对面前陌生的世界，因此，文化之根的固守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遥远的期待》突出地表现了华文作家对自己传统文化的那种割舍不断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着力刻画了一群文化式微下的知识分子，

孤独的坚守以及他们的理想主义气质，并为家园重建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小说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文学方面，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而存在。作为一个融通中西的学者、作家，作为华裔新加坡人，风沙雁是从母体文化、国家前途的双重角度去看待文化式微这一问题的，所以，他不得不对中华文化的式微，尤其是在新加坡社会现实中表示他的重重忧虑和不安。为了在多元文化空间里寻找到自己的位置，用言语、用写作来重建他的文化身份和精神家园，他的作品都建基于“文化”的大背景并力图阐发传统文化意义。这也构成了华文作家从事写作的强大心理动力。风沙雁的小说基于“文化”的大背景并力图重构文化家园。小说《遥远的期待》涉及了当前困扰着新加坡华人文化的主要问题，即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用其独具的学者眼光，从“文化”的角度去观察生活、分析问题，思考着新加坡的今天和明天。在小说中作家精心营造了一个“桃花源岛”，这是对华族文化式微的深深隐忧。在西方文化强势下，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何以成为可能？南淡晨报发展的举步维艰无疑是当时新加坡华语艰难处境的真实再现。风沙雁选择留守家园，守望在他那大中华文化的辉煌想象之中，并在这种想象中肆意地张扬着他的文化情结。对中国文化的爱，对文化受压制的哀怨，对现实政治权力的强势压力的无奈，对多元文化格局中文化弱势群体的悲悯与同情，所有这一切，都基于对中国文化的深深眷恋。

三、结语

面对着社会的急剧转型和东西方各种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海外华人知识分子内心的不安与忧患无可避免。在血缘上、文化上，他们同祖籍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华文化在海外华人心中仍是不可消除的精神之根。华文文学一脉相传的文学关怀就在于华族文化精神的重建。语言是凝聚民族的形式，华语与华文文学的困境实际上是华族文化困境的缩影。文化

的核心是一种人文精神，文学是民族文化的血脉，而一个民族的文学与艺术创作是民族文化精神的进接体现。风沙雁在文化大背景下思考华文文学的命运，他始终把对华族文化、华文与华文文学命运的关怀置于他精神生活与文学创作中。他深深地意识到华文文学的真正危机在于读者的日渐减少，因此，他在寂寞与痛苦中执着地坚守着华文文学阵地。

风沙雁先生作为新加坡华文文学创作卓有成就的作家，他以诗人的心灵感受，在寻根之路上不断求索。风沙雁在新加坡只找到现实或社会的家园，而精神家园的失落造就他精神怀乡的气质。社会与文化的矛盾造成故乡与异乡的错位感，真正的精家园却在中华传统文化与文学中。风沙雁作为一位知识分子不可避免要把文化家园重建置于他精神的核心与创作的核心。作为一位典型的华族知识分子，善于理智地分衡与批判，富于正义感与勇气，还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他的作品中充满一种忧患而感伤的文化家园重建的精神追求。风沙雁对华族母语与华文文学的衰落感到心痛。提倡并从事

华文文学创作，本质的意义上看，它关系到民族文化的承继与发扬，关系到每一位华人精神家园的建设。风沙雁始终把中华文化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这种对于家园的执着与坚守、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使得他从文化危机中突围出来，破茧重生。

参考文献

- [1]. 阎顺利, 敦鹏. 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哲学反思[J]. 阴山学刊, 2009,(1).
- [2]. 郭群. 文化身份认同危机与异化——论查建英的《到美国去! 到美国去!》[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5).
- [3]. 风沙雁. 遥远的期待[M]. 新加坡: 凤云出版社, 2008;7.
- [4]. 风沙雁. 遥远的期待[M]. 新加坡: 凤云出版社, 2008;58
- [5]. 风沙雁. 遥远的期待[M]. 新加坡: 凤云出版社, 2008;63



永远的遗憾 —读《遥远的期望》的感伤

新加坡 唐仁贵

炎热的下午，马路上蒸腾着热气和汽车的废气。在牛车水车水马龙川流不息旁边的咖啡店，我和老友石青山坐在摆放在五脚基上的咖啡桌喝咖啡。这一天爱看书的他送我一本新加坡作家风沙雁的小说《遥远的期望》。

我把小说带回家。也许我真的老了，用了三天的时间才把这本厚度不大的小说看完。这是一本情节不多，为记事之作、非言情之作的小说。故事讲一个为人谦抑的青年放弃了优差，转行到报馆工作。他抱着要加入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的决心，没有想到竟然把自己卷进一场场人事斗争，工作受到限制和威胁。青年在怀才不遇的逆境中寻求出路，选择忍辱，继续上大学进修，结果，考获博士学位。那场人事斗争的“结局”果然让他失去了工作。他就凭着博士学位转行到大学里教书，继续追求他个人的理想，要维护民族文化，还创办杂志来传薪火。

小说中一段段的办公室人事斗争叫人读了惊讶莫名。虽然说“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是个很平常的事，但是我对书中描述的文人世界实在无法相信。看完了合上小说，我的这个下午的心头里留下了许多感叹号！

我以为人事斗争都是发生在商业味强的工作环境，没有想到在文化气息浓厚的工作环境里，人心也这么狭窄。我因此惊讶之余，还是惊讶：深刻的触痛浮现之外，还是深刻的触痛！这本小说里向读者影射了一个过去式的报业人事环境到底有几分真有几分假？作者为什

么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来创作一个这样的故事？来影射一个外表看起来宏伟的机构？他必有抱负着还原历史的使命感吧？他要说的是一个曾经的事实？

小说中有段对白精彩得叫人难过：

“在这机构做事，不须要有真本事，但得懂得要权术。扬应南最善于逢迎吹嘘的嘛！”……（李遵荣语）

“我真的是想像不到。受华文教育者在同一屋檐下做事，那种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比受英文教育者之间的斗争，更为阴险与激烈！”（王弘扬语）

“……而今在你最擅长的华文环境工作，你直接参与斗争。当然感到斗争惨烈罗！其实，华文教育者是丢香蕉皮给你踩，让你自己踩个四脚朝天屁股开花，最好是骨折脚断；英文教育者的斗争如五十年代的流氓在后巷开片，汽水瓶，镰刀一齐出动，大家火拼，谁砍伤或砍死谁，一目了然。差别就在这儿，弘扬你不清楚咩？”（第51页）

小说中的青年弘扬在恶势中也逢上一些仁心贵人，象好心的观玉就提醒他说：“我来这报社五年了，五年来，我看了多少场把戏。在戏台上的那些丑角，有陪笑的，有托大脚的，有陪喝的，有帮腔的，只要巍道义一开口，底下就有应声虫。弘扬，这些‘本领’你一点都不会，你怎么在这儿生存呢？……”

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些文化份子这么愚蠢？他们做为饱读诗书的知识份子，何须浪费

时间进行人心战斗？何必积极踩人，排斥同事，背人谗言搬弄是非，行各种小人角色的動作？为什么要自我糟蹋人格修养？知识份子既然知书达礼，行为为什么这么不堪？知识份子更应该时刻反省自己，纵使偶尔犯个小错，也应该自我整冠正身，激励自己去追求更清白的、人格清高的境界。何必发动无谓的牛角上战争？

万万没想到，那些年里中文面临四面楚歌时，那个最集中优良中文人才、最后的一批拥有最深厚的中文底子的人才的环境里，竟然存在着一些尔诈我虞的行为。书中有动辄用权挤压人才、排异伐胁的上司，导致好报人一个个离职；有些报人软弱地趋附降低中文程度的做法，果真如此这是一个永远的遗憾！难道不能说，这个小岛的中文沦陷成今天这个局面，过去这些为己功利而愿意当应声虫的人，一个个都有份参与陷害中文，阻扰自己民族文化传承之路，埋葬一个优越的语文的发展！他们的一时目光短浅，导致中文的加速衰败！如果当年他们坚持倡导中文，象马来西亚的华校和中文报章办得那么决心坚持，那么，我们今天的中文应该不至于这么垂头丧气吧？

法国人有一句话说，“人走到哪里都逃不过自己的良心！”宇宙里的时间长河是公正的。就算一切已成为了历史，当年的这班权势

应声虫现在回望他们自己的生命轨迹时，他们难道没有感觉惭愧的？甚至是觉悟了所犯的错而深深的懊悔？

小岛的华文萎顿之势非常惊人。英文已经蚕食了整个社会运作。当年的领导丧胆地害怕共产党登陆，短视地以为华文=共产党。……才几十年的时间而已，在这压缩的时光里中文的流失非常惊人！虽然也推行了几十年的讲华语运动，事实证明了推行政策收效不大。小岛的年轻人讲起华语却口吃，别说书写了。中国移民对人讲纯正国语，要招来异样的目光。结果，沟通只好改用英语。

这本小说的一个精神要素是这些磨难中求存的真正知识份子，散布在世界各地，他们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的坚持捍卫和斗志精神，又让人对他们肃然起敬。到今天，有多少余怨，一些世事大家也许想通了，当着一个海外华人社会的一个永远的遗憾吧！纵有不能原谅的，一些世情大家必也看透了，当着是生不逢时来安慰自己吧。

“我们的队伍原本就这么小，再争下去，势力不是更加单薄了。”（82页）诗韵短短的一句劝语，还可以对今天中文界一些势不两立的人当头棒喝吧？做为热爱民族语文和文化的人，和平相处与互相尊重是多么重要。



思想和往事 ——忆王元化先生

日本金泽大学 李庆

元化先生去世，一晃就将近一年了。媒体报道，渐渐减少，在一般人们的视野中，他的身影渐渐消淡。历史长河，依然如故，不停地向前流淌着。

然而，在我的记忆中，和元化先生接触的那些往事，却难以忘怀，他思想的闪光，显得益发明晰。

记得去年5月10日，接到元化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并不感到过分的惊讶。

3月底，因为要出国，我曾到瑞金医院去看望过他。当时已经不见外人了，他姐姐让我进了病房。当时即使见面，一般也只允许十分钟左右。但是那天，他还是非常费力地和我讲了好一会儿话，主要谈他的病，说是肺部有问题。我给了他一本自己新出的小册子。告诉了他关于他的《著作集》日译本第二卷出版的消息，他说已经知道了。要我到日本后，向有关友人问好。还说了一些其他的事。他感到非常疲惫，向我双手合十，说：“我没有力气了。”

然后慢慢地躺下，闭上了眼休息。

我感到元化先生真是竭尽全力了，失去了往日的神情。直到生命临终，他一直关注着学术和思想的研究。

望着他那因放射性治疗而有些浮肿的脸，由衷地祝福他能早日康复，同时也隐约感到一种不祥。我曾把这一感觉告诉过也非常关心元化先生健康的章培恒先生。这是我见到元化先生的最后一面。

令我感到有点意外的是报纸关于他去世消息的报道：

“著名学者、文艺理论家、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元化，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5月9日在上海逝世，享年88岁。”

王元化，1920年生于湖北武昌，祖籍江陵。曾任中共上海地下文委委员、代书记，1983年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生前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著有《向着真实》、《文学沉思录》、《文心雕龙创作论》、《清园夜读》、《读莎士比亚》等。”

这里，他是个“文艺评论家”，他最倾注心血的《九十年代反思录》《清园近作集》（以下略称为：《反思录》《近作集》）等后期的著作都没有提及。

后来，举行了颇为隆重的追悼会，许多有名望的和没有名望的人都出席了。有关报道中，上述一些著作也终于列入了。可以说，颇享哀荣。

我不知道，元化先生九泉之下有知会怎么想，我也不知道，参加追悼会的人中，有多少是认真读过元化先生的著作，理解，或关心他所追求的，探索的，批判的，反思的内容的。

在报刊的舆论和纷纷扬扬之声中，除了悲哀以外，我感到一种寂寞。

当时，有好几位朋友和我谈起，约我写一点东西。我都拒绝了。不敢去碰那悲哀的创伤。但痛后再想，仍难以忘怀。先生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勇气和热情，敏锐而充沛的思维能

力，通达而坦诚的生活态度，这些年来一直影响着我，给了我很大的教益。

真正要忘记一个人，也是非常困难的。

二

和元化先生相交，是在他人生最后的十五年间。

其实，在1984年，复旦大学中文系举办的《文心雕龙》国际会议上，我是见过先生的，但是，没有直接接触。他当时是上海市委的宣传部长，我是普通的大学教师，只是远远地见过他，也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

真正开始接触，是在1993年，斯德哥尔摩市东南郊的萨尔舍巴登大酒店（Grand Hotel Saltsjobaen）附近的湖边。

我应邀去出席“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国家，社会和个人”国际会议。我收到正式的邀请，是因为我写了一本《中国文化中人的观念》的书。我提交的论文《中国文化中“死”的观念》，是全书中的一节。在会议前，我到所住的酒店外的湖边散步。见他一个人，穿着一身休闲服，运动鞋，也在湖边散步。于是打了招呼，这是首次和他接声咳。

在那高远的蓝天，飘逸的白云，深湛的湖水，还有绿色的树丛，呈现着北欧最漂亮夏季风光。在停泊着许多多彩的游艇和小船的湖边，我们简单地聊起来，我告诉他，我是从日本来的。或许当时他看我年轻，不太在意，所以印象中，误认我是去日本攻读学位的留学生。其实，我没有在日本留过学，很久以后，我才告诉他。

此后，在会议间又有接触，他对我在会议上的发言比较赞许，谈得就深入了。因为我带着照相机，给他，还请人给我们一起，拍了些照片。特别是参加斯德哥尔摩议长在诺贝尔授奖礼堂举办的宴会时，我给他单独拍了一张照片。回国后，他有点执着地一定要我把照片，连同底片一同寄给他，结果，我剪下两张照片的底片，寄上，那就是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版的《思辨随笔》和其他一些书前的照片。而现在我手边底片也没有了。关于那次会议，元化先生曾经发表过文章，其实还有一些有意思

的事，容以后有机会再谈。

于是联系渐多，谈论的内容也就海阔天空了起来。他给了我他出版了的主要著作。我大多都拜读了，有不少收益。我曾写过一篇关于《清园夜读》的书评。对他所谈的某个具体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他非但没有不高兴，还很有兴致地送了我一幅他写的字：“为学不作媚时语”，大概是鼓励我的态度吧。

他要我为他主编的《学术集林》杂志做点事，具体是担任“东亚”——当然主要是日本方面的学术联系工作，并且希望我写点有关日本汉学的文章。结果发表了后来在学界引起一些议论的关于中国和日本“疑古思潮”的文章，还有关于留存在日本的一些近代重要人物的遗墨。这成了我和其他年轻的朋友们一起编注《东瀛遗墨》的契机之一。

元化先生80岁时，他的学生们为编辑纪念论文集，要我提供一篇文章。我当时想，还是提供一篇没有发表过的为好。因为我在撰写《日本汉学史》，先生和我的谈话中，又多次问及有关的一些情况，所以，就写了一篇《投海词人孙点》。孙点是清末到日本的一个词人，后来悲世愤俗，投海自杀。但是，在看校样时，编辑的朋友指出，这是“祝寿”性质的纪念文集，写“自杀”，有点不合适。我开始实在没有顾忌到。但已经没有办法了，只好改了一下题名。我把这事和元化先生谈了。他哈哈一笑，说“没有关系的”了之。

自从他知道我在撰写《日本汉学史》，就一直给我鼓励。要我不要搞成时下那种“文格渐卑庸福近”（龚自珍诗）的东西。他还对我说，他主持的上海古籍整理小组的古籍整理经费，虽不多，前一时期都支持了《金文诂林》，但你也可以申请。我当然非常感谢他的好意和提携。但是考虑以后，还是不申请。对此，他也没有不高兴。

此后，他曾寄给我了一幅他写的条幅，就是印在《元化先生画传》前的那幅，他在那幅字后，题上了我的名字，或许是对我的鼓励和要求，我一直铭记着。

三

上一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回国的次数增多，和元化先生会面的机会也多了。其间多受教诲。我感受最强烈的，是他强调：人的思想会不断发展。一个成熟的人，一个成熟的民族的标志，就是能不能进行“反思”。而“反思是痛苦的。”（《反思录》328页）

他在晚年的论著中，多次反复地谈到过这一点。如《文心雕龙讲疏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再版的《思辨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反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中的《近思札记》，《记我的三次反思历程》（见《近作集》，文汇出版社，2004），等等，都谈到了“反思”。他曾说：自己“重要的文章，都是六十五岁以后写的。”

但是，“反思”不是对过去的完全否定，反思表现在各个层面。笔者在8年前，曾写过一篇有关元化先生《反思录》《九十年代日记》的文章，谈到过他的思想和变化，给他看了，他觉得不错。现在看来，我基本还是那样认识，当然，又有新的感受。

在哲学层面，元化先生主要是对黑格尔哲学认识的反思。黑格尔哲学的整个体系是怎样的，这是一个还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然而毫无疑问，从上一世纪以来，在中国的思想界，黑格尔的哲学，有很大的影响。

黑格尔关于把整个历史作为一种逻辑展开的思想，曾经使无数在黑暗中探求理性之光的青年人感到振奋和倾倒。王元化先生在年轻时期，也同样如此。感受到其中“强大而犀利的逻辑力量”。（《反思录》26页）但是，在晚年，他认为，黑格尔过于刚性的思想体系，在现实的展开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

在《反思录》中，元化先生说：“从七十年代末，我开始感到黑格尔哲学”的缺陷，（27页），在《记我的三次反思历程》一文中，再次重点谈了对黑格尔哲学反思的过程。（见《近作集》10页，此文为《思辨录》的序言）他认为，历史的展开和逻辑的展开，并非都完全一致，现实的生活远比抽象的逻辑丰富。（见《读黑格尔的思想历程》，《反思录》228页）

元化先生指出：人对于世界的认识，不仅只有感性——理性这样两个对立的层次，还应当有“知性”的阶段，认为：“知性是理性认识的一个环节”，有着自己的特点，“把知性和理性区别开来很重要”。（见《思辨随笔》120—123页）

他多次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层面，对于黑格尔哲学关于“普遍、特殊、个体”关系的思想，作了阐述：

他说：“黑格尔幻想有一种不同于抽象普遍性的具体普遍性，可以将个体性与特殊性统摄并涵盖自身之内。但这种具体普遍性只存在于黑格尔的逻辑中。不承认独立存在于普遍性之外的个体性与特殊性，实际上也就是用普遍性去消融个体性与特殊性。”

“过去我曾十分迷恋黑氏关于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三范畴的哲学，认为这是他的辩证法所创造的一大奇迹。现在应该从这种逻辑迷雾中清醒过来了。”（《与友人谈公意书》，见《反思录》92页）

哲学层面的探究，是元化先生“反思”的基础。这样的思想转变，使得他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也都产生了变化。

四

元化先生晚年，多次谈到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谈到过对所谓“公意”的看法。

这个问题，在他晚年的脑海中，盘旋了很长的时间。可以说是他的哲学观念在政治学和国家学说中的反映。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已经写了不少文章，都发表了。如：

1992年写了《与友人谈公意书》（见《思辨随笔》199—202页）。

1997年底至1998年上半年，他整整花了8个多月的时间，反复阅读思考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探讨其对中国近代思想的影响，写了长达万余字的文章，发表在1998年6月《文汇读书周报》上。当时我在国外，他特地把文章寄到日本让我看。

2001年，在《反思录》中，把先后三篇有关的文章收入。题为《卢梭<契约论>笔谈三

篇》。

在2003年3月6日的《社会科学报》“学术思想”版上，又发表了《研究<社会契约论>所作的笔记》。

他特地要我把这些文章带到日本，请日本学者翻译成日文，收入在他的日本著作集的第三部中。可见，这个问题，他思考探讨了多年。

他在《与友人谈社约论书》中说：“我认为公意说是《社会契约论》全书的核心。我曾在《谈公意》一文中，将卢梭的公意、众意、私意和黑格尔的普遍、特殊、个体作了比较研究”。（《反思录》108页）

“公意”是什么？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元化先生认为，按照卢梭的看法“公意是被宣布为更充分更全面地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与要求的。它被解释作比每个社会成员本身更准确无误地体现了他们应有却并未认识到的权利，公意需要化身，需要权威，需要造就出一个在政治道德上完满无缺的奇里斯玛式的人物。不幸的事实是，这种比人民更懂得人民自己需求的公意，只是一个假象，一场虚幻。其实质只不过是悍然剥夺了个体性与特殊性的抽象普遍性。”他指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表面上非常带有“民主”色彩的社会公意，在实际上是非常专制、非常不民主的运作的产物。

有的学者，把公意理解为排斥私意的概念，或认为私意和公意相比，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零件。就是“私意”把公意对立起来，（见《研究<社会契约论>所作的笔记》）元化先生认为，这很成问题。卢梭把“什么是公意，什么不是公意的能力赋予一个立法者”的想法，有其明显的缺陷。他说：

“以公意这一堂皇名义出现的国家机器，可以肆意扩大自己的职权范围，对每个社会成员进行无孔不入的干预。一旦泯灭了个体性，抽象了有血有肉的社会，每个社会成员就得为它付出自己的全部自由作为代价。”（《反思录》92页）

“民间社会没有了独立的空间，一切生命活力也就被窒息了。只有在国家干预有所限制

的条件下，方能容纳各种需求，使多元性、自发性、独立性的公民意志得以沟通，达成真正的契约关系。这样才可以使原先淹没于抽象普遍性之中的个体性与特殊性，取得真实意义上的存在。”（同上）

可见，他是在关注国家学说。

在九十年代，对于我们国家要不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改革，有着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国家的机构形态，应当朝什么方向改革，都还“缺乏理论准备”（《思辨随笔》44页）。他的思考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他有关顾准，有关张中晓，有关反思“文革”的一些文字，都与此有关。

一位前辈学者这样指出：“我们的理论界（无论前辈或后辈）并没有提出过一个比较具体的完整的新国家学说。”（转引自《反思录》124页）

这显然是我们今天依然应该花大力气去探讨的现实课题。

五

在思想文化层面，元化先生晚年对于“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走向的研究和反思，主要的论文有：《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和李辉以及其他谈“五四”的文章（上二文俱见《反思录》），等等。

媒体上论说和讨论这方面的文章已经非常多。

关于《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一文，我印象中，元化先生曾讲到，最初是杜亚泉的家人，把他的文章收集起来编成集，想请先生写一篇序元化先生。在阅读时，触发了许多问题，促使自己去找资料，思考判断。于是，不断展开，成了一篇大文章。

他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于“五四”的资料，有一定片面性。那是根据后来人的理解整理过，描绘过的画面。因此，应当根据现在已经可以见到的更多，更全面的史料，再进行探索。

和李辉先生对谈“五四”的文章，元化先生也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最初，谈了以后，整理了一个记录稿，他作了修改，排成了要在

报纸上发表的样稿。当时北京《人民日报》社把样稿发到了住在衡山宾馆的元化先生。那几天，我刚好在上海，他要我到他那里去。当时的元化先生，还相当健康，健谈。他把校样几乎改得面目全非。记得直到截稿日晚上十点钟左右，他叫我帮他把改好的校样复印以后用快件发到北京。而当时，只能到衡山宾馆一层的营业服务处发。发完后，他很高兴。还把一份复印件给我。说，“看看，我改了多少。”这份复印件，我还保存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元化先生如何字斟句酌，反复思索。如果把发表的文字，和原来的稿子对照，是可以看出元化先生思想变化的一些线索的。

对于“五四”的独立精神，对于“五四”对于旧制度的批判，对于五四以后，面对外来侵略时“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贡献，元化先生都给予非常高度的评价。他并非如有些论者所说的，否定“五四”。恰恰相反，认为他自己是在“五四”思想解放思潮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但是，他也确实认为，“五四”以来的思想走向有着偏颇的地方。具体表现在，某些代表人物，在某些时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对现实的中国政治和社会问题，采取了一些过激或简单化的态度。

对于“五四”的反思，涉及到不少具体的问题。

比如，对于“人”的理解和对“知识”“理性”这些从文艺复兴以来，就认为是不可逾越的“金科玉律”的看法。他反对自任为“启蒙”者的高傲态度。认为，理性精神和人的力量，并不是万能的，把所谓的“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绝对化，神话，会造成偏颇。（见《反思录》123页，《近作集》21—22页）我认为，这一见解，非常重要。

他反对把“思想和学问”“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传统和现代”等等概念人为地对立起来，以这种两极对立的模式来分析探讨思想和文化问题。（《反思录》336页，《近作集》29—30页）

我和他谈到过对所谓“文化断裂说”的看法问题，认为，事实上并不存在“全面反传统”的“文化断裂”，对于“五四”是否找成

了文化断裂，有没有文化断裂，都可以考虑。他认为这是应该关注和研究的。

和元化先生交谈，我感觉更多的是聊天，而非“受训”，也可以说是探讨——我不知道其他人如何，反正，我有不同看法也就直接提出。他曾和我讲到，认为“五四”时期的人物是反儒家不反法家的。对此，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记得谈过两三次，结果他笑着说，“那就互相保留吧。”并没有一定要让我接受他的见解。

六

先生不仅对于理论问题，在晚年有深刻的反思，而且在具体的文史研究中，也多有创见。

他不是只在思想层面谈思想的思想家，也不是只在文学理论园地内讨论文学的评论家。他在肯定从具体到抽象的作用的同时，深刻地指出，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因为，还有一个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导言》中提出的“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近作集》16页）他认为：升华了的具体，比“理论”更为丰富。抽象，不应该抹煞具体，只有在升华了的“具体”之中，才会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无穷的生命力。

所以，他始终不断地努力从具体问题的研究中，探寻着自己的理念。

如果说在他早年或中年的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理想主义的鲜明印记：喜爱的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显现的热情和坚持（见《思辨随笔》314页，328页），是俄国的思想家，作家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契诃夫的文学思想和对于真理追求的执着（《思辨随笔》322页，325页等），是英国的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美和典雅（《反思录》264页），但是，到了晚年，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则比较多的带有学术性和现实性。主要有如下一些：

一是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中国的《文心雕龙》研究，在80—90年代，有深入展开，和元化先生的作用分不开的。他根据句容出土的《刘岱墓志》，对刘勰家族世系的增补（见

《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一辑，又见《思辨随笔》214页），对于《文心雕龙》创作论中要有“神思”“感兴”的阐述（见《文心雕龙讲疏》276, 280页）等等，都在学界有相当的影响。他自己也担任过《文心雕龙》学会的会长，为组织这支学术队伍，花费了相当的精力。

一是对龚自珍的研究，他特别重视龚自珍不为“俗风”所惑的特立精神，和“经世致用”的治学态度（《思辨随笔》164页）。评价他对于“自我”，对“情”的重视（同上，165页，307页）。屡次引用龚自珍的诗句：“文格渐卑庸福近”，批判时下一些“各领风骚三五天”的“畸形儿”，（同上，164页）在当时的学术文坛，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可参见《龚自珍思想笔谈》，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1978年）

一是对清末的学者朱一新《无邪堂答问》，陈澧《东塾读书记》等的阐述。（见《近作集》92页，98页等）

一是对近代思想家熊十力，徐复观等的关注。对于熊十力，他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那殆是因为，在中年的时候，曾见到熊先生，受到过他的影响之故（《思辨随笔》176页以降）。

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都比较多涉及到传统的著作，这和他想对中国文化作更深入探讨有关。他谈到，在他年轻时期，对于胡风的文化“移植理论”是赞成的，但是，到了晚年，他有了一些变化，或者说发展——认识到事情并非那么简单（《近作集》43页），所以关注传统文化，也就是必然的了。

然而，元化先生决非“埋头国粹”。他仍然面向世界，决不受“国学”藩篱的困束。

他关注法国德里达的后现代哲学，美国的史华慈的史学，日本冈村繁的古典文学，还有台湾，香港的有关学者，余英时，林毓生，杨启樵，杜维明，李欧凡等学者的研究，并和他们保持着各种联系。

他不是那种只套用某种“思维框架”再填入材料的人。他对余英时先生强调完全是

从原始的材料中，来理清历史上思想展开脉络的研究做法，表示非常赞同，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中，获取思想的灵感；在世界文化的大坐标中，探寻这中国文化的位置；力求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寻找发掘“具有现代意义，不仅仅是形式，作风，气派而已，而是涉及到内质的一种普遍理念的东西。”（《近作集》46页）

元化先生曾说：“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思辨随笔》368页）

虽然这些具体的研究，或许有不同意见，有的还没有得出结论，但是他是勇敢的，他的思考方向，留给我们许多思想的启迪。

七

元化先生说过：“我认为，真正的英雄是和我们一样的人。”（《思辨随笔》40页）我的理解，那是说，即使英雄也都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嗜好，当然也会有不足。

我的感觉，在日常生活中，元化先生是一个情感细腻而重友情的人。

他对于友人的关切发自内心。他告诉我，一位我也认识的老学者，因在五十年代，受到不公待遇，是他坚持将其从外地调入到有关的单位。使之晚年境况稍有改善。

对一位年轻朋友的画，曾再三地赞赏。

他曾和我谈起，一位有才学的年青学者，犯了一点过失，他特地为之缓颊，认为不应一棍子打下去，还特地推荐他参加有关的国际会议。

一位年轻的学生，去世以后，他曾不止一次地念及他的工作和成绩。

2004年，我父亲去世。元化先生是从《文汇报》上见到我们家发的讣告的。他特地打电话到我家，表示哀悼。说实在的，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给了沉浸在悲恸中的我和全家人，以相当的心灵上的安慰。

他还和我谈过，等《日本汉学史》的研究做完后，可以回来，为学术界或教育做点事情。我至今感受着这种出自内心关切的温暖。

此外，据我所知，他对于一些认真做学问的学者或后辈，比如，的研究《文心雕龙》版

本的林其锬先生，撰写《龚自珍年谱》的樊克政先生，还有他的学生们和其他人，都曾给过帮助，或加以提携。

当然，对各种人物，他有的赞扬，有的也批评。我的感觉，都不虚呼吹捧，也不意气用事，而是真诚相待，坦述襟怀。我想，这正是他的人格力量之所在。

元化先生晚年的生活，相当简洁。开始时，让我到他吴中路的家中。后来转到衡山宾馆，最后是衡山路上的庆余别墅。

他长期就活动在不大的房间中。简单的桌椅，机案整洁，不像有的学者，坐拥书城，更没有一丝当官的排场和俗气的“豪华”。他有自己的品位。先生对出版的书，讲求装帧典雅大方。比如，《思辨录》封面的墨绿色和《九十年代日记》的紫色，他说，是他自己选的。对于自己著作的线装本，他看着显得比较高兴，这也感染了身旁其他的人。

他更多的是专心地阅读一本书，品味书中的意涵，思考有关的问题。

他喜欢干净。多余的东西，都会叫人拿开。对于他来说，思考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一种人生。

元化先生，非常注意自己的仪表，注意自己的服装和形象，头发总是理得很整齐，在正式的场合，服装得体。只有到了最近几年，或许是因为熟悉了，热天到他那里，因为服用了治理癌症的药，有时汗流不止，他会脱衣裸体，用毛巾擦干。但这也只限于在熟悉的人前。

我偶尔拍过几张他较随意的照片，他说，那可不登大雅之堂。

挥墨操翰，在他的晚年，有着一种怡神养性的作用。他写大字，有时是到上海图书馆的一个研究室去，而中小楷，则就在自己的屋子。拙著《日本汉学史》写完后，要交出版社出版，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中，抽空题写了书名，那是给我留下的难忘的纪念。

元化先生的伙食也简单。到他那里，有时谈得时间长，他便邀我吃饭，叫下面的食堂送上来。他吃得不多。点的菜饭，往往有：扬州炒饭，菜肉馄饨，炒面，素鸡，酸辣汤，炒

鱼片或虾仁，有时则要一份豆腐干或豆腐。我曾劝他多吃新鲜的绿色蔬菜，他说，他的牙不好，并拿出假牙给我看。

前几年，有时看望他的朋友多了，也一起到饭店吃饭，他挺喜欢做得细致的江南风味的菜肴。晚上弄得晚了，他还自己用小的食品粉碎机，把香蕉打碎，搅入牛奶，很满意地说：

“这个营养很好，来尝尝。”于是，给我一杯，算是点心。

而近几年，身体状况渐差，常服用西药，必须早睡。我回到上海时，他便叫我早上十点左右去他那里。住在附近，晚年常照料先生的生活并帮助先生整理文字的朋友，时常送来一点土豆色拉，豆制品，或烧得比较熟软的蔬菜，他有时也会叫我共享。在小桌子上，铺上摆上几个碗碟，就是一顿午饭。

元化先生不是那种刻意掩饰自己的人，和他接触，感觉就是和一位平和的长者交谈，没有局促感。在自然坦诚之中流露出各种想法，和你交流，和你共享。不时会冒出思想的火花，使你触动。时间则不知不觉中流逝。

这一幕幕的往事，至今时时涌现在我的脑海中。

元化先生曾经说过：“伟大的人格，不是一种先验的独立存在，它是在现实生活里形成的战斗要求。”（《思辨随笔》330）讲这话时的元化先生正好是三十岁，一股青春的热血奔突。

确实，人格是在每个具体的人的生活中展现出来的。

人不仅有理性，还有情感。而每个人的情感都不可能用一个抽象的概念，比如爱戴，敬仰等等来概括，文字永远是单薄的。

和元化先生的接触，他晚年生活中所见所闻，当然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感受。记忆和认识，总带有个人的色彩和片面性。但是，我相信，正因为每个时代有这样的人，这个世界才有温暖和光明，我们在生活中才有希望和前进的勇气。

2002年2月

贾植芳先生散记

日本金泽大学 李 庆

贾植芳先生去世已经快一年了，总感到应该写点什么。

我和贾先生的接触是片断的，他在我脑海中的记忆也是片断的。但是，印象深刻，渐渐地如浮雕般地定着下来。

一

侯艺兵拍的那张照片（见《文集》理论卷前），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先生的性格。

倔强的颈项之上是已经斑白萧骚的头发；深邃斜视的目光，透过那镜片，射向前上方；不粗大但非常有力的胳膊连着一只筋骨张露的手，仿佛要挥扫一切不平。

一看就知道，是条硬汉。

他喜欢抽烟，动作带有硬直的机械性。左手夹烟，大口地抽，大口地吐，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

他写的字，也是直来直往，如棍子搭成一般，不太有弯曲。

年近九十，照样喝酒，吃红烧肉。

大声说话，带有浓厚的山西方言。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和他接触过的国内外的朋友说，“难懂。”但听惯了，会品味出其中时而露出的机锋和幽默。

二

最早见到贾先生，是在复旦大学的“1100号”——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复旦大学的文科研究生，都知道这个地方——原来的教师阅览室，那是我们求学的殿堂。

一天，见一个干瘪的老头，在图书室中，翻看着英文、日文的书，我非常佩服。听说，

他就是贾植芳——“胡风份子”。那时除了外文系的文科教师，能读外文资料的，为数有限。能读两种外文，更是凤毛麟角。他当图书管理员，对学生非常热诚。

八十年代初，一位有才华但不太走运的朋友——汪礼旸，带我去了贾先生家。当时好像是因为要校对贾先生翻译的《契诃夫手记》什么的，闲聊了一会儿，没有什么深的印象。

这位仁兄，在人生路上波折起伏，贾先生提到他，并不以人的沉浮而异样。他后来成了“美食家”，自豪地告诉我，上海的四千多家菜馆，十年间，他已经吃遍了三千五百多家，并要带我去品尝。前些日子，在电视上，又看到了他和美女记者在介绍美食，可见仍在继续着他的事业。但显得更丰硕，面部的纹路也多了。我脑海中浮出两个古老的汉字——饕餮。不知他还记得我们一起去见贾先生时的情景否？

三

先生最早给我的书，是《悲惨的玩偶》。书名源于一个日本学者的著作。我开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好像渐渐明白了。

学者，文人，应该是献身社会的人，而不是玩偶。不是供人娱乐的玩具——权势者的，或社会上什么人的。

知识份子，成为了玩偶是悲惨的。而“悲惨的玩偶”还包含着对于实际上不得不成为“玩偶”的悲哀。他曾经大声地对我说过：

与其唯唯诺诺，还不如该说的就说，该骂的就骂，该大笑的就大笑，该痛哭就痛哭。不然的话，还不如去卖大碗茶，茶叶蛋。

当时谚曰：“手术刀不如剃头刀；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指知识份子地位低下，收入微薄。后来，我写了篇关于该书的小文章《大时代的悲哀》，发在《文学报》上。后来又把他这话的意思写入了《日本汉学史》的《前言》，他看了，挺高兴。叫我“好好写。”

四

先生的一生，和胡风密切相关。

胡风去世，久久未开追悼会。后来要开了，他很高兴。为了表示对胡风的追悼，1986年1月10日，他叫我去他家，要我为他书写给胡风的挽联。关于他写的挽联，已经有不少说法。当时，他给我的纸上，实际是写了四联，而不是一般传说的三联。我抄录了下来，按顺序如下：

其一：今日得平反，聊可慰君于九泉之下；因直而见罪，这个历史教训应记取。

其二：因直而获罪，可叹古今竟这么相似；今日祀忠魂，时代毕竟不是老封建。

其三：焦大多嘴吃马粪，贾府多少讲些人道主义；阿Q革命遭枪毙，民国竟是一块假招牌。

其四：因忠获罪咎，始作俑者应本无后人；以文定罪，这个老文章不许再做。

下署：沉痛悼念胡风同志，贾植芳，任敬敬挽

他问我“哪个好？”我当时觉得，“焦大”那一联比较“冲”，说，“这条算了吧”。他笑了，好像也觉得有点什么。结果我用隶书，书写了第二联。

当时，他还要我把王戎先生的挽联也一起写了。王戎先生的是：

生也坎坷，死也坎坷，人世岂无公道在；
人为革命，文为革命，群众终有是非心。

追悼会上，据说先生痛哭。回来后，他对我说，会上对挽联反应很好。

近年有的文章说“1985年”开胡风的追悼会，似不确。

五

贾先生的梗直和倒楣，乃众所周知。

他自我调侃：“妈的，我被北洋军阀关过，国民党关过，被日本人关过，还被共产党关过——四朝元老。”尤其从1955年被关，到1979年解除管制，乃是坐“自己人的牢”，感到有点“那个”。他自称“江湖派”，有两方印章：“洪宪生人”、“秦坑余民”。在给我的书的扉页上，特地盖上。鲜红的，如血。

他说：“蹲监狱也是一种人生。”（《狱里狱外》159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在漫长的监狱岁月中，他看到了社会各个层面不同人物的外表和灵魂。

1980年后的六年中，干的是教授以上的工作，拿的是有限的收入。到退休，退休金更有限。但他决不奴颜婢膝，趋炎附势。

一次，我和他在大学附近一个小饭馆吃饭，一位已经有点腾达的朋友来，见了，和我们打招呼。我与此君可以说是“同年”，所以站起寒暄。而贾先生则毫无反应，坐着照吃不误。我以为他们不相识。坐下后，和先生开玩笑：“你是趁机独吃啊。”他也笑：“那是某某某，我不想理他。”原来如此。他有自己做人的原则。

1987年1月11日，他写下了自己的座右铭：并特地让女儿贾英（原名桂英）抄了一遍：

“在绝望的坚壁前，正是希望的火花闪烁的地方，因为只有这个时候，你才发现了自己，认识了自己的价值，明了了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你从世上得到了什么，而是体味到了什么，这里才有诗，才有哲学。”“我年过七十，饱经忧患，在生命史上，曾有几次被暴力推到死亡的边沿，所幸大难不死使我对人生、历史、社会和自我的认识和体会，不断得到深化。”

（《文集》书信日记卷，41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

每读这段文字，我总忍不住内心的冲动。

六

在复旦大学，在上海的比较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研究中，他所倾注的心血，起到的开创作

用，有目共睹。

他认为，文学是照耀着人生前进道路的火炬，是战场上挥舞着的利剑，是高举着冲锋的战旗。

关于比较文学，他说：“不了解中国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不了解中西文化之间的不同体系，不同特点，要建立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理论是不可能的，就是连比较文学研究也容易流于形式上的比较。”（《文集》理论卷，209页）我认为，这至今是该学科不易的指针。

这方面，有他的研究生等弟子在，有专门的研究者会去研究，薪火相传。

有的朋友笑称先生为“老顽童”，其实，在学术上，他是很认真的。

七

贾先生硬朗外壳的内部，充溢着对亲人，朋友，学生的爱和柔情。

对师母任敏生病时的照顾，令我们后辈感动。师母多年躺在床上，记得好几次和先生一起在外吃饭，八十多岁的老人还惦念着，要带些比较酥软的萝卜丝饼什么的回去，有时还絮叨着：“给老太太吃”，那种真挚的情感，催人泪下。

在《日记》中他写道：“我们这对老鸳鸯，是在长期的苦难的中国暴风雨中一块展翅飞翔的，我们有共同的甘苦，因而也有共同的情谊——爱情。我们的爱情就是我们的事业，它不是儿女之情的小天地，是中国的历史和天空广阔的中国大地，苦难的中国大地——医治她的创伤，和她的敌人（内奸外寇）斗争，保卫她。”（《文集》书信日记卷，225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

他曾托我为女婿小周找留学的学校。我问他：“都走了，你怎么办？”他说：“年轻人，要发展。我，过得去。”无须多言，心意尽在其中。

对于学生，他更是投下了良多心血。

对自己的每个研究生，甚至并不怎么相干的文学青年，年轻朋友，他都尽力地为之开辟道路。一位年轻的学生，到日本进修，他写了推荐信以外，还特地写了信一封给日本友人的

信，让我到日本去寄发。还打印多份，让这位学生带着，仿佛是空头的介绍信一般。

关于这一方面，已经有很多学生写了文章。有本书：《给学生们》，好像是李辉编的，可以看。先生特地送给我和我的妻子。

先生喜欢孩子，我的孩子刚到日本时，在小学和同学打架，他知道了，大笑：“好样的。”以后，每每问我：“你那小子怎么样啦？”告诉我，他自己在日本时，也是“不买账”的角色。在一代代的年轻人中间，寄托着自己的情感。

我坚信，一个没有善良感情的人，不会是好人。

八

最后的见面，是在2007年夏秋之交。我回国去看他，感到他有点衰老了，但还健康。

再后来，2008年冬，我回上海，见到思和，说是进了医院。有的消息说他情况不太好，而又有说，“还好，吃得下睡得着。”而我自己则有其他的事情奔波，就没有去看先生。但是，回到日本不久，就听说，先生去世了。颇感震惊。

我给贾英打了电话，说了自己的悼词：

“把大写的人字写在蓝天上的人”

他的弟子们和弟子的弟子们忙碌着，开追悼会。追悼会上，好像没有什么显赫的官方的人物。因为，他生活在民间。

对于自己的一生，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先生曾说过：“不管在我生前还是死后，历史会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的”，（见《狱里狱外》95页）确实如此。

先生曾感慨：“唉，自由，在我的一生里实在太短暂了”，（同上）现在，先生，你或许可以自由了，永远自由了。

我想，先生的晚年，已经比过去他的同志和先辈们好多了，社会毕竟在进步。

2009年3月草

一轴人间大爱 与时代风云的历史画卷

——读马来西亚作家甄供的报告文学 《华教春雷林晃昇》

朱厚刚、翟红

甄供先生是一位学者，2004年从新纪元学院研究员职位退休后，即开始了报告文学《华教春雷林晃昇》的创作，终于在林晃昇先生辞世四周年（2006）之际出版了此书。甄先生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他的这本书不是对历史的一种想象，而是力图对历史的一个还原。为此，他不辞辛劳地对相关的人物做了大量的专访，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他说：“我写报告文学，向来严格遵守这样的规则，即真实性和文学性。”他认为：“所谓真实性，是指所写的必须是真实的史实——现实生活或历史的真实事件和人物，不是虚构或凭空编造，内容是经得起考核的。”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作者运用了富有个人风格的叙述话语，即有效地彰显了历史感，又收获了真实性与文学性，两者相得益彰，共同丰富了文本的内涵。书中鲜活地再现了一代华教领袖人物的领导艺术、精神风貌、高尚品格、文学才华、家庭亲情、生活雅趣，同时记录了如火如荼、薪火相传的华教运动。这本书堪称是一轴人间大爱与时代风云的历史画卷。

林晃昇先生是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中一位伟大的华教领袖，他一生“维护华教，发展母语教育；伸张人权，争取平等地位”。是华教工作者敬仰的楷模。他参与的华教运动长达数十年，历经无数华教事件，若按时序一一道来，不啻是一部流水账本。甄先生说：“我想，如

果不严格挑选，事件不论巨细，都全部照写，那只是资料的罗列，不能算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于是，我选择他领导华教运动的五件大事，即1987年华小高职风潮、独立大学的倡导创办及诉讼案、全国独中复兴运动、“三结合”及“两线制”等，反映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领导的风格。此外，我也抒写他的日常生活、待人处事等等的细节，目的在于丰富人物的形象。”在书中，甄先生着力于以历史大事照见主人公临危不乱、勇于负责的人生底色，以生动细节展现主人公爱憎分明、入情入理的处世为人。在叙述结构上，为了避免平铺直叙，平淡乏味，作者采用了纵横交错、虚实结合的“坐标式”结构。这种“坐标式”的结构以林晃昇先生领导华教运动数十年历史作为纵线，以特选出来的五件大事作为时代的横断面，在“史”与“面”的交叉点上体现作者的创作意图。这种艺术结构，具有“史”与“象”的结合、“虚”与“实”的结合，广度与深度相结合的特点。它既有着厚重的历史感，又给人以似乎可以触摸的时代生活剪影。同时，作者运用不同的叙述视点讲述人物、描画场景，并不时灵活地以时代的记录人和历史的见证人的身份适当发表议论；时而亦采用散文与诗歌的话语凸显出文本的文学性。

时间倒流，回到1987年。书中的第一章围绕着1987年华小高职风潮，记述了处于这次风

潮漩涡中心的林晃昇先生。这次风潮起于1987年10月初，而作者却先从林先生被警方扣留写起：“1987年10月27日下午3时40分，一辆警车停泊在林晃昇家门篱笆外的出口处。”“警方人员表明身份，出示证件，说是奉上头指示，援引1960年内安法令第73（1）条款，要进屋搜查，尔后还要‘请’林晃昇到警局去接受调查。”然而，“当晚，他就被套上手铐，戴上不透明的眼镜，由几名警员簇拥着、押持着，登上一辆囚车，被推进囚车内其中一间黝黑、幽闭的、仅能容纳一人在里面坐着的小室里。”虽身陷牢狱，站在事实和真理一方的林晃昇勇者不惧、临危不乱。在所谓审问团面前慨然陈词，据理力争，反过来像一名审丑的大法官在宣读判词。作者之所以先写牢房中的林晃昇，就是要突显其从容镇定、大智大勇斗士形象。而遵纪守法的文雅人士如林晃昇者，居然会被扣押入狱？这样的悬念设置自然会引导读者急切地想弄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

接着，作者巧妙地以主人公意识的流动为衔接，用有如电影蒙太奇的笔法回叙了1987年华小高职风潮的过程。其中给以人深刻印象的是在“全国华团政党抗议大会”上的林晃昇，“会场上万头攒动，举手如林的景象，映入葆有诗人气质的林晃昇的眼里，这就是一个美的意象：这不是拔地而起的一根根的擎天石柱么？一心一意要挡住压顶的黑云和风暴；这一排排毅然举起的手，抖落了沾在他们身上的杂质和尘埃，焕发青春，展现了众志成城、团结战斗的决心；这一排排毅然举起的手，象征一个民族的觉醒、兀立，正气昂扬，是维护、推动民族教育事业与社会前进的蓬蓬勃勃的力量！”“掌声响起，如潮如涛。林晃昇应邀致词，他精神抖擞地站了起来……今天，他穿的是淡色的长袖衣、长裤和棕色皮鞋，腰间系着深色的皮带，不结领带，予人印象是：优雅、清健，英姿焕发！”“他看到台下密密麻麻的人群，视线全都汇聚在讲演者的身上。他们不停地摇动着抗议的牌子，似舟子升起风帆，迎风招展，只待出航，去搏击风浪前的激动。”林晃昇在大会发言中强调了团结，他说：“在华教危机最深重的时刻，我们取得了更大的团结，华团、执政党、反对党，一切维护母语教

育的政党都能够抛弃成见，求同存异，组成了全国华团政党行动委员会，为维护华小不变质的运动提供了阵容强大的领导，大大的增强了保卫华教运动的决心和信心，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为了民族的前途，为了国家的前途，我们一定要奋勇前进，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最后，在会场上人们高歌团结就是力量。为再现林先生当时的神采和精神风貌，作者对林先生的习惯动作做了精准的描绘，“为了加重语气，林晃昇把身子稍稍倾向前面”。

“他右手紧紧地撑在讲台边上，左手握拳，奋力向上一举！”阅读至此，读者不难感受到主人公林晃昇先生之众望所归，以及他所具有的超凡的领袖素质和领袖风范。林先生1925年出生于森美兰知知港，早年家境清寒，日寇南侵后被迫辍学，后来秉承父志从事采矿事业。完全凭借自身的苦干、学识和智慧，他在矿业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从而提升了他的社会地位，进而成为工商业界的领袖之一。

仍是在黑牢中，作者借着主人公意识的流动来推动情节的发展，以跌宕起伏的笔致叙述了独立大学的倡议创办以及独大诉讼案，全国独中复兴运动，“三结合”和“两线制”等大事。在这些华教运动与马来西亚政治生活的大事中，林晃昇先生都起着重要和积极的作用。1970年代末期，作为独大有限公司理事会主席的林先生召开理事会会议，决定向最高元首请求批准创办独立大学的请愿书，并不遗余力地推动签名盖章运动。但独大的创办遭到政府的拒绝，接着在1980年代初，起诉政府的独大诉讼案被判败诉，面对接踵而至的挫折，林晃昇并不气馁，他认为：“深具历史意义的独大事件，不论是它的倡议响应，争论、禁止、诉讼或判决，都轰动一时，影响深远，因为它涉及的不仅是一间民族大学的应否与能否创立，而是我国人民是否享有发展母语教育至大学阶段的基本人权与宪制权利。”“我们相信，只要民权运动能够在各族群、各阶层深入开展，只要人心不死，独大这颗铁树，最终一定会开花！”

多年来，在马来西亚的华教事业一直举步维艰。“1973年，林晃昇为了维护华文独中的生存与发展，组织了董总全国发展华文独立中

学运动工作委员会，并拟定《华文独立中学建议书》，对华文独中的使命、办学方针、统一课程、统一考试、经济问题、师资问题、学生的来源与出路等问题做了具体的建议，作为发展华文独中的指导原则。”“林晃昇认为独中的使命，主要有三个方面：1、教育（母语教育）的；2、民族的；3、基本人权与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对此，他更强调的是母语教育：“要达到华文独中的使命，要紧的是维护母语教育。母语已经被世界公认最为有效之教学媒介。通过母语教育，充分掌握和发挥所学，以发扬固有文化，培养人人必须具备的文化精神，使之成为良好有用的公民。”同时，“林晃昇认为，发展华文独中具有重大与深远的意义，不仅仅是挽救个别垂危的独中而已，而是为了基本人权、华族公民权利与义务可获得平等对待。”1973年至1990年，是林晃昇担任董总主席领导董教总为“维护华小，发展独中，创办独大”的华教运动的17年，这时期华教正值“黑云压城城摧”的多事之秋时节。作为华教运动的领导人，他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凝聚力量。一面抗衡单元化语文教育政策的施压或干涉，另一面要为华教护航、领航，使华教之舟不致倾覆，平稳地渡过礁石遍布的海域。在这一段波诡云谲的时代风云中，林晃昇没有辜负社群的厚望，充分发挥了他的领导才华与魅力。因为有了林晃昇先生，才有“今天，董教总教育中心、新纪元学院等雄伟的建筑群矗立在华侨山岗上——这原是独大的校地。”

在书中，甄先生还给读者讲述了林晃昇

先生的诗人气质、文学才情的另一面。在年轻时，林先生曾是在马华文学诗坛上十分活跃的青年诗人，创作了多部长篇叙事诗，如《快枪八条》、《沙漠夜曲》、《夜曲》、《桥下的一群》等等。它们大多发表在1937至1941年之间，那正是当地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和退潮的时期。林先生的诗作反映了这段时期救亡运动的起起伏伏，同时也关注了艰难时世中的凄苦民生。如《桥下的一群》描写了战争难民的生活，桥下的河岸是难民们唯一的栖宿地，更有甚者，社会的冷漠，闹市人们的鄙视，使他们饱受精神磨难，诗中体现了对弱势族群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充满人文主义的现实情怀。林先生的诗作深受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尤其是艾青诗歌的影响，诗风清新、自然、刚健、舒展，深得艾青诗歌之神韵。

此外，作者透过林先生的女儿、伙伴、战友的眼睛，从多个层面展现了一个为维护华教、伸张人权、捍卫民主而不屈不挠、奋斗一生的主人公。在甄先生的《华教春雷林晃昇》里的许多关于“华教运动”的动人故事中，始终涌动着他笔下主人公那种震撼人心、催人奋进的如春雷般的豪迈气概和大爱无疆的人格魅力，同时，在作者流畅、跳跃的文思中渗透着一种乐观向上、坚守信念的精神气质。在甄先生的这部报告文学中，还穿插有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资料，不仅再现了一个真实的华教领袖的风采，也忠实地为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作证。



汉语的同字异序词

中国·广西 覃盛发

汉语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这样的词：两个语素颠倒次序组合而成的词有的是同素异序词，如“安慰（ān wèi）”和“慰安（wèi ān）”；有的则并非同素异序词，如“老法（lǎo fǎ）”和“法老（fǎ lǎo）”；有的语素并非同音，即同形异音字，如“长处（cháng chù）”和“处长（chù zhǎng）”；“称职（chèn//zhí）”和“职称（zhí chēng）”；“和暖（hénuǎn）”和“暖和（nuǎn huo）”；有的是两个汉字的单音节语素或双语素多音节词，如“儿歌（ér gē）”（双语素双音节词）和“歌儿（gē r）”（两个汉字的单音节词），“麻麻黑（mā mā hēi）”和“黑麻麻（hēi mā mā）”（双语素多音节词）等等。我们把汉语中这类颠倒语素或者字的次序组合而成的词一概称之为“同字异序词”。

笔者在大学从事本科生的现代汉语和留学生的中、高级汉语教学工作数十年。在教学中，深感各少数民族学生和留学生对学好汉语都有着强烈的愿望，但由于民族语言文化上的差异，许多学生遇到汉语中的“同字异序词”往往是一头雾水，闹不清两者之间在读音和词义上的异同，希望能有一部帮助他们解决这一难题的工具书。为此，笔者用了数年的工夫，编写了一部110余万字的这样的工具书。1989年广西民族出版社收到书稿后，经征订，于1990年7月出版了。但因原书要全部付印，平装本定价将达28.50元人民币一本，而当时刚出版的新版《辞海》合订缩印本，每册定价才22.20元人民币，况且，那时正是“89”风波过后，全国上下“读书无用”论盛行，要出版如此高

价的工具书能有人问津吗？于是出版社征求笔者意见，只好选择了一部分常见的词语，定名为《同字异序小词典》，以平装1/64开本出版。全书选了2864个词语编成1432组，共35万余字，印了4000册，每册定价4.50元人民币，由广西新华书店发行。尽管当年只有铅字印刷，印刷技术不能令人满意，装订亦不十分理想，又逢书市萧条之时，然而出人意料的是，4000册书很快就销售一空，十余年来，还不停地有人特别是留学生来信要求购书。为了满足这些读者的要求，近几年来，笔者又投入了大量精力，对原书作了全面的修订，增选了一些古语词和港台的方言词语，并欲更名为《古今同字异序词辞典》，以1/16开本再版。

修订后的《同字异序词辞典》所收的词（含双音节的简称和缩略语），仍按首字音序分组排列，每组以首字笔画少的排在前头，如“巴结/结巴”、“才将/将才”、“达到/到达”；若两个词的首字笔画相等，则按起笔笔形“一一ノヽ一”的次序排列；起笔笔形又相同者，则按第二笔笔形排序，其余依此类推。如“才干/才干”、“奉侍/侍奉”。可儿化的，加“(~儿)”表示。

该书用汉语拼音方案给每个词条注音。为了便于掌握口语，轻声音节一律不标调，重叠的词按实际读音注音。如名词“爱情”注为“ài’ qīng”；动词“安慰”重叠为“安慰安慰”时注作“ān wei’ ān wei”；形容词“结巴”重叠为“结结巴巴”时注作“jiē jiē bā bā”。若一词的后一个音节既读轻声又读原调，注音时则在该音节前加“·”并带声调符号。如“家火”注为“jiā · huǒ”，表

示该词的“火”某个义项读轻声“huo”，某个义项读原调“huǒ”。离合动词（即中间可插入其他成分的动词）注音时中间加双道横斜线“//”表示。例如“报警”注作“bào//jǐng”。正文中的生僻字或异读字亦加注音。例如“刘璩(Qǔ)”、“鋈(wù)”、“发见(xiàn)”、“才将(jiāng〔jiàng〕)”、“将(jiāng〔jiàng〕)”等等。

词义解释主要参照《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出版，2008）、《辞海》（辞海编辑委员会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1979缩印版）、《辞源》修订本（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等编，商务印书馆出版，1980）、《现代汉语难词词典》（吕才桢、白玉昆、白林等编，延边教育出版社出版，1985）、《方言小词典》（傅朝阳编，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1987）、《当代港台用语辞典》（朱广祁编著，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1994）等等，力求古、今、方言义兼顾。每一词均注明词性，每一词不只一个意义的则分别用①、②、③或①、②、③……标示，属方言义的加“〈方〉”注明，港澳台词语在“〈方〉”内加“〔港台〕”或“〔港澳〕”说明；词义用黑体字标示，同义或近义的以一个解释为主，其余作“同××”或“犹××”，并在例句后加“参见××条”说明。

为了突出本书的实用性、指导性和可读性，每一词语的每一义项均引有例句，并注明采撷来源。对词义的解释和例句的选择尽可能做到两个“兼顾”：一是释义尽可能做到古义、今义、方言义兼顾，故不少义项在一

般的辞典中无法查到，而本辞典则可查到；二是例句的选择尽可能做到一般性例句和知识性例句、哲理性例句兼顾。如“健康”一词表示生理机能等正常，一般无缺陷和疾病。这一义项的例句有：①老师，祝你～长寿！（一般性例句）；②多吃番薯有益～。（知识性例句）；③～使人快乐，快乐使人～。（哲理性例句）。例句中“～”代表被解释的词。需要作某些特别说明或引起注意的，则加按、注、注意等。为了节省篇幅，若例句已在其它词目中引用过，则作“例见××条”“×义项”“×例”或“又见××条”“×义项”“×例”；对于来自当今新闻媒体上的例句，若涉及不便指明的真人姓名，其名一律用讳饰号表示，如“李××”、“张××”。为了能充分显示被解释的词语在句子中的语境及其充当不同的成分，有利于加深对被解释的词语的理解并仿效运用，一般一个义项往往选有多个例句，也不拘泥于句子的简洁，有的选用了长复句甚至是句组（句群）。例句中有一些转引了相关辞书的注例。在此，笔者谨向所有被引用例句的相关作者及相关的出版社、报刊杂志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方便检索，本书前有“词目首字音序索引”，后有“部首检字表”，其中包括“部首索引”、“检字索引”、“难检字笔画索引”等。

该书的修订工作还在紧张进行中。为了能让海内外读者及早了解此书的概貌，现按本书编排体例，从正文排序的前十个字母的每一个字母中选出若干条词语试作刊载，敬请读者、专家、学者们指教。

（编纂者覃盛发教授征求出版商合作出版此词书以飨读者）



祝《新世纪学刊》出版九周年

不 尽 长 江 滚 滚 流

廖宝强贺

《新世纪学刊》出版九周年

柳 暗 花 明 又 一 村

梁荣锦贺

连奇、史英、风沙雁、骆宾路书目一览表

一、连奇著作

1. 《小楼随笔》(连奇著)

内收随笔杂感47篇。

新加坡春艺图书贸易公司1988年5月出版
共128页, 定价新币4.00元

2. 《繁华集锦》(连奇著, 散文集)

内收散文28篇。

新加坡春艺图书贸易公司2001年11月出版
共122页, 定价新币6.50元

3. 《那一丛夹竹桃》(连奇著, 诗集)

内收新诗43首。

新加坡春艺图书贸易公司2002年5月出版
共93页, 定价新币6.50元

4. 《罗雀四辑》(连奇著, 文艺评论集)

内收郁达夫研究, 新马及中国文艺评论共24篇。

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年6月出版
共227页, 定价新币20.00元

5. 《郁达夫佚文集》(方修、连奇合编)

内收郁达夫佚文36篇, 为郁氏旅居新加坡期间为《星洲日报》撰写的社论, 是研究郁氏爱国抗日的珍贵资料。

新加坡风云出版社1984年6月出版
共200页, 定价新币5.50元

*以上定价不包括邮费

三、风沙雁著作

1. 《砂砾集》(诗文合集)

(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公司出版, 1974) S\$1.00

2. 《矛盾集》(杂文、散文集)

(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公司出版, 1976) S\$1.00

3. 《樱花飘落时节》(散文集)

(新加坡风云出版社, 1982) S\$2.00

4. 《文艺絮语集》(文学小语)

(新加坡中外翻译书业社, 1991) S\$10.00

5. 《哀思集》(散文集)

(新加坡中外翻译书业社, 1991) S\$9.00

6. 《海外来风—新加坡人眼中的亚洲》

(时事评论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3) RMB¥3.80

7. 《风沙雁文集》(散文、议论文文集)

(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7) RMB¥35/-

8. 《追逐阳光的人》(长篇小说)

(新加坡创意圈出版, 2003) S\$12.00

9. 《遥远的期待》(长篇小说)

(新加坡风云出版社, 2008) S\$15.00

10. 《方修及其作品研究》(上下两册, 819页)

(新加坡春艺图书贸易公司, 2001) S\$35.00

11. 《风沙雁精神家园透视》

(新加坡: 斯雅舍, 2009) S\$16.00

二、史英著作

1. 《花草集》, 1966, S\$0.70

2. 《诗苑短笛》, 1985, S\$4.50

3. 《花开在掌上》, 1986, S\$2.60

4. 《诗文合璧》, 1988, S\$2.20

5. 《弦上寄情》, 1991, S\$2.20

6. 《三色并盘》, 1992, S\$2.20

7. 《笛声向晚》, 1993, S\$2.00

8. 《又唱黄昏后》, 1995, S\$2.50

9. 《一串旧事的沧桑》, 1996, S\$2.00

10. 《双溪合流》, 1997, S\$2.00

11. 《脚印之延续》, 1999, S\$3.60

12. 《三弦弹指下》, 2000, S\$3.80

13. 《新华诗歌简史》, 2001, S\$10.00

14. 《双花并蒂开》, 2001, S\$4.00

15. 《马华诗歌简史》, 2002, S\$10.00

16. 《史英诗歌精选》, 2002, 人民币¥25.00

17. 《三星伴孤月》, 2003, S\$6.00

18. 《单花在双叶间》, 2004, S\$7.00

19. 《史英诗歌精选之二》, 2004, S\$15.00

20. 《文学三合一集》, 2005, S\$7.00

21. 《史英诗选》(中英对照, 角逐诺贝尔文学奖之范本), 2005, 人民币¥50.00

22. 《我的文学在狮城》, 2006, S\$15.00

23. 《新华诗品》, 2006, S\$3.50

24. 《祖孙四代的人生沧桑》, 2007, S\$6.00

25. 《诗文同源各自流》, 2009, 人民币¥35.00

四、骆宾路著作

1. 咖啡正香浓

新亚出版社

新加坡文艺研究会联合出版

1990年

2. 人与鼠

成功出版社

1991年8月

3. 一幕难演的戏

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93年7月

4. 她说, 蓝的是天空

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96年1月

5. 与稿共舞

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

1999年6月

6. 变脸的男人

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

2000年9月

7. 海与岛

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

2001年11月

8. 看海去

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

2003年4月

9. 匆匆一瞥人间春色

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

2004年12月

10. 骆宾路微型小说

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2004年11月

11. 一粒荔枝

香港文艺家协会出版

2005年5月

12. 心之所系万千千

联华书报社出版

2007年9月

13. 千里之约

香港文艺家协会出版

2009年2月

编后话

本学刊创刊以来已九年，回顾我们走过的路向，“立足本土，放眼世界”这基本方针始终没变，但因势利导以配合寰球局势的变化却也是我们掌控方向盘的原则。九年来，我们由开始的以中日学者为尖兵，以新马学者为压阵队伍的姿态出现，到2005年的提出着重研究亚细安华文文学的改弦易辙，遵守的就是因时制宜的方针。因此，从2006年起至2008年的《新世纪学刊》所刊登的新马以及其他亚细安华文文学的研究文章就多了起来。这一期的学刊也不例外，有关新马文学的评论或研究文章依然占了很大比例。这个特色我们会保留下来，但我们也想作一点小调整：我们考虑，今后适量刊载一些世界各国的华文文学的研究文字，毋庸赘言，这当然也是为配合世界局势的演变。

我们注意到，近几年来，中国除在世界各地设孔子学院外，更择地设中华文化中心，这些举措隐然说明，和平崛起的中国已开始用软势力来影响世界。今后的世界，即将出现以王道为主调的东方文明对抗以霸道为基调的文化的局面。正是在这样的势态下，《新世纪学刊》在走过整整九个年头后，在本地学术界取得一定的成绩的基础下，我们决定把视野扩大至寰球的中华文化文学发展状况的探讨。

英文由于殖民地的关系，在世界很多国家已经成为所在地的母语。我们一提起英文文学，想到的绝不只是英国文学，它还包括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文学乃至于非洲、亚洲的一些国家的英文文学。同样的，今后人们若提到华文文学，就不应该只是指在中国大陆的以及包括台港澳的华文文学，它还应该包括亚细安各国的华文文学，乃至于美、加、纽、澳等等国家的华文文学。

语云：“橘逾淮为枳”。中华文化传播到地球各个有海水处，或落地生根、枝茂叶盛，或根损茎伤、枝枯叶萎，或硕果累累，或花果飘零，境遇纵然各异，其所结成的果实，味道却都有异于来源国。在春风荡漾吹醒万物之际，正是我们探索、评估这些“枳”子的各种滋味、前景的良好时机。

枳既有橘之耐寒耐冻本色，欧阳修诗句“残雪压枝犹有橘”足以证明这点；又有随遇而安之淡薄情怀，枳能生长在热带即是明证。这些由橘演变过来的枳，目前在世界各地长成什么模样，该如何改进它们的生长环境，它们之间须如何沟通交流等问题，都是我们深感兴趣的。今后本刊会朝着这方向迈进，希望世界各国的华族学者协助我们实行这目标。



新加坡斯雅舍 新世纪世华文学书列



君
室氏叔模某諱全
世嘉同始光全
宋泰時代蓋字
廓峰弟段周景
之叔商之完
序際堪既胄敦
竟曹輝定武煌
子參天策王效
孫赤曹勲秉毅
遷輔國福乾人



新世纪学刊

MICA(P) 031/10/2008

Published by
Si Ya She 斯雅舍
150 Orchard Road
#02-31 Orchard Plaza
Singapore 238841
Tel:(65)90122319

ISSN 0219-6085

ISSN 0219-6085

0219 6084

售价 (本地S\$12/=
外地U.S.\$8/=)